注释：

字体为：正文字体、五号

【…】 表示是对原文的引用

正常文字 表示对文章所述的概括记录，以及原文表述

// 表示段内分段

**xxx 加粗表示是该段概括的、总领的文字**

**xxx** 表示至理名言，需谨记

**xxx 认为的重要的句子、对标黄的至理名言的个人注解或见解**

*xxx 表示额外的知识补充，一般来自百度；或原文中大段落的举例*

xxx 表示该段落的突出重点

xxx 表示本篇的背景，颜色为字体常用色的第一行最后一个

xxx 小五字号，表示例如书信等来源于原文的对其他地方的内容的引用

(xxx) 括号+小五字号，表示对接下来大段文字的简要概括，一般为可略过的内容

# 第一卷（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12.1）

本篇的背景：当时党内的两种倾向：一、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与国民党的合作，忽略了农民；二、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忽略了农民。毛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忠实的同盟是农民，并预见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会在革命高涨时分化，右翼将倾向帝国主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①要先找到正确的方向，才能走到正确的终点，否则走再多的路也是白费力气的。错误的方向甚至会导致走得越多错得越多，后期纠错时浪费更多的资源。②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别人，要先分析其方向和目的，不要把正确的精力浪费在错误的人身上。

中国过去革命总是失败的基本原因是没有认清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为了分辨敌友，需要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当时，这两个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代表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始终倾向于帝国主义，是反革命的。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派。

*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销售自己的商品，有两种方式，第一，自己派人亲自来开店，但成本太高，第二则是找中国人来代理，帝国主义国家只需要派兵维护销售的秩序即可，成本下降。其中的代理商就是买办阶级。*

*地主阶级：农民运动是要推翻现有的土地所有制的，而土地都是地主所有的，这显然是损害地主的利益的。这种情况下，地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需要一个靠山，因此也会倾向于帝国主义。*

*国民党：国民党进行作战需要的一是武器，二是粮食。高端的武器是从帝国主义国家那里买来的，但帝国主义国家并不会愿意进行纯粹的商业行为，一些附加的条件必然会强迫国民党同意，例如销售自己的商品、保护自己的代理商也就是买办阶级。粮食有两种途径，一是搜刮民脂民膏，二是向地主募粮。至于不直接抢的原因，一是抢的行为本身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二是维护自己的形象，因此不如借此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给予他们军事保护，并收取自己需要的粮食。*

*综上，地主阶级完全依附于国民党，通过国民党间接依附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同时地直接地依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而国民党又直接依附帝国主义。之所以说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附庸，这样看来就是因为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利用这三种力量来实现对中国的殖民化。*

* 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是他们受到外资打击、军阀压迫，因此希望革命能解救他们，二是当革命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又会侵害他们想要成为大资产阶级的愿望，并开始怀疑革命。他们想要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阵营的交锋中，他们的势力不足以成为第三者，因此他们或是加入革命派，或是加入反革命派。

*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基础的体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中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通过学习、努力、科学研发从而掌握管理权、科技专利等等进而掌握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一群人。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且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家庭为单元拥有的，所以中产阶级主要由“中产家庭”组成。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中产阶级是有相对稳定的收入 🡪 稳定的社会地位 🡪 稳定的心态 🡪 因而希望社会稳定的社会阶层。*

* 小资产阶级。可分为三个部分：

1. 属于右翼，占少数。他们是有余钱剩米的，除了必要花费外，能存下一些钱的，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但又胆子小，害怕革命，他们的地位与中产阶级最为接近。
2. 属于中立派，大概能占一半。他们是大体上可以自给自足的。现实让他们觉得世界已经改变了，自己必须在自己的职业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劳动才能维持生活。他们对革命持怀疑态度，觉得革命的成功是很困难的，但并不会真正地反对革命，而是中立，不会贸然参加。
3. 属于左翼，数量不少。他们是从富贵家庭没落的，现在的日子与以前的日子的对比让他们感到精神上的痛苦，三个群体中是最容易主动参加革命的。

当革命能够看见胜利的曙光时，左翼会参加革命，中立派也会趁势加入，而右翼受到左派和无产阶级的裹挟，也会被动参加革命。

*小资产阶级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即不受人剥削，也不剥削他人，例如小商人，小手工业者。*

* 半无产阶级。包含5种：1.绝大部分半自耕农；2.贫农；3.小手工业者；4.店员；5.小贩。半自耕农和贫农是数量极大的，所谓的农民问题也就是这两者的问题。这五种人群的特征都是以微薄的收入对抗不断上涨的物价，除主业外还需付出额外的劳动才能维持生计，生活困苦。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 无产阶级。主要就是现代工业中的工人。此外，与此类似的还有：码头搬运工、车夫、农村中的雇工等人群。这部分人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原因有二：①集中；②经济地位低下。他们没有生产手段，如土地、生产机器等，只有双手，没有发财的希望又要忍受各种压迫，所以特别能战斗。
* 游民无产者。指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理这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他们很有力量但也有破坏性，需要引导得法。

综上所述，我们的敌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及其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朋友是：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需要提防的是：中产阶级，因为其右翼可能会是敌人，左翼可能会是朋友。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

是毛为了回答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震慑，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主要讲了当时农民运动的必然性和不可阻挡，要慎重选择在前面领导他们还是在后面批评他们。

#### 组织起来

主要讲了当时农会中农民人数已经大幅增加。

*当时的农民已经组织化，“农会”就是那个组织。*

####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农村的恶劣习惯。】当时的斗争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农会已经取得一切权力，目标已经被驱逐，那部分人能跑的则跑，跑不了的则想方设法请求加入农会来避免被进一步攻击。

#### “糟得很”和“好得很”

不用多说，对于农民革命触动了自己利益的人来说，农民革命自然是“糟糕的”，而对于农民或类似的人来说，自然是“好的”。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

【一切革命通知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下划线的这句话体现了农村革命的重要性，农民最为工人阶级最主要的朋友，也就要关心他们的利益，并且领导他们。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的原因有三：1.没有把农民当作同盟军，没有帮助农民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也就没办法唤起他们的革命热情；2.看不起农民，没有把握住时机来领导、启发他们应该如何革命；3.部分革命党人不仅没有帮助，反而利用、镇压农民革命，导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需要注意的是，农民是受旧时社会压迫最为严重的一批人之一，因此他们的思想相比之下会更为落后，难以冲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当遇到革命时，他们或是不能正确理解，或是漠然视之，有时甚至还会妨碍革命，这也是部分革命党人看不起农民的原因之一。*

#### 所谓“过分”问题

对于被斗争的人来说，自然是“过分”的，因为他们仍然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根基，只想让出一部分自己的果实作为妥协。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上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 所谓“痞子行动”

农民运动已经兴起，因此没有人敢明确反对，因此有人就说农民运动是对的，但领头的人不行，说他们是痞子，得换。

#### 革命先锋

农民可分为三种：富农、中农、贫农，并不是每一类人对于农民革命都是相同的。

* 富农。如字面意思，富农原本的生活就是富裕的，他们并不是那么需要革命来改善生活，因此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是消极的，当革命取得曙光后，他们才因为形势而感到害怕，被迫加入革命。
* 中农。他们原本的生活就是还算可以的，因此会持观望的态度，对于革命的成功率是怀疑的。
* 贫农。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生活本来就是落魄的，因此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资金，不会害怕失去什么，又或是有少量的土地和资金，但仍需要额外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他们对于革命是最为积极主动的，因此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对于这批人，需要团结他们，不可以打压他们而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

#### 十四件大事

1.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将所有的农民组织起来，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在短期之内，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农民协会，使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感到震惊，是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
2. **政治上打击地主。**农民有了组织性后，第一个行动便是打压地主的权力和地位，这个斗争是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只有这样，之后的经济斗争例如减租减息、要求土地等才有胜利的可能。农民从政治上打压地主的方法有：

* 清算。组织清算委员会，将经过土豪劣绅之手的、极有可能被贪污的、账目不清的地方公款重新计算，其意义不重在追回公款，而是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打压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把农民的权力提上来。
* 罚款。对有罪的土豪劣绅进行罚款，使其体面扫地。
* 捐款。捐款虽然与罚款相比较轻，但地主为了免祸，也会进行捐款。
* 小质问。邀集多人涌入土豪劣绅的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并使其停止恶意行为。
* 大示威。集结大批人对土豪劣绅进行示威。
* 戴高帽子游乡。在某人身上注明“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敲锣打鼓引起他人的注意，对其颜面扫地。
* 关进监狱。如题。
* 驱逐。如题。
* 枪毙。对于罪状严重的土豪劣绅，农民集结各界民众督促政府对其进行枪毙，也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1. **经济上打击地主。**截断地主经济来源或过程，例如不准谷米出境、不准抬高谷价、不准加租加押、要求减息等。
2.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打倒都团，即打倒土豪劣绅的权力机关。*“都”是旧时像镇、县之类的区域等级。*旧式的都团政权机关，几乎全是土豪劣绅占领的，要夺取其权力。
3.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如题。
4.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县知事”即县长。*土豪劣绅霸占权力时，无论什么人做县长，都是贪官污吏。农民革命后：1、各种民众团体一起参政议政，监督县长做事；2、将审案转移到农民协会，使县长及其手下无法颠倒敲诈，断了其贪污收入来源；3、使警察队、警备队、差役等团体不敢再下乡敲诈农民。
5.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国家系统的政权、家族系统的族权、迷信的鬼神系统的神权，以及女子所额外的来自丈夫的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四种权力随着地主政权被推翻而一起动摇：使家族族长和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贪污祠款、使用残酷的“家法”；破除鬼神迷信，将庙产用来当农会经费、办学校；贫农的妇女也需要进行劳动，因此也占了家庭中一部分经济来源，所以在家庭中也有发言权，再团结妇联，破除“夫权”。

需要注意的是：要把握主要矛盾，这些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要让农民自己去摧毁，作为革命党人，不要代替、勉强他们，否则会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

1. **普及政治宣传。**即对农民普及“三民主义”、“平等”、“自由”等理论知识，由理论指导实践，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怎样是错。例如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用三民主义理论进行抵制。理论的重要性。（参考历代农民起义，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就停滞不前）
2. **农民诸禁。**例如禁止赌博、鸦片办酒席、放鞭炮等等。这些禁令有两个意义：①对于社会恶习的反抗，因为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的权力倒台后，这些附庸之物也需要一起扫除；②对于城市商人剥削的自卫反抗，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 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贷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粮食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3. **清匪。**字面意思，小偷、土匪等不再出现。原因有四：①农会会员人数众多使得土匪无处藏身；②农民运动后，粮食价格变低，不再因为民食问题而被迫当土匪；③一些旧中国民间团体加入了农会，将出气的目标对准了土豪劣绅阶级；④各路军队招募兵马，部分土匪当兵去了。
4. **废苛捐。**军阀没有被推翻，因此革命军的军费还是需要农民负担，这免除不了。但是土豪劣绅执政时对于农民的剥削被推翻了。
5. **文化运动。**【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未受教育的人里，比例最高的就是农民，地主被打倒后，农民的文化运动也就开始了，使农民的文化有所提高。农民是反对“洋学堂”(例如教育局想要办的国民学校)的，因为教材所讲的内容并不与农民实际需要的知识，而且洋学堂的老师对待农民的态度是不好的。因此，农民提出的是想要农民自己办自己所需要的“农民”学校，例如“私塾”。
6. **合作社运动。**农民特别需要“消费”、“贩卖”和“信用”这三种合作社，因为农民 “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和“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虽然有自主组织“借贷所”，但没有详细、正规的组织法，即没有正确的理论，需要指导。
7. **修道路，修塘坝。**有钱的地主不肯拿出钱来修道路和塘坝，农会建立后强迫他们进行。

以上十四件事，恐怕只有土豪劣绅说不好。某些革命党人，天天说着“唤起群众”，民众起来了害怕，这是叶工好龙。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10.5）

这是毛1928.10.5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当时主要是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部分同志对“红旗到底打多久”有疑问，在这次会议上，毛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

蒋1927.04.12发动“清党”行动，屠杀了近38万国民党的中基层党员，共产党也被害5万多，仅剩1万多人，此举基本彻底断绝了国民党与社会基层民众的联系，其目的是打算挟北伐胜利之威，在推翻北洋政府统治的同时，实现他个人在国民党内的独裁，做中国的实际掌权者，他几乎成功了，但以蒋为代表的新一代军阀，他们自身内斗不断，还弱小的党也于1927.8.1揭开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南昌起义，在一系列成功或失败的起义后，党积累了许多斗争经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也与毛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但依旧面临着随时覆灭的危险。

#### 国内的政治状况

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本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并成为反革命。主要是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由于共产党不注重军队的领导权，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破坏革命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都没有还手之力。蒋介石已大权在握，其治下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变得更厉害。

各路军阀虽然名义上表示统一，但实质上都是独立的，他们所各自依靠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也有矛盾和斗争，因此，只要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存在分裂，那么这些军阀们也就是分裂的。

中国迫切需要一次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不能由其他阶级领导：1.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总是由于其受到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失败；2.农民阶级有其局限性，不可能领导新兴的革命；3.地主阶级是被革命的对象；4.其它如小资产阶级革命不具备坚定性和彻底性。

中国的民主革命内容：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 1. 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地方，多股帝国主义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与其他帝国主义斗争，而没有统一的统治力量对革命起义进行统一、直接的镇压。即多股大势力之间的斗争使得部分小势力能够有立身之地。

*中国的国情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在以后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思想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从这里出发的。*

* 1. 是发生在因为之前的革命而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崛起过的地方，群众有了一定的“红色”基础，能够分化出红军。即之前已经有过0🡪1的结果，使得能够继续从1🡪2。
  2. 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即红色政权的发展趋势与大环境的趋势是一致的，而不是逆流而上的。
  3. 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即红色政权拥有自己的正规军而不是松散的“杂牌军”，能够抵抗敌人正规军的进攻而存活下来。
  4. 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即决策的正确性保证不会走上毁灭的道路。具体例子见下方的“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斗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实力，小地方的红色政权得以乘机产生。但当白色政权暂时稳定之后，他们便会联合起来消灭红色政权。

决策的正确性使得湘赣边界的割据能够成功继续存在，具体决策有：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这些具体的政策加上合理利用地形环境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八月的失败的原因为决策的错误性：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乘力持异议的毛等人不在时，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失败。*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才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才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才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才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才--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 经济问题

因为敌人的封锁导致物质的缺乏，这个问题需要注意。

#### 军事根据地问题

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 井冈山的斗争（1928.11.25）

这是毛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有且仅有中国之所以能够存在若干的红色政权，原因：1.只有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不断的分裂和战争；2.有很好的群众；3.有很好的党；4.有相当力量的红军；5.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6.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对于不同时期的白色政权，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当他们分裂时，可以在注重坚实的中心基础的同时采取激进的策略；当他们稳定时，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策略，最忌把兵力、人力分散而不建立坚实的中心基础。 // 当敌人稳定而不内部分裂时，他们会集结正式军队来进攻，如果这时我们还分兵，则必然会被各个击破。同时，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能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 // 以上就是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即没有分清统治阶级的两个时期，采取了错误的策略。而其他原因还有：1.一部分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分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为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 割据地区的现势

描述了当时割据地区的战况。

#### 军事问题

割据地区的所有问题因为生存问题而偏向军事化。

边界红军的兵源有很大问题，以前的骨干部队在多次战争后数量已经不如新兵，而新兵又以俘虏居多。

红军的成分，一部分是工农，一部分是游民无产者。游民太多自然是不好的，但战争频繁又伤亡大，游民分子有战斗力，并且能找到游民已经算不错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加紧政治训练。

红军废除了雇佣制，即使士兵感觉到是为人民打仗而不是为了他人。红军至今没有正规的工资，只发放物资和少数的零用钱，本地人则分配了土地。

政治教育使士兵有阶级觉悟以及土地分配、建立政权和工农武装等知识，知道战斗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阶级，因此士兵没有怨言。

坚持党代表制度，督促进行士兵的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好，哪一个连就健全，而连长则不太有这样的政治作用。此外，下级干部死伤过多，俘虏往往不久就要担任领导，因此也不能废除党代表。

红军没有时间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军事技术差，只能靠作战勇敢，只能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

红军的物质生活条件差，全靠打土豪供给军费。从伙夫到军长，条件都差，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物资缺乏、战斗频繁，而不败亡，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没有那么多的等级规定和条条框框，士兵感觉物质不如敌人，但精神得到了解放。不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士兵的革命积极性、肃清由反动军队带来的军阀主义风气，当然，提倡民主时也要反对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

连、营、团、军四级都有党组织，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有很大作用，得以经得起考验。要继续发展党员的数量。

地方武装的扩大刻不容缓。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红军需要尽量帮助地方部队武装起来。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地方武装则以分散为原则。敌人稳定时，会集中大量军力攻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

敌方的俘虏愿意留的则留下，想走的则发路费释放，以打破敌人对红军的丑化宣传。此外，文字宣传，如标语等也在进行。

#### 土地问题

大部分的土地仍然在地主手里，实行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

农村阶级可分为：①大、中地主阶级；②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③中农、贫农阶级。富农虽然占有的土地不多，但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受中间阶级的阻碍。中间阶级在革命初期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上则利用以前的地位从中作梗，例如恐吓贫农、拖延时间、隐瞒土地实际数量、自占肥田分出瘠田等。在此期间，贫农因长期受压迫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而不敢积极行动，只有在多次的胜利的刺激下，才会对中间阶级进行积极的行动。

革命高潮时，贫农的积极行动也让他们有所恐惧而不敢乱为，甚至主动亲和。而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他们会在敌人优势时马上背叛、反水。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他们反叛的主因（*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

日常生活受抑，例如盐、布匹、药材等的缺乏，也会导致中间阶级的反水。贫农阶级因为长期习惯比较能忍受物资的匮乏，中间阶级忍不住时就会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间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

对于土地分配的标准：一般为一视同仁平均分配。以劳动力为标准多劳多分，实际上是不妥的。而富农想以他们拥有的优势生产力，如人工和农具(资本)，生产力多的也分的多，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而浪费了他们手中的优势生产力，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问题仍然需要讨论。

至于土地税，部分地区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而红军给养，米暂时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完全靠打土豪。

#### 政权问题

各级民众政权虽然普遍地组织起来了，但是名不副实，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所谓的代表会，或者是由一哄而集的群众选举出来的，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和投机分子的操纵。又或者是选举完毕后就名存实亡了，权力由其他组织掌控。

原因在于代表会这一新的政治制度缺乏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脑中，一时扫除不尽，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

没有代表会而只有委员会时，委员会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维护群众利益时不坚决。

初期的委员会中，一些小地主富农装作很热心，争着上位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

#### 党的组织问题

* 机会主义

过去新军阀们主导的反革命大高潮导致党组织全部被破坏，近一年以来重新建党，相当多的机会主义的现象出现，许多党员的观点游移不定，敌人来了，要么躲并无心斗争，要么盲目的暴动，两者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红军内亦存在这种现象，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想法，在讨论作战时往往由一个人说出来，这就是机会主义的错误。经过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拼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改正。

*机会主义，也称投机主义，意为应付或妥协，最早用来形容19世纪法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党和政客。后指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的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潮、路线。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着变化了的情况前进，而是拘泥保守，停步不前，甚至企图开倒车；只顾眼前的暂时的局部利益，而不顾工人阶级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他们或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或低估计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势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观情绪，不敢斗争甚至主张搞阶级合作；或者害怕革命形势，屈从反动势力，压制群众斗争，放弃原则，甚至出卖革命，投降敌人，其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分离。又叫右倾投降主义。*

*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并占统治地位。表现为不是放手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而是放弃党的领导权，致使党不能组织有力的斗争。抗日战争初期，曾经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王明，在只要联合，不要斗争，“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以退让求联合的思想指导下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把抗日领导权交给蒋介石，严重影响了江南新四军的发展。*

*右倾和“左”倾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它们虽是从两个各不相同的极端出发，但思想基础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既反对“左”倾，也反对右倾。*

*另一种是“左”倾机会主义，表现为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离开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时的现实性，堕入空想和盲动。 “左”倾主义者或者急于求成，夸大革命主观力量，轻视敌人力量和客观困难，在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盲动的冒险的行动；或者在革命组织内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或者在同盟军问题上实行关门主义，打倒一切。*

*这种“左”倾思想如果形成为系统完整的路线并在实践中执行，便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或叫“左”倾冒险主义。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出现过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

* 地方主义

有些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关系。党在基层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会议简直就是家族会议，各地方是各自的山头，只关心自己地盘上的利益，而看不到全省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需要在斗争中遭受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打破地方主义。

* 土客籍问题

即本地户籍的人与外地来(移民)的人之间有很深的历史仇怨，占领山地的移民素来被占领平地的本地人压迫。这种矛盾被反动派所扩大、利用。八月进军湘南失败后，本地豪绅反攻回来，宣传移民要杀本地人，本地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本地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移民又去没收本地人的财物，继而党内也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现在的办法是一方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反动派影响，安心回家，一方面由当地政府责令移民将没收的财物退换原主，并出布告保护本地农民，务必保持本地党员与移民党员的团结。

* 投机分子的反水

革命高涨时，许多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待白色政权优势时，又趁机反水。当对党内进行“清洗”后，党员数量减少，战斗力却增加。过去党组织全部公开，现在开始建设秘密的组织，这样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另外，多方伸入白区，力图在敌人内部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原因有二：一、在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我军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党员难以立足，目前正在纠正错误。

* 党的领导机关

党的领导机关开始重组和重新划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党组织内几乎全是农民成分，以后需要增加工人的代表，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否则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 革命性质问题

中国现时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是要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还要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的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

对于全国革命潮流是感到低落的。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所到之处没有友军，群众态度冷淡，敌人也没有倒戈现象，需要在当地进行大力的宣传才会有所起色。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道路。

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之前上级觉得我们的政策不够激进，烧杀太少，没有“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但是后来执行的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太过激进，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开始反对我们。直到后来改变这种太“左”的政策，情况才有所好转。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我们将其打倒并取消这些税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 割据地区问题

对当时罗霄山脉区域的战局的分析。

###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1929.12）

这是毛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是经过了艰难的道路的，红军从1927.8.1南昌起义创始，到1929.12，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这个时期内，红军中的共产党和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学到了很多东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写的这个决议，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个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国区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

当时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其来源是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 表现

1. 认为军事和政治是两者对立的，没有认识到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
2. 以为红军和白军一样是单纯地打仗的。没有认识到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除了打仗，还有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任务。没有后面的任务，也就没有打仗以及红军存在的意义。
3. 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及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4. 忽视宣传、组织的重要性，忽视军队士兵会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
5. 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6. 本位主义，只知道为红军第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7. 觉得只有红军第四军这一唯一的革命势力，因此，存在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8. 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幻想。这是盲目主义的残余。

*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后来这种思想渐渐减少。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 来源

1. 政治水平低。没有认识到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2. 雇佣军队的思想。很多带有这种思想的俘虏的加入带来了这种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3. 以上两个原因导致了第三个原因，即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4. 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

* 纠正的方法

1. 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红军第四军)本位主义。
2. 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3. 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官兵。
4. 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5. 编制红军法规，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纠正的方法：

1. 从理论上根除。
2. 指出其危险：损伤党的组织，削弱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造成革命的失败。
3. 指出其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4. 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要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看具体情况)，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 关于非组织观点

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时，他们不诚意地执行决议。

纠正的方法：

1. 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问题时不要调和敷衍，要把是非弄明白。在不妨碍工作的前提下，一次会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多开几次会。
2. 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用户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 非组织的批评。
* 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有些党内批评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

纠正的方法：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 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和组织外没有分别。

纠正的方法：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这一小节的原文是在下方的“关于主观主义”中的，因内容是党内批评，所以挪到这里来了。）*

####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具体表现，例如：发给伤病用费，不分轻伤重伤，要求平均发给；长官起码，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宁愿工作完不成，也不愿比别人多做一点。

**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 关于主观主义

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纠正的方法**：教育党员使其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 1. 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2. 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其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3. 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 关于个人主义

**具体表现**：

1. 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就找机会报复：当外则打骂就，党内则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会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
2. 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
3. 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数量很少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4. 享乐主义。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到大城市去，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不乐意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5. 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6. 离队思想。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人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一是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是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

**具体表现**：

1. 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
2. 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
3. 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1. 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2. 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3. 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4. 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具体表现**：

1. 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
2. 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
3. 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
4. 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
5. 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

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1. 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2. 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1.5）

这是毛1930年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征求意见的信。毛在这封信中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一种悲观的思想。1948年林彪向党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毛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毛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毛决定以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针对红四军内部弥漫的悲观情绪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如果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

1. 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日益激烈、扩大，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
2. 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
3. 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
4. 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
5. 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6. 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是正确的。

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才能动摇反动统治阶级的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

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1. 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敌人的力量也是弱的。西欧的革命主观力量虽然强，但其敌人比他们更强，因此不能即时爆发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欧快。
2.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只剩下部分的小力量，自然会使部分人感到悲观。但若从实质上看，剩余的部分小力量在中国的环境里简直具备发展的“必然性”，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不可只看现象，要去实质。初期，有的人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而当再次被围剿时，又变得悲观。
4. 现时还是有人被表象迷惑而忽视本质。一遇到挫折，就把当下的困境所属的时间和空间扩大化，认为其他地方、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的。其原因在于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

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兵力🡪消灭更大的敌人🡪占领城镇🡪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扩大政治影响🡪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①好一点的环境和②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这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争取江西”这个决策本身是正确的，除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但其缺点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还有三点：

一、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

二、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

三、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

以上三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于其他省而言，农村起义更普遍，红军游击队更多。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只能说出未来发展变化的大致方向，不应该机械地规定时日。

### 反对本本主义（1930.5）

这是毛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句话其实不野蛮，没有调查，就不明了情况，就是闭着眼睛瞎说。

####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如果不能解决某个问题，就应该调查它的现状和历史。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这样，一定要产生错误的办法和主意。

遇到问题，不应该只是叹气、恼火，而是应该真正地走出门去，了解工作范围内的各个部分。又或者是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总之就是想方设法搜集情报，把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而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才能纠正这种本本主义。

####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如题。

如果不做实际调查，其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唯心的。这并不是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例如“李逵式”(忠诚但处事鲁莽)的长官，对于手下犯事就乱处置一通，其结果是犯事的人不服气，产生更多的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了。

####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如题，就是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的原因。

社会经济调查，其**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其**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其**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革命主力”、“同盟者”、“敌人”这三个部分各自含有哪些阶级。因此，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和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和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要注意调查的方法是否正确，否则就是“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例如，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中农)、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

以下是要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

* + 工业无产阶级
  + 手工业工人
  + 雇农
  + 贫农
  + 城市贫民
  + 游民
  + 手工业者
  + 小商人
  + 中农
  + 富农
  + 地主阶级
  + 商业资产阶级
  +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阶层)的状况，都是调查时要注意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当时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模糊。斗争不可能只停留在农村，因此不仅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任务的第一步，是争取大部分工人阶级，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跟着就要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任务需要依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坚决的斗争策略，否则革命就会暂时失败。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想要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而使工人阶级受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日益走向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但这需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的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需要时刻了解新的社会情况、进行新的实际调查。斗争的策略是一直在不断更新、进步的，不应该认为可以依靠以前的策略而一劳永逸、不做进一步的行动。

#### 调查的技术

* 1. 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 1. 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有进步的思想、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兵士、流氓都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 1.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要依调查人的指挥能力而定。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二十几个人。人多的好处是，在做统计（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和结论（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时，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人多的坏处是，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 1. 要定调查纲目

　　要事先准备纲目，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有疑义的则提起辩论。“调查纲目”要有大纲和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 1. 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 1. 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后，再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 1. 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8.12）

这是毛1933.8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演说，阐明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经济建设事业。因为，现在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组织、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

即使是战争时期，也不应当认为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是不重要的，或是认为只有等战争胜利后有了和平、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

**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敌人的经济封锁、破坏金融和商业、妨碍对外贸易。例如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会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而对生活不满意，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影响到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所以，不应该认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如果一切应服从战争而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加顺利地发展军事。例如，不再需要花费额外的经历去寻找补给而能专心地打敌人；广大群众不再因为困苦的物质条件而犹豫是否加入红军。

与此同时，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环绕、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

　　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否则会影响到工作的成效。因此，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从组织上动员群众。** //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督促、检查。 // 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们都加入到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 // 再者，要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讲明白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提高群众的热情。
2. **不应该以官僚主义的方式动员群众**。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包括经济建设工作在内的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而是应该以群众化的方式，即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命令主义：不顾客观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觉悟程度，依靠领导者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问题，并采取简单粗暴、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迫群众接受违背他们意向或他们尚未明了的事情。*实际上，命令主义是不能成功的，即使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其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发展。例如，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因此，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而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3. **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但是，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4. **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例如，①只有深入查田运动(见下方补充)，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②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③只有正确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才能健全政府机关，使政府更有力地领导各方面的工作；④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⑤至于红军的扩大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

*查田运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查田是为了查漏划的地主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巩固和纯洁苏维埃政权。1933.6.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同时按照1931.1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规定，《训令》还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在这次查田运动中，存在着“左”的错误。*

###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10）

这个是毛1933.10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 **地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见下方)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以下三类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①之前是地主，虽然已破产，但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②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③依靠放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

*收学租：旧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所有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有一小部分，农民有权干预。*

* **富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 **中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偶尔、稍微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与贫农的区别见下方的“贫农”部分末。）

* **贫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需要租入土地来耕种，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 **工人**

工人(包括雇农)一般全无(或拥有极少)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完全或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 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1）

这是毛在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

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在自己统治的区域内民穷财尽，并宣传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并进行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其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的经济。

经济政策的**原则**：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经济建设的**中心**：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红色区域的农业，从结果来看，是向前发展的。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主要是由于在分配土地期间，地权还没有确定，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走上轨道，以致农民的生产情绪还有些波动）。但是经过分配土地确定地权并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生产便恢复并进一步得到发展，如产量提升、开发新的土地、组织新的队伍、更合理地调剂生产资源。

而国民党统治时期，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这里应当指出：

* +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各类日常用品的原料(棉、麻、蔗、竹)的供给问题。培养森林、增殖畜产，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重要农产作出生产计划、动员农民努力，这是必须的。
  + 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耕牛、肥料、种子、水利等问题，须领导农民来解决。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与，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任务。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重要季节对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
  + 部分农民缺乏耕牛也是一个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无牛人家合股买牛共同使用。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是迫切地需要的。

敌人的封锁使得货物出口困难，因此许多手工业生产衰落，例如烟、纸等。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自给，其次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两年以来，因为开始注意和群众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工业开始恢复、兴起和发展。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有计划地组织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异常需要。

现在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私人事业和合作社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

私人经济，只要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内，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在极迅速的发展。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才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为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可能的方法。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的收入，是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其效果已逐步表现出来。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经济建设，是会计制度的原则。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1.27）

这是毛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么，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也不能战胜敌人。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例如，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保障工人的利益、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等，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解决了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使群众知道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群众也就自然会拥护我们，也就能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号召群众参与到革命战争中。有的同志只关心自己所制定的革命目标，对于群众困顿的生活问题丝毫不理睬，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失去了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的两大任务是：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我们不仅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也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要巧妙地把两者结合，而不是完全独立。要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即使是正确的任务或目标，在错误的实行方法上，也是不能成功的。

###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

这是毛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毛的这个报告是在1935.12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的。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毛根据中央决议在这里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唤起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中共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1935.1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的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 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政治形势开始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想要将中国变为殖民地。

过去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使得中国在反抗中能保存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其阴谋失败。1922年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的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1931年9.18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限于东北四省，而现在则其侵略范围开始扩大到全中国，想要将中国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而该采取怎样的策略，则需要先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对其的反应。

##### 工农、小资产阶级、土绅军官买

* **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多次革命斗争已经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 **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和农民一样，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生存空间，并且也已经多次进行过革命斗争。
* **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买办**，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认为无论任何革命都帝国主义更坏。因此，他们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

##### 国民党营垒（民族资产阶级）

在**国民党营垒**中，比较复杂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中，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部分人是其右翼，暂且不去考虑他们；而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其特点就是“**动摇**”，原因在于，他们与地主、买办不同，没有封建性、买办性，不喜欢帝国主义而又怕革命的彻底性，因此在二者之间动摇，这能解释他们曾参加革命，后又投靠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现在，中国由半殖民地走向殖民地，而他们曾经抛弃同盟工人阶级，投靠地主买办阶级，却没有得到好处，反而是民族工商业破产。综上，在斗争的某些阶段，其左翼可能加入斗争，另一部分则可能动摇而中立。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他们同红军打过死仗，后又同红军订立了同盟：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一起打蒋介石。无论他们将来采取怎么的策略，但是把火力由红军转向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都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则今天的环境也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党内有人认为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他们没有正确认识今天情势，并且忘了他们确实曾经分裂的历史（历史事件这里就不记叙了）。

有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软弱性，而认为他们不会变化，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不能解释他们曾经确实加入过革命，其软弱性也不应该是从前没有而现在却产生的。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因此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也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贿赂为钓饵将他们临时吸引过去，因此他们也有革命的不彻底性。但不能说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综上，说明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时，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时，国民党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蔡廷锴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是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其**反面问题**在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欺骗民众。原因在于，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各帝国主义的走狗们可能随其主人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利益的斗争。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而这不过是不同的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对于革命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 民族革命营垒

**红军**。一年半以来，三支主力红军都放弃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红军本身也有很大的削弱。如果以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得到暂时的部分胜利，我们遭遇暂时的部分失败。但是，红军完成了长征，从这一方面看，红军在“保持原有阵地”是失败了，但在“完成长征计划”是胜利了。敌人在“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是胜利了，在“实现围剿、追剿”是失败了。

　　讲到长征，其意义在于，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长征：十二个月，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长征是宣言书，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让广大的民众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长征又是播种机，在十一个省内散布了许多种子，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主力红军如此，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则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各种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学生**运动正在不断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各种破坏、镇压，则必须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

　　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参考前面。

**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所有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民族统一革命战线。

##### 民族统一战线

　　知道革命、反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当着革命的形势改变时，革命的策略、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中国的和世界都临在革命的新时期，两者的革命力量相比过去都有所增长，但仍小于反革命力量。总的革命形势将会发展更快，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状态还是会存在，需要花费长时间、大力气才能达到平衡，而且还需要一个优秀的革命策略。

当下革命形势的特点和事实有两个：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新的全国大革命即将发生；二、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的力量还是很强大，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革命的力量严重不平衡，这使得须作持久战的准备。因此，必须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

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统一战线**认为：

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中国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 🡪 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弱点 🡪 组织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 打破关门主义 🡪 以统一战线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友 🡪 认清、并将火力攻击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这个主要敌人 🡪 把敌人驱逐到狭小、孤立的阵地上去 🡪 将潜在的友军变为真正的盟友 🡪 革命力量扩大，革命胜利。

**关门主义**认为：

要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对于革命，力量要纯粹、道路要笔直。没有其他阶级是可以团结的而变成盟友的，只有自己是唯一、永远的革命力量。因此，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答案自然是统一战线的理论是对的，关门主义则是要反对的。革命的道路必然是曲折的而非笔直的，阵线也是必然会变动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只有统一战线和广大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而关门主义会将潜在的友军全都被迫投靠到敌人那边。

##### 人民共和国

　　政府的成分，除了过去所已经有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政府的成分扩大后，任何只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人，都可以加入，甚至是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因此，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修改过去的政策。

1927年革命失败，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而现在，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其重要性在于，使得有了革命中心力量，可以避免卖国贼势力用各种手段破坏统一战线，对力量小于他们的势力进行击破。

对于统一战线的广泛队伍，必然会存在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统一战线必然会因产党和红军的存在而一起发展，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付革命队伍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用来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把人拉过去，我们则也能把人拉过来。总之，现在一切中间势力，必然依附于我们或他们中的其中一方。而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们的政策，会驱使很多的力量到我们这边来。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80%-90%。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需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这是没有问题的，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并不包括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而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如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中国80%-90%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顾民族利益，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势力，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则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是并不危险的。工人、农民是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1927年至今，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 国际援助

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有了帝国主义后，世界就牵连为一体。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包括中国。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包括中国在内，义战遍布于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抗日战争需要国际援助，首先是苏联，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蒋介石隔断了国际革命力量而使中国革命力量而成为孤立的，而现在得到已经改变，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

#### 一、如何研究战争

##### 1.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不论做什么事，不了解事情的情形、性质、和其他事物的关联，就不会知道那件事的规律以及如何去做。

战争 🡪 革命战争 🡪 中国革命战争。由一般到特殊，除了研究其继承过来的一般规律外，还应研究各阶段的特殊性。

有人认为：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例如苏联革命战争经验)，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但这是不对的，应当尊重但不应该全盘接受，如果当下的情势已经改变，却仍照着别人的经验而“东施效颦”、“削足适履”，是要打败仗的。战争规律是发展的，也就是不断改变的，战争情况的不同，使得“时间”、“地域”和“性质”都各有差别，因而战争指导规律也有差别。从指挥一个连到指挥一个团，采用了更高级的战术，等等诸如此类，都是发展。

##### 2.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乃知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战争，是互相残杀，最终是消灭战争的，但消灭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例如，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国家，则包括革命、反革命战争在内的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就是永久和平的时代。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个人见解：所谓的共产党领导的战争是正义的、是拯救人类的，不过是战争双方以自身利益出发而进行的“名正言顺”罢了，无论是哪一方，都会有从自己利益出发的口号。

##### 3.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因此，小到一件粒子，大到一件事情，一个事物，一个概念，任何事，任何物都可以被看作是全局。比如，一滴水就是一个全局，那组成一滴水的水粒子就是局部。一本书就是一个全局，那书的封面，目录等就是局部。一个公司是一个全局，那公司下的各个部门就是局部。一个团队就是全局，那组成的团队的人员就是局部。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局部战争的指挥者也是有必要了解全局战争的规律的，全局有助于了解局部，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战术决定战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全局和各阶段的战果是战争胜败的主要、首先的问题，即，如果全局和各阶段有了重要的错误，则该战争一定会失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说的是带有全局性质的、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只有局部性、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即，要注意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有些局部的失败不会对全局有大的影响，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因为这些局部对于全局没有决定性作用。但如果决定性的部分失败了（如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全局就立即起变化（例如，多次胜利后的一次失败而全功尽弃、多次战败后的一次胜利而扭转局势）。指挥全局的人，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战争的全局，这才是最吃力的地方，而不应该丢弃这个重点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例如，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于全局和局部的理解，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比如一个师的动作和各个团、营动作的关系。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是否重要或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规律，必须根据具体情势（*例如，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总之，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环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必须用心去想，因为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感受。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某些有关全局性的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它们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都需要用心去想。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 4.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学习战争规律，是为了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而学习是不容易的，使用则更不容易。战争的学问，“纸上谈兵”和实际使用是两回事。关键在于，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使用，两个时候都要用这种方法，即，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有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主观上犯错误，在于战争的部署和指挥不符合情势，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也就是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只能说尽可能地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更好地符合起来，以提高打胜仗的几率。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而突击成功，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敌人配置的实际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是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而全部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的双方是活人且互相保持秘密，这和处理静物或日常事件是不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 🡨 正确的决心 🡨 正确的判断 🡨 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使用一切侦察手段获取各类情报 🡪 筛选并多方面思考 🡪 加入自己方面的情况，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 🡪 构成判断，做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做出每一次战争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鲁莽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而是把军事计划建立在单纯空想、不符合实际的基础之上，又或是受敌人的欺骗，受部下错误的鼓动，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

认识情况的过程，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和建立之后都是存在的。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到战争结束，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就必须有新认知和新计划，以适合新的情势。无论是部分地改变还是全部地改变都是正常的，不知改变而只是一味盲干，其结果必然是糟糕的。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摸熟了自己的和敌人的部队情况（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以及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就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理论或规律，都是关于过去战争的经验总结，都是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与此同时的，更为重要的，就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然后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则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没有机会进学校机会却仍然可以学习战争的主要方法。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也就是从一无所有到“入门”的距离。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或用得纯熟不容易，但入门并不难，干革命、干战争，可以迅速缩短这个距离。入门后只要有心并善于学习，深造也是办得到的。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只单方面地了解自己或了解敌人，都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规律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各利益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等诸条件，并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的活动必须基于客观物质条件，即参照物质条件的许可范围，而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而企图战争的胜利，在这一范围内，军事家则可以进行各式“表演”来发挥威力打倒敌人，也就是必须用主观指导的能力来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而不是鲁莽地乱撞乱碰。指导战争的规律，就如同在大海中游泳时的游泳术，使之不会沉没并有步骤地达到彼岸。

#### 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1924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1924-1927和1927-1936；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他们是革命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一定会失败。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前提是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

1924-1927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革命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1927-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有了新的情况。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并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领导权，这是使革命具有坚持性的最主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①1931-1934的“左”倾机会主义，使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这个错误是在1935.1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②1935-1936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严重损失，后也纠正过来了。这些错误，自然是不好的，但也使党和红军得到锻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解放中国的旗帜，也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深刻影响世界的革命。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 三、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 1.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中国的革命战争有其独有的特点，机械地照搬苏联的革命经验是错误的。而敌人也曾犯过类似错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红军，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特有的策略，这也使敌人1933年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之前与红军的战争失败。而后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不再维持旧的策略，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 2.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中国革命战争有3个主要的特点（将“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合并在一起了）：

1. 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

这个特点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1927冬-1928春的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就不能更进一步。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亿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而又难走的路，以上几者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有了红军的种子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也有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这个特点，基本地同时规定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1. 敌我双方力量悬殊。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是夺取并稳定了政权的党，控制着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是全国性的政权。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其军队获得军事支援后已经完成改造，并且数量上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其军力与红军有天壤之别。

而中国红军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比较稳定的时期。红色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外援，也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并且流动不定，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落后。红军数量少、武器差，军事物资供给困难。

这个特点使得红军的作战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1. 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共产党支持和领导土地革命以获得了农民的援助，使得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威力，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红军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斗，上下层在政治上是一致的。这和国民党形成尖锐的对比。国民党反对土地革命，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下层官兵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政治上的分歧减少了战斗力。

##### 3.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上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3个主要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1和3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2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和胜利的缓慢，即持久战的必须性，以及失败的可能性。

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顺利的条件和困难的条件共存。必须认识到，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中产生的，过去十年的战争也证明了其正确性。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 四、“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红色政权持续遭遇敌人的“围剿”，敌人总是跟着红军并想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则这种形式将一直持续到红军掌握主动权未知。

红军采取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是反“围剿”的胜利，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一次反“围剿”是一个战役，包括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围剿”和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区别。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在于**战争形式的长期反复**(包括一次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即长征)。敌人进攻红军的防御 🡪 红军进攻敌人的防御。这两个阶段长期反复地进行。至于**战争的内容**则是每次不同的，规模、复杂程度、激烈程度都不断提升。

而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再是最具威胁性的，“围剿”的程度稍有缓和。

在战略上说，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类似的“长征”，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强大得多。然而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1930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的长期反复的规律，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很多东西从无到有，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但也是有防御和后退的——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1906、中国在1927；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1918的布列斯特条约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1931-1934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 五、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 1.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1924-1927的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转向阶级战争。最为首要的就是抵御“围剿”的战略防御问题，因为敌人更为强大而拥有主动权。从国内战争说，当红军的总的力量超过敌人，则改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剩下的防御手段就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过去的十年战争中的战略防御问题，常常要么轻视敌人，要么为敌人所吓倒。①领导者将局部的优势推导到全局的优势而轻视敌人，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也没有清晰的认识，采取了错误的积极进攻战略而不是防御和退却，导致许多失败；②而另一些人太看重敌人太看轻自己，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过度防御错过了许多可以消灭敌人的机会，也导致许多失败，例如第五次反围剿的右倾错误，导致根据地丧失被迫开始长征。然而过度防御的错误，往往是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1932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应当坚决反对。

德日两国的军事家积极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不适合中国革命战争。他们认为防御的一个重要的弱点是会动摇人心。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而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能够动员最大多数群众。苏联的革命也是在防御形式下以保卫的口号动员群众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这是说乘敌不备而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应一鼓作气不要让敌人有卷土重来的机会。然而不是说当敌人是优势时也不采取防御手段。

过去的战争，整个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而军事上采取打破“围剿”的形式。从军事上来说，敌人的多次“围剿”是衔接的，而我们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以是否打破“围剿”为防御还是进攻的拐点，其中，防御比进攻更为复杂重要，即如何打破“围剿”，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 2.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围剿”，必须有提前充分准备，才有打破“围剿”的可能。

有一个问题是：何时结束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我们处于进攻地位时秘密进行的，难以知道敌人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过早会减少进攻的收益甚至其他不良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备退却和相关的政治上动员；而过晚时又会陷入被动。断定这种时机，要了解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搜集敌人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材料以了解敌人的情况，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的失败或自己的胜利，也必须估计到敌人的弱点和己方的优势。一般地说来，宁可少点收益也不要陷于被动。

准备阶段中有以下的主要问题：

* 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退却的成本继续变高，例如不要进攻得太远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主要关注于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和训练自己。
*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与红军和群众分析关于敌人进攻的情报以及我方的相关情报，号召全体进行反“围剿”。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 征集新兵有两方面：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 财政和粮食问题。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计算在整个战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 不可不警戒政治异己分子，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

反“围剿”胜利的程度与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联系，无论往哪个方向过分倾斜，其结果会导致失败。

##### 3.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面对优势军队的进攻，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对此反对，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外”。而事实上以静制动、以逸待劳，趁机寻找敌人的破绽，比一股脑地进攻好多了。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曹刿论战》中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战役不大，却说了战略防御的原则：

* 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
* 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
* 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
* 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

我们的战争先是没有经验，经常打败仗，1928.5开始，有了适应当时情况的朴素性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这一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并应用成功。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形成，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然而基本的原则仍是十六字诀。

然而1931.1开始，左倾机会主义者成立了另一整套相反的“新原则”，否定了“游击主义”。其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变成军事保守主义，最后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1935.1在遵义会议才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

他们认为：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的，是主观主义，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依过去情形来说，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

1. 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人民这个条件，是最重要的条件，是根据地的条件，使得4、5、6等条件也容易形成。当敌人进攻时，红军总是退却到根据地，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有了很大的改变，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

1. 有利作战的阵地。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必须讲求阵地条件，并有别的条件相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即因某些因素而比较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能继续退却。白区有优良的阵地却无优良的人民条件。

1. 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进攻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一般情况是根据地中部，依照情况决定，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1. 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实际上往往不知敌人各部分的强弱情况，往往需要长时间地获取情报。这也是战略退却的必要之一。

1. 使敌人疲劳沮丧。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便只有等敌人深入根据地后一直“拖”着以不断削弱敌人，使敌人的弱点都暴露出来，总之就是减少敌军的绝对优势。

1. 使敌人发生过失。任何高明的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也必然会发生一点过失，或用计主动让敌人发生过失。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同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并且也是不可能、没必要的。而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

退却终点的确切位置，具体如选在根据地的前部或是中部等，须要判断敌我双方在局部和全局的条件所形成的形势是否利于我方反攻，将局部形势和全局形势相联系后再决定，并计算到之后的变化，因为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只有局部的形势是利于我方进行反攻，而全局的形势并非如此时，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然而并不是完全拒绝在白区作战或将白区作为退却终点，当敌军强弱悬殊的大规模“围剿”时，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以形成利于反攻的条件。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在根据地的前面、侧面、后面。需要以具体情况为准，且历史上也并没有真正的经验，是理论性的。

反对战略退却的人，其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及物资，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围剿”的堡垒主义中诱敌深入变为无用，我方退一步则敌之堡垒进一步，根据地被逐步蚕食，因此，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是“以退为进”，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丧失土地，而能够战胜敌人加恢复甚至扩大土地，这是赚的。市场交易，买卖者如果不先丧失金钱或货物，就不能取得货物或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破坏是为了取得进步的建设。睡眠丧失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物资及不良影响也是同理。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战略退却的困难，在于选择开始时机、退却终点，政治上说服干部和人民。

退却开始时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退却过早会损失收益，过晚则有风险。及时退却取得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后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二、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对于敌人更快的攻势而退却得太晚，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者还没有权威而决定权还在大多数人手里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相信战略退却是十分困难的。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经验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亲自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否取胜。

##### 4.战略反攻

形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仅是创造战胜敌人的可能性。而决定真正的胜败，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是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不仅是战略退却阶段，反攻阶段也能继续创造条件和形势，但两者的性质和形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两者相同。也会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会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企图逆转局势的努力；而胜利者方面则试图扩大优势，阻止敌人卷土重来。所以，不论哪一方，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为激烈、复杂和艰苦的。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 5.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五次围剿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一○）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193012.30~1931.1.3），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五次围剿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47）。十五天中（1931.5.16~31），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48）。（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49），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50）。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五次反“围剿”经验，证明红军想要打破“围剿”，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很重要。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 **必须打胜，以获取主动权**。确保各条件有利于我，以最大几率取得胜利，否则宁可退让以待战机。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 **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好的全战役计划才有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但这个仗不利于全战役甚至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前，必须想到后续直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每一次打赢或打输，后续会如何变化。
* **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反攻的同时，也要顾及反攻胜利后或失败后，接下来的做法。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

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 6.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怎样复杂、严重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否则就会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远不如进攻战所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中具有主动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而仓卒应战，表面上似乎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

集中兵力，是首先和主要的，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三点：

1. 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由“敌进我退”企图变为“我进敌退”。集中兵力一战而胜以达到这个目的，也影响全战役。
2. 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形式上、内容上，都是起了变化的。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3. 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的红军，有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

从1932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军事平均主义者到1933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是战略的说法，确实是如此；对于战役和战术而言，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损失，其收益是突击方向取得胜利，自然钳制方向的损失也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忽视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惧怕根据地的丧失而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第五次‘围剿’的堡垒主义使我们不能集中作战而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缺一不可。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重要的战场作战，应投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于弱敌或不重要的战场作战，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例如只是作为某种战术的必要条件，比方当作诱饵；或者是充当游击队等，过多的兵力会变为负担。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红军更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 7.运动战

在没有广大兵力和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在防御和进攻上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无用的。敌我力量的悬殊导致红军没有固定的作战线，而是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使得作战线不固定。即使大方向可能没有阻碍而暂时不改变，但小方向是随时可能调整的。一切战争因为其胜负进退的变化而不允许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是常见的。战争的流动性 🡪 根据地的流动性 🡪 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流动性。长期的建设计划是没有的，计划频繁改变是常见的。当下的情势和条件规定了必须制定具有流动性的、非长期的计划，否则就如第五次反“围剿”时否认这种流动性一样，其结果是被迫开始长征。

红军运动战的基本特点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路的时间远多于作战。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一、正面敌人太多；二、与其他部分的敌人联系紧密；三、有巩固的阵地；四、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以上这些时候，都是必须走的，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

并不是说完全拒绝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用阵地战。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是红军幼年时所遗留的。后续则往统一、正规的方向发展，否则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根据当下条件仍然是需要游记性和流动性的，而不是因为往正规化发展而对以前的即使有用的方案也全部否定，否则同样是有害的。

现在处于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是需要做准备的。将来的趋势是往固定化发展的，各方面的流动性会逐渐减小，现在的限制条件也会被打破。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办法，也要反对不再需要的红军幼年时代的非正规性。要坚决恢复积累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的优良经验，并将其丰富、发展，准备步入新阶段。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这里就不说了。

##### 8.速决战

战略上需要持久战，战役和战斗则需要速决战，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必须是持久性的。国际和国内的环境的变化将使得将来的发展更为速度，但仍是持久、长期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而国际的革命势力仍然是弱于反动势力的。

而战役和战斗上则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必须以持久战。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上而是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对的，原因在于：一、红军的军事物资没有来源；二、红军相比白军只有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三、白军密集，战斗时间越长敌人越多。因此，必须实行速决战，甚至是几个小时解决一个战斗。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达到速决的目标还须许多具体的条件才能：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

限于根据地的各资源条件，反“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即使面对困难的形势也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而避免急躁，是完全必要的，仍然需要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下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样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而放弃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到福建人民政府。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 9.歼灭战

“拼消耗”对于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 🡨 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进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1936.12.28）

这是毛1936.12.28就蒋所谓《对张、杨训话》的声明所作的一次谈话。全文围绕着一点，就是督促蒋介石“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

蒋介石氏在西安因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而被迫同意联合抗日。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而言是一个打击，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讨伐派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蒋介石1936.12.26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糊、曲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并没有吸取教训和改变错误的政策，这一声明并没有诚意，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实行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

1.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 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4. 召集各界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 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将于蒋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然而声明中又说西安事变是受“反动派”包围，但没有说明所谓“反动派”的具体含义和到底是什么人。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是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

1. 张杨部队、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
2. 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
3. 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
4. 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
5. 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6. 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

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所说的“反动派”，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和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

　　蒋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还有共产党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的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因为如果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则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这一主张和张扬及宋子文等国民党人的主张是一致的，与全国人民痛恶内战的情势是一致的主张。

　　蒋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今后的问题是蒋是否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否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

　　蒋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8月25日致国民党书（见下方）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这封信的主要部分：“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和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和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和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和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红军和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和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的说法，更是完全的空谈。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中国在现时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和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和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党和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红色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红色区域实行和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和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和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地不能有什么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和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和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和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和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和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的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尽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几乎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在我们和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的愤怒和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的志气和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和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和各省党部中，中央和各省政府中，在教育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和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和爱国的人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着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和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我们希望他们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和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担负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民主政府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地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伟大的革命时期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7.5.3）

这是毛1937.5.3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从三个方面作了阐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对华北事变以后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环境，指出党在这个阶段的具体目标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等。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提出：一、要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具体的动员口号；二、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党要成为先锋模范；三、在不失去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并发展和巩固同盟；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要保证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

#### 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

1. 形势有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
2. 中国长久处在“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和“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两者之中。1927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对立，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民族和民主革命。
3.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 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 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和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
   * 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1935八月宣言，十二月决议，1936.5放弃“反蒋”口号，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2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等步骤之所由来。
   * 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分裂，争取和平与统一。
   * 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并没有减少，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4. 从1935.12.9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1937.2国民党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两广事变，绥远战争和援绥运动，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5.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得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
6. 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两个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前一阶段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是争取民主。建立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必须有和平和民主。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1. 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的战争相呼应，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对中国本部侵略的条件——国内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日本的某些“友好”行为，是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确实要对抗日斗争做准备，但也要警惕有些人以“准备”为借口趁机满足自己的利益。
2. 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急需的必要条件。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民主自由 🡪 全国的和平与团结 🡪 动员人民和发动人民的积极性 🡪 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
4. 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独裁改变为各方合作的民主政体。应首先地、迅速地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之前，改变国民大会违反民主的参与办法，持续并直到各方面都具有民主性，这样才能巩固和平、增强团结。各界爱国者必须着重认识并集中力量于带有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民主化运动，批判、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独裁，执行人民的意见。
5. 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如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言论、结社自由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部分和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广大人民。
6. 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竭尽全力来破坏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托洛茨基主义是一股国际思潮，它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用“不断革命论”来歪曲和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否认农民的民主主义要求，主张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认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胜利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欧洲主要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

1.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是许可和必需的保证，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使国内两个敌对的政权变为团结。这种有原则的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必须保持特区和红军是中共产党领导，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
2. 共产党是同意三民主义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经获得人心使1924至1927革命的胜利。但是1927年国民党反共，使革命失败和民族危险，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心。如今的团结抗日的需求下，重新整顿三民主义，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共产党有自己的纲领，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决不抛弃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但时下两个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可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
3. 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没错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则革命的动力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仅仅共产党继续革命，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奋斗了许多年。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不违背反而坚决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的政策，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新的民主共和国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因为其如今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

#### 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的。

1. 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国内各方之间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应该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
2. 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提高各方面的战斗力。（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区域内实行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文化建设。

#### 我们的领导责任

1. 参加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性，在某一时期条件下会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的领导，并充分发扬无产阶级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1924-1927年的经验表明，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领导时，革命是前进的，相反时革命就会失败。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因此，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必须更加肩负起抗日和革命的领导责任。
2. 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想要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则：
3. 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
4. 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应努力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
5. 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6. 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以实现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
7. 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
8. 关于民主共和国，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其是在民族抗战过程、无产阶级领导下、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9. 向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妨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倾向，需要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要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克服上述不良倾向，需要在全党中提高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

###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5.8）

毛1937.5.8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报告针对代表会议上个别同志对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的不同认识，分别从和平问题、民主问题、革命前途问题、干部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方面作了阐述。指出西安事变后实现了和平，但和平没有巩固。这种情况下，不能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要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实现抗战；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强调了党内民主和全党团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都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它的问题。

#### 和平问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由“争取和平”变为以“争取民主”来“巩固和平”。上述观点于有些人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他们说：“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和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甚至还不如。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我们说和平只是实现，并没有巩固，原因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还是企图让中国内战。西安事变后实现和平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的，必须借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这种情况下，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使革命进程更进一步。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就是否认之前为旧任务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成果，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而没有前进。

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观点的原因，在于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将许多局部和一时的消极影响上升到全局，认为全局都是消极的。我们说国民党的转变并不是彻底的转变，而是需要我们更多努力的。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对新出现的消极影响感到惊讶。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革命并不能一蹴而就的并且可能是反复的，必须是用长时间的努力来逐步推进。国民党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已经变得更为“温和”，因为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是同一道理。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抗日分子。

####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的1935年一二九运动到1937.2国民党三中全会的阶段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了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远抗战或“一二九”。）和平是抗日的前提条件。从“一二九”起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止，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都围绕着“争取和平”这一中心环节和最本质的东西。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新阶段中，许多的抗日斗争也会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虑。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为什么还忧虑？然而，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落得无结果，这是英国和日本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而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强调国民大会，是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带着国防性，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 革命前途问题

有几个同志发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能是简单的。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 干部问题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中国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领导者是狭隘、没有能力的小团体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即使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也早就是一个大政党，有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列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应该学习并提高自己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原文如下：“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

####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实行民主制 🡪 发挥全党的积极性 🡪 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张国焘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表示了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长期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 实践论（1937.7）

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用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辛苦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在1931-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极大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

毛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决定其他一切活动。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性质、规律性以及与人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得到，因此，人们的认识，对于自然界和社会方面，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狭小的生产规模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马列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要认识什么事物，必须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取得了“知”，秀才通过某种媒介接收后才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亲口尝梨知酸甜”。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则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再来看战争。如果战争的领导者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与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必然要吃亏的。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

* 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 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黑格尔·逻辑学》）*。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这里不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没有反映事物本质。要完全地反映事物的整体、本质、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则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理论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则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这些理论的创立，而且在于被后来的科学实践所证实。马列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后来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⑼，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受着许多的限制，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常常部分地或全部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必须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列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 矛盾论（1937.8）

这是毛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文章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结论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文章从方法论上批判了“左”倾、右倾的错误思想。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在研究这个法则时，必须涉及广泛的方面和许多哲学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

* 两种宇宙观；
* 矛盾的普遍性；
* 矛盾的特殊性；
*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 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 1、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可能的、常见的)观点是：

* 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
* 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

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的定义）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及其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事物及其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即，事物的特性是与生俱来和永远不变、不会发展的，改变的只有事物的数量）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原始社会里就有的，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他们认为，事物的一切发展都是外力的作用，即“外因论”、“被动论”）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与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唯物辩证法的定义）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事物发展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物的一切变化源于其内部的矛盾，外力是内因引起的变化的催化剂，外力激化内因产生更剧烈的矛盾）鸡蛋因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举例说明）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打击，是因为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或欧洲，是古代就产生了的。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使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是非常重要的。

#### 2、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的许多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

* 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 二、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社会方面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倾向”。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所有事物都包含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则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简单的运动形式和复杂的运动形式，客观现象和思想现象，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则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旧的对立的平衡状态演化为新的对立的平衡状态），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为简单、普通、基本、常见、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列宁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 3、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必须注意其的特殊点，即，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这是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和区别事物的基础。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构成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自然界、社会现象、思想现象中都同样存在。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依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根据；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而言，总是 个别的、特殊的 🡪 概括的、一般的。当认识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对尚未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必须认识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还未曾涉足的具体事物。教条主义者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并且颠倒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列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即，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不可能暴露过程的本质。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统一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统一看待的。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东西、活的灵魂，即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实践论》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作片面地看问题，或叫作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有些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可以防止错误，防止僵化。”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不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1924-1927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

* 国民党方面：
  + 1. 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
    2. 1927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3. 1936年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
* 共产党方面：

1. 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领导了1924-1927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
2. 1927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
3. 1935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

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否则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即，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则反之。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充分、更完全地阐述了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研究事物时，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时，分析了列宁主义所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而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事物、过程、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包含在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个性产出共性）。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 4、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帝国主义侵略这种国家时，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一些叛国分子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1894年中日战争，1900年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 // 当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1924-1927年的革命战争，1927年以后的10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直接的蛮力打击有时并非是最好的） // 当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时，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其他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或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1927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就要聚焦于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是如此。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找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必须把程中所有的矛盾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随着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非主要方面属于乙；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个事物转化为其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时，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为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且还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在辛亥革命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1924-1927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1927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肃清内部的机会主义后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这时，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例如革命党人犯了错误，1924-1927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1927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1934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时，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任何事情要做时，但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理论的重要性）当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没有违反唯物论，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 5、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

*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 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如何看待这句话？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转化为相反的方面，转化为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1927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1927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在怎样的条件之下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这样看待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即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的“夸父追日”，《西游记》的孙悟空七十二变、《聊斋志异》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这种神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1917.2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10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么，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日常生活中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个过程向着其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见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原文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

#### 6、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答：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列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 7、结论

　　总地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无论共居时还是互相转化时，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互相转化时，斗争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时，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要点，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 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上）

##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7.23）

### 1、两种方针

**第一种方针**，即正确的、坚决共同抗战的方针：

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后发表号召抗战的宣言：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２〕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是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受到全体欢迎，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 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 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 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该谈话的结语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

**第二种方针**，即错误的、主张妥协的方针：

近月以来，有汉奸和亲日派分子在积极活动，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与坚决抗战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需要迅速改变，否则会付出惨重代价。

（接下来就是一些呼吁共同坚决抗战的话，这里省略）

### 2、两套办法

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

1. **动员全国军队。**立即将主力投到抗日战线上，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召开会议，确定战略战术，计划游击战与正面战场相配合；以政治工作使军民一心、肃清亲日分子；训练后备军、确保军事物资补给；
2. **动员全国人民。**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撤销一切妨碍爱国的政策，武装民众以增加抗日力量。
3. **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界人士共同管理，依靠群众、实行民主集中制、清除亲日分子。
4. **抗日的外交。**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争取英、美、法，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
5. **宣布、实行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减少赋税、提高待遇等，提升人民的购买力，复苏经济，以提高抗日力量。
6. **国防教育。**改革教育，使一切媒体和娱乐利于抗日。
7. **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提出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是没有道理的。
8. **全体军政民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社会各界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真正地团结起来，不要破坏团结。

### 3、两个前途

坚决共同抗战，则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

妥协让步则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

### 4、结论

（呼吁共同坚决抗战、反对退让妥协，这里省略）

##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937.8.25）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由于各方面因素，国民党从“对日不抵抗+坚持内战”变为“联合全国爱国力量进行抗日”。

　　但另一方面，国民党依然继续“九一八”以来的错误政策进行妥协和让步，挫伤了爱国力量。日本帝国主义在夺取平津之后，借以德意帝国主义的声援、英帝国主义的动摇、国民党隔离广大劳动民众，将继续大规模进攻。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必须吸取教训，借鉴国外的经验，坚固地团结起来。动员一切力量的关键是国民党的转变。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是有进步的，但在团结群众力量和改革政治环境等政策问题上依然没有转变，这会造成巨大损失。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提出的救国纲领：想要彻底战胜日寇的 🡨 全民族的抗战，而非单纯的政府抗战 🡨 国民党彻底改变政策，全国共同彻底抗日。

　　为此，共产党向各界提出十大救国纲领：

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反对任何动摇，坚持抗战。
2. **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动员全国力量，定期研究抗日方针，武装人民以发展游击战争，进行政治工作使各界团结。
3. **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废除压迫爱国精神的政策，允许其自由进行抗日活动，动员全国人民的现有力量。
4. **改革政治机构**：选举国防政府实行民主集中制，吸收各界抗日力量，肃清亲日分子。
5. **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借用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的力量。支持国际反法西斯阵营。
6. **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为原则。经济政策以振兴国防生产，保证自给，发展农村经济，反对投机操纵。
7. **改良人民和军队生活**：如题。
8. **教育政策**：革新教育以增加抗日力量。
9. **肃清亲日分子**：如题。
10. **抗日的民族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反对自由主义（1937.9.7）

主张每个人都有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因为它有利于团结。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会使得政治上腐化。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主要的有11种，下面归并为8种）：

1. 因为是熟人，为求得和平亲热而不作原则上的争论。
2. 不当面提出建议，而是在背后不负责任地乱说，没有集体意识。
3. 明知不对，但明哲保身，不与错误作斗争。
4. 不服从命令，以自己的意见为优先。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
5. 纯粹是个人攻击、闹意气、图报复，而不是为了取得进步。
6. 办事不认真，敷衍了事，得过且过。
7. 自以为资历老、有功勋，不愿学习，做不了大事也不愿做小事，态度懈怠。
8. 已经认识到错误，但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会使团结涣散，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失去组织和纪律，上下层发生隔离，政策无法正确执行。

自由主义的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集体的革命的利益放在第二位。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两种思想共存，各有各的用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希望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

（共产党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克服自由主义，坚持与错误的思想作斗争，以集体利益为上。）

##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9.29）

（

* 九一八事变后，直到西安事变前，共产党想要与国民党停战并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都没有结果。
*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虽然已经建立，无论对于国内还是国际都有积极影响。但其并不彻底的、坚固的，国民党并没有完全地改变政策以适应统一战线，国民党继续之前的政策使得统一战线无法扩大到全民族、全阶级，仍然局限于以政府军队抗日，这是不能成功的。
* 国民党应当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改革政府和军队，唤起民众，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 共产党之所以实行例如“取消没收地主的土地”之类的政策，是为了更好地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出的暂时妥协。

）

##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1937.10.25）

###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抗日战争不可避免，日本帝国主义的“和平承诺”只不过是托词。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全员全体民众。

### 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

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主要有两方面：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在中国所做的种种，使中国有亡国的危险；二、使中国大多数人和国际认识到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性。

日本的目的你以为是什么？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多少？

日本的计划，一是占领华北和上海，二是占领全中国。说到日寇实现其计划的程度，由于至今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山西亦在危急中。

据你的意见，中国的抗战也有它的成绩没有？如果说到教训，则教训在何处？

成绩有：

1. 现在的抗日战争，是第一次的真正的全国战争，性质是革命的。
2. 战争使全国由分崩离析变成比较团结，国共合作是其基础。
3. 国际舆论从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
4. 将消耗日本帝国主义巨大的资源，为国际反法西斯阵营贡献了力量。

说到教训，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

政治方面，抗战仍然局限于政府和军队，只有参战地域的普遍，没有人员的普遍，广大人民没有参与，这是无法取得胜利的。

团结方面，各方之间还没有完全地团结，党禁等仍然存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军民之间，军官之间，关系依然隔离、恶劣。

军事方面，大多仍然是单纯防御。

那末，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政治上说来：一、建立民主集中的统一战线政府；二、允许人民以爱国行动的自由和武装抗日；三、改良人民军人的生活；四、外交政策的积极化；五、改革教育以适应抗日；六、肃清亲日分子。

军事上说来：由单纯防御改变为积极进攻；改革军队；鼓动人民上前线；统一指挥；以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等等。

更多的参照十大纲领。

共产党如何使这个纲领实行起来？

联合、动员一切爱国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孙中三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纲领，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动员广大民众参与。国民党要继续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实行。

### 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

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

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它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战略战术问题。采取其它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但主力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

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

拿现时这一阶段来讲，多采用分散兵力，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

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此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使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用游击战以辅助。

其次，政治工作问题。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一、官兵一致原则，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全军团结一致。二、军民一致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胜利不仅依靠我军的作战，还依靠敌军的瓦解。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着，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依靠强迫人民，而是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收效大得多。

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它中国军队？

完全能够适用。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1924-1927年的时代。那时国共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

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之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924-1927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

现在抗日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

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

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 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

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三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

据你看，这种危险的前途如何？

前途不外两种：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或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

两种情况中何种可能为多？

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是中国抗日战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

请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其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

### 民主制度和抗日战争

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

不冲突。共产党在1936.8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其含义包括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包括工人、农民及其它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从这三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要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政府必须能够真正代表民意，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难道也有符合的？

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民主集中的、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

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

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

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1926-1927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胜利。

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那末，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为什么？

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1924-1927年的两党合作，使第一次革命胜利。1927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现在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

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那个停止是对的。那是大会按国民党过去的规定召集，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937.11.12）

这是毛1937.11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从这时起，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反对这个提纲；直到1938.9~11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

### 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

片面的抗战也比不抵抗主义进更一步，是带着革命性的，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早就指出：抗战必须要有人民群众的全面参与，进行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胜利——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在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全面抗战中，必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有一个完全执行这个纲领的政府和军队。

　　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是这样的：

　　1、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

　　2、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仅仅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

　　3、德意法西斯竭力援助日本帝国主义。

　　4、国民党对于它的用以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制政策，还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

　　另一方面则表现：

　　1、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力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

　　2、民众运动开展了一步。

　　3、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

　　4、国民党中主张改革现状的势力正在增长。

　　5、国际反对日本和援助中国的运动正在发展。

　　6、苏联正在准备用实力援助中国。

　　因此，目前是处在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在此期间，中国的片面抗战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

　　一、全面抗战。这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国民党还没有下决心。

　　二、投降。这是日寇和亲日分子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

　　三、抗战和投降并存。这将是日寇和亲日分子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

依目前形势看来，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存在，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英、美、法顾虑到国民党投降对于它们利益的损失，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

　　因此，争取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是一切共产党、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走向决定于，中国内部是国共合作和这一基础上的国民党政策转变，是工农群众的力量；中国外部是苏联的援助。

　　国民党有在其政治上组织上加以改造的必要，也有这种可能。这主要地是因为日本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部新生力量的增长。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它实现这一改造，以便作为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基础。这一改造无疑须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同意，我们是站在建议的地位。

　　改造政府。我们提出了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方针，这也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一改造也无疑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

　　改造军队的任务是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这种新军将影响并团结一切旧军。这是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一改造，同样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八路军应在这一改造过程中起模范作用。八路军本身应该扩大。

### 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1927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使革命失败，应当吸取这个教训。

　　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主要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卢沟桥事变后，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主要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

很早时就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还是资产阶级来领导？当前即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提出谁领导的问题和反对投降主义。

抗战以来，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组织，对这种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投降主义倾向作了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并且收到了成效。

　　在参加政权问题上，中央发出了一个决议案的草案。

　　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等现象。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有特别大的危险性。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改名的政治部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据地，同样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坚持了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

　　在西安和陇东，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在南方各游击区——这是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在卢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政策企图削弱的力量——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的警戒。

　　要想全面抗战，必须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其目的，一方面是保持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但是主要的目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是不可分离的。几个月来，更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群众是在我们的影响下团结起来了，国民党营垒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长中，山西的群众斗争是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但是必须清楚，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微弱的。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 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上面说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只有克服这个倾向，才能将片面抗战变为全面抗战。

　　另一种投降主义，是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它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现时是发生于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

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这是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的基本条件。

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上海各大报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倾了；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是开始动摇了，CC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动摇中。抗战的军队是得到了严重的教训，其中某些成分是开始了或准备着改造。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其害怕战争破坏他们的财产和民众的崛起。他们中间有非常多的亲日分子，另一些人则被迫暂时加入民族统一战线，也迟早会分裂出去。目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最坏的分子，正在策动发布谣言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 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关系

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1938.5.15）

这是为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的一份布告，其目的就是旨在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对我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破坏活动。当时国共合作成立不久，蒋介石集团即阴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破坏陕甘宁边区，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毛认为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这个布告打击了当时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

（国民党顽固派在根据地搞破坏，发布了布告，坚决禁止。）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5）

###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记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确认以正规战争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那么，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又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的强大，很快就能将敌人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如上所说，是一个大而弱的处于进步的时代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敌人占地甚广且具有战争的长期性，但他们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性，即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是大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问题、向运动战发展问题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延伸到战略。这样的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人类战争史中也是罕见的。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相比从前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就一定会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照样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

### 第二章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在说战略问题之前，还要说一说战争的基本问题。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或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局部的牺牲是为了全局的胜利）。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则（荫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战略原则止，都贯彻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时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

### 第三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

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发展自己。所以问题是：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

总的说来，为了上述目的，主要的方针或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

1.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2.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3. 建立根据地；
4. 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5. 向运动战发展；
6. 正确的指挥关系。

### 第四章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和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 1、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

　　日寇强而进攻，我们弱而防守，因此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以作战线来说，一方面，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另一方面，敌军强但数量不多，我军弱但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族侵入，我方是本土作战，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在战略的防御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都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或表现形式。游击战争一般用袭击表现进攻。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要求速决性，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兵力、隐秘和神速，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避免消极防御、拖延和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游击战的特点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的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战略防御时期还是战略反攻时期，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并消灭敌人的全部或部分。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战略作用。

#### 2、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一切战争的双方，都力争在各局部或全局的主动权，即军队的自由权。军队被逼处于被动地位就不自由，有被打败的危险。相比于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进攻的外线作战更容易争取主动。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等，是第三个弱点。这三个弱点，使得其虽然有主动权却日益减弱。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灭全中国是不可能的。有一天日本会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中国方面，开始时处于被动，但新战略、战术的不断更新，以及不断积累经验，将逐渐取得主动地位。

　　而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则更加严重。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新成立的游击队缺乏经验的状态和不统一的状态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整体兵力不足，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而敌人无奈他何，这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此时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守我攻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过于悲观的消极行动、过于乐观的冒险行动，都将丧失主动权。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时，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游”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 3、灵活地使用兵力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

游击战争比正规战争更需要灵活使用兵力，这是转变敌我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

* 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
* 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
* 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
* 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
* 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

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

* 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便于随机应变，又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
* 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化零为整”，用于在敌人进攻之时消灭敌人；也用于在敌人取守势时消灭某些驻止之敌。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或作民众运动等。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就应抓住时机迅速转移；有时需要频繁转移以消灭不同方向的敌人；某处不利于战斗则要立即转移与其他的敌人交战。转移时要隐秘、迅速，采取策略，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更重要的不仅是知道重要性，还要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需要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还需慎重。

#### 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即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了解情况，确定任务，部署兵力，实施军事和政治教育，筹划给养，整理装备，配合民众条件等等，都要包括在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游击战不能与正规战争一样有很大的计划性，不能企图在游击战中实行高度严密的计划工作；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

　　上面所说的各点，是游击战战略原则的第一个、也是最中心的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保证。

　　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是基本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使得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于正规战争有所区别。

### 第五章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消耗、钳制、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给予正规军和群众精神上的鼓励，给予敌人精神上的压力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

　　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敌占风陵渡后，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主要是由正规军进行的），对于配合陕西、河南两省沿黄河西南两岸的防御战，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钳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 第六章 建立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说明了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之后，下面的问题是实行建立根据地时必须认识和解决的。

#### 1、几种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

　　平地较之山地会差些。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在之前的战争经验中还没有证明，而短期的则是已经证明可以了的；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 2、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以此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他地方则不然，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会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的占领地。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一、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二、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三、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 3、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武装部队进行战胜敌人、发动民众，这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或第一个条件。从事游击战争必须建立一支或多支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

　　第二个条件，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第三个条件，就是用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的一切力量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

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 4、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把侵入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何种原因产生，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和向前发展所必需，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也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危及根据地本身。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 5、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方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方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和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如果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 第七章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姿势和处于进攻姿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 1、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敌人为了消灭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常会采取围攻，每次分多路的兵力，同时有计划地前进。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便乘机追击。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在一个大的根据地内，例如五台山地区，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四五个或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在上述作战方法之下，往往同时地或先后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位于内线。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

在反围攻的作战中，地方人民力量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为了协助作战（坚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这就是所谓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不是在几经反围攻之后已证明在那里无法打破严重的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应企图放弃那个根据地而跑到别的根据地去，应注意防止悲观情绪的发生。只要领导上不犯原则错误，一般的山岳地带，总是能够打破围攻和坚持根据地的。只有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势，考虑下面的问题：留着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转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到别处，我又再往那里活动。

由于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况，敌人是一般地不能采取中国内战时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的。但是我们应该估计到在某些特别威胁敌人要害的游击根据地中，敌人有可能采取相当程度的堡垒主义，要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坚持那里的游击战争。根据在内战时还能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民族战争中当然更能够坚持。因为即使在兵力对比上，在某些根据地中，敌能使用质量、数量都极端优势的兵力，但是敌我民族矛盾无法解决，敌之指挥弱点无可避免。我之胜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

#### 2、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

在已将敌之旧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战略守势我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部队的休息和训练是必要的，敌取守势时是休息、训练和解决补给的最好时机。不是一事不做专门关起门来休息和训练，而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工作中，争取时间达到休息和训练的目的。

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这时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也逐渐整理，恢复元气。敌占地区内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因此，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不可在自己的战略进攻中得意忘形，忘记团结内部、巩固根据地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这种时候，须观察敌人是否又有进攻的征兆，以便能及时结束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 第八章 向运动战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个问题，是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如果中国能迅速地战胜日寇和收复失地，没有什么持久战，也不是什么残酷的战争，则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

现在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这种成分随着战争的持久将逐渐地增加。这是今天抗日游击战争的长处，不但使游击战争迅速地发展，并且使之迅速地提高。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

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

地方主义是存在于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间的，往往只顾地方的利益忘记全局的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生活。主力游击部队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形，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够继续地发展游击战争；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撤换其干部的办法，使小集团能够融合于大集团。

单纯军事主义和地方主义相反，是主力部队只图扩充自己不顾扶助地方武装的。他们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必须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须使指挥员、战斗员们认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组织上须逐渐地具备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方法以及供给卫生等的经常制度。装备方面，须增加武器的质量、种类和必要的通讯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

### 第九章 指挥关系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挥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由于游击部队的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高度的集中主义，否则会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挥，这就是国家参谋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战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根据地组成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几个军分区，军分区之下分为几个县，县之下分为几个区的情况，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根据上述的原则，一般的方针集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如果是一个集中行动的部队或兵团，其内部指挥关系，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该部队或该兵团一旦分散行动，便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的情况无从明了。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 论持久战（1938.5）

### 问题的提起

（阐述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十个月的抗战历史证明亡国论(认为中国打不胜)和速胜论(寄希望于国际支援、轻敌)都是不对的。

中国需要的是以持久战来取得胜利。有三个条件：一、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三、日本国内和日本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的持续时间取决于这三个条件的形成时间。

对于抗战的前途：割地换取日本的停止全面进攻是不现实的，日本的政策是侵占整个东南亚、封锁中国海岸。中国当下抗日的形势相比于红军反围剿的形势要优越的多。中国广大的疆土使得即使有一半领土被占领也有回旋的余地。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

主要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日军战争机构笨重而行动慢，因此，全局以于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行动迅速的、大规模的运动战为主，辅以重要军事地点的阵地战。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战争的前期，应避免大规模冲突，以逐渐消耗敌人为主。此外，还要发挥农民的巨大潜力，使日军长时间的忙碌，利用日军在异国作战的劣势，慢慢夺取日军的物资、争取国际支援等，进行长期消耗敌人而逐渐平衡我军的劣势，使我军最后有能力对日军进行主动进攻。

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或者是将局部、暂时的表现推广到全局。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用客观、全面的观点考察战争，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 问题的根据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依据。

日本方面：

1. 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使得战争不可避免和中国不能速胜。
2. 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产生了日本战争的**野蛮的**、**退步的**帝国主义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使其面临崩溃而不得不进行冒险战争。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其所需反而会加速其死亡，这就是日本战争的退步性。退步性+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其战争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
3.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局限于其领土面积小，各资源均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其正是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问题，但同样，发动战争以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将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4. 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会遇到更大的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

中国方面：

1.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性质。各方面的力量都很弱，使战争不可避免和不能速胜。
2. 近百年历史的解放运动，其结果虽不如意但同时也锻炼了中国人民，各方面相比从前有了很大进步，这是当下抗日战争得到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向上发展的，与日本帝国主义向下没落是相反的，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
3.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军民众多的国家，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
4. 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获得国际广大援助，又同日本的失道寡助相反。

以上的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规定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战争的持久性、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产生。分析抗日战争，应综合以上所有因素全面看待，而不是片面的。

### 驳亡国论

亡国论者因敌我强弱而认为“抗战必亡”、“再战必亡”。如果我们说，日本虽强却是小国，中国虽弱却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来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打败了进步的；英灭印度来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因此，驳亡国论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就是**时代的特点**，其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我们的战争是中日两国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战争。敌人方面，它是退步的、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的英国不相同，和一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正是为了最后挣扎而进行冒险战争。所以，灭亡的必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再则，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各国已已经开始反抗法西斯侵略这一大趋势是一致的，这是日本已经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中国方面。国内的条件：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弱国，处于进步的时代，相比以前已有进步，而且，不是说普通的进步，不是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其进步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有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共产党、红军、有了觉悟的广大人民以及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如果说，在俄国，没有1905年的经验就不会有1917年的胜利；则也可以说，我们如果没有十七年(从共产党成立开始算)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 // 国际的条件：中国在战争中不再孤立而有了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支援，这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且比俄国革命的国际援助更为广大、深刻。

日本领土小、资源少、退步、寡住，中国则反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规定了日本能够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则要走一段时间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同时也规定了日本不能永远横行，最后必然失败。

阿比西尼亚的灭亡。一、弱国且小国；二、它不如中国进步，是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和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共产党和红军；三、它的战争是孤立的，没有国际援助；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

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其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将来也必然会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而中国已有新的人、政党、军队和抗日政策，且都是向前发展的。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以今天的敌强我弱的情势，抗日战争是艰难的，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爱国志士对时局有忧虑：一、惧怕对日妥 协；二、怀疑政治不能进步。

第一个问题：

社会根源存在，必然导致妥协问题，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其依据仍需从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

* 日本方面。我们在抗战初起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仅只有程度不同。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1938.1.16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至今坚决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 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1936.1.16，日本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同时，对国民党进行威逼和诱降，宣称国民党如果依然策动抗战则日本政府将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不在以他为谈判对手。*
* 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二、国民党，其依靠英美，英美不叫它投降；三、别的党派，大多数反对妥协。这三者互相团结，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 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鼓舞中国抗战，全国人民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特别是苏联的存在。

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第二个问题：

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两者互相促进，但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的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有忧虑。但是抗战的经验证明，十个月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爱国志士们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不但排除敌人也将清洗自己。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的失败可能引起日本人民革命，此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

###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亡国论或是被敌我强弱情况、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的人，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这是他们的片面性和主观性。

然而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他们或是忽略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或是夸大了中国的长处；或是将局部的胜利放大到全局。

客观全面的分析下，解放和亡国都是确切的、可能的前途，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争取这些条件则是我们的任务。这与亡国论者只承认亡国这一个可能性是不同的。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应当看到其他倾向和其他现象的存在及其逐渐占更大优势并为之努力，这与悲观的人们也是不同的。

客观全面地分析到一切敌我情况，则只有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应当是努力争取条件而缩短持久战的时间，而排斥空谈的速胜论。

###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为什么是持久战”，需要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片面的因素会得出片面的结论。敌人的军事力量更强，但我方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可以借此扭转战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现时是敌强我弱的程度悬殊太大，其余因素还不足以扭转这一态势。所以，当下一定程度上是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敌胜我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统一战线，加之其他因素，逐渐变化这一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在坚持抗战的前提下，有能扭转敌强我弱态势的条件，且需经过大量的努力来转化条件，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方能正确运用军事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持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量变产生质变，而使我方成为优势并获得胜利。

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他们的政府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抗日战争的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一、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的时期；二、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三、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大致的轮廓，是战略指导所必需的。

1. 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和悲观。
2. 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第一阶段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到达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辅以运动战。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敌人的根据地、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要准备付出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也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3. 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以及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变为战略反攻，表现为战略进攻；逐渐由战略内线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仍以运动战为主，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则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其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亡国论和妥协论者会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和片面的。我们不但应当看到武器而且要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么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则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一定会碰壁的。

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具体时长则谁也不能预断，决定于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 犬牙交错的战争

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也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这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

* 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 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 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如果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
* 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 为永久和平而战

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意大利、日本、阿比西尼亚、西班牙、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亿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

* 无间断，是因为，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参与，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接着是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
* 这次战争又接近于永久和平，是因为，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走向崩溃而不是获救。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亿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战争前极力阻止，战争后就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进行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求和平的，而且是求世界的、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一切牺牲，坚持到底。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的新中国和新世界上。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 能动性在战争中

以上说的，都是说明持久战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着重的是“是什么”。接下来，将转到研究“怎么做”上。（接下来的内容直至结论，都是。）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如果照做，就要失败，故须反对。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一系列理论，而理论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自觉的能动性”，是人区别于物的特点。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 🡪 正确的思想 🡪 正确的行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的诸物质条件，但这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必须在客观条件限度之内，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 战争和政治

战争和政治的关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

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而帝国主义压迫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特殊组织、特殊方法、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 抗日的政治动员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需要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不普遍、不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拼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武器等劣势尚在其次，而这的关系是绝大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政治动员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人明白为什么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才能造成热潮、使人齐心、愿意贡献。 // 然后，还要说明为此的步骤和政策，即要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才能动员全军全民怎样为目的而努力。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民，并动员所有军民实行起来。 // 其次，怎样去动员？口述、传单布告、报纸书册、戏剧电影，靠学校、民众团体、干部人员，并且要合民众口味，不能与民众有隔膜。 // 最后，要频繁地政治动员，而不是一次就行。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

### 战争的目的

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两军相杀的所谓战争，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战争的目的

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因此，可以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和基本原则。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前者使得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等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后者使得扫清射界、组织火网德等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的原则和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战争目的和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资源，把这些部分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

###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战略方针。前面说过，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但这不是具体的。具体的应当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采取战略进攻方针，我们是战略防御。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在其占领区域，空出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 // 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方则反之。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 // 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我兵虽多，乃是弱兵，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主要打运动中之敌。将兵荫蔽于敌必经之路，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围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上述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用一句话说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所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

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攻敌防；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主动性------------------------------开始

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避免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但主动或被动基于战争力量的优劣势，以及主观指导是否正确。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战争的主动性

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全局的绝对主动权，只有拥有绝对优势才有可能。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拼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拥有绝对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开头则少见。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者居多。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 // 日本于我相比，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其又有其他许多不利因素，优势便被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广人多和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小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劣势的程度，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主动制造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使敌人变为局部劣势和局部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优势和主动是敌我双方都在争取的，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双方以各项物质条件为基础的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胜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许多场合的无法全知彼己，产生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导致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如各种以弱胜强的战争历史，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和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丧失优势和主动地位，从而失败。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错觉和不意，会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重要方法。 // 什么是错觉？“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能够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使其丧失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此。 // 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劣势但有准备，常能打败优势而无准备，这是因为掌握了主动。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无准备。 // 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掩护我军封锁情报，造成敌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过去土地革命战争的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

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而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使不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他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他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主动性------------------------------结束

灵活性------------------------------开始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即灵活地使用兵力。这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使用军队比组织军队更为困难，特别是敌强我弱时。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来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从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战争的灵活性

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天时、地利、人和）。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及时恰当地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个“妙”即灵活性。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

灵活性------------------------------结束

计划性------------------------------开始

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比别的事业要困难得多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流动和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或全局的改变都是有的。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略计划须随着阶段推移而作出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

战争的计划性

有些人因战争的流动性而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认为是“机械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发展而修改。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和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赋予它相对的固定性。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方针的更替。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计划性------------------------------结束

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中国地广人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相反。因此，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以其他形式辅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

**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同时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这和只有向后没有向前的逃跑主义是不同的，否则就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

而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也是不对的。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拼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其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 // 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局部的付出是为了全局的胜利。 // 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另寻战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整个战争中，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辅之，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辅助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抗战中，游击战的本身，是战术问题和特殊的战略问题共存的。这个问题，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在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为此，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其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主要的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仍须以运动战为主。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 消耗战，歼灭战

前面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因为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其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上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所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然而缺点是：一、消耗敌人的不足；二、我们自己消耗多，缴获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多、俘虏少的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破坏这种东西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国际宣传、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而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我们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的落后。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一般是难以实现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对于包围并俘获或杀伤敌人，不能应用于全部也要应用于部分。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大者有五：

1. 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
2. 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
3. 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
4. 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著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
5. 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

这五个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应该学习。

###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进行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避免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避免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不做拼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或政治太落后的国家是做不到的；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鼓吹战略决战，照此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

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走到亡国论。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拼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为此，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坚决反对。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是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被迫放弃，但争取了时间，歼灭和消耗了敌人，取得了战斗经验，使人民起来了，增长了国际地位。这种血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可始终立于主动，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丝毫也不为其所动。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 兵民是胜利之本

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一、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二、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西伯利亚。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是由于日本强并且中国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革新军制需要增强现代化技术条件，有此才能胜利。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 + 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 🡪 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技术和战术有最好的基础去发挥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如果克服了这一缺点，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 ，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地广人多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的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些原则都须从尊重士兵、人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具体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以至于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 结论

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1936.7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1937.8《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10.14）

这是毛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毛在报告中提出“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便是为的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地负起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又有斗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对于中国情况是不适合的，这样就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主义的错误；毛在这次会议的结论中所讲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就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全会同时又确定了全党从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战区和敌后，而批判了那种把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等项错误思想；毛在结论中所讲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就是关于这一方面的问题。

关于这个战争的各方面问题，已经说得很多。抗战以来的经验、当前的形势、全民族的紧急任务、用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战争的理由和方法、国际形势，这些因素都已经分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

###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可以且应该同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由具体历史条件决定。日寇和希特勒也有其“爱国主义”，但却必须坚决反对。使日寇和希特勒的战争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因为日寇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而中国是被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须争取抗日胜利。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这同时也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积极性，坚决抗日。为此，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寇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让党员站在抗战的最前线。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

### 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党员应表现高度的积极性，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形成了当下的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必须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具体的模范行为。) 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除了不可救药者外，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应当团结、鼓励而不是排斥他们。共产党员应当成为民众的模范，但也要向民众、环境、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充分发挥先锋的模范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

### 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奸细分子，即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劝告人民不要上当。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

### 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

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拒绝关门主义的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党里。发展党是已经确定了的方针，不可因为怕奸细而停止，但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

### 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任何党派都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抗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在任何方面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可否认，认为阶级斗争不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所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

### 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时，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必须懂得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工作的态度。

### 干部政策

党是在一个几亿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但是，现在所拥有的骨干还不够，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培养、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也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一、指导他们。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二、提高他们。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不要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 党的纪律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 党的民主

全党必须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即，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但不至于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 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使党获得伟大进步。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于：

* 是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
* 机会主义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政府工作、民众工作、党的建设，都有大成绩，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 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同时也仍要注意反对“左”的急性病。在统一战线、党的组织和民众的组织等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民众运动；但同时，也要注意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无条件，否则会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

　　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

### 学习

一般地说，一切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研究这些，尤其是更高级的干部。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实际地学会了马列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党的战斗力量。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需要去学习。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并承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教条主义必须废弃，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 团结和胜利

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条件。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样，我们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同志们，只要我们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11.5）

### 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

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应当积极地实行互助互让，而不是消极的，例如指派间谍。发展自己的同时也应赞助别的党派的发展。就像是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这是为了抗日而互助且积极的原则和方针。红军改编、暴动政策取消等“让步”行为是为了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消极的步骤是为了积极的目的。把所有的让步都看作是纯消极的东西，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而纯消极的让步也是有的，陈独秀、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应该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是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做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段看的。

###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即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为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表现出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即抗日的需要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

###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那只是片面地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日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先“经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提出过这样的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形势是国民党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指令。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的同意，那么他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想限制我们的发展，提出这个口号只是束缚自己的手脚。在现时，有些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不奏，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总之，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决不可束缚住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口号，如果要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 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11.6）

毛于1938.11.6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共产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采取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的正规战取得速胜。为克服这种错误倾向，毛从分析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入手，撰文着重说明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并动员全党注意对军事问题的研究。《战争和战略问题》是毛指导抗日战争的军事理论著作，它所阐明的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基本理论，以及唤起全党重视研究军事理论、战略战术，注重军队政治工作等思想，对于发展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 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兵权的重要性

（军事家在客观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主观地发挥军事才能。这就包含两个条件：一、物质的条件；二、发挥才能的条件。而“发挥才能的条件”首先就要有兵权，也就是军队的指挥权。）

战争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用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正确的。

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代替了封建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而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经济和政治的罢工、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有则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需要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大多数无产阶级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农民群众自愿援助无产阶级，起义和战争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所做的，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受封建制度压迫而没有民主制度；外部受帝国主义压迫而没有民族独立。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中国的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对于党而言：

* 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之时，要么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北伐战争；要么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也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土地革命战争。
* 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之时，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都是为着战争的。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那一时期。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例如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军后方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又如土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都是例子。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民；不同点只在于或国内战争、或是民族战争、或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当然，这些区别是重要的，这表明，战争主体有广狭的区别（工农联合，或工农资产阶级联合），战争对象有内外的区别（反对国内敌人，或反对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又分北洋军阀或国民党），表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革命战争。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以及任何的革命任务，都离不开武装斗争。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而忽视了争取军队，其结果是国民党一旦反动则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之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转变，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

经验说明，中国的问题离不开武装。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将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这次会议又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更给了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对于有些党员愿作党的组织工作，愿作民众运动的工作，而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没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线，等等现象，还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不能有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部分距离战区较远的后方和一部分敌人控制的地区，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学习军事，注重战争。

### 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孙中山从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取代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抗日三个时期。蒋介石过去十年是反革命的，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以战争获取一切权利。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们学习。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认为“有军则有权”。

谭延闿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例如进步党，但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和政党，多谁就势大。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很难觉悟到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最自觉的领导者，都应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而是好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整个世界。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是用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 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

党在之前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从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在名义上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党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到今天为止，可以自信地说，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锻炼出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和战争问题；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骨干和一大批会治军的骨干。在世界范围内，还只有苏联、中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国的党都还没有军事经验，所以我们的经验特别宝贵。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 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

国内战争的过程，可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我党的军事任务也将分为两个战略时期。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的前期，主要是游击战争；战略反攻阶段的后期，主要是正规战争。但抗战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某种程度上正规性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设想在装备新式武器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这将是战略反攻阶段中的事业。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

* 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做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二、要反对过分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知道遵义会议才纠正过来。
* 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卢沟桥事变后，敌人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并仍怀有敌意的国民党，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这样的转变在现象上是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可能会轻敌或是恐日，在国民党中都是发生了的。国民党从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时，主要由于轻敌，同时也存在着部分恐日，而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然而我们却顺利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胜利了。得益于广大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在东方和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可能是空前的。
* 至于由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第三个转变，则属于战争发展的将来，估计那时又将发生新的情况和新的困难，现在可以不去说它。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以正规战争为主，辅以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因此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不能胜利。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广大和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而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不可能。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是又一方面。

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游击战争就是可能的，因此古代也有游击战争。但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出现。故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如像内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国共两党的分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的。

由此，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必要的。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缩小敌军的占领地；扩大我军的根据地；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

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 注意研究军事问题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军事的理论、战略战术、军队政治工作，都要研究。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军事工作已有很多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没有总结。战略问题和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只限于极少数人。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经验丰富，新创设多且好，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不足。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是必要的。

## 五四运动（1939.5.1）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是例子，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 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5.4）

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对的。“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它表示几十年来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孙中山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清朝政府并推翻了它。我以为他做的是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和革命再失败。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和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主体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是革命的骨干和根本力量。中国现在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这个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长远来看，中国乃至全世界将来都是不要资本家的。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目前阶段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也是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红军战争，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但是从孙中山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辛亥革命赶跑皇帝，这是胜利的；但中国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是失败的。五四运动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在。北伐战争的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如果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却至今尚未达到目的的原因有二：一、敌人的力量太强，即帝国主义(主要)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二、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90%人口的工农群众没有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90%人口的工农大众动员、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在遗嘱中说的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的经验教训，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即动员占全国90%人口的工农大众。

　　第四，再讲到青年运动。“五四”以来，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中国青年们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也就是带头作用，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组成的一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但这是不够的，还需要主力军，也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广大工农大众动员、组织起来，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几亿人的强有力的军队，才能攻破敌人的防御。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不愿意和占全国90%人口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是没有好结果的。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希特勒、墨索里尼、陈独秀、张国焘也都讲过“信仰社会主义”，但结果都是反革命的。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是负担了重大责任的。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没有一次像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中国的广大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统一，抗日到底。

　　第六，说延安的青年运动。其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和方向，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做了且做得很好，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都是团结的。全国甚至海外华侨，大批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方法，实行生产运动开发荒地。开荒种地是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是抗日救国的先锋，政治方向和工作方法都是正确的。

## 反对投降活动（1936.6.30）

毛1939.6.30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文章。1952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2011年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文章首先指出中华民族在日寇面前始终存在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以致到目前，这一争论不论如何改头换面都始终存在。指出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坚决地反对主和派。并指出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而反共就是准备投降。有力地鞭挞了暗藏在抗日阵营中的“张精卫”“李精卫”等的投降卖国活动。指出反对投降和分裂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卢沟桥事变仅仅“暂时地”宣布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应当反抗，为什么是“暂时地”？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国际投降主义者的妥协企图、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战和之争。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部分动摇分子(有些在明面上，有些则暗藏着)。因此，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散出各种谣言动摇共产党，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反对共产党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迫使日本让步，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明他们的主张的正确性。

共产党人是始终主战的且坚决地反对主和的。（反对和斥责投降派，寄希望于日本主义和国际投降主义维护中国的利益是不现实的。）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投降的可能性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者必须注视投降派的活动，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 必须制裁反动派（1939.8.1）

《必须制裁反动派》是毛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

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杀害了抗日、革命者，并且不是在其势力范围内，而是在抗战的后方。很明显，是准备投降的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来杀人的。且包括法院、法律和法官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有出来过问，因为中国不统一。

平江惨案就可以看出并没有统一。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

* 统一于抗战。现在抗日同志不但没有受赏反被惨杀了；而那些坏蛋却没有受处罚。这就是不统一。要反对这些投降分子，捉拿这些杀人凶手。
* 统一于团结。赞成团结的应该受赏，破坏团结的应该受罚。但是现在赞成团结的却被人惨杀了；而那些破坏团结的坏人却没有受到一点处罚。这就是不统一。
* 统一于进步。要全国进步，落后的人向进步的人看齐，决不能拉进步的人向落后的人看齐。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百。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共产党员、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很大的事，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破坏抗战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汪精卫、汉奸都是。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分裂，这种行为是完全不对的。“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因此，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9.1）

问：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其意义如何？

答：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英法苏三国谈判之所以没有成功，完全是因为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三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进行了四个多月，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九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解放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而出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

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

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国坚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

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

这就是：

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

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1939.9.16）

问：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九月一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三部分。

答：关于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还没有到，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则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所以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则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则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说的。但孙中山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磨擦的问题。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虽然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周恩来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友军，不叫“异军”，则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才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才应该限制。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即抗日。所以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和反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国共两党不是互相的敌人，不应该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还有关于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实行压迫，则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磨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磨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末，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1939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9.28）

说几个与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

有些人说：“苏联利于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因为过去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在过去，苏联不但为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和平；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谓民主国家挑拨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例如，它加入了国际联盟，同法国同捷克都订立了互助协定，竭力想同英国及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订立保障安全的条约。当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采取名义上“不干涉”实际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时候，苏联就积极地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反抗德意，反对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法同样“不干涉”时，苏联就积极地援助中国的抗日。当英法两国牺牲奥国和捷克纵容希特勒侵略的时候，苏联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的黑幕，向英法提议制止侵略。当波兰问题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不管张伯伦、达拉第如何没有诚意，苏联还是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企图订立一个英法苏互助条约，制止大战的爆发。无如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所障碍，世界和平事业就遭受了最后的挫折，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知道的。在这种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放弃<防共协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精疲力竭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击破了。国人不去注意此种阴谋，不去注意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实在是上了这些阴谋家的当。这些阴谋家，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的甜蜜演说所蒙蔽，苏德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些人应该觉悟过来了。

有人说：“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爆发了，苏联或者会参加战争的一方，就是说，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人民，都应该反对这种战争，揭穿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也不利于世界人民，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坚决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并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有些人把苏联根据苏德商务协定同德国做生意看作是苏联参加德国战线的行动，这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不但不能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通商和援助混为一谈。例如在西班牙战争中，苏联是同德、意两国通商的，但世人不说苏联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西班牙。又如中日战争中，苏联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但苏联确实援助了中国。现在世界大战的双方都和苏联有通商关系，这种事实，对于双方都说不到援助和参战。除非战争的性质有了变化，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战争经过一定的必要变化之后，对于苏联和世界人民有利的时候，那时才有援助或参战的可能，否则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至于依据交战各国对苏联的态度是亲苏或反苏的分别，使苏联对它们的通商不得不有多有少，这是各交战国自己态度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但是即使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采取了反苏态度，只要它们还愿维持外交关系，订立通商条约，而不向苏联宣战，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德国那样，苏联也不会同它们断绝通商关系的。

国内许多人，对于苏联进兵波兰的问题，糊涂起来了。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德国方面，英法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波兰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

* 德国方面，它是为了掠夺波兰人民而进行战争的，是为了击破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而进行战争的，是帝国主义的，不能同情，应当反对。
* 英法方面，是把波兰作为英法财政资本掠夺的对象之一，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拒绝德国帝国主义重分它们的赃物而去利用波兰的，是把波兰当作自己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来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英法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不能同情，应当反对。
* 波兰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它又是一个大波兰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波兰民族以外的许多非波兰民族的少数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波兰反动政府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
* 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义的，我们应该同情波兰人民。
* 苏联方面，则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下面的两个：

一、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苏联选择了后者。在那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居住的一大块土地，还是在1918年订立布列斯特条约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从幼年的苏联手里强迫地割去，而后来又被凡尔赛条约强迫地放到波兰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面。苏联现在不过是把过去失掉的土地收回来，把被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解放出来并免受德国的压迫。这些少数民族是把红军看作他们的救星的；而在德军占领的西部波兰，法军占领的西部德国，则丝毫也没有这种消息。这就表明，苏联的战争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英法的战争，则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压迫他国民族、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

二、张伯伦企图继续反对苏联的老政策：一、方面大举封锁德国的西面，压迫德国的西部；二、企图联合美国，收买意大利、日本、北欧各国，以孤立德国；三、拿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作为礼物，以引诱德国。总之，推动德国放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之进攻苏联。这种阴谋，不但过去和现在是存在着，而且将来也还会继续的。苏联大军的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地成功了。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

*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欢迎这个协定是正确的。但当诺蒙坎停战协定订立之后，英美通讯社纷传日苏互不侵犯协定行将订立的消息，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一种忧虑，有些人认为苏联将不援助中国了。这种观察是不正确的。诺蒙坎停战协定的性质，和过去张高峰停战协定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这种停战协定，将使苏联增加对于中国援助的可能，而不是减少其援助。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即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据我看，根据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议会上的演说，苏联是不会变更这个基本原则的。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那些反苏的人，借着诺蒙坎停战协定的订立和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挑拨中苏两大民族间的感情。中国的外交政策，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下，主要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也应该争取，但只能看作是部分和暂时的。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是投降派的意见，应该根本拒绝

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国人议论纷纷的问题。国人注意国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注意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这是很好的现象。

##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10.4）

党的历史、核心、路线等。

1939.10毛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毛强调，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将这一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2]

1939.10.4，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创刊，毛为刊物写了发刊词，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指出：“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刊物，现在终于实现了，这个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在当前的时机中，出版这样一个刊物十分必要。”而毛所提到的当前的时机，正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以及共产党党内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毛写作了《〈共产党人〉发刊词》。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二、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它的任务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政治、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这样的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而这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某种程度上说，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群众性的党；就其领导骨干、党员的某些成分、总路线、革命工作来说，也已经是一个思想、政治、组织上都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在于：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政治、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需要提高水平，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政治、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所负的任务，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更复杂、任务更艰巨。*布尔什维克：*①*1903.7.30，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裂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派别。1912.1，布尔什维克正式取得党的主导地位。1917.11.7.，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成为俄国唯一执政党；次年，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2.12.30，领导各苏维埃国家组成苏联。1952年，正式更名为苏联共产党。②由于列宁的坚持，党纲中写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讨论党章时，在入党条件问题上出现尖锐分歧。列宁主张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内某一组织者，皆可成为党员。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些人反对把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为入党条件。结果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但在选举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时，拥护列宁的占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派占少数，被称为孟什维克。因而从1903年以来，布尔什维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策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大党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因此，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政治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

　　应该怎样建设这样一个党，这个问题是同党的十八年历史不能分离的。

党的历史，从192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共产党人》发刊词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18年，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从中锻炼了自己。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非常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这样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这种关系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而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中国革命的特点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缩小和扩大、发展和巩固，都必须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党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同样，当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也会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也能更正确地处理政治路线、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1924-1927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1927-1937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

* 1. 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尽可能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

各阶级的特点

* 1. 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
  2. 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
  3. 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起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并限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发展，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
  4.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
  5. 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

这些规律的正确性，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和目前的抗日战争时期都证明了的。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作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二、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作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从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其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参加北伐战争。这时，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党的路线

1. 第二阶段，土地革命战争。这时，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2. 第三阶段，抗日战争。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也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
3. 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党的建设。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党逐步学会并坚持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人民和共产党的地位，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党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

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有三个阶段的特点：

1. 第一阶段，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党还是幼年的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革命的特点、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的末期，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发展但没有巩固，没有能够在思想、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多，但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多，但不能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而没有清洗出去。党处在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而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2. 第二阶段，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于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党就能够有了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胜利。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重新发展且得到巩固。敌人虽然在暗害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且变成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到了遵义会议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3. 第三个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非常有意义的。党凭借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从狭小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党扩大了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刻在企图破坏，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边区和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此，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斗争。这需要依靠全体党员、干部、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

　　这就是党在十八年中的主要经历和主要问题。

　　十八年的经验说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政治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就会懂得。

　　我们的任务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和当前的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巩固起来，避免曾经犯过的错误。

##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939.10.10）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一）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德国或英法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叛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依然坚持其和平政策，对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用出兵波兰的行动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巩固东欧和平，解放被波兰统治者所压迫的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兄弟民族。苏联和其周围各国订立了各种条约，以预防国际反动势力的可能的袭击，并为世界和平的恢复而奋斗。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企图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

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为此，它需要“扫荡”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经济开发和建立伪政权，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辅以军事进攻。政治进攻就是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 ，引诱国民党投降，而不是着重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现在时期，敌人如同过去进攻武汉那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行动，由于他所受中国过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战的打击，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财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即是准备反攻阶段。但是：

一、说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经到来，并不否认敌人还有某些战役进攻的可能；敌人现在正在进攻长沙，将来还可能进攻其他若干地区。

二、随着正面相持的概率增加，敌人将加重对于我游击根据地的“扫荡”。

三、如果中国不能破坏敌人占领地，让其达到确保、经营占领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国不能打退敌人的政治进攻，不能坚持抗战和团结以准备反攻力量，或者国民党自动投降；那么，将来敌人就仍有大举进攻的可能。即已经到来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敌人和投降派破坏的可能。

（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仍是当前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和倒退现象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为此，在敌后方，必须坚持游击战争，战胜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占领地，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正面，必须支持军事防御，打退敌人的任何战役进攻。在我后方，必须迅速认真地实行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实行宪政。任何的动摇和懈怠，任何与此相反的方针，都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全力从思想、政治、组织上巩固党、军队和政权，以防止可能的突然事变，避免意外损失。

##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12.1）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但许多党的干部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为了正确认识知识分子问题，发挥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毛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

1. 在长期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2. 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军队、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这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3. 因此，今后应该注意：
   * 1. 一切战区的党和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学校、政府工作。只要愿意抗日的忠实的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吸收、教育，在战争和工作中磨练，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代领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
     2. 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要充分、严肃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已经混入的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
     3. 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教育、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
     4. 对于一部分且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应该切实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
     5.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则，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斗争、文化运动和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4.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12）

中国革命的来源(历史)和发展。

这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后撰写的重要理论著作之一，文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一起，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1940.1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

### 第一章 中国社会

#### 1、中华民族

（描述中国的自然条件、周边国家、人口组成、民族历史、民族文明。）

#### 2、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经济、政治、文化就长期发展迟缓。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历代农民起义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1.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2. 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部分甚至大部分，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3. 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用于镇压农民的军队。
4. 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则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生活，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和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 3、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前面已经说明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而中国现在的社会则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则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城市手工业和农民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么，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封建旧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与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即**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此目的，帝国主义列强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迫手段：

1. 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英国鸦片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用战争打败了中国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占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2. 强迫中国订立许多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并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海河陆空交通事业，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3. 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4. 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5. 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剥削中国农民和其他大众。
6. 除买办阶级之外，还使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
7. 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以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
8. 除所有上述办法之外，进行文化侵略政策以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例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中国人民。
9. 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把封建的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由此，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将这两个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说，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1. 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而且与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2. 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3. 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4. 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5. 中国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 + 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 + 中国的领土广大 🡪 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6.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导致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 第二章 中国革命

#### 1、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赞美从鸦片战争到土地革命战争，直至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说明革命尚未完结，并引出下面几段的内容）

#### 2、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中国现时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的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即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是现实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帝国主义是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例如北伐战争和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曾在1927-1937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同盟，背叛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成汉奸。所以，抗日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由此可以明白：

*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强大的封建势力，还有在一定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并且，异常强大这样的敌人，还会导致以下的特点：
* 导致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革命力量就需要长期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 使得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主要形式，必须是武装的而不是和平的。因为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正如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因此，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 导致革命的根据地问题。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 + 中国土地的广大使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 + 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 + 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 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着重武装斗争并不是说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武装斗争取得胜利需要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否则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为使革命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胜利，必须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工具，即敌人的军队。因此，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城市和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方针，必须采取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在一切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稳扎稳打地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所能成功的。

#### 3、中国革命的任务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主要）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区别、互相关联、互相统一的：

* 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 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 4、中国革命的动力

根据上述的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则中国社会的哪些阶级和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这就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以此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其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其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决定了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现在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1. **地主阶级**

其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但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1.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可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 和 民族资产阶级。

*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

其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他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中的亲日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而欧美顽固派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但也非常动摇，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

* 民族资产阶级

其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由此，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曾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尤其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虽然在1927年至抗战开始前跟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需要采取慎重的政策。

1.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其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其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现在来分析这些小资产阶级：

*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政治立场来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其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例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列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织革命力量和建设革命事业的成功，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 小商人

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

* 是手工业者

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地位类似中农。

* 自由职业者

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例如医生。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地位类似手工业者。

　　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一般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1. **农民阶级**

　　农民大约占全国80%人口，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

* **富农**。约占农村人口5%，算上地主则10%，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 **中农**。约占农村人口20%。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部分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 **贫农**。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70%。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农民这个名称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1. **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 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 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其虽然是最有觉悟性和组织性的阶级，但如果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1. **游民**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 5、中国革命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 革命的敌人主要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 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 + 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经由旧式的一般的变为新式的特殊的，且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不仅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之特点：

* 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不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 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 和孙中山所主张的三民主义革命基本是一致的。*孙中山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有这些，就把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党在1937年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仅指这种新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里不详说。）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还是国家组成，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撇开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彻底完成。

#### 6、中国革命的前途

以上问题弄清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新的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则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则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所以资本主义经济是会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的，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还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 7、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综上，整个中国革命是包括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现时和将来两个阶段的革命 这样两重任务的。且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之上。

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党的全部革命任务。没有认识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而最后目的，则是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只有认清二者的区别和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且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39.12.20）

（如题，斯大林和苏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 纪念白求恩（1939.12.21）

（如题。）

## 新民主主义论（1940.1）

该文是毛1940.1.9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2.15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1939年底1940年初，毛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党内首次创造性地提出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此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其更加系统和完整。新民主主义理论系统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动力、前途等，阐述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 1、中国向何处去

（忽来的妥协、反共之声，又让人们觉得“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新问题，趁此说一说。）

### 2、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共产党人多年来的奋斗目的，在于：政治上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文化上把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 3、中国的历史特点

要建立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

一定的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对于文化、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则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又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问题是很清楚的，要革除的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是不能离开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要建立的新文化，也不能离开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而所谓的中华民族的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又是什么？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是封建的政治和封建的经济，其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就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但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要革命的对象。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呢？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懂得这一历史特点，才能指导这个革命的胜利。

### 4、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经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那么，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能知道，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现在来研究这个形成过程。

很清楚的，现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一、改变这一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二、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等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整整一百多年，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还未完成还须很大的气力，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孙中山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原因在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占全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苏联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逐渐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斯大林在1918年就说道：“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1925年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义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逐渐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 5、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下面来说明其具体表现的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

　　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足够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革命，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由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这时，中国无产阶级因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迅速地变成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纲领、土地革命的实行，都是党领导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资产阶级，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有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1927-1937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1927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在中国，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因此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不得不是无产阶级。

所以，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已觉悟，或正在觉悟起来，必然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即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已经过时；另一方面，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即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但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

* **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 **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 **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是大同小异的，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指的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一切反革命分子。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1924年在国共合作时国民党的庄严声明。而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误，希望它在抗日中改正这个错误。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指的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 6、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政治和经济上都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国共合作的庄严声明，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允许农村富农经济的存在，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经济的集中表现。

### 7、驳资产阶级专政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90%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

　　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而不是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垂死挣扎的时期。但因如此，它就更需要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就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断绝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则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几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必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1927年以后的反苏运动就是教训。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因此，中国必然要建立社会主义。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依国内环境说，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获得了必要的教训。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1927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然而结果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当一个强大敌人深入国土、抗日战争已打了两年之后，难道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吗？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1927年至1931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1937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吗？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二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教训。不见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吗？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诚心诚意地奉劝这些先生们，你们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 8、驳“左”倾空谈主义

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也不可能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

将来的第二步是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人恶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以此反对共产主义、红军和共产党。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抗日的彻底性，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就用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但是做贼心虚怕而害怕，于是以“一次革命论”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也迷惑于“一次革命论”但没有恶意，而是纯主观地希望“毕其功于一役”，而不知革命有阶段，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这种混淆革命步骤的观点，会降低对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

### 9、驳顽固派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之下而认为，既然社会主义是下一阶段的东西，那么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这种观点，其本质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新的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成历史。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成历史(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惟有共产主义才能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在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也有多个主义，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

为了免除误会，并使顽固派开开眼界起见，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 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1927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才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
* 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因此，民主政纲不是完全相同的。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没有革命彻底性。由于上述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由此，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

### 10、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乃是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

新、旧三民主义以这篇宣言为界限而区分。新三民主义是因为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才为共产党所认同的，才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 联俄。如果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就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中国必然要选择其中一方，要么是联俄的三民主义，要么是联帝国主义的三民主义。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而没有“中立”。且现时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苏联帮助就不能胜利。
* 联共。如不联共，就要反共。而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会同流合污成为汉奸。如果不依靠日本帝国主义势力，而依靠别的帝国主义或只依靠自己来独立反共，则力量不足以成功，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也没有成功，现时则更不可能；并且现时的反共就是破坏抗日、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也是成为汉奸。
* 扶助农工。即“唤起民众”。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数千万的各种工人。各种工业工人是中国工业经济的生产者。近代工业工人阶级是最富于革命性的，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而旧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俄国还是帝国主义、国内还没有共产党、工农运动也没有登上政治舞台。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举行了1924-1927的革命。

### 11、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反映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其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又有半封建文化，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不将其打倒，新文化是建立不起来的。

新文化则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但由完全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经济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主要)。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 12、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以“五四”为界限，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都有这种性质。那时的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当时的这种新学的思想，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无力，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1921年，均在一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装束和新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进攻，在各个领域都有极大的发展。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在“五四”以后，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相比政治更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 13、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并服务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中国的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样有统一战线，并可分为四个时期：

1. 1919-1921，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五四运动有着辛亥革命所没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性质，是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的彻底的文化革命。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国际上帝国主义国家的衰退和无产阶级的崛起，在当时世界革命、俄国革命、列宁的号召下，使革命知识分子有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在于没有工农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有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铺垫了共产党的成立、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2. 1921-1927，以共产党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不但领导了辛亥革命，还适应新情势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联系的，没有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被人们看是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而临时应用的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而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合作而被推广到了全国，以及教育界、学术界和青年界。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了封建的尊孔读经、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再加上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1. 1927-1937，前一时期末期，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得不进入新时期，而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另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至十年之久，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但结果却都惨败了。军事“围剿”的结果是红军的北上抗日；文化“围剿”的结果是“一二九”青年革命的爆发；共同结果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在政治、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1. 1937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 14、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经济情况和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列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 15、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互相吸收和发展，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要吸收精华，决不能毫无批判地吸收。“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于古代文化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940.1.28）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应认识到，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应认识其严重性，坚决反抗，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则抗战的前途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和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对于国民党中的大多数、中间阶层、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民众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及政权的发展、党的巩固和进步等，都要力争。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1940.2.1）

声讨汪精卫和反共顽固派。

日本帝国主义即使高层换人，其灭华方针是不变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汪精卫，订立了卖国条约，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傀儡军队反对抗日。反共是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因此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与国民党顽固派合作，到处破坏抗日的局面。

　　许多人因此气愤并以为抗日没有希望，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气愤是对的，但抗日仍有希望，国民党也不全是坏人，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棒子打死，惩戒破坏抗日的，团结忠于抗日的。

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统一”，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是借统一之名实行专制。如果没有共产党，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牵制大量日军。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没有封建的、最民主、最进步的抗日根据地。取消这些是不对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才真正的统一论。

##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1940.2.1）

声讨汪精卫和反共顽固派。

1. 进行全国讨汪运动。
2. 加紧团结。有人声称要“统一”，实则是要取消共产党和各地方抗日力量。见上一篇。
3. 厉行宪政。开放党禁，扶植舆论，表示诚意推行宪政。
4. 制止磨擦。停止一切消耗抗日力量的反共行为。
5. 保护青年。取消青年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允许青年的进步思想。
6. 援助前线。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搆陷，以励军心。
7. 取缔特务机关。如题，参考古代的特务机关残害百姓。
8. 取缔贪官污吏。如题。
9. 实行。照孙中山的嘱咐，唤起民众。
10. 实行三民主义。如题，严督全国实行。

## 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1940.2.7）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提出的缺一不可的三大方针。没有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是不能持久的。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内部分裂。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具体事项参考上一篇)。

##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940.2.20）

这是毛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这时，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帝国主义 + 封建主义 🡪 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缺少的主要的是一、独立(现时即是抗日)；二、民主。而要建设这些，须要先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没有民主，抗日无法持久。

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不是旧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旧式的民主，已经变成反动的东西。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他们实际上想做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资产阶级的宪政和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由大多数人作主，而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社会主义的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如孙中山说的：“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

而顽固分子不愿意进步或进步得太慢，开大会就是为了“促”其在最短时间内进步，使宪政快些实行。现时的促进会有两个意义：研究、推动。研究是为了答复假如问：“为什么促我呀？”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动起来。很多小流汇合成大河。

各国历来的宪政，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而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即使颁布也必被阻挠。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是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做一些假动作例如颁布宪法、选立大总统，但并不是为了真正的民主。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

但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但顽固分子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

（对战胜顽固派的希望。）

##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3.6）

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部分地区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有极坏的影响。

目前正在开始的召集河北参议会和选举河北行政委员会，是一件具有严重意义的事。同样，在晋西北，在山东，在淮河以北，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需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步骤，目前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

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

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例如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

责成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各军队首长，对党内作明确的说明，使此指示充分地实现于政权工作中。

##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3.11）

目前的政治形势是：

1. 日本帝国主义已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但敌人仍然坚持灭亡中国，并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加紧敌后“扫荡”、加紧经济侵略等方法。
2. 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无召集的可能。
3. 苏联的对外政策取得了新的胜利，积极援助中国抗战。
4. 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
5. 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
6. 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他们在全国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中间势力中亦有相当影响。在抗日战场上，共产党所抗击的日寇兵力，同国民党比较起来，几乎占到了同等的地位。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

　　以上就是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这是不可分离的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必须纠正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等观点。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红军、共产党进步势力，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斗争。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斗争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现实的中间派：

* 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政治权力。赞成团结抗战，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
* 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必须争取。
* 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

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对于中间势力，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共同抗日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应当向他们进行说服和批评。

争取中间势力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必须满足如下条件：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逐渐取得胜利。否则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甚至变为顽固派的同盟军向我进攻；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

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他们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加以思想政治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同他们作反抗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的策略步骤对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

* 自卫原则。决不可首先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彻底消灭之。
* 胜利原则。决不可举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
* 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打退而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我们则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斗下去。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

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包含顽固派、中间派、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不能因为国民党实行了某些反革命的政策就以为整个国民党都是顽固派。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必须认这一点，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上一篇的内容。）

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正在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

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的纲领：

* 1. 实行孙中山遗嘱，唤起民众。
  2. 实行民族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
  3. 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
  4. 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5. 实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

这些都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但是除了抗日一点外，现在的国民党都不能实行，只有共产党和进步派才能实行。这些是已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简单的纲领，但是许多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今后应该随时把握这五条纲领，用布告、宣言、传单、论文、演说、谈话等等形式发布之。这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动的纲领。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国民党的这些纲领，同我们的纲领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我们所应该实行的，仅仅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而绝不是国民党的思想体系。

##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5.4）

这是针对东南局书记项英强调华中特殊，不愿向敌后发展和为实现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既定战略任务而发出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同地区、不同军队，虽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应该发展。即，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失去时机会使将来更加困难。

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反共行为，不论是理论、政治、军事，均应坚决反抗坚决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参见上一篇）。例如，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只有执行上述原则，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有所准备。

在估计目前时局时，应懂得，投降危险是加重了，但仍有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的、有趋势的，还不是全国的、已发生的。我们的任务，是坚持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方针。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须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准备应付任何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各级人员都应该加以严格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危险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 团结到底（1940.7.5）

（坚决抗战，具体内容可参考上面几篇。）

## 论政策（1940.12.25）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1. 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统一、独立。
3. 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4. 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
5. 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6. 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7. 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联合尚能抗日，斗争和孤立坚决反共的。
8. 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打击和孤立亲日的，拉拢和争取动摇的。
9. 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10. 对待帝国主义亦然。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1939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这里只综合地指出几点：

*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 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 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禁止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 关于锄奸政策。坚决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反共分子，才能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滥杀无辜。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宽大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一律诚恳和气地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对于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混应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 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各类工作；放手地吸收、任用和提拔他们。不要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混进的在学习、工作再加洗刷不迟。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 关于军事政策。尽量扩大红军，因为这是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当然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但是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动摇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但在纠正错误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反攻等项不良现象。

##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1941.1.20）

###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积极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以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是：

1. 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以动员舆论；
2. 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3. 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4. 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5. 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6. 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7. 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8. 封闭《新华日报》；
9. 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10. 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11. 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12. 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13. 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14. 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15. 国民党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共产党中央曾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党已非1927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

　　（二）中国其它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冲昏头脑。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4]；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现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941.3.18）

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多个集团之间有多个矛盾，国内的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而同情共产党，我党的继续抗议政策，均不容许国民党继续像过去五个月那样反共。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前，对于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军事压迫，仍应继续抗议运动。

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的指示，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5.8）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日本准备新的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是次要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再重演国共大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国民党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和日本对立，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彻底地作战。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这个政策是不变的。

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不可。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九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这个电报，曾经取得当时中间派的同情，孤立了蒋介石。）*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领导革命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

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打倒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是弄清很多问题的基础。

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并不是说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 第三卷（抗日战争时期-下）

##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3/4）

1941党即将走过20年战斗历程，为克服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同我党当时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任务相适应，毛编集《农村调查》一书，并撰写了序言和跋。

### 序

现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指导工作，是异常危险的。好的领导，需要对于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有具体的了解。

要了解情况，第一是要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唯一的方法是作社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知识。

第二是开调查会。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开调查会，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任何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必须以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他们才会知而不言。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必须有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了解这一点，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再度申明：出版这篇参考材料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还仍然坚持。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都是要失败的。因为这都是无知妄说，没有经过周密调查。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

### 跋

十年内战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现在，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无疑是错误的。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是正确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作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腐化，可能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和这种腐化思想作斗争，但不要把这种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不能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

## 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5.19）

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为更进一步，需要研究现实存在的缺点：

* 不注重研究现状。虽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二十年来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收集材料和研究，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氛围，是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与马列主义的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是相违背的。
* 不注重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对于自己的国家，不论是近百年和古代的中国史，还是漆黑一团，认真研究历史的氛围也是不浓厚的。
* 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许多同志是单纯地学习马列主义，而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分析现实事物。这种态度是非常有害的。

确实的，现在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

对于自己的历史懂得甚少，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近百年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许多人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办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批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对周围环境不做系统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地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外国，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恩列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观点、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恩列斯教导我们：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许多人做研究工作，但是对于研究今天、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上。许多人是做实际上工作的，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第二种：**马列主义的态度**。应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斯大林说：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要有目的地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使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方法。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列主义。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我们要从国、省、县、区的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行动的向导。须不凭主观想象，而是凭客观的指导下，从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据此，有下列提议：

* 向全党提出系统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引出应有和必要的结论。为此，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分别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 聚集人材，有组织、有分工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列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这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看列宁、斯大林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1941.5.25）

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必须揭穿、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这是敌人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必须揭穿、反对。

日本在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谣言互相呼应，其用意甚为可疑。也应揭穿、反对。

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6.23）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不仅是反对苏联，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不仅是保卫苏联，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反法西斯而斗争。现实，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法西斯。

　　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

*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以此援助苏联。
* 坚决反抗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
* 在外交上，同其他国家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联合。

##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11.6）

今天参议会的目的，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中国只能有这个目的。因为现在的主要敌人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现在苏联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还要继续奋斗，还要使革命的三民主义见之实行，才能胜利。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而现时的中国，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新三民主义，其是可以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的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参与政治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这就是要联系人民群众、倾听意见，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再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汉奸和反动顽固派，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不要紧。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不是民众之上。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多数的党外的人合作。（重复含义。）

## 整顿党的作风（1942.2.1）

革命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民要推翻压迫人民的敌人的压迫。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来领导人民推翻敌人的压迫。

现时的党的学风、党风、文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学风不正，即有主观主义的毛病；党风不正，即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文风不正，即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三者有它们的历史根源，虽然现在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但还在经常作怪，因此，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只要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

### 主观主义

#### 正确理解马列主义

主观主义是反对马列主义的，和共产党不能并存。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的观念在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念。我们首先要问，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来马列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和读的人都多了。这是很好的事。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革命实践问题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理论呢？特别是经济理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实在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不能这样说是有了理论家。因为马列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没有进一步地根据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而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还是不能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们所要的理论家应当是：能够依据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解释和理论说明。为此，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应用它去深刻、科学地分析中国实际问题，找出发展规律。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死的教条，而要能够精通、应用，其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能应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成绩就越大。

#### “知识分子”问题

讲一讲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知识分子特别宝贵。党中央之前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否则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知识架子，而不知这是阻碍他们前进的。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没有其他什么知识了。现在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一个人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很难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使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

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历史、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不应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必须抛弃教条主义，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列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列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现成书本上的知识；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列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列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列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时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或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而不易识破。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和真正的理论家，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通俗地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列主义”是箭，“中国革命”是靶的。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列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圣药。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这样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的话。只有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则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 宗派主义

虽然经过了二十年的锻炼，但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且对党内的、对党外的都有：

* 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
* 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

#### 党内宗派主义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特别强调自己的局部工作，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自己的局部利益。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必须预防，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则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不正确的宗派主义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而不是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去掉不适当的狭隘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不顾大局，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党的发展产生了大批新干部，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热忱欢迎、关心新干部。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缺乏经验，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则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的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党队伍整齐，步调一致，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 党外宗派主义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理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则更甚。但并不是说，所有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许多同志，看不起党外人员，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书籍后，反而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占多数的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总是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首先要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必须肃清。

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但是还有许多同志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许多同志蒙受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所以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抵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此，要提高嗅觉，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或抵制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为什么，都要经过周密思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一、“惩前毖后”；二、“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是不可救药的地步，愿意改正，就要欢迎他，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 反对党八股（1942.2.8）

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是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清算连党八股，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如果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为什么又叫党八股呢？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

党八股在党内已经有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前进、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的文章和教育，且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就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大功绩。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党内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前进、革命、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有缺点。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则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则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在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很大数量的党员又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都不免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八大罪状：

1.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必须停止。
2.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简直是无赖了。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就靠装样子吓人。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只是老实地说和做。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常有两个名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进行打击。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而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列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列主义的真理，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3. **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曾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但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ㄣ”；人字则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人彡”字。无疑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是给什么人看、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的党八股人家都能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也一样。无论和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4. **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如果一篇文章，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单纯不丰富，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有许多同志的宣传工作，也不学语言，乏味得很，没有人喜欢听他们说。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活泼、表现实际生活的。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在写文章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于我们适用的东西。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干部”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进步道理，且要吸收新鲜用语。（三）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就没有充分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什么是宣传家？教员、新闻记者、文艺作者是宣传家，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也是宣传。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
5. **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中药铺的药柜子上有许多贴着药名的抽屉格子，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第一是壹贰叁肆，第二是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ABCD，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不分析、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这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在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所办的事才能办好，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6. **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7. **流毒全党，妨害革命**。
8. **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列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和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也应该改革。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

*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自以为是、夸夸其谈。

*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么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这就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
* 第三篇，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1. “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而我们恰恰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
2. “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而我们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却硬要大写特写。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3.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4. “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

### 引言

目的是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它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为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这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削弱了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好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这样一些问题应该解决：

*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是歌颂还是暴露，这就是态度问题。这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的，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

1. 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指出他们必然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
2. 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
3. 自己人，即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而决不是相反。

* **工作对象问题**，即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则都不相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根据地，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从全国各地来也要到各地去，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农村、工厂、红军里面，了解、熟悉各种人和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熟，即人不熟，对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不熟悉工人、农民、士兵、干部。不懂，即语言不懂，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生活空虚，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作品语言无味，且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为此，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否则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而互相熟悉了，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就觉得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意思是说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列主义的知识。但是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思想感情。但是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表明这些同志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文艺工作者要学习文艺创作，但是马列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即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各自状况、面貌和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 结论

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以此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中国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环境、任务不协调。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它问题。

#### 一、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不需要再讲，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他们的情绪、作品、行动、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或多或少地不符合群众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在一起从事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都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这种文艺直到今天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叫作汉奸文艺。而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对这些旧形式加以改造，加进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红军和其它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要为这四种人服务。为此，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而是实际、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换句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线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却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它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红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了，但不等于完全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它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 二、如何去服务？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严重地轻视了普及，过于强调提高了。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且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粗细、高低、快慢之分。所以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即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则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把自己充实、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应该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它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 三、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政治伟大的影响。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还有，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只此一家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此，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现时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团结一切党外赞成抗日的文学家艺术家。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不赞成，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 四、文艺批评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这里只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艺术标准。

* 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反之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主观愿望即动机，还是看社会实践即效果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而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动机是否正确、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而应该容许包含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
* 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是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都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为第一，以艺术标准放为第二。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 “人性论”。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是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完全错误的。
*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和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不是废除讽刺，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逐渐地懂得和掌握正确的立场是什么。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社会和文学艺术，并不是要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它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 五、整风运动

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就是说明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思想、共产主义、党是什么。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虽然其中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为此，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周围的人物，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因此，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磨擦，但是只要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942.9.7）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和之前已不相同。抗日的第五第六年，既接近着胜利，又有极端的困难，即“黎明前的黑暗”。这种情况，整个反法西斯各国在目前阶段上都是有的，整个中国也是有的，但尤以我军的各个根据地表现得特别尖锐。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同抗日的开头两年和中间两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否则他们就只会跟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虽然已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绕过暗礁。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但还有若干同志不懂得，这就是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抗战要有一个团结，在团结中有各种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政治上的困难，过去有，今后还可能有。五年以来，党用了极大的力量逐步地克服着这个困难，今后还要增强团结。但是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目前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我们有唤起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克服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目前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现时根据地已经缩小，今后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战争机构。在目前，战争机构和战争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敌人的“三光”政策就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使我们的战争机构适合战争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就不会被敌人战胜。所以，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的，想不到又要亲手将它缩小，就感到很困难。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但是人们往往不够及时，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很不适于作战。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变得更小、更扎实，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10.12）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许多人在这种时候还被德国的攻势所迷惑，以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18年冬，在1916年，德军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军的战役统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军最精锐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带决战性的。德军猛攻不克，整个德奥土保阵线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走到了最后的崩溃。然而当时英美法阵线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军仍极强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经快到面前。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视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间世界人民的注视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希特勒在西线胜利以前，他似乎是谨慎的。攻波兰，攻挪威，攻荷、比、法，攻巴尔干，都是注全力于一处，不敢旁骛。西线胜利后，他就冲昏了头脑，企图在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向这个庞大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就分散了他的兵力。去年十月向莫斯科进攻的失败，结束了苏德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特勒第一个战略计划破产了。红军制止了德军去年的进攻，并在冬季举行了全线的反攻，是为苏德战争的第二阶段；希特勒转到了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此期间，希特勒撤消了他的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自己充任总司令，决定放弃全面的进攻计划，搜索欧洲全力，准备向南线作局部的但被认为是打击苏联要害的最后进攻。因为这一进攻带着最后一次的性质，关系法西斯的存亡，希特勒就集中了极大的兵力，连在北非作战中的一部分飞机坦克都抽调过来了。从今年五月进攻刻赤和塞瓦斯托波尔起，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希特勒调动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附以飞机坦克的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作空前剧烈的进攻。他企图迅速攻下两处，达到切断伏尔加和夺取巴库两个目的，然后北攻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并令日本法西斯集中兵力于满洲，准备在斯大林格勒攻下后进攻西伯利亚。希特勒妄想把苏联力量削弱到足以使德军主力从苏联战场上解脱出来，以便移到西线对付英美的进攻，并可掠取近东资源，打通德日联系，同时，日军主力也可从北面解脱出来，以便西进南进对付我国和英美，而无后顾之忧，这样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但是这个阶段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希特勒遇到了苏联制其死命的策略。苏联采取了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的方针。五个月的战争，使德军既没有打进高加索油田，也没有打下斯大林格勒，迫使希特勒顿兵于高山与坚城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损失甚大，陷于僵局。现在已是十月，冬季就要到来，战争的第三阶段快要结束，第四阶段快要开始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

拿希特勒在第一阶段上的情况和第三阶段作比较，就可知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目前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方面，实际上均已停止了德军的进攻，希特勒已到再衰三竭之时，他对斯大林格勒、高加索两处的进攻已经失败。他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整个冬季中所整备的一点兵力，已经耗竭了。在苏德战线，距冬季不到一个月了，他须赶快转入防御。整个顿河的以西以南是他的最危险的地带，红军将在这一带转入反攻。今年冬季，希特勒因被死亡所驱迫，将再一次整备他的军队。他或者还可能搜索他的一点残余力量装备出几个新的师团，此外则乞援于意、罗、匈三国法西斯伙伴，向他们勒索一些炮灰，以应付东西两线的危局。但是，他在东线须应付冬季战争的极大消耗，他在西线须准备对付第二条战线，而意、罗、匈等国则将在希特勒大势已去的这种悲观情绪中，一天一天变成离心离德。总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四十八天中，红军的保卫斯大林城，和去年保卫莫斯科市有某种相同。这就是说，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计划也像他的去年计划一样，归于失败。其不同点，则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虽然接着举行了冬季反攻，可是还要遭到今年德军的一个夏季进攻，这是因为一则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尚有余勇可贾，二则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缘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则形势将和去年完全两样。一方面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欧洲人民也将准备着起义响应。另一方面，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的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的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1942.11.6）

（如题，表达对战胜法西斯的希望。）

##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942.1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经济无基础是不能解决财政困难的，经济不发展是不能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实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且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证明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1943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固了。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不要忘记人民的帮助的重要性。1940-1942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1941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1941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这是国民党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1941-1942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1937-1939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1940-1942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1943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1943、1944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则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这个趋势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准备这样做。

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我们用不着和这种人辩论，我们只会兴盛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共产党和边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总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党和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一定有办法，足以渡过任何严重的困难。我们现在的困难，有的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我们曾经历过比现在还要困难到多少倍的时候，那样的困难我们也渡过了。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甘宁边区要大得多，那里天天有严重的战争，已经支持了五年半，也一定能够继续支持直到胜利。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彻底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这五项目的，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如果把这五项要求在党、政府、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

##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6.1）

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1942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1943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机关、学校、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1942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其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逐渐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部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 质问国民党（1943.7.12）

近月以来，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置在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三个集团军，都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对付日寇。这种事实，已经是四年多了，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料近日却开动了两个军，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

不禁疑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做增强团结吗？

请问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那末，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日本人这样欢喜你们的背，而你们丢了河防不管，让它大段地空着，你们的心就那么放得下去呢？

在私有财产社会里，夜间睡觉总是要关门的。大家知道，这不是为了多事，而是为了防贼。现在你们将大门敞开，不怕贼来吗？假使敞开大门而贼竟不来，却是什么缘故呢？

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

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向着边区人民前进，这也可以算作“精诚团结”吗？

或者照你们的另一种说法，你们并不爱好什么团结，而却十分爱好“统一”，因此就要荡平边区，消灭你们所说的“封建割据”，杀尽共产党。那末，为什么你们不怕日本人把中华民族“统一”了去，并且也把你们混在一起“统一”了去呢？

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定身法”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末，可否把你们的这种“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

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其次看国民党的党务。国民党为了反对共产党，办了几百个特务大队，其中什么乌龟王八也收了进去。即如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亦即公历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抗战六周年纪念的前夕，中国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出了这样一个消息，说是陕西省的西安地方，有些什么“文化团体”开了一个会，决定打电报给毛，叫他趁着第三国际解散的时机，将中国共产党也“解散”，还有一条是“取消边区割据”。读者定会觉得这是一条“新闻”吧，其实却是一条旧闻。

原来这件事出于几百个特务大队中的一个大队，受了特务总队部（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指令，叫一个以在国民党出钱的汉奸刊物《抗战与文化》上写反共文章出名、现充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的托派汉奸张涤非，于六月十二日那天，就是说还在中央社发表消息这天以前二十五天，就召集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所谓电文。

这个电文，延安到今天还没有收到，但其内容已经明白，据说是第三国际既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还有“马列主义已经破产”云云。

也是国民党人说的话儿呢！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

现在中国境内党派甚多，单单国民党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叫汪记国民党的，立在南京以及各地，打的也是青天白日旗，也有一个什么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有一批特务大队。此外，还有日本法西斯党遍于沦陷区。

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当你们指使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不于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汉奸党和日本党也值得解散呢？难道你们以为共产党太多了吗？全中国境内共产党只有一个，国民党却有两个，究竟谁是多了的呢？

国民党先生们，你们也曾想一想这件事吗？为什么除了你们之外，还有日本人和汪精卫，一致下死劲地要打倒共产党，一致地宣称只有共产党是太多了，因此要打倒；而国民党呢，却总是不觉得多，只觉得少，到处扶植养育着汪记国民党，这是什么缘故呢？

国民党先生们，让我们不厌麻烦地告诉你们吧：日本人和汪精卫之所以特别爱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者，就是因为这个党这个主义当中有可以给他们利用的地方。这个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在1924-1927，孙中山把它改组了，把共产党人接受进去，形成了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这个主义，也只有在同一时期，经过孙中山的手加以改造，成为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除此而外，这个党，这个主义，在排除了共产党、排除了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条件下，就受到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的爱好，因此日本法西斯和汉奸汪精卫也爱好起来，如获至宝地加以养育，加以扶植。从前汪记国民党的旗子左角上还有一块黄色符号，以示区别，于今索性不要这个区别了，一切改成一样，以免碍眼。其爱好之程度为何如？

不但在沦陷区，而且在大后方，汪记国民党也是林立的。有些是秘密的，这就是敌人的第五纵队。有些是公开的，这就是那些吃党饭，吃特务饭，但是毫不抗日，专门反共的人们。这些人，表皮上没有标出汪记，实际上是汪记。这些人也是敌人的第五纵队，不过比前一种稍具形式上的区别，借以伪装自己，迷人眼目而已。

至此，问题就完全明白了。当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所以绝对不肯在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日本党和汉奸党也值得解散者，是由于不论在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你们和他们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还有一条要质问国民党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国境内，“破产”的只有一种马列主义，别的都是好家伙吗？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前面已经说过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怎么样呢？张涤非的托洛茨基主义又怎么样呢？中国境内不论张记李记的反革命特务机关的反革命主义又怎么样呢？

国民党先生们，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对于这样许多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所谓“主义”，连一个附笔或一个但书也没有呢？难道在你们看来，一切这些反革命的东西，都是完好无缺，十全十美，惟独一个马列主义就是“破产”干净了的吗？

老实说吧，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区别。（举例说明敌人对共产党做得种种破坏，国民党也跟着做。）怎么能够不使人们疑心你们和敌人汉奸互相勾结，或订立了某种默契呢？

我们正式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取缔中央社，惩办汉奸张涤非。我们向一切不愿撤离河防进攻边区和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1943.10.1）

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彻底减租。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应当成立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政府应当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和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今年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1943年的缺点错误，而于1944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而彻底改正。

##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10.5）

两个会议的全部材料现已收齐，可以作总评。

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欧洲轴心国是感到了这一变化的；希特勒采取了最后挣扎的政策。这一变化主要地是苏联造成的。苏联正在利用这一变化：红军以席卷之势打到了第聂伯河；再一个冬季攻势，不打到新国界，也要打到旧国界。英美也正在利用这个变化：罗斯福、丘吉尔正在等待希特勒摇摇欲坠时打进法国去。总之，德国法西斯战争机构快要土崩瓦解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已处在总解决的前夜，而消灭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共产党“扫荡”，对国民党诱降。

国民党人亦感到了这个变化。他们在这一形势面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洲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本来，国民党人的主意是叫苏联独力去拼希特勒，并挑起日寇去攻苏联，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拼坏，叫英美不要在欧洲闹什么第二第三战场，而把全力搬到东方先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国共产党打掉，然后再说其他。国民党的“先亚后欧论”、“欧亚平分论”，就是为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年八月魁北克会议的末尾，罗斯福和丘吉尔叫了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去，讲了几句话，国民党人又嚷“罗丘视线移到东方了，先欧后亚计划改变了”，以及“魁北克会议是英美中三强会议”之类，还要自卖自夸地乐一阵。但这已是国民党人的最后一乐。自此以后，他们的情绪就有些变化了，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国民党的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党操纵的这次参政会，可能就是这种另打主意的起点。

国民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又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的主意不外三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照老路拖下去；改变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打共产党，拉国民党”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五十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六、七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想一面反共一面抗日。许多黄埔系军人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共产党人要向这些人问：忘了十年内战的经验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三百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做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存在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也可以向“暂时拖，将来打”发展。这和投降派有些差别，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又绝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这些人是可能采取此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英苏一致反对中国内战，因此他们被迫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把内战阴谋推迟下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一样，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所以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去会见蒋，在重庆等了十个月之久，但是蒋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三月，蒋发表《中国之命运》，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蒋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回延安，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人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揭发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的阴谋。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没有公布。国民党一切报纸刊物都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六、七月间周恩来和蒋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食言且派遣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可恨。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逐渐心平气和，“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这类口号。日本把其在华兵力58%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42%监视国民党；近来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稍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及其党人没有也不敢对这话提出任何驳斥。日本帝国主义看见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投敌的国民党中委和将领却不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国民党诬陷、进攻共产党，而对于投敌的国民党中委、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如此，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但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贯的骗人的空话，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而第三种方向也可能有的，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即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共产党人是始终主张这个方针的，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及其嫡系国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针。但是依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他们并不愿意。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是欧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蒋在十一中全会上宣称：“应宣明中央对于共产党并无其他任何要求，只望其放弃武装割据及停止其过去各地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并望其实践二十六年共赴国难之宣言，履行诺言中所举之四点。”

蒋所谓“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应该是讲的国民党，可他却污蔑了共产党。自武汉失守，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的事实。（三次反共的详情。）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地发动的，这不是“破坏抗战之行为”是什么？

党中央在1937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称：“为着取消敌人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组现在的红色政府为特区民主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改变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第一，所有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裂国共合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准备如此。这就是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裂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实践自己的诺言，因而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三，原来的红色政权还在抗战第一年就改组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承认的状态，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承认了的区域，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我们天天请求你们承认，你们却老是不承认，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负呢？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党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现在乘着蒋先生又在十一中全会上要求我们实践诺言的机会，我们就要求蒋先生实践这个诺言：采取法令手续，承认早已实现民权主义的陕甘宁边区，并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若是你们依然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就是你们叫我们继续“割据”下去，其责任和过去一样，完全在你们而不在我们。第四，“红军名义及番号”早已改变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践了。只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现在是直接受共产党中央统辖，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41.1.17发表了一个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反革命命令，宣布该军为“叛军”而“解散”之，并使该军天天挨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但是该军不但始终在华中抗日，而且始终实践四条诺言中第一至第三条诺言，并且愿意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要求蒋先生取消解散命令，恢复该军番号，使该军获得实践第四条诺言之可能性。）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文件除上述各点外，又称：“至于其他问题，本会议已决议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尽可于国民大会中提出讨论解决。”所谓“其他问题”，就是取消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和法西斯特务机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取消妨碍民生的经济统制和苛捐杂税，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扶助中小工业、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政策。我党共赴国难宣言中曾称：“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蒋介石先生既于这个宣言发表之第二日承认这个宣言的全部，就应该不但要求共产党实践这个宣言中的四条诺言，也应该要求国民党实践上述条文。蒋现在不但是国民党的总裁，又当了国民党的主席，应该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条文和一切蒋自己许给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无数诺言，认真地实践起来，不要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要看事实，不愿再听骗人的空话。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和国民党的要求。其中大多数，正是你们自己的诺言。如能实行这些要求和诺言，则我们保证继续实践我们的诺言。在蒋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希望蒋走第三条路。）

## 组织起来（1943.11.29）

今天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想讲的概括起来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中央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事实已经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毫无例外地动员、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也要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就可以克服困难。今年的成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达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既不要国民党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敌人在各根据地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军队如果只会打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也正在学习。只要我们的军队，人人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还有工厂，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与此相反的错误方针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陕甘宁边区过去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是少了。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因为战争紧张，也因为领导机关注意不够，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但是在中央今年的指示后，各个地方也都准备明年的生产运动了。前方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严重的战争，有些地方还有灾荒。但是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必须动员全体，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明年必须造成广大的运动。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可以且必须做到。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初级形式的农民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由穷苦变富裕、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总结经验。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运盐队、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就一定可以胜利。

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共产党员应该经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大世面。“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然后再向群众宣传，并号召实行，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90%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10%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和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部分这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军队工作中，还存在有一种军阀主义作风，这也是一种国民党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军党关系、官兵关系、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干部相互关系，都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但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人民、政府、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保存国民党作风，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此，一切工作才都会顺利地开展。

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有了很大进步。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群众观点已经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大进一步的表现。但不应该自满，还要继续自我批评求进步；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尽管官僚主义倾向、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我们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灰尘天天都向我们扑来。因此，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就像天天要洗脸一样。

## 学习和时局（1944.4.12）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提高。在这次学习中，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是：

* **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的环境的分析、错误的内容、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也不损害同志，这是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 关于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指出，其结论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都是正确的。但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以及其他。但无论如何，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 关于1931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 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应该指出，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指出这一存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为经过遵义会议、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党整风和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这样许多次党内斗争之后，还有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种宗派存在，则是不对的。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继续进行整风学习就可以克服。目前严重、普遍地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严重妨碍党的统一和增强战斗力。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主观原因是党内教育不足。指出这些原因，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思想，提倡互相了解、尊重，实现全党大团结，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法西斯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希特勒、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后一个特点，比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见，但是它已在欧美、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说明。

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 1937-1940为第一个阶段。1937-1938，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用主要力量向国民党进攻，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而不重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游击仗罢了。但是自1938.10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转移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国民党在1937、1938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对抗战逐渐消极。共产党在1937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四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1940，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约达一万万。几年内，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党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党吸收的广大新党员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内，党曾经克服了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 1941-1942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更加强调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对根据地进行连续“扫荡”和“三光”政策，致使党在1941、1942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党根据地缩小，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又认为他们已经闲出手来，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着进攻党。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党，党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治安强化”运动、“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克服了第一阶段的骄气。这一阶段内，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站住脚了，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和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卫斗争的这些情况，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但是也被我们克服了。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1943-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此外，又在去年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1943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1941至今这三年，60%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党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党，党又要担负抗击90%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40%的日军和不到10%的伪军。从1938.10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但也是早出晚归，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敌人退了袖手旁观。1943年国民党更加反动，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至1944春，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美国的反攻增强，希特勒在苏联红军打击下有摇摇欲倒之势。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的计划。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2/3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这完全是几年来国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结果。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1937.7至今，七年时间内，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党七年工作的总结。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内有大的发展但不巩固，因此在第二阶段内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缩小了。在第二阶段内，一切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比第一阶段好多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进一步，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学习还需要时间，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学会。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更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为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现在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难。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在这十多年中间去实行。但是现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要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1937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1942有了四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切不可轻视这样的数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手足失措。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 所谓放下包袱，即要解除精神上的许多负担。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包袱、负担。例如：犯过错误或工作无成绩，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或工作有成绩，从此骄傲起来。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放下自己背上的包袱，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1927上半年，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1930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红军打破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第四次是在1938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又使得受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
* 所谓开动机器，即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心之官则思。”孟子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党内浓厚的盲目性，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在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就会胜利。

###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4.20）

共产党自1921产生以来，就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1921-1945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毛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亿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1921-1927，特别是1924-1927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和伟大胜利。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发展了全国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叛变了革命，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和其它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有效抵抗，使革命失败。

　　从1927革命失败至1937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只有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它革命群众，作了政治、军事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1931“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列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进行革命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

　　尤其值得庆幸的是，党以毛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1931.1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1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曾经给了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吸收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在马列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1927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对于革命前途悲观，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采取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1927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情绪在1927.8.7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1927.11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1927革命的失败），因而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的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1928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1928.6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正确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和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1929下半年至1930上半年，还在党内存在的若干“左”倾思想和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1930.5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领导，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不到四个月。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1930年底至1931年初胜利地粉碎了第一次“围剿”。其它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1930.9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11月的补充决议和12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1927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1929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领导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1929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它“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其特点是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1931.1党在这些以陈绍禹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使中央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实际上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其如前面所分析的，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文化方面的有益工作，在1935.6也英勇牺牲。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1931.5.9中央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的正确领导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它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过分夸大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1931.9.20《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1931.9间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1933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1931.11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1932.10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1933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1933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它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1934.1由临时中央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其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革命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它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为首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与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歪曲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要求纠正，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不满更甚，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开始觉悟。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1935.1遵义会议结束“左”倾路线。

　　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始了以毛为首的新中央。由此，党才能胜利结束长征，保存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领导了1935“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解决了1936西安事变，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遵义会议后，“左”倾路线被逐渐克服。1942以来，毛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历次“左”倾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也有了改正和进步。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党经过了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领导下，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为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吸取教训，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 **在政治上：**

　　如斯大林所指出和毛所详细分析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它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必须经历长期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3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1. 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一样，毛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它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党在1927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它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1935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1935华北事变尤其是1936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严重的关门主义，远落于人民的政治生活。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2. 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必须建立武装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1924-1927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首先建立。毛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毛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力量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不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从而低估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它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和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1927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首先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在1932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1933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错误强调所谓“正规化”，反对红军“游击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

六届七中全会指出：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已经迫近。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并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寇，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1927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现时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1. 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所指出，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而毛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在1927革命失败后，正确指出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强弱不同，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发展。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正确估计到1927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1924-1927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认为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十分“脆弱”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数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1924-1927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反对“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 **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问题。毛不但运用马列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列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一、我们的军队不能是其它样式的，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它样式的，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第三次“左”倾路线具有完整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强我弱，红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做准备。

* **在组织上：**

　　如毛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即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1929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左”倾路线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打击和阻挠党内马克思主义。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同志被诬害。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 **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其思想根源都在于是否从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再三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24-1927革命的历史经验。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的做法，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列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理论和实际脱离，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正是马列主义；正像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列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仅仅满足于局部经验，把它们当作可以到处使用的教条，不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列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和摆老资格，不肯倾听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其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种错误思想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两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经验主义作为教条主义附庸；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列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的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的“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仍是正确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一起进行了积极斗争，因而许多地区和部门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由此，才能反对敌人进攻达数年之久；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列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过渡的阶级，有两面性：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列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列主义者了。但是，必须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完全入党，往往是以马列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将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而且也不能引导现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作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其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经验主义。
*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其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1924-1927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1924-1927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不利于革命。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左”倾路线的错误组织路线。党长期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其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而是利用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不兼容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路线、掌握领导，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列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列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列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列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坚决执行毛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错误，就应该帮助、欢迎和团结。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列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所代表的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党领导之下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的旗帜下。以毛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共产党，在以毛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 为人民服务（1944.9.8）

这是毛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能接受并采用人民的批评的；为人民而牺牲是死得其所的；要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1944.10.11）

蒋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是，空洞无物而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蒋介石说，大后方尚有广大土地，不怕敌人。寡头专政的国民党领导者们，至今看不见他们有什么改革政治抗住敌人的意图和本领，只有“土地”一项现成资本可资抵挡。但是谁也明白，没有正确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国主义是天天在威胁这块剩余土地的。蒋大概是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威胁，而向人民反复申述没有威胁。他又反复地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蒋介石在寻找方法，以期重振这种信心。但是他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而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他说，“国际观察家”都是“莫明其妙”的，“外国舆论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都是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缘故。说也奇怪，罗斯福一类的外国人，也和宋庆龄一类的国民党人、国民参政会的许多参政员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都不相信蒋介石及其亲信们的好听的申辩，都“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蒋介石对于此种现象感到烦恼，一向没有找出一个在他认为理直气壮的论据，直到今年双十节才找到了，原来却是他们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于是蒋在演说中用了极长的篇幅痛骂这种“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以为可以把一切中国人、外国人的嘴巴封住：对于我的军事政治，谁再“纷纷议论”，谁就是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这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对于国民党的寡头专政，腐败无能，对于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敌寇汉奸从来没有批评过，倒是十分欢迎的。引起人们一致不满的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日本帝国主义作过多次衷心的称赞。关于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一事，也没有听见什么敌寇汉奸说过半句话，因为保存现在这样压迫人民和打败仗的政府和统帅部，正是敌寇汉奸的希望。蒋历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的对象。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提出的“反共”“灭党”两个口号，早已放弃了“灭党”，剩下一个“反共”。日本帝国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向国民党宣战，他们说，日本和国民党之间还没有战争状态存在呢！国民党的要人们在上海南京宁波一带的财产，至今被敌寇汉奸保存得好好的。蒋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和日寇进行秘密谈判。特别是在日寇进攻紧急的时候，这种联系和谈判就来得越多。由此，对于蒋的军事政治发生“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已明其妙呢？

　　蒋在演说中，还否认中国将有内战。但是他又说：“决没有人再敢背叛民国，破坏抗战，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在这里寻找内战的根据并且是找着了。1941年正当中国叛卖者们宣布解散新四军，中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的时候，蒋曾说：将来决不会有“剿共”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讨伐叛逆的战争。读过《中国之命运》的人们也会记得，蒋介石在那里曾说：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勾结”过汪精卫。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上，又给中共安上了“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八字由头。现在又读了蒋介石这篇演说，就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决不要忘记，当蒋声言不打内战的时候，已经做了许多内战的事情。

　　而蒋的演说在消极方面却充满了危险性。蒋的态度越变越反常，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仇视中共，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劝蒋改变作法。）

##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10.30）

首先是战争(抗战)，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文盲、巫神等，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进行文化斗争，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一、团结；二、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1.10）

各位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起了三个作用：

* 带头作用。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
* 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你们是干部的后备军，将来可能成为干部。
* 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但你们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骄傲起来，不再努力，不尊重别人，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

你们的经验，这次会议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文件说得很好，不但这里适用，各地也可以适用，我就不讲这些了。我想讲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且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大部自给，并有盈余。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更好。如果哪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年年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即思想要适合于当下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然。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刻了解农村。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做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并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比如我们提倡采取现有样式的军民生产运动，发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打击日寇，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希望有外援但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其办法就是：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

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都说：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愿意组织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则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文化、卫生、风俗也会进步；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农村社会就会逐渐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了。

如果工作人员用心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物资，以为将来之用。

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拿陕甘宁边区说，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二十六万担，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由于展开了生产运动，军民两方面都吃得很好。

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用费，大部自给，有些单位则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并且自给一部分粮食，一部分被服。

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可以设立第二、第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用费50%，可以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自给50%，但是可能自给%15-%25。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种粮、菜。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

有人说：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生产就不能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最近几年，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学习，都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和军民之间也更团结了。在前方，去年进行了大规模生产运动，可是去年作战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并且普遍地开始了练兵运动。机关因为生产，工作人员生活改善了，工作更安心、更有效率，边区和前方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活跃；纪律，内部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这是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我们学会了这一条，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逐年更有生气、精力，愈战愈强。

在这里，有一点还须引起前方同志的注意。有些地区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在将来一定会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关于工业品，陕甘宁边区决定在两年内，做到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原来根本没有或者出产很少的，要一概自种自造自给。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一切产品，求质求量。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部、党中央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这是非常之对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这样做。有许多地方已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得到成功。

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

##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1945.1.31）

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已经能够发动军民进行生产运动的问题，但是在游击区中，在敌后之敌后，是否也能够这样还是有疑问的，这是因为还缺少证明的缘故。

而现在有了证据了。已有游击队在环境恶劣的区域于战争的间隙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并有了好成绩。

许多人说：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果真没有土地吗？请看晋察冀：“首先在农业为主的方针下，解决了土地问题。共有九种办法：

1. 平毁封锁墙沟；
2. 平毁可被敌人利用的汽车路，在其两旁种上庄稼；
3. 利用小块荒地；
4. 协助民兵，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敌人堡垒底下的土地；
5. 与缺乏劳动力的农民伙耕；
6. 部队化装，用半公开的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旁边的土地；
7. 利用河沿，筑堤修滩，起沙成地；
8. 协助农民改旱地为水地；
9. 利用自己活动的村庄，到处伴种。

农业生产是可以的，手工业及其它生产也是可以的。请看晋察冀：“沟线外部队的生产，不限于农业，而且也和巩固区一样，开展了手工业和运输业。第四区队开设了一个毡帽坊，一个油坊，一个面坊，七个月中盈利五十万元本币。不仅解决了本身困难，而且游击区群众的需要也解决了。毛衣毛袜等，战士们已能全部自给。”

游击区战斗频繁，军队从事生产也并不影响作战。请看晋察冀：“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以第二分区第四区队为例。当春耕开始时，就派有专门的部队去打击敌人，并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正因为这样，军事动作也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这个小部队从二月至九月初，作了七十一次战斗，攻下了朱东社、上庄、野庄、凤家寨、崖头等据点，毙伤敌伪一百六十五名，俘伪军九十一名，缴了三挺轻机枪，一百零一枝长短枪。”“把军事动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宣传配合起来，马上进行政治攻势：‘谁要破坏大生产运动就打击谁。’代、崞等县城内敌人问老百姓：‘为什么八路军近来这么厉害？’老百姓说：‘因为你们破坏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伪军在下面纷纷议论：‘人家搞大生产运动，可不要出去。’”

游击区人民群众也可以发动生产运动，那些地方，也许是减租不彻底的，农民也有兴趣去增加生产。晋察冀：“沟线外部队生产运动的开展，还给了当地群众以直接的帮助。一方面，用武力掩护了群众的生产；另一方面，又用劳力进行了普遍的帮助。有的部队，规定了农忙时期以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群众生产情绪因此大大提高，军民关系更为融洽，群众都有了饭吃。游击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同情和拥护，从此更增高一步。”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晋察冀边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沟线外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由于干部的思想转变，重视生产，重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培养了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初步总结中，有六十六个英雄模范），仅仅五个月中，我们沟线外的部队，不仅在生产任务上按时完成了计划，而且特别有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新创造。”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

## 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4.23）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积极意义。）

（西方、东方的反法西斯战争都接近胜利。）

　　中国的两个前途：一、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老旧的中国。两个前途现时仍然在面前。

　　既然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则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党领导下，为新中国而奋斗。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就是大会的、全党的、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这是可能实现的，因为现在已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1. 经验丰富和党员众多的中国共产党；
2. 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兵力强大；
3. 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4. 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阐述这些条件的优越。）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其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党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经过大量的斗争，共产党已成为革命的重心，努力就能成功。）

## 论联合政府（1945.4.20）

### 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八年抗日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寇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寇。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主要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共产党在八年抗战中，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但是在目前形势下，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 二、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能否实现上述要求，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但现实国际国内形势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 **目前的国际形势：**

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寇就为时不远了。但还需有的警觉，若干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忽视这些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了的。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和平和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一战的形势大不相同。那时还没有苏联和许多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国家被打败、二战结束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散布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的反民主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仍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反法西斯的二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 **目前的国内形势：**

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牺牲，但同时也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最伟大的战争。一方面，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有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有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史上最高的觉悟，而且有了强大的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民主运动。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则这一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存在。团结全国人民，并给以适当的指导，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 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寇的主要国家，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做全面总结。因此，大会应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则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寇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寇，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在实际上帮助日寇的。

国民党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被压迫，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还是在日寇和国民党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发展。两条路线：国民党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什么这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必须回溯抗日战争的历史。

抗日战争是1931就开始了。1931.9.18日寇占领沈阳，之后占领东三省。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和人民，在党领导下自发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1932日寇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率领十九路军抵抗日寇的进攻。1933日寇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是没有任何援助的，且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破坏。1933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破坏。

国民党之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在于国民党在1927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

1924孙中山接受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1924-1925扫荡了广东反动势力，1926-1927举行北伐战争，占领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1927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党被看成了仇敌，而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使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了。从此，内战代替团结，独裁代替民主。但是，党继续战斗，高举革命的大旗，举行武装的抵抗，组织了人民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创造红军，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继承了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日寇打入东三省后，党在1933向一切进攻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停战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一方面是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更甚；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更甚。各种爱国组织建立起来。1934-1936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党适应新情况，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1935.12.9北平学生群众在党领导下发动爱国运动并推广到全国。1936.12.12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内战停止，全国的抗日战争开始。1937.5芦沟桥事变的前夜，党召集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党自1935以来的新政治路线。

1937.7.7芦沟桥事变至1938.10武汉失守，国民党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日寇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的重点还放在反日，就顺利形成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全国人民、党、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寄予极大希望，希望其乘此厉行民主改革，实施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仍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活动。一方面，国民党对待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多方限制各党派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仍保持其1927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党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人民的全面战争，胜利；压迫人民的片面战争，失败。又指出：战斗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移到了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游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红军保存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不管现在红军比起国民党现存军队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按其战斗力，按其有广大人民配合作战，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红军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

* 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 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 有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一概欢迎，并给予适当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 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善于按照变化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 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友军、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 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生产，达到军队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 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所有人都在自愿、民主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 还由于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例如，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则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各种困难，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打倒日寇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此，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装备，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寇。

#### 两个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1938.10武汉失守后，日寇停止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军事主力移到解放区战场；同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此，国民党变化了政策，重点由抗日转移到反共反人民。首先在军事上采取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以“坐山观虎斗”。

1939国民党采取《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概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从此时起，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1939-1943五年之内，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国民党反动分子以“奸党”、“奸军”、“奸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污蔑共产党和红军。1939.7.7党发表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共高潮”。

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寇主要向着解放区。到1943，64%日寇和95%伪军，为解放区所抗击。

1944日寇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国民党军队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就将广大区域沦陷。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56%；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44%。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寇反对解放区。此外，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八十万人。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 中国解放区

解放区现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红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动员了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这一切使得解放区在日寇和国民党压迫之下，屹立不摇，并且逐渐发展，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寇、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红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模范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起了模范作用。1937.9.22，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 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和广大人民间有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严重危机；极大减少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并变成统一和动员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管辖之下的一切重要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寇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党，把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寇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

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排斥。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反对它的领导。国民党的军队、政府机关、经济机关和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 比较

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比较。

* 两条路线：
  1. 人民战争的路线，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
  2. 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 国民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更缺乏。
*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武器比地方系军队好得多，但战斗力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在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 国民党的粮食供应充足丰富，但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使军队经常缺粮。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敌人“三光”政策的摧残，但却能自己生产，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严重，大部分工业破产，连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解决日用品的需要。
* 国民党区域，各类工作者生活痛苦。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 国民党区域利用抗战发国难财，贪污成风。解放区艰苦奋斗，工作之外，还要生产，禁绝贪污。
*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 国民党有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 国民党真凭实据地破坏了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打了十年内战，不顾一切国防事业，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寇打进关内，仓皇应战，从芦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讲不通了。

#### 两个问题

1. 什么原因使国民党抛弃了从黑龙江到芦沟桥，又从芦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2.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日寇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说：幸喜党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寇手里夺回来的解放区再送交日寇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1939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941的“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1943的“解散中国共产党”，1944的“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的“让”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保存了一片干净土和一支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寇，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寇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 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许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驱逐日寇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斯科比是英帝国主义派驻希腊的侵略军的司令。1944.10德寇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他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腊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把希腊投入恐怖的血海中）*。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1927-1937国内战争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则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 谈判

为着打败日寇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1944.9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不要以为一切都将是顺利的。事实是好坏的两个可能性、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寇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寇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就似乎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或前途：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寇，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表达信心。）

### 四、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上述已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1944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解放区以前，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害怕泄露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所以在1944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不许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所说不过是不必要的，而是关系着几亿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目前中国时局的严重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都希望中国能实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党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下面，来说明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

#### 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寇，并建立新中国，人民、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党派，迫切也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和具体性的两部分。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寇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就是说：

1. 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
2. 中国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
3. 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么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寇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一、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二、取得占中国80%人口的农民阶级的同意；三、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是虚伪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这是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的伟大政治指示，必须尊重并坚决实行，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集中的，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以它们保卫国家，且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和保护人民的，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符合孙中山的原则。土地问题上，孙主张“耕者有其田”。工商业问题上，孙在上述宣言里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其中所谓的国家，一定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基本纲领。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敌视；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给以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确定的。

但是，一切共产党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现阶段的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的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人民，曾为此而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和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亿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知道而不会被欺骗：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在1924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但应当指出，二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孙的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的这种革命的新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的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证明：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有具体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必须有所改变。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因为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

1. 日寇还未被打败；
2. 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团结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寇；
3. 国民党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现时的、适当的、最低限度要求是：

*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寇，并建立国际和平；
* 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
* 要求惩办分裂民族团结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使民族团结；
* 要求惩办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
* 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
* 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
* 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
* 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 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
* 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使其用于抗日；
* 要求承认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
* 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
* 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
* 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
* 要求从政治、军事上改造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
* 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
* 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
* 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
* 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
* 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
* 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
* 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
* 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
* 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
* 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
* 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
* 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 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 要求取缔官僚资本；
* 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
* 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
* 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
* 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教育；
* 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
* 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
* 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
* 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
* 要求保护因被日寇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寇的斗争；
* 要求改善中苏邦交；
* 等等。

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前提是：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且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 1、彻底消灭日寇，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决定应使日寇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现在日寇正在暗地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和日本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彻底消灭日寇，不许中途妥协，立刻制止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应该要求国民党改变现在的消极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红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坚决打击破坏抗战的行为。）

##### 2、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寇，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的丧失人心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 真做。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各党派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协议。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的。
* 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的。

反人民者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给自己系上一条永远解不开的绳索，即“国民大会”，想把“国民大会”当作法宝，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现在谁都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那里来的国民党代表？那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一、目前，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将来，经过自由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中国只能走这条路。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不管国民党现在还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 3、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和主要是向着日寇。但是国民党剥夺人民的自由，使不能反对日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的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应该争取，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可能成立。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寇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1925孙中山在其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国民党却反着做。）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 4、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寇、防止内战、建设新中国，必须将中国由分裂变为统一，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其结果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下台。国民党反人民集团走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寇打了进来。现在又大叫其专制统一论，是没人愿意听的。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的是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共产党在1935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国民党推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只有统一于抗战、团结、进步，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有了人民的自由和人民的民主政治，才能立刻统一。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就是争统一的运动。在具体纲领中提出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寇，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众多的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非如此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 5、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寇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红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消灭之。1944国民党提出“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1945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1924-1927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没了。现在的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及一切要求进步的人民，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么？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所谓“国家”，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以保障人民的自由，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1924孙中山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红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红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寇而不反对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 6、土地问题

为消灭日寇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哪些人是革命民主派？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即除开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都积极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因为农民被封建思想毒害太深和被封建主义压迫太久，一时间难以接受新的进步的思想，难以担当领导者的重任）*，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伟大同盟军的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1927-1936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实现孙“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战争的，就是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二五减租”一类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日“奸区”。

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寇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反对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腐败无能无力抗日，即国民党的路线；或赞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80%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即解放区的路线。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正因为这一点，我们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也正因为这一点，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受到日寇的欢迎和鼓励。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奸党”、“奸军”、“奸区”、“不服从政令、军令”，正是因为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事业。

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和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是日寇的死敌。

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大众文艺、国民卫生，都离不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

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解放区发展起来，今后应尽量推广。

应当指出一点，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成了农民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寇，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还要指出一点，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不了解这些特点，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处理农村问题，因而脱离农村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从任何小事情做起，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组织起来，为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极其重要的工作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消灭日寇以后，应当没收日寇和汉奸分子的土地，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 7、工业问题

为打败日寇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且大部分处于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会遭到破坏，农业、工业都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寇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这两者 🡪 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 🡪 没有巩固国防，没有人民福利，没有国家富强。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18年，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埋头于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寇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多起来了。

获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轻、重工业，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国家，巩固的经济作基础 + 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 + 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作基础 🡪 巩固。

共产党愿意协同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自一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1921产生中国共产党，从此，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在最后打败日寇，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将起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更大。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盈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打败日寇后，日寇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

##### 8、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

应当积极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应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之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即应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新文化。

##### 9、少数民族问题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1943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1944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政策。

1924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尊重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多年以来，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 10、外交问题

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寇，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共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且已经派遣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国民党必须停止仇视苏联，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1924孙中山召集的国民党一大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1937抗战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寇的国家。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些援助。太平洋问题最后的彻底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就要把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在日寇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否则不能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我们希望印度独立。一个独立民主的印度，是印度人民和世界和平都需要的。

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打败日寇，能够得到建立独立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关于具体纲领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样。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都首先需要一个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

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即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意见的态度，那是错误且必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共，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关于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已在上面作了充分说明。无疑，这些纲领是要在全中国实行的；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给中国人民展开了这种想望。但是，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解放区，这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必须在实行时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些已在前面说到了，有些还须在下面加以补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中国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还有许多社会各界发表同类性质的宣言。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日益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要求改革。重庆等地的各界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工农、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国民党阻止不了这一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寇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那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时机成熟后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寇。日寇及其走狗，对于沦陷区内的所犯罪行；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红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寇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只要是反对日寇及其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的人提出警告：赶快认识自己的罪行，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罪。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共产党、红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

####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且有了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巩固和发展。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广泛进攻一切被敌占领的可能攻克的地方，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注意，现实敌人还是有力量的，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合作。

为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必须充分进行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驱逐日寇以后，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工作时，应当根据农村特点、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寇，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

红军和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并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必须注意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因为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不容易识别和处置。因此，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 五、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么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但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如果忽视困难的一面，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战中，创造了巨大的力量。但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缺点。如果忽视缺点一面，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共自1921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历史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结晶。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列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共，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的新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共正是这样做了。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党在二十四年中，克服这些错误思想，使得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党现在已有121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成效，纠正了很多不纯正的思想。今后应继续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反则反之。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同志，不要让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倾听群众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组织起来，逐步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这样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在我们的前头，迫切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同志的思想，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思想和党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有很大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最广大人民及其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生命去殉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生命，使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最后打败日寇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此，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寇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此，要把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在党内团结全体同志，在党外团结全国人民，就可以把日寇及其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并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共产党的努力，没有共产党人做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表达信心。）

## 愚公移山（1945.6.11）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做了三件事：一、决定了党的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完成革命目标。二、通过了新的党章。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对这个大会的赞扬。）

要向广大人民宣传大会的路线，使全国人民建立信心，坚持下去，革命就会胜利。

要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现时民主是主流，反民主、反民族独立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注定要失败。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且更扩大了，所以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坚决相信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4.27）

我们的军队在物质极端缺乏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能够完善地解决。否则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解放区的军队，已经达到了九十多万。为打败日寇，还需要扩大军队到几个九十万。但我们还没有外援。就是假定将来有了外援，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供给，这是一点主观主义也来不得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贫困、国家分裂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我们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现在，让站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部队，例如说两个连，去选择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或由上面全部供给生活资料；或让它生产自给。在认真地试行一年生产自给之后，一定会认为后一种办法结果要好些，愿意接受它。这是因为后者能使部队的一切成员改善生活；而前者，在目前的物质困难条件下，无论怎样由上面供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至于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和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

* 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起生产劳动，亲如兄弟。
* **增强劳动观念**。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动员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不会造成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目前的条件，只能采取动员制，还不能采取征兵制。动员来的兵要过长期的军队生活，将减弱他们的劳动观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
* **增强纪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反而会增强战斗纪律和军人生活纪律。
* **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在生产中，军民互助，增强友好关系。
* **军政关系好了**。军队埋怨政府的事少了。
* **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

1942和1943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我们在1937以前入党的党员，剩下的不过数万人，而现在的党员是120多万，其中大多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革命积极性，愿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在1937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如果不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是不能顺利前进的。但是，我们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党就能够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稳步前进了。在今后，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另一个是生产运动。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粮食、油盐、被服、经费都不足。这是伴随着1940-1943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困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抓住这个环节，抗日斗争不能。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如此，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945.7.10）

四届国民参政会是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所以，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蒋在开幕时说：“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可使诸君得以充分的讨论。政府准备以最诚恳坦白的态度，聆取诸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也和美国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其极力怂恿蒋，蒋才敢于稍硬了起来说一定要“还政于民”。蒋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宣称不和中共合作外，还极力替蒋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二者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从此以后，就泄气了。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到处皆是。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其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蒋介石说：“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咨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既然如此，不知道。按照蒋的说法，中国是无任何可以咨询民意的负责团体的，但蒋又向参政会聆取意见，这是自相矛盾的。大会的内容还需要过几天才能知道，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中国人民群起反对之后，热心“君主立宪”的人们也劝蒋不要套上被称为猪仔国会的那条绞索。因此，蒋就此缩手也未可知。然而蒋是决不会轻易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人民的。现时蒋将人民的合理批评称之为“肆意攻击”就是证据。据说，“在战争状况之下，沦陷区域势必无法举行任何普遍的选举。因此，在两年以前，国民党中央全会乃有于战事结束一年以内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定。若干方面，当时曾肆意攻击”，以为迟了。及至他“鉴于战事的完全结束为时容或延长，即使战事结束后各地秩序亦未必能于短时期内恢复，所以主张在战局稳定之时即行召集国民大会”，不料人民又是批评，使蒋很不好办。但是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怎样说和怎样做，是决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但蒋是一件也不做，却在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任何这类的欺骗，决不容许保留其一丝一毫。有无国民大会是一件事，可以暂时搁置；有无起码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是必须立即实施的。请问蒋：既然愿意“提早”“还政于民”，为什么不愿意“提早”实施若干起码的民主改革？

##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7.12）

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坚持反动政策的国民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内战为生活的；仅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这样的时机，才被迫暂时地放弃全国规模的内战。但从1939年起，局部的内战又在发动，并且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是反共第一抗日次要。目前国民党一切军事布置的重心，不是反对日寇，而是消灭共产党。不论是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或是战后的和平建设，这种情况均须严重地估计到。罗斯福也估计到了这一点，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党的政策。1944.11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延安时，曾赞同中共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他后来变卦了，露骨地表现于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一群人的意见。就在这时，罗斯福去世了，赫尔利得意忘形地回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究竟是否改变和哪一天才改变，今天还不能确定。但必须认清赫尔利式的政策的危害。

##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1945.7.29）

（对于抛弃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恢复美国共产党，这一决定的赞美）

##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945.8.9）

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抗日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寇的时间已经到来。*（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调集大军到苏中边境地区。1945.6.30《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中规定苏联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宣布大连为自由港等。这就为苏联对日作战创造了条件。1945.7.26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布后，日本天皇于次日主持最高作战会议，但没有做出一致的决议。铃木首相7.30宣称，要把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苏联便参加了对日战争。1945.8.8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忠于同盟国义务，宣布从次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红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广泛进攻和歼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缩小沦陷区。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

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亿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

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最后胜利而斗争。

# 第四卷（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8.13）

最近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日寇投降大势已定，其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寇已经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已经取得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此形势下，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和将来的可能，党的方针，这是全国和全党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过去打过十年反革命内战。抗日期间，发动过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但止于党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现在胜利被他等来了。八年来我们和蒋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八年来解放区在毫无外援，全靠自己，解放了广大国土，抗击了大部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使大后方的二亿人民和土地没有受到日寇摧残，但也保卫了躲在峨眉山上的蒋，让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但蒋并不感谢我们。蒋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不知他的底细而还拥护他。他上台，却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抗战时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反而仍像1927一样发动内战，屠杀人民。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时，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人民和党内的许多同志，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认识得很清楚，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自然、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却还要再打。对于蒋发动内战，党是一贯坚决反对内战的。今后还要以极力领导人民制止内战。但必须清醒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要打内战的方针已定；不要打内战的只是党和人民，并且后者的力量又不足以制止前者，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蒋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曾进行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注意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党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7党还幼年，对于蒋突然反革命毫无精神准备，以致失掉了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现时党已有三次革命经验，大大提高了政治成熟程度。党再三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党和红军，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蒋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而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的办法办事。蒋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我们就按照他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了东西，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刀要杀人民。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造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叫他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办。不久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易得逞。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在皖南事变以后，有一次，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问我们的动向如何。我说，你天天在延安还不清楚？“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那时候还没有提出蒋的名字，只提何应钦。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一定要内战，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的。如果我们打不赢，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当权的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蒋说：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个决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1927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所以抗战胜利的果实应当属于人民，蒋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必然不属于他，这是一个问题（理论）；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实际）。

* 蒋介石勾结着美帝国主义，在某些大城市他们的力量占优势，所以那里的果实就要被蒋抢去，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
* 另一些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但现时仍只能说“力争”。
* 某些地方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乡村和乡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块，七八十个城市一块，四五十个城市一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这批胜利果实。

得到了这批果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历史上，我们只在1931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但是还没有中等城市。二十一个小城市联在一起，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五十万人口。依靠着这些，中国人民就能奋斗那样久的时间，粉碎那样大的“围剿”。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就有了几个大于江西中央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就很可观了。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或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是否会爆发，决定于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蒋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

* 解放区有一亿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
* 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是一种牵制。
*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1927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共产党的形势。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

此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人民还不觉悟时，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大大提高。党在人民中的威信空前的高。但是，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需要做很多切实的工作。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不打就不倒。有些同志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党和红军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即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能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反动派。蒋同我们相反，他完全依靠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方针的基本点。美帝国主义要帮蒋打内战，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早定了的。但是，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不相信其“好话”，不惧怕其恐吓。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没那样容易。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对此要有准备。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

##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1945.8.13）

国民党说，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自己招供，活画出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可是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他们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正是坚决地执行波茨坦公告第二项的规定：“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而蒋的所谓“命令”，正是违反了他自己签字的波茨坦公告。只要拿这一比，就知道谁是不“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了。

国民党和蒋的行为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但他们找了朱德总司令命令敌伪投降缴械当作借口，只足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伪看得比同胞还可亲些。淳化事件，明明是胡宗南军队攻入陕甘宁边区，挑拨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却说是中共的“谣言攻势”。淳化事件这个借口，好容易被国民党反动派找着了，却被中外舆论界一下子识破，于是又说八路军、新四军不该要敌伪缴枪了。八年抗战，红军受尽了蒋和日本人夹击围攻的苦楚，现在抗战瞬将结束，蒋又在暗示日本人，叫他们不要向红军缴枪，以便于使自己拿了这些枪杀共产党。叫日本人缴枪给蒋，叫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以宁渝合流、蒋伪合作，去代替“中日提携”、日伪合作；以蒋的反共建国，去代替日本人、汪精卫的反共建国。这难道还不是违背波茨坦公告吗？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亿以上的人民，抗击着56%侵华敌军和95%伪军。实在说，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则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

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945.8）

这两个电报是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并且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毛写第一个电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第二个电报里，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为着同样的目的，毛还为新华社写了两篇评论，即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由于党采取了这种决不被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的坚定的果断的立场，就使解放区和解放军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并且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 一、八月十三日的电报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美英军队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这无疑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使我们不得不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

### 二、八月十六日的电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解放区、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二亿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在抗战将要胜利结束时，我提起你注意目前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亿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十九个省区内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1937七七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此外，我们还在沦陷区(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69%日军和95%伪军。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解放区及其军队，不承认，不接济，且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解放区全体军民虽受尽了敌伪和你的军队两方面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他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解放区人民和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你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纷争，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都被你和你的政府所拒绝。凡此一切，我们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并下了一个非常无理的命令，又命令你的军队以收缴敌人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凡此种种，使得我们不得不向你提出下列的要求：

1. 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后的一切条约，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解放区、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否则，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2. 解放区、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解放区内的日伪的投降，收缴其物资，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
3. 解放区、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派遣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4. 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有权选出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5. 请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解放区的军队和你的军队各自接受所包围的日伪投降，互补干涉。
6. 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

　　此外，我这里重复声言你8.11的电报命令是错误的，日本并未实际上投降，这和各同盟国继续彻底战争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这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美英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实际投降。

##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945.8.16）

蒋的发言人说共产党违反蒋对朱德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蒋在消灭日寇的最后关头，禁止一切人民军队打日伪。这个命令当然不应接受。随后蒋就把人民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这表示：蒋向中国人民宣布了内战。这是他在八年抗战中的一贯计划。过去的三次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但都被制止。因此，蒋把全国内战改期到抗战结束的时候，就有了近来的命令和谈话（见上篇）。蒋为了发动内战，发明了各种诬陷的词令，这一次的新词令是“人民公敌”。而中国实际的“人民公敌”是蒋自己，想想蒋所做之事就能明白。中公是一贯坚持拒绝内战的，并做了诸多的努力，现在蒋使内战一触即发。然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迅速壮大人民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新华社记者唤起全中国和全世界来反对这样一种最虚伪和最无耻的谎言：蒋禁止中国人民去解放敌占大城市、解除敌伪武装和建立民主政治，而由他自己去做，中国内战反而可以避免。这种谎言不但显然违反中国人民的利益，且违反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事实。必须记得：蒋的1927-1937内战，大城市都在蒋手中，正是这样，内战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十年。而十年内战中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之所以被制止，并不是由于蒋力量强大，而是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相对地更强大；不是因为全国呼吁停止内战而停止，而是因为中共和西安事变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严正自卫而打退的。正式因为共产党有力量、有骨气、为人民而战斗，才能使抗战坚持到今天，使蒋到今天还能活着在离前线那么远的山坳里发表什么命令谈话。实现共产党所主张的“联合政府”及其他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8.26）

这是毛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由于党和中国广大人民坚定地反对蒋的内战阴谋，也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当时还顾忌世界民主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蒋在1945.8.14/20/23三次电邀毛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还在八月二十七日为此来到延安。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遣毛、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所起草的这个通知，分析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以及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的对策，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的指示，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毛等在八月二十八日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虽然只发表了一个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政治上却使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因而是成功的。十月十一日，毛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在重庆继续谈判。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见本卷《关于重庆谈判》。

日寇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垄断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要力争。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城市共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伟大胜利。华北方面，也收复多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

现在苏美英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周恩来、王若飞和蒋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收缴敌物资后，加强了它的地位，但仍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缩小解放区和解放军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输了理，党就有理由自卫战争，绝不被反动派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是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指示外，这些地方必须独立分析环境，解决问题，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无可奈何时，可能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绝不要依靠谈判，绝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行动指导的正确，党内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关系。坚决依靠人民。

总之，党面前困难甚多，全党必须作充分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大势有利于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 关于重庆谈判（1945.10.17）

目前时局问题。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了四十三天。其结果已在报上公布。现两党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但解放区和军队的问题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要把它变现，还要经过很大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是矛盾的。所以说，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努力。之所以国民党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是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谈判和成立《双十协定》呢？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人甚至有国民党员认为，蒋是靠不住的，谈判不出什么结果，一定要打仗。另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蒋有很多顾忌：解放区的强大、兵力众多，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大幅提高，现在也只好承认党的地位。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国、全世界。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同情我们，也不赞成蒋。这使蒋不能不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党是一贯赞成团结的。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必须承认。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去和不去，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今后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让出八个解放区是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所以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让出？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人家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让步，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现在所有宣传机关，除新华社，都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交涉，作过更大的让步。这一次让步，就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数目缩编，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但我们的枪不交给他们，否则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目前时局的发展，有许多矛盾现象，如上所述。）

有个别同志抱着错误的想法，不是想到那里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而是认为那里的一切都很顺利，比延安舒服。我劝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想法。去，是为了工作，即斗争。那些地方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敢于主动挑重担子才是好的。）

（到前方去的干部，要团结人民，发挥人民的力量。）

二战后，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趋势。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了，但不会打三战。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有好处。反苏反共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都坚决反对。近三十年内，打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战和二战间隔了二十年。人类只在这三十年内才打过世界战争。一战后世界有很大进步。二战后世界一定会进步得更快。一战后，产生了苏联，全世界产生了几十个共产党，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二战后，苏联更强盛，欧洲的面貌改观，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更团结了。中国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间，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应当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还要告诉人民，道路是曲折的，要承认和坚持。

##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5.11.5）

这是毛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的谈话。这时蒋介石已经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的内战规模已经日趋扩大。

合众社重庆三日电报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宣称，“国民党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并提出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新华社记者为此询问中共方面发言人。

中共发言人告记者称：吴所说全系撒谎。（国民党大批军队向解放区开进，多个国民党军队被打败，被俘的指挥官和指示进攻的文件，都可以证明国民党不是“守势”，而是主动进攻。）

记者又问中共发言人，吴所提恢复交通办法，你的意见如何？该发言人答道：这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先解决交通问题，后解决三项问题呢，还是先解决三项问题，后解决交通问题呢？解放区军队艰苦抗日八年，为什么没有受降资格，而劳其他军队从远远的地方开去受降呢？伪军人人得而诛之，为什么一律编为“国军”，并且指挥他们进攻解放区呢？地方自治，《双十协定》上已有明文规定，孙中山早主省长民选，为什么还要政府派遣官吏呢？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为着迅速制止已经普及全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我们主张：

* 已经进入华北、苏北、皖北、华中各解放区及其附近的政府受降军队和进攻军队，立即撤返原防，由解放区军队去接受敌人投降和驻防各城市与交通线，恢复被侵占的解放区；
* 全部伪军立即缴械遣散，在华北、苏北、皖北者，由解放区负责缴械遣散；
* 承认一切解放区的人民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实现《双十协定》的规定。发言人说：只有如此，才能制止内战；否则是完全没有保障的。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战斗中所缴获的文件以及大举调兵和大举进攻的实际行动，已充分证明国民党当局所谓恢复交通是为着人民，不是为着内战，乃是毫不足信的。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5.11.7）

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此，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

目前战争的规模很大，许多领导同志在前方指挥，不能分心照顾减租和生产。因此，必须实行分工。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在1946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

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在减租中和减租后，必须帮助大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会中。

使大多数生产者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是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政府发放农贷、工贷，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也十分重要。现在一面要为战争动员民力，一面又要尽可能地不违农时，应当研究调节的办法。在不妨碍战争、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部队、机关、学校仍要适当地参加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

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党的重要任务。为此，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材，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一切仍要从长期支持着想，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1945.12.15）

过去几个月，在肃清敌伪和粉碎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得到了伟大的胜利。1946年各解放区的工作必须注意如下各点：

1. **粉碎新的进攻**。国民党在调动更大的兵力，准备新的进攻。1946春的战斗，将是紧张的。因此，在自卫立场上，尽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
2. **开展高树勋运动**。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必须对一切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瓦解其战斗意志。另一方面，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高树勋，人名，国民党将领，起义反对内战。）*
3. **练兵**。目前扩兵应该停止，而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各兵种都如此。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1946年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为各方面的团结而奋斗。按条件重新组织各地民兵。重新调整军队后方勤务工作。尽力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继续办理军事学校，着重训练技术人材。
4. **减租**。各地按照指示务在1946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酌量增加工资。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
5. **生产**。各地按照指示立即准备，务使1946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人民中发生的疲劳情绪，只有在认真实现减租和生产两项任务，并有了显著成绩后才能克服。减租和生产是否能完成，将最后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切不可疏忽。
6. **财政**。为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1946必须有计划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
7.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1946这两项工作必须做得更好。这对粉碎国民党进攻和巩固解放区将有重大意义。应从每个指战员的思想上解决问题，彻底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性。以改善地方对军队的关系。
8. **救济**。各解放区有许多难民、失业者，亟待救济，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法外，主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此种互助救济，应由党政鼓励群众组织之。
9. **爱护本地干部**。现在每个解放区，都有大批外来干部做各级领导工作。对于这些外来干部，各地领导机关，务须告诫他们，爱护本地干部。将识别、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当作重要任务。只有这样，党在解放区才能生根。
10. **一切作持久打算**。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均须作持久打算。目前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同时，党代表团即将出席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和国民党重新谈判。但事情可能还有曲折。还有许多困难，例如新区域、新部队还不巩固和财政困难等。必须正视这些困难，在一切工作布置中作持久打算，注意资源节省，力戒侥幸心理。

##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12.28）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苏联宣布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会合，领导东北人民，消灭日军和伪满的残余，肃清汉奸，剿除土匪，建立各级地方民主政府。但是这时坚持要独占全东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解放军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要地。东北的严重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而这一斗争对于全国局势显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确定了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中共中央和毛的这个正确的方针，由中共中央东北局有效地实现了，因而能在三年以后的1948.11取得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

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这必须经过艰苦奋斗，需要三四年。但必须在1946完成初步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

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党，如果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近几个月，打下初步的基础，则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否则，群众分不清国共两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造成在东北的不利形势。

党现时在东北有一项主观上的困难，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干部不满不能占领大城市，不耐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都是同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相矛盾的。必须反复教育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应向干部说明，即使大城市和交通线归于国民党，东北形势对于我们仍然是有利的。只要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建立根据地，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不可太低估国民党势力，也不可以为国民党将向东满和北满进攻，因而产生不耐心的情绪。这样说明时，当然不要使干部觉得国民党势力过大。应当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这就给党以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但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正向热辽边境进攻，如果没有受到打击，不久将向东满和北满进攻。因此，党必须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必须扫除干净干部中不经过艰苦奋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

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一切军队，均须有确定的地区和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此次我军十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余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

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建立根据地和争取胜利关系极大。因此，应充分注意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

##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4）

这个文件是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而写的。一九四六年春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在这个文件里，反对了这种错误思想。毛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1947.12中共中央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

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

上述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但是，这一类的妥协在目前短时期内还不会很多。美英法同苏联的通商贸易关系则有扩大的可能。

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7.20）

1945《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就不断地破坏这个协定，但是当时他对全面内战还没有准备好，主要是大批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运到内战前线。因此，1946.1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仍然不能不召集有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且在一月十日发布停战令。蒋介石不愿意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停战令。在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继续在许多地方向解放区进攻，在东北进攻的规模更大，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同时美国用极大力量运输和装备国民党军队。到了1946.6底，蒋和他的美国主子认为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认为可以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解放军，就以六月二十六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七月起到九月止，国民党军队先后向苏皖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大举进攻。十月，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时，继续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在全国规模内战爆发的时候，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正规军共达一百九十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占其总兵力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各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分局的领导下，英勇地抗击了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当时，解放区共有六个大的作战区域。这六个作战区域和在这些区域作战的解放军是：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解放军；华东解放区（包括山东解放区和苏皖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解放军；东北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解放军；晋察冀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聂荣臻等领导的解放军；晋绥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贺龙等领导的解放军；中原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的解放军。当时解放军的总兵力约为一百二十万人，较之敌人的兵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解放军正确地执行了毛所制定的作战方针，不断地给进犯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经过约八个月的时间，在消灭了敌人正规军六十六个旅，加上非正规军，共七十一万多人以后，便停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接着，解放军又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逐步地展开了战略性的反攻。

蒋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且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的进攻，才能恢复和平。

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战胜蒋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是不可避免且必要的，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都能明白，有精神准备。

为粉碎蒋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一方面应坚定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的进攻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巩固解放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必须作持久打算，节省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检查和纠正各地贪污现象。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完全自给。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即在东北亦应开始提倡。在财政供给上，满足自卫战争的物质需求，同时减轻人民负担，使解放区人民虽处战争环境，但生活仍能有所改善。总之，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8.6）

这是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一篇很重要的谈话。在这篇谈话里，毛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做“泥足巨人”一样，毛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做纸老虎，都是从它们的本质说的。这是革命人民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来，毛曾经多次地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毛1958.12.1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关于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问题，参看本书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五章第六节和本卷《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第一部分。

* 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 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一年以上。
* 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样久吗？可以的。
* 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蒋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 共产党能支持多久？就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 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因为蒋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 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掩盖当前美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也正是这样。

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从政治、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不能实现。但目前，二战结束不久，美国反动派如此强调美苏战争，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三战才可以避免。

* 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反动派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属于人民。1917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但历史证明了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和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真正有力量的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比蒋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因为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9.16）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敌人使用许多个旅分几路向我军前进时，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至少三倍及以上)，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这个旅，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援助较少的，或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迅速增援，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得手后，依情况，或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或收兵休整，准备再战。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作战方法。

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我军担任攻击的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至少三倍及以上)，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 // 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 // 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必须详举战例，反复说明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指出这是战胜蒋进攻的主要方法。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但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时，必须应用这一方法。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则应分为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①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②如果我军兵力不足，则应对敌军所占诸城逐个夺取，不要同时攻击几个城镇的敌人。

我军主力集中歼敌时，必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地方部队在打敌部队时，也适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大量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因此，凡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不但歼灭敌军的正规部队应当受到奖励，就是歼灭敌军的保安队、还乡队等反动地方武装，也应当受到奖励。但是，凡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能够保守或夺取的地方和在战役上战术上有意义的地方，则必须保守或夺取之，否则就是犯错误。因此，凡能保守或夺取这些地方者，也应受到奖励。

##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1946.9.29）

问：是否认为美国调解中国内战之举已告失败？如美国政策按目前形式继续实行，则结局将如何？

答：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使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并经过蒋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

问：中国内战将延长多久？其结果将如何？

答：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行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协定，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否则，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痛苦；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问：是否认为蒋是中国人民的“当然领袖”？共产党是否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接受蒋的五项要求？如果国民党企图召集一个无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共产党将采取何种行动？

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蒋如能按照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五项”或十项违反上述协定和决议的片面要求，则我们仍然愿意和他共事。国民大会只应当按照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由各党派共同负责去召集，否则我们将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

## 三个月总结（1946.10.1）

中央指示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三个月的作战，已证明是正确的。

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无法克服，是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也已发生尖锐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190+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其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军歼灭25个旅。今年二月至六月被我军在东北所歼灭者，尚未计算在内。

蒋军190+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就必定越打越少。

（三个月被我歼灭的25个旅的所属说明。）

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25个旅，如此，即可能停止蒋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这一任务完成时，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25个旅，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

过去三个月内，我们损失几十个中小城市。其中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地暂时放弃的；一部分是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今后还可能被敌再占一部分，但只要今后仗打得好，失地即可收复。各地应检讨过去作战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都极大地援助了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过去三个月战争，吸引了蒋原拟调赴东北的几支有力部队于关内，使我们在东北得到休整军队、发动群众的时间，这对将来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25个旅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至少三倍及以上兵力，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须如此。

过去三个月内，我军不但歼灭敌正规军25个旅，又歼灭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反动军队为数不少，这也是一个大成绩。今后仍应大量地歼灭此类军队。

过去三个月证明：歼灭敌军一万人，自己须付出二千至三千人的伤亡作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为应付今后各地的长期战争，必须有计划地扩兵，保证主力军经常满员，并大量训练军事干部。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遵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项原则，坚决地实施之。

三个月经验证明：在一月至六月休战期间，凡依照中央指示加紧进行了军事训练的军队（中央指示各地以练兵、生产和土地改革为中心任务），其作战效能就高些，否则效能就低得很多。今后各区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执行了中央指示，深入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否则，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生产工作。

三个月经验证明：凡民兵、游击队、武装工作队等地方武装组织得好的地方，虽然被敌人暂时占领许多的点线，但仍能控制广大的乡村；否则，就给敌人以很大的便利。今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打击反动派活动。

三个月战争，使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快要用完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同时，国民党恢复征兵征实，引起人民不满，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展。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指使下，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决心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我们必须揭穿美蒋的一切阴谋。

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已引起各国广大人民日益不满。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斗争日益高涨，各国共产党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反动派想要压服它们是不可能的。苏联的国力及其在各国人民中的威信日益高涨。美国反动派和被美国反动派所扶助的各国反动派，必然日益陷于孤立。这些就是极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凡此国内国际形势，都比一战以后时期，大不相同。二战以后的革命力量是极大地发展了。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应向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

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各地必须依照上述各项方针坚决实施，力争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

##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2.1）

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过去七个月作战，已歼灭蒋的正规军56个旅；大量伪军和保安部队，被击溃的正规军，都未计算在内。蒋的攻势虽然还在继续，但已经衰弱得多。蒋军兵力不敷分配，征兵不足规定数额，这同他的战线之广和兵员消耗之多，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蒋军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主动。今后数月内可能达到歼灭蒋军连前共计100个旅。蒋不可能再从他的后方调动很多有战斗力的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进攻解放区的218个旅中，被歼灭已超25%。虽然有些部队又以原番号补充恢复，但其战斗力很弱；有些则根本没有补充。我军如能于数月内，再歼其40-50个旅，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同时，蒋区域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去年11.30因国民党压迫摊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和去年12.30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由北平开始的学生运动，已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超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规模。

解放区解放军的胜利和蒋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

这一形势，是在美蒋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之下形成的。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我党七大即曾预见美蒋实施这些反动政策的可能性，并为战胜这些反动政策而制定了完整的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

美蒋上述反动政策，迫使各阶层人民团结自救。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它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广泛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统一战线相比，规模同样广大，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解放区在坚决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参加工作。解放区内，除汉奸分子和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后，解放区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仍将受到保障。

由于蒋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中同美帝国主义资本相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蒋为了继续内战，恢复了抗日时期极端恶劣的征兵、征粮制度，迫使广大乡村人民首先是贫苦农民不能生活，因而民变运动已经起来，并将继续发展。这样，蒋就将日益丧失威信，遭到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危机。一方面推动蒋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日益向前发展，另方面使蒋军士气更加下降。

以孤立党和其它民主势力为目标而召开的国民大会及其伪宪法，在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威信，反而使蒋自己孤立起来。党和其它民主势力拒绝参加伪国大。蒋已拉拢两个毫无威信的小党派和某些“社会贤达”，并且中间派队伍中预计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人投到反动派方面去，因为民主势力日益壮大和反动势力日益孤立，所以敌我两条阵线不得不划分得清楚。一切隐藏在民主阵线中欺骗人民的分子，最后都将露出原形而为人民所唾弃，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队伍则将因为同隐藏的反动分子分清了界限，而更加壮大起来。

国际形势的发展，极为有利。苏联力量的增长及其外交政策的胜利，世界各国人民的日益左倾及其反对本国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斗争的日益发展，迫使美帝国主义日益孤立。如果再加上无可避免的美国经济危机这一因素，必将迫使美帝国主义更加困难。美蒋的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中央多次指出这一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日益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为取得修整时间，为向美国取得新的借款和军火，为缓和人民愤怒，蒋又要求和我党恢复所谓和谈。党方针是不拒绝谈判，借以揭露其欺骗。

为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今后几个月内再歼40-50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必须充分实行关于三个月总结的指示（见上篇）和去年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指示。这里特再着重指出几点：

* 军事问题。我军在过去七个月奋战中，已证明有一切把握粉碎蒋的进攻，取得最后胜利。我军的装备和战术均有进步。今后军事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各大小军区，各野战兵团，必须解决为了加强炮兵和工兵而发生的各项问题，主要是训练干部和制造弹药问题。
* 土地问题。各区都有约2/3的地方执行了中央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还存在解决不彻底的缺点，主要因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以致没收和分配土地都不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意。在这种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受到惩罚。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和包括富裕中农的利益。此外，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之处，照《五四指示》办理。总之，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90%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
* 生产问题。各地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在此基础上，正确解决财政问题。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必须反对片面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二、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必须反对只顾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错误观点。三、统一领导，分散经营。除依情况应当集中经营者外，必须反对不顾情况，一切集中，不敢放手分散经营的错误观点。

（表达胜利的希望。）

##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1946.11、1947.4）

毛起草的这两个文件，一个是在1946冬季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时候在延安写的，一个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在1947.3.19占领延安以后的二十天在陕北靖边县青阳岔写的。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以后，为了挽救自己的垂死统治，采取了召开伪国民大会，驱逐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等项疯狂的步骤。蒋采取这些步骤的结果，如本文所说，在政治上完全是自取灭亡。在军事上，他企图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结果也完全失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达到二十五万人，西北战场的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因而国民党军曾经先后占领过解放军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是国民党军不但没有达到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或者把它们赶到黄河以东的目的，而且受到解放军多次的沉重打击，损失兵力约达十万人，最后不得不逃出边区，而解放军胜利地转入解放大西北的进攻。同时，西北战场解放军以很少兵力吸引和歼灭了敌军的大量主力部队，也有力地支持了其它战场首先是晋冀鲁豫战场解放军的作战，帮助他们较快地转入进攻。毛和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从1947.3解放军撤出延安起，到一年以后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进攻止，一直留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极大地鼓舞了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毛在留驻陕甘宁边区期间，不但继续指导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而且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达到了本文所提出的“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参看本卷《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和《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两文。

###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指示

蒋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但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乃蒋自取灭亡之时。蒋军在被我歼灭了35个旅、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的灭亡。总之，蒋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各地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

###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

国民党为垂死挣扎，除采取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驱逐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机关，宣布国共破裂等外，又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其统治的危机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决定：

1. 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2. 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3. 同时，为工作便利，以刘少奇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1947.4.15）

（如题。）

##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5.30）

和全民为敌的蒋，现已发现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军事战线上、政治战线上，蒋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想不出逃脱方法。

美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曾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把二战后的中国和世界，看成和过去一样，不许任何人违背他们的意志。日本投降后，他们决定要使中国回复到过去的旧秩序。经过政治协商和军事调处等项欺骗办法赢得时间之后，蒋就调动了二百万军队实行了全面的进攻。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一、蒋和解放军的战争；二、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之间的尖锐斗争。蒋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蒋的军警宪特与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用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完全陷于孤立，蒋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已经表明。

由于美蒋介石代替了日汪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发动内战、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并使斗争迅速发展。被蒋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它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蒋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卖国的中美商约所加强了，美国独占资本和蒋的官僚买办资本结合，控制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维持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现在人们已经看到这些工具的迅速破产。

蒋军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过去十一个月，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90个旅，没有了过去的神气。蒋曾错误估计解放军的力量和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数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十个月之后，蒋全部军已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解放军所包围。

蒋军在前线打败仗的消息传到后方的日益增多，被蒋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感觉自己翻身有了希望。恰在这时，蒋的一切政治欺骗迅速破产，反而将蒋自己孤立。在这以前，许多人尤其是中间分子，对蒋的手法是多少有幻想的。如今没有人会相信蒋了。

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正确。我们曾不断指出，蒋仅仅是一个卖国内战独裁的政府，以内战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和维持独裁统治。其因为采取了这些反动政策，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和力量。蒋的强大只是暂时、表面的，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

　　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947.9.1）

第一年作战，歼灭敌正规军97.5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十二万人。这是一个伟大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第一年作战，敌人以248个正规旅中的218个旅一百六十多万人，近百万的特种兵，以及伪军、交通警察部队、保安部队等，向解放区进攻。我军正确地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不惜付出三十余万人的伤亡，大块土地的被敌占领，使自己随时立于主动地位，因而争取了歼敌一百十二万人，分散了敌军，锻炼和壮大了我军，并且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的土地。

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以前，困难将是不少的。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战斗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

到国民党区域作战的关键：一、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二、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利，站在我军方面。

（到今年八月止的敌军分布。）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今年计划征兵一百万补充前线并训练若干新旅和若干补充团。但是，只要我军能如第一年作战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在第二年再歼敌96-100个旅，则敌军将进一步大受削弱，其战略性机动兵力将减少至极度，势将被迫在全国一切地方处于防御地位，到处受我攻击。国民党虽有征兵百万训练新旅和补充团之计划，也将无济于事。其征兵纯用捕捉和购买方法，必难达到百万，而且逃亡甚多。我军执行外线作战方针，又可缩小其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包括一次打几个旅的大规模歼灭性战役在内），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以求达到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一方面，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另一方面，发扬勇敢战斗、不惜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极大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坚决攻取一切守备薄弱之据点和城市；相机攻取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暂时弃置一切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兵员补充自己。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只有一部分向老解放区求补充，特别是南线各军应当如此。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

## 中国解放军宣言（1947.10.10）

这是毛为中国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在这个宣言里，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解放军的也就是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在1947.10.10公布，被称为《双十宣言》。宣言是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的。

解放军在粉碎蒋的进攻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同日寇奋战了八年。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却发动内战，逼得全国各阶层只能团结起来打倒蒋。

蒋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是蒋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1927蒋就背叛了国共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1936西安事变，党以德报怨，协同张杨两将军，释放蒋，希望蒋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又一次忘恩负义，消极应战日寇，积极镇压人民，极端仇视党。日本投降，人民又一次宽恕蒋，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在签订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四项诺言后，随即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在美帝援助下，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从1946.1停战协定宣布到现在，蒋先后动员了220+个正规旅和近百万的杂军，向中国人民从日帝用血战夺取过来的解放区，实行大举进攻，先后侵占各城市和广大乡村。蒋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同日寇完全一样。去年十一月，蒋介石召集了伪国大，宣布伪宪法。今年三月，蒋驱逐了共产党代表。今年七月，蒋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区，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使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都是蒋利用独裁权力横征暴敛而来的。蒋为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军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军事物资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严重的条件，以酬谢美帝。总之，蒋二十年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今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都认识了蒋的罪恶，盼望我军打倒蒋。

我军是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我军的政策，代表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1. 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2. 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为首的内战罪犯。
3. 废除蒋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等项自由。
4. 废除蒋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5. 没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6. 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7. 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8. 否认蒋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的一切外债。要求美撤退其驻军，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打内战和使日寇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上述，就是我军的基本政策，适合全国90%+人民的要求。

我军对于蒋方人员，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罪大恶极的蒋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必法办他们。我军警告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切勿同流合污。凡是已做过坏事的，赶快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我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给予奖励。

为早日打倒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在本军到达之处，同我们积极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秩序。在我军未到之处，则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我们号召解放区人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支援前线。

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应积极努力，完成任务。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破坏任何纪律。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共领导的队伍。

## 中国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1947.10.10）

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但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统一规定，重行颁布。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三大纪律如下：

1. 一切行动听指挥；
2.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 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如下：

1. 说话和气；
2. 买卖公平；
3. 借东西要还；
4. 损坏东西要赔；
5. 不打人骂人；
6. 不损坏庄稼；
7. 不调戏妇女；
8. 不虐待俘虏。

##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12.25）

1. 革命战争现已达到转折点，即解放军已打退美蒋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还在1946.7-1947.6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蒋的进攻，迫使蒋转入防御。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47.7-.9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将战争继续引向并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计划。现在，战争已从解放区转到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解放军主力已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解放军已扭转了美蒋的反革命车轮，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这是蒋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因为发生在一个近五亿人口的国家内，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因为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占人类的一半的十亿以上人口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2. 从蒋反革命起，我们必须打败蒋，是因为蒋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二战结束、日帝被打倒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改革，实现国家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然而恰在这时，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帝及其走狗代替德、日帝及其走狗，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解放。这时，以蒋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帝走狗汪精卫一样，充当美帝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共领导解放军坚决反对蒋的进攻，依据马列宁主义估计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是能够打败的。1946.7蒋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时，蒋认为只须3-6个月就可以打败解放军。他们认为他们共有军事力量四百余万人、已经完成进攻准备、重新控制了大城市、拥有三亿以上人口、接收了日军一百万人的装备、取得了美在军事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解放军在抗日战争中已经很疲倦且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远不及国民党军队、解放区只有一亿人口且还没有巩固。从这种估计出发，蒋撕毁停战协定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内战。那时，我们说，蒋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帝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这是解放军占优势。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正义、革命的性质，必然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的政治基础。
3. 十七个月作战，共消灭蒋军169万，使我军打退了蒋的进攻，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使自己转入进攻。所以能够如此，在军事方面，是因为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我们的军事原则是：

十大军事原则

* + 1. 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2. 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3.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4.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至少三倍及以上)，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就数量来说我们是劣势，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5. 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6.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7. 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8. 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9.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10. 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时间，一般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时间。

以上这些，就是解放军打败蒋的主要方法，是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中锻炼出来的，并完全适合目前的情况。美蒋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军事人员曾向蒋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的失败。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当我们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主动地放弃许多城市时，敌人是兴高采烈了，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张家口被占领的当天下午，蒋即下令召集他的国民大会，似乎他的反动统治从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帝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蒋的腔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十八个月中，蒋的前线高级指挥官，大部分因为战败被撤换。他们将日本投降以后一个长时间内，中共代表人民愿望，力争和平反对内战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和力量薄弱。他们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量，冒险地发动战争，因而落在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里。

1. 现在，解放军的后方比十八个月前也巩固得多了。这是由于党坚决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抗战时期，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和团结尚能反对日帝的人们，党主动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为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实行的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政策也不应重复。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8%，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则达全部土地的70~80%。因此，土地改革所反对的对象，人数甚少，而乡村中能够参加和应当参加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的人数，则有90%以上。这里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二、必须团结中农，不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完成。旧式富农按照平分原则所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之所以应当拿出来分配，是因为富农一般带着很重的封建剥削性质，大都兼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其雇佣劳动的条件亦是半封建的；还因为他们所占的土地数量多、质量好，不平分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但是按照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对待富农和对待地主一般地应当有所区别。土地改革中，中农表现赞成平分，这是因为平分并不损害中农利益。在平分时，中农中一部分土地不变动，一部分增加了土地，只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有少数多余的土地，他们也愿意拿出来平分，这是因为在平分后他们的土地税也减轻了。虽然如此，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在没收分配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时应当注意某些中农的需要。在划分阶级成分时，不要把本来的中农错误地划到富农里去。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在土地税和支援战争的负担上，必须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则。这些，就是党在执行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一战略任务时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能够普遍解决土地问题，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2. 为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巩固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抗战时期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收到了成效的，主要在于使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但是，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解决。1937-1947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是极大的跃进，使党成了空前强大的党。这使有可能打败日帝，并打退蒋。但缺点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党，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政府和民众团体的组织，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否则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现在正和平分土地的决定一道在各地坚决地实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全党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3.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100~200亿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战期间和日本投降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作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作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蒋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替美蒋散布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当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应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不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是应当坚决保护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政策，如像党在1931-1934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否则必然损害劳动群众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中国土地法大纲上有一条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里所说的工商业者，就是指一切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和一切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总的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①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②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③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4. 1947.10解放军发表宣言说：“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解放军的、也是中共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表面看来，现在比抗日时期，民族统一战线似乎缩小了。但实际，只是在现在，只是在蒋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帝，发动内战后，只是在美蒋的罪恶已暴露后，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抗日时期，蒋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还有许多的欺骗作用。现在，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已经没有什么群众，完全孤立了。和国民党相反，中共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如果说，1945在蒋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则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由于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党获得了比抗日时期更广大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于美蒋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党获得了蒋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的内战夺去了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地掀起了反对美蒋的斗争，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在抗日以前，在抗日时期，乃至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他们的觉悟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巩固。这件事，不但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而且同解放军的胜利，同蒋由进攻转入防御，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革命已进入新高潮，这一总的政治形势，密切地联系着。现在，人们看到了蒋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将希望寄托在党和解放军身上，是很自然的道理。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否则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在1927北伐战争高潮时期，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革命遭到失败。抗战时期，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党在能够战胜日寇，而且保证了党在内战时期能够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胜利。
5. 蒋之所以敢于冒险发动内战，不但依靠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帝。一方面，以为它能够像流水一样地供给军事、财政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设想所谓“美苏必战”、“三战必然爆发”。这种对于美帝的依赖，是二战后全世界反动势力的共同特点。反映了二战给予世界资本主义的严重打击，反映了各国反动派力量的薄弱及其恐慌，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强大，使得各国反动派除了依靠美帝的援助，就感到毫无出路。但实际上，在二战以后的美帝并不像蒋所想的那样。美帝在二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美国的战争景气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矛盾，每天都在威胁美帝。这就迫使美帝建立奴役世界的计划，集合各国反动势力，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势力，准备战争，企图在将来发动三战打败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计划。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须打败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打败它。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在我们，不在敌人。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巩固其内部，并互相团结。以法意为首的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力量正在发展。美国内部，存在着日趋强大的人民民主势力。拉丁美洲的人民，并不是顺从美帝的奴隶。整个亚洲，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并向前发展。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檄文，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的斗争方向，巩固了胜利信心，全世界的反动派惊惶失措。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内部反动派的压迫，以东方十亿以上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为奋斗目标。我们应当在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阻止三战，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我们清醒地知道，还会有种种困难，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能够掌握马列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是完全能够战胜任何困难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948.1.7）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所规定的报告制度，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这个问题在这时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这种情况，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中共中央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参看本卷《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第六部分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的第四点。

为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

（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及其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则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写发综合报告的日期是单月的上旬，报告用电报发来。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书记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除自己报告外，指定代理书记或副书记作后方活动的报告。此外，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所作的临时性的报告和请示，照过去一样，不在此内。

之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的七大以后，仍然有一些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某些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作战方针，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及其克服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此项报告的字数、写作方法以及发报时间，和各中央局、分局报告的办法相同。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规定此项政策性综合报告的理由，和上述中央局、分局应作综合报告的理由相同。

##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1.18）

### 一、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

反对过高估计敌人力量。例如，惧怕美帝，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和蒋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没有前途。我们有信心战胜一切内外敌人。

因此：如果在全局或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在每一个局部或具体问题上(不论是军政经思)，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反对“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在打胜仗时，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时，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防止“左”倾。

### 二、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1. 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老解放区的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2. 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中农和其他阶层订错成分的，应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应退还。必须纠正在农民代表中、农民委员会中排斥中农的倾向和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将贫雇农同中农对立起来的倾向。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25%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平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必须经本人同意。
3. 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这种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属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在国家和人民接收过来之后，必须使其继续营业，不得分散或停闭。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在公营企业中，必须由行政方面和工会方面组织联合的管理委员会，以加强管理工作，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公私两利的目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应当试行这种办法，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工人生活必须酌量改善，但是必须避免过高的待遇。
4. 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他们中的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
5. 关于开明绅士问题。抗日时期，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且是成功的。对于那些同党共患难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对于过去混进我政权机关中来、实际上一贯是坏人、对人民并无好处而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者，则照一般处理恶霸分子的办法交由人民法庭审处。
6. 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在减租减息时期提出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对于稳定中农、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平分土地以后，必须号召农民发展生产，并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平分土地时，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
7. 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五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其中确仍保有大量多余财产者，则应依照农民要求拿出其多余部分。
8. 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尤其不应在斗地财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
9. 对待地主和富农必须依照土地法大纲加以区别。
10. 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
11. 一方面，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多杀乱杀只会使党丧失同情，陷于孤立。土地法大纲上规定的经过人民法庭审讯判决的这一斗争方式，必须认真实行，它是农民群众打击最坏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有力武器，又可避免乱打乱杀的错误。应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千万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必须按照土地法给以不高于农民所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12. 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一方面，在批评和斗争时，应说服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方式，避免粗暴行动；另一方面，则应使其提出保证，不对群众采取报复。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

### 三、关于政权问题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三、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应当依据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 四、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 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 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

没有这两个条件，就不能实现领导。例如党要领导中农，必须率领中农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消灭地主武装，平分地主土地。如果没有坚决的斗争或无法胜利，中农就会动摇。再则，必须以地主土地财产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农中的较贫困者，对于富裕中农则不要损害其利益。在农会中和乡区政府中，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并须在数量上做适当规定。不要订错中农的成分，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要公道。同时，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要丧失中农的拥护。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也是如此。

## 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1948.2.3）

关于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

* 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这种地区的工作中心，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在这种老区，不是照土地法再来分配一次土地，也不是人为地、勉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农会，而是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这种小组的积极分子，可以担负农会和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工作，但是不应当排斥中农，规定一定由贫农做领导工作。这种地区的农会和农村政权的领导工作，应当由贫农和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在这种地区，过去的贫农大多数已升为中农，中农已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必须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
* 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1945.9-1947.8所解放的地区：占现在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可称为半老区。在这种地区，经过两年清算斗争，经过执行《五四指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相当提高，土地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尚不是很高，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应当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这种地区，中农占少数，并且是观望的。贫农占大多数，积极要求土地。因此，必须组织贫农团，必须确定贫农团在农会中、在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 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在这个阶段中，应当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骨干，还可组织以贫农为主体的农会（可称为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须两年；第二阶段，须一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三年，太急了也办不好。

##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948.2.11）

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例如：

1. 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而通讯社、报纸或广播电台竟将这类通讯发表。各地党委宣传部，对于此类错误竟没有任何的反映。此类宣传，在过去几个月中虽然不是普遍的，但相当多，以致使人们误认为似乎这是正确的领导思想。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
2. 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传。
3. 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关于既反对观望不前、又反对急性病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抓紧了；但在许多地区却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4. 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某些解放区存在着的严重的“左”倾，或加以赞扬，或熟视无睹。

总之，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伟大斗争，帮助了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作中占着主要成分。但也必须看到一些错误缺点。其特点就是过左。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列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列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这种检查，责成各地党委宣传部和新华总社负主要责任，并将结果用自己的名义写一个政策性的报告给中央宣传部。

##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1948.2.15）

1. 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这点在老区和半老区亦是如此。
2. 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一、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先打击大地主，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二、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8%，人口10%。在区别待遇和总的打击面上，半老区亦是如此。老区一般只是填平补齐工作，不发生此项问题。
3. 先组织贫农团，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严禁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农民协会和贫农团。贫农团积极分子应作为农民协会的领导骨干，但必须吸引一部分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农民协会的委员会。在土地改革中，必须吸引中农参加，并照顾中农利益。
4. 不要全面动手，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发展。在整个战略区是如此，在一个县内也是如此。这在老区、半老区都应如此。
5. 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荫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
6. 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和特务组织，必须消灭，不能利用。
7. 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此点老区半老区都适用。
8. 应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与建立根据地。但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防止他们把持权力。一般不宜要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着重任用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
9. 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从长期观点筹划经济和财政。军队和区乡政府都要防止浪费。

## 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2.27）

1. 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严重破坏工商业，必须迅速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时，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检查。
2. 在领导方针上。应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3. 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利用报纸作为组织和领导工作的重要工具。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许久之后，才开总结会、总纠正。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4. 全党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并不等于我们的胜利。在政策上犯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948.3.1）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即1947.10中国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

* “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
* “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
* “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地是指的开明绅士。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即是由这些人们团结起来，组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合作过、现在也还合作、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现实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90%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因之我们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在中共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当时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共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了。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1924-1927革命运动，而在1927-1931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应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抗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抗日的参加者。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观望。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此，必须慎重处理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重要性(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因此，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如此，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

##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948.3.7）

这是毛为中国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这时西北战场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粉碎，解放军已经转入进攻。这篇评论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扼要地介绍了全国其他战场的概况。这篇评论的更重要方面，是在着重地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这个新式整军运动是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当时全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军队中的反映。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于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关于这个新式整军运动的意义，参看本卷《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等文。

解放军总部评西北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形势，证明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这次西北解放军突然包围宜川敌军一个旅，胡宗南令其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四个旅，即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编九十师之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约二万四千余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于二十八日到达宜川西南地区。西北解放军发起歼灭战，经过二十九日至三月一日三十小时的战斗，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计生俘一万八千余人，毙伤五千余人，刘戡本人和九十师师长严明等人，亦被击毙。接着于三日攻克宜川，又歼守敌整编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五千余人。此役共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三万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二十八个旅中，有八个旅属于三个主力师，即整编第一师、整编三十六师和整编九十师，其中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前年九月在晋南浮山被我歼灭一次，其一六七旅主力，去年五月在陕北蟠龙镇被我歼灭一次，整编三十六师之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于去年八月在陕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歼灭一次，这次整编九十师又被全歼，剩下的胡军主力，就只有整编第一师的七十八旅和整编三十六师的二十八旅，还没有受到过歼灭。因此，整个胡宗南军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经过此次宜川歼灭战，胡宗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二十八个旅，现在只剩下二十三个旅，这二十三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一个旅，已成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九个旅，对付我陈、谢野战军；陕南有一个旅，任汉中一带守备。此外，分布在潼关到宝鸡、咸阳到延安“丁”字形交通线上的有十二个旅。其中三个是“后调旅”，全系新兵；被我军全歼新近补充起来的有两个旅；曾被我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有两个旅；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可以想见，这些部队不但很弱，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两个旅防守榆林；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的九个旅分布在三边和陇东。以上胡、邓、马各部，全部正规军包括过去被歼一次至两次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目前总共三十四个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再说所谓“丁”字形交通线上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其中两个旅困守延安，三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部署。我西北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解放军配合作战。

发言人说：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我晋察冀、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各路野战军，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之后，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解放军中都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党正确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坚决团结全国90%+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解放军的无敌。任凭美蒋在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 关于情况的通报（1948.3.20）

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工商业方面、统一战线方面、整党方面、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

党的历史表明，在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

现在的“左”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

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两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好在纠正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

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厌倦长期战争，怀疑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程度，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但这类偏向现在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难。

最近几个月，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可以使整个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

由于对美蒋存着某种幻想，怀疑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力量，并因此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尚有存在可能、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突然攻势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最终在1948.1采用我党的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

对于这些人，应当采取团结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作适当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有益的。

这些人的特点是从来不愿意接近劳动群众，又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虽然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因此，应当争取他们。估计要待我们有更大的胜利，夺取几个大城市，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已完全判明以后，邀请他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他们可能愿意来解放区。

本年内，时机不成熟，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本年蒋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当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多个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

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可以有力地支持南线作战，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我南线各军，即山东兵团九个旅，苏北兵团七个旅，河淮间兵团二十一个旅，豫鄂陕兵团十个旅，江淮汉水间兵团十九个旅，西北兵团十二个旅，晋南豫北兵团十二个旅，除江淮汉水间刘邓兵团的主力因白崇禧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未获休整，到二月底才抽出一部到淮河以北休整外，其余各兵团均在十二月至二月间作了休整。这是过去二十个月作战中的第一次大休整。

这次休整，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成分、工作、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教好或清除了军队中的部分地主、富农分子或坏分子，讲明了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对待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扬了军队中的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增长了战斗力。

现除刘邓兵团的一部尚在休整外，各兵团均已于二月底三月初先后开始新的作战行动，并在两星期内歼敌九个旅。北线各军，即东北兵团四十六个旅、晋察冀兵团十八个旅、晋绥兵团两个旅，在冬季则大部作战，一部休整。

东北兵团，利用辽河结冰，举行了三个月作战，歼敌八个旅，争取敌一个旅起义，攻占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和四平街，并收复吉林。该兵团现已开始休整。俟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

晋察冀兵团休整一个多月，现已向平绥线行动。晋绥兵团数量较小，其主要任务是钳制阎锡山。总计我军现有南北两线大小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五十个纵队（等于国民党的整编师），一百五十六个旅（等于国民党的整编旅），一百三十二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八千左右。

此外，尚有非正规军，包括地方兵团、部队、游击队、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占八十万人），全军总计为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余人。

而在1946.7以前，我们只有正规军二十八个纵队，一百一十八个旅，六十一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不足五千；加上非正规军六十六万五千余人，总计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余人。

可以看出，我军现在是壮大了。旅的数目增加不多，每旅的人数却大为增加。经过二十个月作战，战斗力亦大为增加。

国民党的正规军，从1946.7至去年夏季，是九十三个师，二百四十八个旅，现在则有一百零四个师，二百七十九个旅的番号。

其分布是：北线二十九个师，九十三个旅（沈阳卫立煌十三个师，四十五个旅；北平傅作义十一个师，三十三个旅；太原阎锡山五个师，十五个旅），约五十五万人。

南线六十六个师，一百五十八个旅（郑州顾祝同三十八个师，八十六个旅；九江白崇禧十四个师，三十三个旅；西安胡宗南十四个师，三十九个旅），约一百零六万人。第二线九个师，二十八个旅（西北区，包括兰州以西地区，四个师，八个旅；西南区，包括川、康、滇、黔，四个师，十个旅；东南区，包括长江以南诸省，八个旅；台湾，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九万六千人。

国民党正规军番号增加，是因为国民党军大量被我军歼灭，并由战略攻势转入战略守势之后，甚感兵力不足，因此将大量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为正规军，计北线卫立煌系统增加三个师，十四个旅；傅作义系统增加两个师，六个旅；南线顾祝同系统，增加六个师，九个旅；胡宗南系统，增加两个旅；共计增加十一个师，三十一个旅。

因此，国民党军现在不是九十三个师，而是一百零四个师，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而是二百七十九个旅。但是第一，最近几个月（至三月二十日为止）被我歼灭的六个师，二十九个旅，只有空番号，尚未来得及重建或补充，也许有一部分永远无法重建或补充了，因此，国民党军在实际上现在只有九十八个师，二百五十个旅，比之去年夏季以前只多了五个师的番号和二个实际的旅。

第二，现在实有的二百五十个旅中，只有一百十八个旅未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其余一百三十二个旅，或者被我军歼灭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然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受过我军一次、二次，甚至三次歼灭性打击的（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其士气和战斗力甚为低落。在未受歼灭性打击的一百十八个旅中，有一部分是在第二线训练的新兵，有一部分是从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的，战斗力很弱。

第三，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也减少了。1946.7以前，其正规部队二百万人，非正规部队七十三万八千人，特种部队三十六万七千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一百零一万人，总计四百三十万五千人。

而在1948.2他的正规部队181万人，非正规部队56万人，特种部队28万人，海空部队19万人，后勤机关、学校81万人，总计365万人，即是说，减少了65.5万人。

1946.7~1948.1十九个月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97.7万人（二月和三月上半月尚未统计好，大约有18万人左右），即是说，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所动员参军的一百余万新兵消耗了，而且大量消耗了它原有的兵力。

在此种形势下，国民党采取和我们相反的方针，不是充实各旅人员的数目，而是减少旅的人员，增加旅的番号。国民党军在一九四六年平均每旅差不多有八千人，而在现在则平均每旅只有六千五百人左右。

今后我军占地日广，国民党军兵源粮源日益缩小，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

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

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1946.7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两个地区尚有较大的机动兵力，可以举行战役性的进攻，使那里的我军暂时处于困难地位。

其一，即大别山，有约十四个机动旅。其二，淮河以北地区，有约十二个机动旅。在这两区，国民党军还有主动权（淮河以北地区，由于我抽出九个主力旅开至黄河以北休整，准备使用于其它方面，故国民党军有了主动权）。

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具有对我特别有利形势的战场是东北、山东、西北、苏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郑汉路以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4.1）

今天主要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过去一年内，在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一方面，反对了右的偏向，发动了群众斗争，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另一方面，纠正了在运动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使全部工作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这是晋绥人民对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所做的结论。我们领导他们发动了斗争，消灭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和老区半老区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犯了贪污罪，或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经过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过去对于我们是致命的东西，现在去掉了。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这是在座的一位同志对我说的。致命的东西，就是指存在于党和政府组织内的成分或作风不纯因而引起群众不满的严重现象，现在是根本上去掉了。过去没有而现在有了的东西，就是指贫农团、新农会、区村人民代表会议，以及由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所造成的农村中面目一新的气象。

这是成功的第一个方面。在这基础上，晋绥党组织才能够在过去一年内完成巨大的军事勤务，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假使没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要完成这样大的军事任务，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晋绥党组织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三个“左”的偏向：

* 在划分阶级成分中，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92%左右，人数90%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现在已经纠正了，大大地安定了人心，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
* 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现在也已纠正，使工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
* 在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中，晋绥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并严重反对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的重要犯罪分子，即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肉刑。现在也已纠正了。

认真地纠正上述偏向后，晋绥中央分局领导下面的全部工作，已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一切党员所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原因，都是由于离开了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的教训。

关于整理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你们已经根据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采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邀集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组织的成分或者作风不纯，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样做，将有可能健全地完成对于党组织的全部整理工作。

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执行这个方针，也是对的。

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贫农团和农会成为它们的助手。我们曾经打算在各地农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去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现在你们的经验以及其他解放区的经验，已证明就在土地改革中建立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是必要的。在一切解放区，也应这样做。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建立起来时，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当然不是勉强凑数，而是要分别有市镇的农村和没有市镇的农村，分别市镇的大小，分别城市和农村，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实现这个联合一切民主阶层的任务。

在土地改革和整党中，教育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是宝贵的财富。今后应当加强教育，使他们在工作中不断进步。同时，应警告，决不可以因为成功而骄傲自满。

由于上述各方面的成功，应当说，晋绥解放区更加巩固了。在其他解放区，凡是这样做了的也就巩固了。

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

* 在去年春刘少奇的当面指示和夏康生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批判了过去右的偏向，揭发了各种离开党路线的现象，决定了发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方针。否则，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和整党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会议的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分上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上太注重清查地主的地财；在对待群众要求上缺乏清醒分析，笼统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关于这后一个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应是：凡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的不正确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地委书记会议仅仅强调了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的方面，忽视了党应当教育和领导群众，助长了某些同志的尾巴主义错误。
* 晋绥分局在一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是在分局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回来后实行的，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迅速和彻底，在短时期内将“左”的偏向纠正过来了。

晋绥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领导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实行减租减息，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纺织业、军事工业和一部分轻工业，建立了党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建立了近十万人的人民军队，因而就能据此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打退阎锡山等反动派的进攻。但总的说来，抗日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给了能据以打败蒋的有利条件。抗日时期，晋绥党组织的领导方面的缺点或错误，主要是未能依靠最广大的群众克服党和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分或作风不纯及由此的不良现象；这个任务，留给了你们到现在来完成。那时晋绥的某些领导，缺乏了解党和群众的真实情况，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这也应引为教训。

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是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和整党，继续发展和支援解放战争，酌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你们现在正在开生产会议。在目前数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你们有广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使用机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希望你们好好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农业方面，过去被官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对于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变工队和合作社都垮台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们的任务，是细心保存、发展并推广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变工队、合作社和其他必要的经济组织。

关于全国形势。自从去年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展开土地改革和整党后，在一切解放区都召开了有关整党和土地改革的大的干部会议，批判了右倾思想，揭发了成分或作风不纯的现象。而后，在许多地区，又采取适当步骤，纠正“左”的偏向。这样，就使党在全国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之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差不多一切解放军的部队，在近几个月，都利用了战争的空隙，实行了大规模的整训，其是完全有领导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由此，激发了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地认识了战争的目的，清除了存在于军队中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倾向和不良现象，教育了干部和战士，提高了战斗力。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整军运动，必须继续进行。所实行的整党、整军和土地改革，国民党是一样也不能实行的。在我们方面，是如此认真地纠正缺点，团结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有效地执行党中央的一切政策，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敌人方面，则一切相反。他们腐化，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被人民唾弃而完全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互相对比的全部形势。

这种形势下，全党必须紧紧掌握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它只能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即这个革命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就是所说的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其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农村人口70%。土地改革的主要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20%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否则，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迅速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平均主义。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其性质是反动、落后、倒退的。土地改革的对象，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应当惩办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即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下子消灭全部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不能超过农村户数8%，人数10%。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分地区，即应当集中力量在可以巩固地占领的区域进行合乎当地群众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以待情况的变化。分阶段，即在解放军刚占领的区域，应当提出和实行中立富农和中立中小地主的策略，缩小打击面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作为新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逐步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在新区，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在新区，必须充分地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即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大中小地主，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使人们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任何地区一经消灭封建制度，完成土地改革，党和政府就必须立即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为此，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坚决反对任何人破坏和浪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和消费的合作团体。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党规定了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后者，忘了总路线和总政策，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贻误工作。

再说一遍：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4.2）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在党的报纸或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白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士气很高，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迅速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在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天天讲群众路线。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只靠少数人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什么，怎样做，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为此，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利用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报纸也要靠大家、靠全体人民群众、靠全党来办，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原因及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群众都能懂得、掌握，这是一项马列主义的领导艺术。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群众还不觉悟，就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就硬领导他们去干，必然失败。当群众要求前进，还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这些问题有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报纸要好好地宣传，使大家都能明白。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经历很少。对于1933《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为此，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和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多听多看并下工夫研究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丰富实际知识，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工作才能够做好，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但是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后，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你们现在正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这样很好。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工作就会有改进。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斗争中很认真，充分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缺点主要是把弦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在纠正偏差时，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对于工作，对于群众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经过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以后，报纸会办得更好。应当保持过去的优点，尖锐、泼辣、鲜明、认真。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党所办的报纸，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948.4.8）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因为它的内容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所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其他前线和其他地区的领导同志。

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

* 谨慎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
* 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对于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 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其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
* 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
* 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头绪，人心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后，才按情况酌量处理。
* 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 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 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注意节约。
* 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是完全错误的。

##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1948.5.24）

这是毛给邓小平的电报。

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进入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否则就要犯错误。就是在华北、东北、西北各大解放区的接敌地区，亦须实行上述同样的策略。

##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5.25）

必须注意季节。利用今年整个秋冬季，即自今年九月至明年三月，共七个月时间，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依次完成下列各项工作：

* 乡村情况调查。
* 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上级派到乡村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必须首先团结当地党支部组织内的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
* 组织或改组或充实贫农团和农会，发动土地改革。
* 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分。
* 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实行分配的最后结果，使一切主要阶层都感觉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阶级分子亦感觉生活有出路，有保障。
* 建立乡(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三级政府委员会。
* 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
* 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必须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一方面利于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兴趣，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
* 按照正确政策，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
* 将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转移到团结农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开始组织在自愿和等价交换两项原则上的小规模的变工组织和其他合作团体；准备好种子、肥料和燃料；做好生产计划；发放必要和可能的农业贷款(以贷给生产资料为主，必须有借有还，严格区别于救济性质的赈款)；在可能的地点，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

以上是由土地改革到生产的全部工作过程，必须使一切直接从事土地改革的同志了解这样的工作过程，避免工作的片面性，并不失时机地于秋冬两季全部完成上述工作。

为达上述目的，今年六月至八月的三个月内，必须完成下列工作：

* 划定土地改革工作范围，必须是在下列三项条件下划定之：

1. 已全部消灭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的游击区域。
2. 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
3. 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

如果某一地区，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将该地区列入进行土地改革的范围。之后是否列入，还要看情况才能决定。在这类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不要分土地、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

* 开好干部会议。在为土地改革和整党召集的干部会议中，必须充分讲明关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部正确政策，将许可做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将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从事土地改革和整党的干部，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如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部分，应当提出修改的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今年的各级干部会议，必须由各地高级领导机关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纲要，斟酌纲要的内容和文字(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这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工作中，如果存在着这种有害的经验主义方法，必须注意克服。讨论政策的会议，人数不可太多，只要事先有良好准备，会议的时间亦可缩短。按情况，大约以十几个人，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开会一星期左右为适宜。传达政策的会议，人数可以多些，时间亦不可过长。只有整党性质的高级和中级的干部会议，人数可以多些，时间亦可以长些。
* 九月上半月至迟九月下半月，全部直接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必须到达乡村并开始工作，否则就不能利用秋冬两季的全部时间完成全部土地改革、整党和准备春耕。

在干部会议和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区别老区、半老区、接敌区和新区的不同，否则就要犯错误。

凡属已经根本消灭封建制度，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和支援前线。在这类地区的部分乡村中，如果尚有土地须待分配或调剂，阶级成分须待改订，土地证须待发给者，自然应当按照实际情形完成这些工作。

一切解放区，不论是否完成土地改革，都必须在今年秋季指导农民耕种麦地，并进行一部分土地的秋耕。在冬季，要号召农民积肥。所有这些，都对1949解放区农业的生产和收成有极大重要性，必须用行政力量，配合群众工作，加以实现。

必须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的某些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或上级党委的政策，执行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

中央及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直到支部，必须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通讯方法，小型会议（例如四五个人的），区域会议（例如几个县的），和个别谈话等项会谈方法，小型巡视团（例如三至五个人的）和个别有威信的委员的巡视方法，同时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密切地互相联系，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不要等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下面才向上面作总结性报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指示。这种报告和指示，往往过时就会失去作用。犯错误的已经犯过，来不及纠正，损失太大。全党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时机的生动的具体的报告和指示。

必须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将工业生产任务和农业生产任务，放在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和市委的领导工作的适当位置。即不要因为领导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而忽视对于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工作的领导。现在已有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就要犯错误。

##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9/10）

### 一、九月七日的电报

准备从1946.7算起五年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是可能的（实际为三年，参见参见本卷《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只要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00个旅，就能达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191个旅，平均每年95.5个旅。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300+个旅。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希望能歼敌正规军115个旅。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40个旅左右，并攻占若干大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14个旅，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12个旅。要求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14个旅，并攻占太原。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35个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欲此，适当的战役部署指挥和作战休息调节，是决定性关键。如果能在9、10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18个旅之目的。为此，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十八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九月至明年六月的十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六个月左右时间，余四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 二、十月十日的电报

从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三日以敌情（锦州守敌之抵抗能力，葫芦岛、锦西援敌和沈阳援敌之进度，长春敌军之动态）我情（攻城进度，攻城和阻援之伤亡程度）电告一次。

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曾说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也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十二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四纵、十一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四纵、十一纵等部所钳制和阻止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

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前面所说各点，只是希望你们予以相当的注意。尤其在锦州作战的头几天内，东西援敌不会大动，你们要用全部精力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

## 关于健全党委制（1948.9.20）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关于这个文件的意义，邓小平1956.9.16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1948.9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而非实质上的一致。此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10.10）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1948.9会议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集的。它是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个解放区从事紧张的解放战争，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这样大的会议。

1948.9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到政治局委员七人，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重要工作人员十人参加，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

1945.4党的七大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了比抗日时期更良好的团结，使得党能够应付日本投降以后整三年内国际国内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并在这些事变中使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摧毁了美帝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抵抗了国民党的再一次叛变，打退了它的军事进攻，使解放军由防御转到了进攻。

（1946.7-1948.6两年作战中，解放军歼敌、占地、扩军等事项的数据。）

由于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改革，现已在约一亿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村人民，首先是贫雇农。

（党员增长，数据略）。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克服党内在某种程度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但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革命斗争，认真纠正错误，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大进一步了。

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

两年内，在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有领导、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1927-1932期间曾实行有效、后来被取消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将约八十万左右的国民党军俘虏兵变为解放军，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160万分得土地的农民参加解放军。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党正在大规模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两年内，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还不足以应付战争需要。我们缺乏若干重要的原料和机器，基本上还不能炼钢。

我们已在华北四千四百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统一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并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有人口四千三百万）和西北（有人口七百万）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支援前线，并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两区的上述工作也统一起来。

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7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1946.7为430万人，两年被歼和逃亡309万人，补充244万人，现有365万人。估计今后三年尚能补充300万人，今后三年被歼和逃亡可能达到450万人左右。这样，五年作战结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可能只剩下200万人左右了。我军现有280万人，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170万人（以占俘虏全数60%计算），动员农民参军200万人，除去消耗，五年作战结果，我军可能接近500万人。如果五年作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打倒了。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共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根据这一情形看来，这样的目标是可能达到并且可能超过的。国民党现有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是在第一线（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东，承德和长春之线以南），在其后方者（包括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西）仅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国民党现有全部正规军二百八十五个旅，一百九十八万人，其中在第一线者二百四十九个旅，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人（北线九十九个旅，六十九万四千人，南线一百五十个旅，一百零四万八千人），在其后方者，仅有三十六个旅，二十三万八千人，并且大部分是新建立的部队，缺乏战斗力。因此中央决定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

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很大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党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过去两年中，军队和作战的正规性是增长了一步，但是还不够，必须在第三年内再进一大步。为此，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党迅速而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广人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其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加入我们，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应当大批利用。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党周围。现在，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1949召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中央会议认为，必须一方面使解放军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如此两方面才能够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这两方面有很多困难。大军进入国民党区域执行无后方的或半有后方的作战，一切军事需要必须大部地就地自己解决。而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则需要有较好的组织工作，很好地领导解放区内部的市场和管制对外贸易，解决某些机器和原料缺乏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交通运输和修理铁路、公路、河道的问题。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很大困难，即使比较国民党的困难要小得多。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通货膨胀很大，而组织工作不够特别是财经方面，则是原因之一。在克服的斗争中，必须厉行节约：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后方减少国家机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季节，节省工业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适当组织各解放区的经济，克服市场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分子进行必要斗争。

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扩大党内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环节。中央会议已通过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专门决议。讨论了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问题。

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已胜利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明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将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并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10.11）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告知华东局和中原局。此后，全国局势发生了对中国解放军有利的急剧变化，中原野战军奉命东进徐州、蚌埠地区，由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的地方部队共同作战。战役发起后，毛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野战军并告中原野战军的电报，下达在徐州附近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战役决心。于是，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这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多人。毛在这个电报中所提出的战役方针得到完全的成功，只是战役的发展比预计的更为顺利，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在这个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处在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了。淮海战役在1949.1.10结束，1.21蒋即宣告“引退”，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关于淮海战役部署，提出几点意见：

1. 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部一个旅，并力求占领临韩，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一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丘段，以牵制邱兵团一部（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壁地区，以牵制李兵团。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的部署，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
2. 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估计这时，青岛之五十四师、三十二师很有可能由海运增至海、新、连地区。该地区连原有一个师将共有三个师，故我须用五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钳制邱李两兵团，仍然是九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
3. 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那时敌将增加一个师左右的兵力（整八师正由烟台南运），故亦须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三个星期。

三个阶段共须约一个半月至两个月。

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11）

现在，全世界觉悟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真诚革命者纪念苏联十月革命31周年，我想起了斯大林1918十月革命第一个周年纪念所写论文，文中说：“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是在列宁、斯大林的指导下建立和发展的。

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时，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此，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以至出现了老一辈人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中共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和发展的一个党，使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的德意日。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则反法西斯的二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对于二战的胜利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二战胜利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而疯狂地准备着新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帝及其各国走狗，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其内部分崩离析，脱离人民，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在中共领导之下的以反对美帝对于中国的疯狂侵略，反对卖国、独裁和以内战屠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目标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现已经取得巨大胜利。中共领导的解放军，在1946.7-1948.6两年时间内，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由防御转到了进攻。在两年作战中（1948.7以后的发展尚未计算在内），解放军俘虏和消灭了国民党军队264万人。解放区现有面积23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960平方公里的24.5%；现有人口1.68亿，占全国人口4.75亿的35.3%；现有城市586座，占全国城市2009座的29%。由于党坚决领导农民改革土地制度，现已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区域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民，首先是贫农和雇农。中共党员，由1945的121万增加到了现在的300万。中共的任务，是在全国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这一点，中国革先行者孙中山是理解的，确定了联苏政策，临终时还写了一封给苏联的信，当作他的一份遗嘱。背叛孙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战线方面、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是国民党的蒋匪帮。但是人们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全部反动统治将被中国人民所彻底地打碎。中国人民是勇敢的，中共也是勇敢的，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948.11.14）

这是毛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在这篇评论里，毛根据辽沈战役以后敌我力量变化的新形势，对于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指出从1948.11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来的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的这个预见。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转折点，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现在数量上也已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的第二年底，即今年六月底，总数约计尚有三百六十五万人。这个数目，对于1946.7国民党开始发动全国性内战时期的四百三十万人来说，是少了六十五万人。这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两年战争中虽然被歼、被俘和逃亡了大约三百零九万人（其中被歼、被俘为二百六十四万人），但在此期内又补充了约二百四十四万人，故亏短数尚只有六十五万人。最近则起了一个突变。经过战争第三年度的头四个月，即今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时，国民党军队即丧失了一百万人。四个月内国民党军队的补充情形尚未查明，假定它能补充三十万人，亏短数为七十万人。这样国民党的全部军队包括陆海空军、正规军非正规军、作战部队和后勤机关在内，现在只有二百九十万左右的人数。解放军，则由1946.6的一百二十万人，增至1948.6的二百八十万人，现在又增至三百余万人。这种情况，就使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长期占有的优势，急速地转入了劣势。这是由于四个月内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国民党的正规军，因为它拚命地将非正规军编入正规军内，至今年六月底，尚有二百八十五个师的番号。四个月内，即被解放军歼灭了营以上部队合计共八十三个师，其中包括六十三个整师。

这样，就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从原来预计的1946.7起约需五年，变为从现时起再有一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

敌人正在迅速崩溃，但尚需共产党人、解放军和全国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才能最后地完全地消灭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12.11）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的最后一个。这个战役歼灭和改编了五十二万多国民党军，解放了北平、天津、张家口等重要城市，基本上结束了解放华北的战争。毛在这里提出的战役方针，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经过批评后已懂得了。现在张家口、新保安两敌确已被围，大体上很难突围逃走。十六军约有一半迅速被歼。怀来敌一○四军慌忙南逃，估计今日或明日可能被歼。该敌被歼后，你们准备以四纵由西南向东北切断南口和北平间联系。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和十六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和九十二军一起集中南口、昌平、沙河镇区域集团防守。但四纵此举直接威胁北平西北郊和北郊，可以钳制这些敌人不敢动。若这些敌人再敢西进接援三十五军，则可以直接切断其后路或直接攻北平，因此，这些敌人大约不敢再西进。我华北杨罗耿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他们提出早日歼灭该敌，我们拟要他们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他们此次以两个纵队围住三十五军，以一个纵队阻住一○四军，两敌都被击退。

现在同意你们以五纵立即去南口附近，从东北面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将来该纵即位于该地，以便将来（大约在十天或十五天之后，即在华北杨罗耿兵团歼灭三十五军之后）腾出四纵使用于东面。如此，请令五纵本日仍继续西进。

三纵决不要去南口，该纵可按我们九日电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四纵、十一纵、五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

据估计，大约十二月十五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12.20-12.25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地区，即廊房、河西务、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然后攻歼几部分较小之敌。此时，四纵应由平西北移至平东。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四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以上部署，实际上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涿县、良乡已被我占领）、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开平诸点之敌一概包围了。

此项办法，大体上即是你们在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榆关、滦县线上作战时期用过的办法。

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12.21-12.25）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

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少可能的。

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为着在12.25前完成上列部署，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对上述计划意见、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望考虑电告。

##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948.12.17）

（描述战况，说明其已经没有希望，敦促投降。）

## 将革命进行到底（1948.12.30）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道路。国民党在发动反革命战争时，他们军队数量3.5倍于解放军，装备和人力物力更远超解放军，拥有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获得美帝在军事、经济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准备的。由此：

* 战争的第一年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1946年占领了大量地方。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1947上半年将进攻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 战争在第二年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一些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 战争第三年的上半年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劣势转入了优势。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强大精锐兵团。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97个旅，内有46个整旅；第二年，94个旅，内有50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统计，147个师，内有111个整师。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的总数多15个。敌人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便利了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人民在政治战线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胜利。因此，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反动派或是美帝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逐渐重视政治斗争。中国反动派和美帝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帝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挑拨和策动他们，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情报，美帝已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并已开始在中国进行。美帝政策，已由单纯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斗争：一、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二、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阻止革命；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不要太多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帝和法帝则是美帝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

* 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方法，坚决彻底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封建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压迫一起掀掉，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 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休整的机会，然后再在某一天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必须选择要走的路，表明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以蒋为首的反动派，自1927.4.12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中，已证明是一伙满身鲜血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和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从1936.12西安事变以来，从1945.10重庆谈判和1946.1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一切善良的愿望没有改变他们丝毫的阶级本性。这些盗匪的历史，都和美帝分不开，依靠美帝把全国同胞投入内战，用美帝所供给的武器屠杀了人民，而美帝则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作恶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不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应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如此中国才能有独立、有民主、有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且可怜（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曾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这次却大谈“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12.21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1945.12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农夫一样怀有对毒蛇的好心肠。但是我们却听见并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各种蛇，虽然已感觉到冬天，但还没有冻僵。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容纳一切愿意参加革命事业的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不容许坏人侵入，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还应记住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既然敌人正阴谋用“和平”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帝，则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怒潮正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变化。大群的人民正脱离国民党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人民和一切人民朋友将愈加团结一致，在中共领导下，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帝、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团结一致，会发生互相争吵，互相抛弃，但在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这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但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共，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未来的任务、表达胜利的希望。）

## 评战犯求和（1949.1.4）

这是毛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其它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

为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帝势力，蒋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这对于中国人民认识美蒋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美蒋迫切需要的东西。

蒋供认了整个计划：

* “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是首要的。“和平”可以，但“和平”而有害于一切保护蒋反动国家的，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利益，以及将中国作为美帝殖民地的各种条约的，则一概不可以。
* “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卷土重来。“和平”就是为了这个。
* “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确保中国反动阶级的统治地位，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否则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
*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已被解放军歼灭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余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否则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
* “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求和的终极目的。否则和平有什么用呢？这个条件一经蒋提出，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则“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除上述一切，还有另一项就是蒋所说的“京沪决战”：“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姑且不说政治、经济，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几十倍”姑且算作二十倍，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说“有决胜的把握”了。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难道万事皆好，但缺点是有的，蒋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吗？

　　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的销路问题，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1.14）

自1946.7国民党在美帝帮助下发动内战，已两年半，国民党违背民意，召集伪国民大会，颁布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伪令，出卖大批国家权利给美帝，从美帝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美帝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帝军事顾问团参加内战，从美帝获得了大批军用物资作为屠杀人民的武器。国民党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数百万军队向解放区和解放军举行了进攻，所有解放区无不受到蹂躏，多地被占领。匪军所至，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压迫各界人民出粮、出税、出力，以供“戡乱剿匪”之用。国民党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等项正义的运动；滥发伪法币和伪金圆券，破坏人民经济生活，使广大人民陷于破产；各种搜括使国家最大的财富集中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总之，国民党在其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之上所举行的内战，也已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决不能逃脱应负的全部责任。

同国民党相反，中共自从日本投降后，尽一切努力向国民党要求防止内战，实行和平。中共据此方针，在全国人民赞助下，首先1945.10签订国共会谈纪要。在1946.1又签订国共两停战协定，并和各民主党派协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国民党接受共同决议。自此，中共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道为维护这些协定而奋斗。但可惜，其均不被国民党所尊重，而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不值一顾。国民党认为人民可欺，协定可随意撕毁，解放军不值一击，数百万军队可以横行全国，美帝援助是无穷无尽的。以此，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共不得不奋起反抗。自1946.7起，解放军抵抗了国民党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又使自己转入了反攻，收复了解放区的一切失地，并且解放了诸大城市。解放军克服了困难，壮大了自己，以美帝送给国民党的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在两年半中，歼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现在，解放军无论在数量、士气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的残余。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也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不能维持。

于此，为保持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蒋提出愿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中共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因为蒋提出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而不是和平的条件。全国人民也已显示了意志，不赞成所谓和平，和他们的反动条件。因此，中共声明：虽然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痛苦，中共愿和国民党在下列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1. 惩办战争罪犯；
2. 废除伪宪法；
3. 废除伪法统；
4. 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5. 没收官僚资本；
6. 改革土地制度；
7. 废除卖国条约；
8.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共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如此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国民党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则应承认八个条件；否则，就证明所谓和平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亦应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国民党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丝毫不应当松懈战斗。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歼灭之。

##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1949.1.21）

国民党电称：决议如下：“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蕲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共称：这个决议没有提到蒋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也没有提到毛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没有表示对于这两个建议究竟是拥护或反对哪一个，却另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是令人不能理解的。实际上，南京行政院完全忽视中共的建议，且直接推翻蒋的建议。蒋在建议中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南京行政院却说“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不禁要问，谁的建议有效呢？我们认为南京伪行政院越出了自己的职权，没有资格推翻伪总统“蒋”的建议。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停战协定。不但人民，就是国民党亦有不少人表示了这种希望。否则国民党没有和平诚意。人们要问：如真有诚意，为什么不愿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不是证实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论断？中共说：南京现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伪总统和伪行政院各有建议，要和谁去打交道呢？

##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1949.1.28）

国民党电称：“政府发言人称：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商谈。惟据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广播中共发言人谈话，一面虽声明愿与政府商谈和平解决，一面则肆意侮谩，语多乖戾。且谓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试问中共方面如不即时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而竟诿诸所谓北平完全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须知全国人民希望消弭战祸，已属迫不及待。政府为表示绝大之诚意，仍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南京中央社又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二十六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据此，中共表示下列诸点：

冈村宁次是侵华日寇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国民党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共和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国民党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反对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提出严重警告：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的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此。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获知南京要求和平谈判是那样地热烈、迫切，据说都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感觉中共则与之相反。我们老实时说：你们是是要受审判的战争罪犯，所谓“和平”、“民意”，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依赖美帝，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协定发动内战，那时你们是那样地热烈、迫切，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伪令。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账必得算。听说你们很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算。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拼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你们提出了五条，我们提出了八条，人民立即拥护我们的八条。你们不敢批驳我们的八条，不敢坚持你们的五条。你们声明愿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的基础。这样难道还不好吗？为什么还不快点谈呢？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迫切，而我们则显然不是。但是且慢，我们会要紧张迫切起来的，战争时间一定可以缩短，人民的痛苦一定可以减轻。你们既然同意以我们的八个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你们和我们会要一齐忙碌起来。实行这八条，你们，我们，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全国各界人民恐怕几年还忙不完！南京的先生们听着：八条不是抽象的条文，要有具体的内容，目前这一个短时期内还是大家想一想要紧，为此耽搁一段时间，人民也会原谅的。老实说，人民的意见是要好好准备这一次谈判，谁要中途翻了不肯谈，那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还得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不容许战争罪犯们替我们规定谈判的时间。我们和北平人民正在做一件重要工作，按照八个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你们在北平的人等也参加了这件工作，经过你们的通讯社的公告，你们已经承认了这件工作是做得对的。这就不但替和平谈判准备了地点，而且替解决各地的和平问题树立榜样。因此，这件工作是应当受到赞美的，南京的先生们对此应当表示郑重态度。我们正在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在我们区域的和在你们区域的都在内，商量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准备第一个条件的具体内容。这个名单，很快就可以正式公布。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和正式公布这样一个名单，其原因是你们的和谈要求来得稍为迟了些。如果早一点，也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们除了逮捕冈村宁次外，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内战罪犯名单）。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帝或英帝，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否则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我们认为只有逮捕这些战争罪犯，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只要战争罪犯们还存在，就只会延长战争时间，加重人民痛苦。

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八条中其他各条双方应行准备的工作，另一次再通知南京。

##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乎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1949.2.5）

中共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得到了国民党的答复，这个答复里，对于中共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提出了狡辩。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重新逮捕冈村宁次，押送解放军，并负责看管其他日本战犯勿令逃逸一节，说“是一个司法问题。这完全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于中共要求逮捕蒋一节，说是“真正的和平不应该有先决条件”。并且说中共“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而且是“节外生枝”。对此，中共声明：在那时，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那末，该发言人应当知道，这个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现在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实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例如当着你们如此急切地要求谈判时，忽然判决冈村宁次无罪，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在中共要求重新逮捕后，又把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战犯送往日本，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日本现在是什么人统治呢？难道是日本人民在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在统治吗？日本是你们如此热爱的地方，以致使你们相信日本战犯们生活在你们统治的区域，还不如使他们生活在日本较为安全、舒服，较为能受到正当待遇些。这是一个司法问题吗？为什么发生这个司法问题呢？难道八年抗战你们也忘了吗？完全与和谈无关吗？中共提出八条时，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为什么你们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因为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解放军和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场大决斗刚刚完毕，一个对外战争刚刚完毕，你们就发动这次对内战争。你们打败了，要求谈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无论你们是否叫节外生枝，这件事必得谈，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一月十四日以后的，没有包括在我们原来所提的八个条件以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个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一、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二、惩办国内战争罪犯。这是有理由的，是反映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都要惩办日本战犯。即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认为是理所当然。无论你们是否说我们有和平诚意，这两类战犯问题都得谈判和惩办。关于叫你们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这些战犯逃跑的问题，你们认为“不应有先决条件”。这不是先决条件，这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我们在谈判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时，你们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你们闲得发慌，因此叫你们做一件合理的工作。这些战犯任凭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你们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你们是有很多好心眼儿的人们，对于这些屠杀几百万同胞的负责者应当没有什么爱惜，从你们愿意以惩办战犯作为一条谈判基础这一点来看，你们似乎也并不很爱惜这些东西。但是既然你们声明叫你们马上逮捕这些东西显得颇有为难之处，也罢，你们就防止他们逃跑吧。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时，战犯已经跑了，那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们还有什么光彩呢？“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此外，该发言人还说了许多废话，这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我们认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南京或广州或奉化或上海的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如果你们以为我们的这篇声明的态度又有些不够郑重的话，请原谅，我们对你们只能取这种态度。

##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1949.2.8）

这是毛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其他有关的野战军和有关的中央局。这个电报估计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因而及时地提出了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这个方针，对当时新解放区干部问题的解决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关于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性质，参看本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四日电悉。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并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今后均应全部负担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要在此种条件下去进行乡村工作。因此，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较为困难，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会发生极大困难。因此，必须在二月处理其他一切问题，在三月内，全部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已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我们现正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此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既然严重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过去，则军队人数和装备的补充，以达到适当程度为宜，决不可要求太多、太好、太完备，以至引起财政危机。这亦须考虑。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我们已和康生同志谈了许多，请他于十二日赶到你们处，和你们会商。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处置，会商后请即电告。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一切后方工作交山东分局负责。

##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1949.2.15）

国民党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现在距离解放军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的淮海战役期间，三个战役使国民党在不足四个月中丧失约一百五十四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美帝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原想用“和平攻势”来打击中国人民，现在是打在自己的脚上了。除了傅作义将军协助解放军已经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外，各地希望和平解决的还大有人在。美帝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们不争气。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经泄露这个秘密。他在蒋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蒋集团长期地不敢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命令，其理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12.27的一项指示中说得很明白：“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国民党当时发出这个指示，是因为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已经在主张言和了。去年12.25白崇禧及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提出了“和平解决”的问题，迫使蒋不得不在今年1.1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蒋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统治。蒋于1.8派张群到汉口要求白崇禧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内战。但是这些步骤全都失败了。毛在1.14的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的假和平阴谋，使蒋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预期相反，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蒋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残余力量，但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许多地方都在进行局部和平的活动，但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至不可收拾。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九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邓文仪和孙科一样，推翻了上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关于以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声明，而要求所谓“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但是邓文仪没有说出在今天他的对方究竟应和什么人去谈判“平等的”“全面的”和平。似乎找邓文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乎不找邓文仪或者其他张三李四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未免叫人为难了。据中央社上海九日电称：“新闻记者问邓文仪：李代总统是否已同意邓局长所发表之四项意见？答：本人系在国防部立场发言，本日所发表之四项意见，事前并未呈经李代总统过目。”邓文仪不但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的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民党政府的全面立场，而且事实上还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政工局的小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防部的大局部立场。因为邓文仪公开反对并污蔑北平的和平解决，而伪国防部则在一月二十七日称赞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并称其他地方例如大同绥远等处亦将依同样方法“实施休战”。由此可见，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可以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它的代总统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力量实行全面和平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握有全面的力量，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任何郑重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个基本的政治形势。

##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乎”变为呼吁战争（1949.2.16）

一到二月上旬，蒋的和平调子就突然低落，“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2.13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特别宣传指示》：“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两星期以前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再也不提了。假如中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风”，一定要惩办战争罪犯，那就不能谈和平了。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按《特别宣传指示》是选择了后者。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共方面尚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意见中，现在已经收到了好几方面的意见，都是认为去年12.25中共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所列战犯为数太少，应当是一百几十个。那请问国民党，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是你们在1949.1.26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难道想收回挂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吗？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为什么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4.5亿而是4.75亿，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倘若你们不去算清楚就将你们那个原来很好、我们也同意、全国人民也同意的——“以拯救人民为前提”，急急忙忙地改成“以拯救一百几十个战犯为前提”，你们就一定站不住脚。这些“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在“呼吁和平”几星期后，又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尖顶上，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1949.2.18）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这是1949.2.13国民党《特别宣传指示》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

这个论点，不是别人，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1948.12.25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蒋。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可这是不调和的。中共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则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对的，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1949.1.1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发表元旦声明的同一天晚上，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孙科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孙科比较蒋“公道”一点，他不是像蒋将战争责任全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平均地权”，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而且有“全国人民”，4.75亿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也许还有孙科自己，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在这里打架。

第三个国民党人李宗仁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1949.1.22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关于战争责任问题，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李宗仁出的是无头告示，没有说国民党应负责任，也没有说共产党或者别的方面应负责任，但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别的地方，而是出在“黄河南北”。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谁在这里造成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呢？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吗？李宗仁是做过北平行营主任的，桂系的军队是和蒋系军队一道打到过山东省的沂蒙山区，所以他有确实的情报，知道这种“浩劫”的地点和情况。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则他说出了这句实话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乱”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根据李宗仁自己的逻辑，在同一个声明里，他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在内。惩办战犯，是“浩劫”的逻辑的结论。为此，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埋怨李宗仁，认为不应接受中共的八条件。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是有原因的。蒋还没“引退”时，死硬派原想批驳八条，后来蒋一想不妥，大概是认为驳了就绝了路，这是1.19的事情。当1.19早上，张君劢从南京回到上海，发表谈话，说“关于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不久即可能发布另一文告，提出答复”时，中央社即于晚间发出通报说“顷播沪电张君劢谈话一稿，请于电文末加注按语如下：张氏谈话中所说政府不久即发布另一文告一点，中央社记者顷自有关方面探悉，政府并无发布另一文告之拟议。”1.21蒋发表“引退”声明，并无只字批评八条，并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改变为“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宪法、法统、军队等项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1.22敢于承认以中共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国民党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面反对，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一声“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1949.2.5孙科“迁政府于广州”后，2.7发表演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至于共产党，孙说：“吾人试观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

孙还不止此，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结束，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士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好了，孙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打，即自动招供，而且忠实无误。就是国民党，就是蒋，迷信武力，发动战争，及至军事方法未能解决问题，方始求和。孙用字造句也很正确，他说过分迷信武力的是他们党内的“若干人士”。这一点，对于中共仅仅要求惩办若干国民党人，把他们称之为战争罪犯，而不是全体国民党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和孙科之间，在这个数目字上并无争论。不同的是在结论上。我们认为，对于这些“若干人士”，必须当作战犯加以惩办。孙科则不同意这样做：“现共方之迟迟不行指派代表，一味拖延，显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为目前业已羽毛丰满，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全国，故拒绝先行停战，其用心亦极显然。余兹须郑重提出者，即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这样看来，孙又有些不可爱了。他似乎认为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不算公平合理，和2.13国民党宣传部的《特别宣传指示》对于战犯问题所表示的态度，是一样地吞吞吐吐，不敢明目张胆提出反对，较之李宗仁敢于承认以惩办战犯为谈判的基础条件之一，大不相同。

但是孙仍旧有可爱的地方，即是他说共产党“亦正迷信武力”，是表现在“迟迟不行指派代表”和“拒绝先行停战”这两点上，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在1946就迷信武力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夫“迟迟不行指派代表”者，是因为确定战犯名单是一件大事，要“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故须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互相商量，以此“拖延”了一段时间，并且未能迅速指派代表，引起了孙科之流颇为不快。但是这也不能一口断定即为“亦正迷信武力”。大约不要很久，战犯名单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谈判就可开始，孙院长就不能说我们“迷信武力”了。

至于“拒绝先行停战”，这是服从蒋元旦文告而采取的正确的态度。蒋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的行政院于1.19做出了一个违反蒋的决议，说什么“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共曾于1.21严正批评给这个不通的决议。不料孙充耳不闻，又于2.7说什么中共“拒绝先行停战”，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连蒋那样的战争罪犯，也知道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没有商谈是不可能的，孙科在这点上比蒋差远了。

人们知道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发动并坚持战争。直到1947.6.22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现在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像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这是不忠实的。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3.5）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949.3.5~13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的有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后，国民党主力已被消灭，残余的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 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准备的。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不可松懈战斗意志。
* 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按照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同时也是有利于我军和人民的，可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都应注意和学会这一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
* 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大体上不动，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再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北平方式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决不可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了就成了革命党，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 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
* 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绥远方式解决问题时是这样。随着战斗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解放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5.3万个干部，对于不久将占领的广大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就可以展开广大地区的工作。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1927至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用乡村包围城市。采取这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和荫蔽的斗争。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

在城市斗争中，有些糊涂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或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要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避免盲目地乱碰而忘记中心任务，以至于占领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还没有上轨道，引起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为此，必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城市中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则不能维持政权，就会失败。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必须有所区别。

* 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党和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武装力量，建立党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首先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两年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尽可能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
* 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其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了人民统治，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解放军。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而不是别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战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产生了党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1. 中国已经有约10%的现代性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和古代不同的。由此，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忽视这一点，就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2. 中国还有约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这点上，我们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向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同古代相似。忽视这一点，就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3. 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但它却极为集中，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忽视这一点，就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4.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参加或保持中立。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还处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活动范围方面，税收政策方面，市场价格方面，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死，或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5. 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不能任其自流。必须组织生产、消费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且必须组织、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 私人资本主义 + 个体经济 + 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6. 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由落后农业国变成先进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此，必须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一、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二、国外的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忽视这一点，就犯绝大的错误。
7. 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 中共的领导 + 世界各国尤其苏联的工人阶级的援助 🡪 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力帮助国民党。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愤怒，使帝国主义者丧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二战后大大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空前增长。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和应当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其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被打倒的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分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暂时存在，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全国胜利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现在及其全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都不必急于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则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脱离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及其死党。蒋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的政策。不论是全面或局部的和平谈判，都应当这样去准备。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接受谈判，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接受。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党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否则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党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打倒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在革命胜利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商量和解决问题，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并做出成绩。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斗争而非迁就或关门态度。每一个城市、战略性区域和省，都应培养一批能够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1947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国际意义。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气力。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因为胜利，骄傲、停顿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列主义的武器。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可以不向帝国主义讨乞，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

##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949.3.13）

1. 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地区，担负繁重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2. 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否则，问题就会长期不得解决。书记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3. “互通情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语言。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4.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不懂装懂，要“不耻下问”，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且照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否则，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给以批评。
5.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
6. 要“抓紧”。党委对主要工作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
7. 胸中有“数”。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反对的、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8. “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解决什么问题，并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9. “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时间也不要太长。
10. 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和不同的，都要善于团结和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11.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12. 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则应基本上肯定他的工作。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1949.4.4）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面前：一、向美蒋靠拢，继续与人民为敌，在解放战争中和蒋集团同归于尽；二、向人民靠拢，与美蒋决裂，在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①坚持地走第一条路，口头说得好听，行动上继续备战、卖国、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是蒋的死党；②愿意走第二条路，但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③徘徊歧路、动向不明，既不想得罪美蒋，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和第三部分的混合物，第二部分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是美蒋的工具。

4.1南京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保护美蒋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死党一同荒谬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蒋等人，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则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是否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及其死党、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110万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美蒋和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性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如果也愿意这样做，则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抛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解放军就要进军，没有一点游移余地了。

##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4.11）

这个命令是毛起草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解放军遵照毛和朱德的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1949.4.20夜起，至二十一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四月二十三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五月三日解放杭州，五月二十二日解放南昌，五月二十七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七月，开始进军福建。八月十七日解放福州，十月十七日解放厦门。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五月十六、十七两日，解放华中的重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又南下湖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八月四日宣布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在九、十月间进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军的主力以后，又向广东、广西进军。十月十四日解放广州，十一月二十二日解放桂林，十二月四日解放南宁。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华北各兵团，四月二十四日攻克太原。彭德怀、贺龙等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在五月二十日解放西安之后，同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八月二十六日攻克兰州，九月五日解放西宁，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全部歼灭了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军。九月下旬，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十一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五日解放贵阳，十一月三十日解放重庆。十二月九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十二月下旬，进入西南的解放军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军，二十七日解放成都。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共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蒋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 🡪 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 + 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1.1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 + 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1.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2.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
3. 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4. 在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 中国解放军布告（1949.4.25）

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1. 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解放军合作的态度。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2. 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3. 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4. 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5.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6. 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7. 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8. 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 解 放 军 总 司 令　朱　德

## 中国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4.30）

1949.4.20~21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二百五十二人。紫石英号也被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三艘英舰逃走。英国当局曾由其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经过紫石英号舰长同解放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放行。当谈判还在进行之际，紫石英号军舰于七月三十日夜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借以逃跑。当解放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军舰竟开炮射击，并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26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解放军的防区，并向解放军开炮，致使解放军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

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侵犯。艾德礼说：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解放军要求英美法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艾德礼埋怨中共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英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重巡洋舰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

##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6.15）

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其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共在1948.5.1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

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各界响应，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

这是中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全国人民拥护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1946.7到现在，已三年了。

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援助下发动的。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可是，仅三年，即已被解放军所打败。不久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现在，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

三年中，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军560万人。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150万人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这是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

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

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坚决、彻底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中国必须独立，必须解放，中国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现在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国人民盼望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且不需要多久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6.30）

1949.7.1中共成立二十八年。中共已经不是小孩子和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

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衰亡，完结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国家权力和党的消灭。我们则恰是为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

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列主义的刚进党的同志，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但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必须懂得，消灭阶级、国家权力和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看得远些。

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为说清在下面所要说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

党的二十八年是在困境中走过的，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列主义。

列宁在1920《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描写过俄国人寻找革命理论的经过。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

自1840鸦片战争失败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共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英美法德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列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919五四运动。1921中共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共。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共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22年内，蒋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二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列主义，建立了中共。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24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共领导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

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刺不刺激都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就有生意可做了，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二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假如没有苏联，没有二战胜利，没有打倒日寇，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英法德意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则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显然是不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他们不会援助人民国家。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借以解救他们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曾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反而遭到无情打击，只得过一次苏联的援助。孙的遗嘱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有了经验，他吃过亏。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专政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不是现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现时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和改造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走入反动派的错误路上去，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不如此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本文不打算多谈经济问题，这里不来详说。

1924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党一大，通过了一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背叛孙，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22年，到现在才被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这些人。蒋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就是这样做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80-90%。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很凶恶的帝国主义站在旁边。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抗战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缺乏远见和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孙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来做这两件事。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的四十年革命失败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党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都是区别于前人的，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曲折道路。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聪明起来，事情就办得好些。任何政党和个人，错误总是难免，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主要经验、主要纲领。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事情还很多，过去只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扫灭。经济建设摆在面前。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学会不懂的东西。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老老实实地学。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最好的先生，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团结全国，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8.14）

本文和《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四篇，都是毛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工厂、铁道、枪炮等，这些是物质条件。解放军的强大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帝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帝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自从1840英国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法国进攻中国，日本进攻中国，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日本和沙俄争夺中国领土，1931日本进攻中国东北，1937抗日战争，最近三年来表面是蒋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50%以上”，“美国供给了国民党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积109年经验，几百次大小斗争经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流血和不流血的经验，才获得今天的基本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亿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70%。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则只能控制极少数人，另外的则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污蔑。可是，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亿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不愿意区别当权的美帝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他们容易被美帝分子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帝对于中国目前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无可奈何。艾奇逊在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确定要捣乱。效果据说是会有的。就是依靠“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不同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不能改变。斗争，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和中国人民的革命都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即旧民主主义分子，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国民党、苏联、中共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因为他们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帮助、批评、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如此，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计可施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没有和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尤其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即要推翻马列主义，推翻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俄国的列宁和斯大林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

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还公开发表，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国热气腾腾，有良好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说服一切这样的人。

## 别了，司徒雷登（1949.8.18）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象征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帝在二战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4.75亿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兴起，特别是苏联在欧亚两洲之间抵抗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觉悟，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这样，就迫使美帝不能采取大规模直接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打内战。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军和解放军接触过，被解放军俘虏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共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请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是担负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只是因为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你们不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

美国确实有科学和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腐败的蒋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就是跟我走。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在美蒋面前站起来了。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蒋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军事武器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解放军横渡长江，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除了看见解放军走过，工人、农民、学生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949.8.28）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注意并发表了许多声明。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中国革命迫使美帝内部的一个方面或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或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官方文书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1949.8.5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愉快的事。只有美国反动派和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确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消灭之日，都是不可以弃置的。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倒了以后，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索性不用那片布更有利，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 “友谊”，还是侵略？（1949.8.30）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友谊”。

美帝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望厦条约，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14.7%，教育费占38.2%，宗教活动费占47.1%。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1844订约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105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45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59.14亿美元，帮助蒋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1840英美鸦片战争）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9.16）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一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

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帝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共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

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

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4.75亿，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或不革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共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

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

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

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1840鸦片战争到1919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1917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列主义，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

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列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

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列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列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的影响怎样艾奇逊没有说。

孙以大半辈子从西方资产阶级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孙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

那末，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的继承者，孙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学习呢？为什么孙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列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了马列主义后，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近代世界历史上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复兴着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

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

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共两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另一方极度上升。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 第五卷（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7）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809184553336900](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809184553336900)

## \*第五卷出版说明（1977.3.1）

中共中央毛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

毛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的不朽贡献。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现在出版了，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

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五卷和以后各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的历史时期，毛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原则。

领导我党和我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在反对高饶、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王张江姚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这个时期，毛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系统的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新思想、新结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它不仅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而且具有伟大的深远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1949.9-1957的重要著作。

毛关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还长期存在的科学论断，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就是在这卷著作中首次提出的。

以后，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根据革命实践经验，不断地充实和发展了这些光辉思想。

毛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团结战斗、继续革命的胜利旗帜，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毛的思想和学说是永存的。

收入选集的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著作，有一部分公开发表过，有一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过，包括毛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9.21）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解放军战胜了美蒋，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前我们曾和国民党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但那次会议被国民党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要么推翻这些敌人，要么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

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三年内很快觉悟并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代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和共同纲领，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全国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国旗和国徽，决定国都、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历史上，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成功继承了先人的意志，革命取得了胜利。）

（表明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发展。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还要作最后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也还会以各种方式捣乱，企图复辟。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胜利成果和反对敌人复辟的有力武器，必须牢牢掌握（人民民主专政）。在国际上，必须团结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使我们在保障已有成果和防止敌人复辟的斗争中不会处于孤立地位（团结国际友人）。这二者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迅速获得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4.75亿人口和960万方公里的国土。

（困难是有很多的，但确信会成功。）

艰苦奋斗 +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 团结国际友人 🡪 经济战线迅速胜利和高潮 🡪 文化建设的高潮，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巩固国防，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侵略国土。在解放军的基础上，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将不但有强大的陆军，而且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

##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949.9.30）

这是毛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在人民领袖毛领导之下”一句，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任务。

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它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全国人民的空前团结。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在中共领导下，经过长期英勇奋斗，战胜了美蒋后所获得的。

（会议表明一百多年来的中国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接下来的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

在毛的领导下，会议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制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定都于北京，制定了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决定了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

它将指挥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将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它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949.9.30）

这是毛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10.26）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1936-1948曾使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是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 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1950.3.12）

这是毛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通知。

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几年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

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理由：

1. 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过左，如果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
2. 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半封建富农，则将显得更有理由，即更有政治上的主动权；
3. 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经济和组织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但未作详细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

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有关文件，并颁布，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

因此，请中南局、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950.6.6）

目前的国际情况是有利的。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发展，特别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美英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

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推动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三战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避免三战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

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没有根据的。

目前我们的情况是：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已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外交关系。

战争已在大陆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国民党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又组织许多特务和间谍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暗杀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

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解放军自1948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从1949.4.21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它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183万国民党军队和98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

现在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党、人民政府和解放军。

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

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1.2亿亩耕地和4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政府组织了大规模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水利建筑工作。

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要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失业群。

革命胜利后，整个旧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

人民政府进行了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继续。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1.6亿人口)，土改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已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或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在新解放区(约3.1亿人口)，则因为解放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的土匪待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没有调整工商业，失业严重，社会秩序没有安定。

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

1. 土地改革的完成；
2. 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
3. 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更多。

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在三年左右争取实现的。那时，就可以看见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1. 有步骤地土地改革。战争已在大陆基本结束，和1946-1948的情况(解放军和国民党胜负未分)完全不同，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帮助贫农，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2. 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不适合国情。
3. 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4. 有步骤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都是不对的。
5. 救济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和其他灾民，帮助其就业。
6. 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开好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7. 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全党和全国人民提高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警惕。
8. 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党整风。党已有450万人，必须谨慎发展党组织，坚决阻止投机分子入党。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组织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前，一般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1950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的条件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错误，克服居功自傲的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 不要四面出击（1950.6.6）

这是毛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

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北方已约有1.6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1.6亿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3.1亿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

在土改中，敌人是够大够多的。一、帝国主义；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四、地主阶级；五、帝国主义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改组，但暂时也带来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

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很紧张。失业的知识分子、失业的工人和一批小手工业者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当前总的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总要想办法。

要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

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

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并教育和改造他们。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

就是那些唯心论者，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团结他们。

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必要的。

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到我们这边来了，也要团结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这有利于劳动人民。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只有全部的条件都成熟了，才能进行改革。当然，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四面出击会让全国紧张，很不好。

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台湾西藏反动派、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

我们的政策、战略策略方针、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1950.6.23）

这是毛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

此次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这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各界委员和其他，略。）

这样就能集中广泛意见，检查过去工作，决定今后方针。希望以后继续采用这种方法。

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但实际上，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采纳并见之实行的。

我们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员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

在这些报告中，总结了过去的工作经验，规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这次会议所以有这样多的议题，是因为新国家成立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发展，在军事战线、经济战线、思想战线、土地改革战线，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都待总结，都待指示方针。

会议按法律规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议题众多的会议，一次为议题较少的会议。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4.75亿，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

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议题是改革旧有土地制度。大家同意刘少奇的报告及中共中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作了若干有益的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现在要过土改一关。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关，就容易了。

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

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帮了忙，并不半途而废，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必须坚持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在国内，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巩固革命统一战线。

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

要巩固革命统一战线，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其标准即现时的《共同纲领》。

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推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好方法，是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方法。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 你们是全民族的模范人物（1950.9.25）

这是毛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的祝词。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

中共中央向你们的会议致热烈的祝贺，并向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你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

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中共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

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它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

当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个国庆纪念节日快要到来之际，你们在这里开会，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们庆祝你们的会议获得成功，庆祝你们在今后工作中获得伟大的胜利。

##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950.10.8）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它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 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1951.1.19）

（中朝两国要团结，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志愿军要如题，这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2.18）

中央于二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兹将决议要点通报如下。

1. 二十二个月的准备工作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1. 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1. 土改

3.1、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

3.2、争取今年丰收。

3.3、依靠县农民代表会及训练班。

3.4、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

3.5、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

3.6、同意华东分期退押的办法。

3.7、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

3.8、土改后，增划区乡，缩小区乡行政范围。

1. 镇压反革命

4.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

4.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

4.3、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

4.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1. 城市工作

5.1、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议程如中央所通知，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

5.2、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5.3、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5.4、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

5.5、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

5.6、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

5.7、全国总工会及各上级工会应着重解决下面的具体问题。

5.8、党委及工会应着重典型经验的创造，迅速推及各处。

1. 整党及建党

6.1、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

6.2、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

6.3、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以在一九五一年进行整党。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一九四八年“搬石头”的经验。

6.4、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十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

1. 统一战线工作

7.1、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

7.2、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

7.3、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7.4、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1. 整风

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借以教育干部。

##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5.15）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

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

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

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

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

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

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严重的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坚决、迅速地判处死刑。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宁放过，不错杀。）

为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从6.1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初步清查一次。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强迫。

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它要害部门，则须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与，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

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

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在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 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0.12-1951.9）

1.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1950.12.19）
2.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不怕。（1951.1.17）
3. 劲头不足、草率从事，这是全国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特别是草率从事，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1951.3.30）
4. 中央已决定，在党内，在解放军内，在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它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又保存了大批劳动力，利于国家建设。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它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10%，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80%，即可保全80%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它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不能分化敌，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如果其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应执行死刑的人，一律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也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1951.5.8）
5.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1951.6.15）
6. 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领导。（1951.9.10）

##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951.5.20）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反帝反封建时期，却狂热宣传封建文化，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应当歌颂吗？

向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是能够容忍的吗？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和对其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文化界的思想何等混乱！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1840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作斗争的新社会经济形态，新阶级力量，新人物和新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它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10.23）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现在开会了。

这次会议，除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外，应邀列席的尚有志愿军、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它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

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多为人民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过去一年中，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运动，取得了胜利。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外，将于1952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美帝进行了坚决斗争。

志愿军代表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

由于三大运动已取得胜利，国家实现了空前的统一。

西藏问题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稳定，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已前进一大步。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的爱国增产运动，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改和在工厂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

只要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就一定会出现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在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政府的方针，广泛开展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同样值得庆贺的新气象。

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已逐步变为现实。

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一切事实都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而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

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台湾、侵略朝鲜和打到了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我们举起反侵略的旗帜，是完全必要和正义的。

为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志愿军。这是现时中国人民和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不再如过去那样而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在中国成立的两年中，各方面工作都获得了胜利，是依靠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获得的。在国内，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

由此，就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料到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能够反击侵略者。

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我们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想欺负中国，他们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可以断定，是不可能的。

与此相反，中国是不能欺负的，以苏联为首的伟大和平阵营是不能侵犯的，全世界和平人民是不能欺骗的。

自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就确定了，现在则因为中国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使这个局面发展和巩固了。

不错，在第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曾发生过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结果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是狂妄的和徒然的。

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中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盟国苏联的力量增强了。

现时，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的老路，其结果是完全可以料到的。总之，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

我希望我国人民团结一致，并和苏联团结一致，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

## 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1951.11-1952.3）

* 1. 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教育改造不使重犯，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951.11.30)
  2.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951.11.30)
  3.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1.12.8)
  4.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极为和适时的。

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精密部署，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

只要形成这个统一战线，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以必要的惩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速作部署。(1952.1.26)

* 1. 多项（1952.3.5）

5.1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5.2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95%，后二类约5%。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5.3这五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各大城市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最好处理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对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税较大的。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它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以的。

5.4根据城市实际情况，决定将过去所定的四类工商户改为五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 其它三类不变。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10%，基本守法户约占60%，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25%，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将完全守法户和有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5.5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肉刑逼供，严防自杀，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5.6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

* 1. 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6.1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6.2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6.3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它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收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6.4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6.5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6.6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6.7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6.8在一切大、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 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51.12.15）

这是毛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1951.7，刘少奇背着毛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九月，毛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12.15，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

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

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

## 元旦祝词（1952.1.1）

（祝各工作顺利。）

##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1952.4.6）

我们基本同意西南局、西南军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只有照此，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

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

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

* 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这时我军仍能在西藏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
* 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不能解决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一切仍旧，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

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

* 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
* 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

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

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

他们既不愿意实行，目前就不实行。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反而有利些。

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它各条。

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

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

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一时也不会变化。

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952.6.6）

这是毛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毛批判了这个部的负责人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间阶级的错误观点。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8.4）

去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即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

收入少，支出多，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去年提出增产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

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坦克都有了。

抗美援朝是个大学校，那里实行大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这次战争，本来存在三个问题：

* 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多，但士气低。
*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拉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 有没有东西吃。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究竟打到那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

1. 要死人。他们为扣留一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三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
2. 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3. 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4. 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美国方面不由我们说了算。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

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

说马上要打三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大家要团结，划清敌我界限。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团结和划清敌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

孙中山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两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种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

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国家稳步前进。

##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1952.10.24）

（对战果表示祝贺。）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

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迫使敌人妥协。

自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2/3以上。

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9.18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1953.1.5）

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应当唤起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

党在“三反”中基本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

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有的省人民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党和政府，不但目前且将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党和政府内的反映。

就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示给中下级干部。

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

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

如果领导任务有所加强，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使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因此请你们在1953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展开斗争。

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

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

## 批判大汉族主义（1953.3.16）

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这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

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

根据不少材料，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无事，实际很严重。

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到处存在。如果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和克服，是很危险的。

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员和人民。

## 解决“五多”问题（1953.3.19）

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存在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

这些问题存在很久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提出，尤其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

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遗留至今。

因此，必须在1953内，在执行中央1953.1.5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

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情况，加以适当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

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

为此，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派出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它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

目前农业基本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

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

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党脱离全国80%人口的农民群众，是非常危险的。

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分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

##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1953.5.19）

这是毛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

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6.15）

这是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在讲话中，毛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15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各项工作的灯塔，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就要犯“左”倾错误；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停留在原来，不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继续搞“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就要犯右倾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过渡时期充满矛盾和斗争。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这种想法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实际是不妥当的。
*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这是不对的。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953.6.30）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现在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其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1952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二、团如何做工作。两者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

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即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

现在朝鲜议和，土改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14~25岁的青年，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

尤其是14~18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多娱乐一点，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

祝贺身体、学习好、工作都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太积极太热心，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各类人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睡眠休息娱乐都要抓紧。现在要搞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学习、工作都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就用这句话顶他们。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方针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

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30岁以下的原来只有9个，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60+个，也只占1/4。30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3/4，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60+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

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马克思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

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现在有九百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一百万会拥护。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团章草案规定，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六个月，你们也规定六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一百万人能办到，八百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

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

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是谨慎的讲法。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

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1953.7.9）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绝大部分是在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

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

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约只占1/4，其余的3/4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

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很大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8）

从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3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作了原则性解决。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8.12）

这次会议很好，周总理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三反”“五反”运动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列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很大打击党内资产阶级思想。但当时仅给贪污浪费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财经、政法、文教和其它工作中也有，中央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列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党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没有动摇的，是马列主义思想；有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列主义，但夹杂一些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列主义思想。

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才是对的。

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战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

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

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七届二中全会已经说明，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过多，也不可没有。现在，不顾人民生活的干部还不少。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

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1949.3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应当按照自愿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110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现在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

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是主观主义。

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

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1941.2.2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7.1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1948中央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1.7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1953.3.10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

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

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一、关心集体领导。二、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要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上管不了下。三、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监督，受各级党委领导，这是完成党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打得它相当怕。这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1953.9.7）

1953.9.7毛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进行了谈话。这是毛写的谈话要点。

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和逐步具体化。所谓“明确”，即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党还是民主人士，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5年，因此不应发生震动和不安。

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私营商业亦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私营工商业占有大约380万工人、店员，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训练干部。

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所得税34.5%；福利费15%；公积金30%；资方红利20.5%；总计100%；

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愿意与党和政府靠近、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3~5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3~5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 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3/4)，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9.12）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已告一段落。

胜利，正确领导是其一，但主要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美帝的武器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妥协的原因：

1. 军事方面，美军处于不利、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作战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确实是铜墙铁壁，战士和干部勇敢不怕死。而美军却怕死，军官也呆板。他们的战线并不巩固。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再打几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主要原因）
2. 政治方面，敌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停战。
3. 经济方面，敌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收支不平衡。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阵地，相反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讲到领导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战术。例如头一个月，我们汽车损失很大。除了领导想办法，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40%减少到<1%。后来，地下仓库、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上面丢炸弹，我们下面开大会。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加上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很重要意义的：

1. 和朝鲜人民一起，守住了三八线。否则，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就不能安心生产。
2. 取得了军事经验。志愿军的各类部队等，取得了对美军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军，如果不接触就会怕。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
3.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4.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三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今后，敌人还可能用各种办法来捣乱。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但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是有办法的。

我们现在，同1950冬不同了。那时美军不是在三八线，而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没有对美军作战的经验。现在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要打新的侵略战争，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们说不打了，则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任何地方都不去侵略。但人家侵略，就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抗美援朝，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如果美帝要再打，就跟它再打下去。

打仗要用钱。但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现在建设要用钱，农民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抗美援朝。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当然是前者。去年和前年，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是要的。但最大的仁政是抗美援朝，就要有牺牲，要用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或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者是小仁政，后者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人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这种思想党里也有。1941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说党不体贴农民。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打倒日寇。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红军，那是对日寇有利的。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

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不能太高，否则，抗美援朝就不能打了，或不能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认真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9.16-18）

梁漱溟与毛同岁。1918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毛的恩师）家里初识，当时梁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到延安，与毛多次交谈。

1950.1在毛和周恩来邀请下，梁到北京，毛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由于梁吃素，毛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毛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与毛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有时兴高采烈，有时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的那段公案。

1953.9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小组讨论时，梁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认为，过去中国近30年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到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的发言，毛很不以为然，此后几天，会议对梁的言论进行了严厉批判。梁震惊不已，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

随后，毛给梁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梁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毛）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的。蒋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用枪杆子杀人，梁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反动透顶，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不同。傅公开承认反动透顶，但是傅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梁的功在哪，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一毫也没有。而梁却极力描述自己的美。

梁提出“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不是“赞成总路线”，完全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人民政府不能采纳这种建议。

梁“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认为，相反，对于梁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梁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梁参加。

梁又要求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此，我认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梁把自己写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中国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无色透明政府”、“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九天九地”、“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高论，这一切不能使我相信。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不承认这点，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他好像也不反蒋，究竟梁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我看书没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知道更多计划和机密的。

梁又提出，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划入不进步派或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情形之下，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那里？他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起码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的话死也不肯说。在公开言论中，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心中也有数。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三战不打，蒋不来，就跟党走。如果三战了，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

我认为梁应当做一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过去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比梅兰芳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是，农民看也不是。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其它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是另一类。还有跟梁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藏不住，还是会让大家看得出来。

梁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了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也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只要他自己愿意，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他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没有起过义。没有反过美蒋。没有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对抗美援朝都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照梁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好。

梁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上，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改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梁有办法吗？他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他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不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梁就是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因为梁的薪水比工人多得多！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

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列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中国现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希望。梁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没有希望。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就要亡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再说一遍，绝不采纳梁的路线！

梁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

梁又攻击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只有10%。落后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党里。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80~90%，其它还有些是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乡是90%。对于这种情况，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的当。

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那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梁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梁，要实行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就是总路线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有益处的。

##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10.15、1953.11.4）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

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

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

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一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十一月四日的谈话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

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

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他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变化，他也有一点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

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

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

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哪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

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

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

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适合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

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

农村人口中间，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说“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

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

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

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都要有计划性。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1957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了。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6.14）

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有几个好处：

* 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可以实行的。这样，就有信心了。
* 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

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现在草案也许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其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是领导机关意见和广大群众意见相结合的。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意见和全国人民意见相结合。

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

广大积极分子之所以拥护这个草案，觉得它是好的，主要有二：

* **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

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十九信条”，到民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的伪宪法。其中有积极也有消极的。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比较好的；当然，有缺点，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是反动的。我们的宪法草案，主要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

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法美，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压迫多数人。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

* **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整个宪法中。

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下子全都实行社会主义，这样缺乏灵活性。因此，要逐步做。比如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即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为此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步”。现在能实行的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这个宪法草案是可以且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还是草案，由全国人大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要准备实行。

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国家要有章程，宪法就是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明确、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宪法草案公布后，在国际上，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明确、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帝国主义、蒋都不会高兴，也不会赞成。

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6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可以打下一个基础。那时也不一定就很伟大了。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像个样子了。

现在我们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不是说能造的辆数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就是到五十年后，也要谦虚。

我们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合理。

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是迷信，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9.15）

（略。）

##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54.10.16）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

这是30+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

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注销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

之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应当团结他们采取，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1.28）

这是毛在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教递交国书的时候谈话的要点。

中国和芬兰的关系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从来没发生冲突。在欧洲国家中，在历史上，中国只同英法德沙俄意奥匈荷兰等国有过战争。参加侵朝战争的有十六个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卢森堡等国，都说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却把中朝两国说成是侵略国。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好战分子。他们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侵略，我们坚决回击。

美国的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

一战的结果，在俄国把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扫光了。二战的结果，在中国把蒋和地主推翻了，东欧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也解放了。美国如果发动三战，那其结果是美英及其它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

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搞革命。

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3）

没找到原文

毛在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谈到对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时指出：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

1955.3，在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概念，认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在根本上就是“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特别是“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

## 驳“舆论一律”（1955.5.24）

这是毛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写的一篇文章。

胡风（190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1920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1933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获释。1980平反。后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他的文学理论著述辑为3卷本《胡风评论集》出版。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

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

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

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只有充分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复辟，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反革命目的。

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

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

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

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而且法律也一律。

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的反革命分子好象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

“舆论一律”，或说，“没有舆论”，或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

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

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

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

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

“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后，人民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

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

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1950说的。那时，大陆刚消灭了蒋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

##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1955.5/6）

关于胡风，某些见上篇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7，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在报告中指出，1949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毛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他还建议，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

*1952.6.8，在与其有矛盾的时任文化部长周扬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转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

*1955.1.20，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从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

*1955.5.13，《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1955.5.18，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1965胡风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胡风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第一次平反*

*1978.1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

*1985.6.8病逝于北京。*

*1980.9.22“文化大革命”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1980.9.29，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第二次平反*

*1985胡风在北京逝世 [1] 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第三次平反*

*1988.6.18，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 序言（1955.6.15）

为应广大需要，现将《人民日报》在1955.5.13-6.10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1955.6.10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在这本书中，仍然印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

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为反革命分子和广大人民所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他们灭亡。

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只是失败的纪录，没有挽救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耍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

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因此，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

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荫蔽得十分彻底。

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接收他们时缺乏严格审查。

也因为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鱼龙混杂，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

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以此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

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逐渐清查。

### 按语（选辑）（1955.5/6）

宗派，古代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我们听得很熟的。

干这种事情的人，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

胡风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

《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

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但他们人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军经文教各个部门。

过去说他们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推翻中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随时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

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

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们处不利情况时，为了保护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发展，往往以攻为守。或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抓住若干表象，攻击事情本质；或吹捧一部分，攻击一部分；或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

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非法的斗争。

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由于我们骄傲自满，或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之中。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它坏分子钻进来了。

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

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

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和政治错误的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时，有两条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或堕落下去甚至变为反革命。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敌人是落后腐朽的反动派，注定灭亡，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

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想：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

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个地倒下去，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

照胡风分子说来，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完蛋的，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虽“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

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欧话，在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永远不会承认失败。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

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

只有我们，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彻底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

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能。

“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说得一点不错。只是“封建潜力”几个字说错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的反话，如同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一样。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

我们必须学习，提高阶级警觉性和政治嗅觉。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巩固我们的革命专政，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

##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7.31）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某些同志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是错误的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

这是五亿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有伟大的世界意义。应当积极有计划地去领导，而不是拉它向后退。

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可以理解，也不难纠正。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积极地帮助他们，就会克服。干部和农民是在党领导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

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教育他们，而不是简单斥责。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

干部和农民在斗争经验中将改造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

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现在，全国合作化运动已大规模进展，但还需辩论：合作社能不能发展、巩固？就某些同志来说，看来问题的中心是在他们忧虑现有的几十万个半社会主义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几户)合作社能不能巩固。如果不能巩固，当然谈不到发展。

某些同志看了过去几年合作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不相信，他们还要看今年的发展情况，也许还要看明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巩固，才真正相信农业合作化是可能的，才相信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这两年的工作很要紧。为此，现在就来谈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

在中国成立前，在22年革命战争中，党已经有了在土改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例如，抗日时期，陕北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过当时还没有推广。

党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此基础上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国成立以后。到现在，已有了六年了。

1951.12.15党中央做出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时(这个文件1953.3才在报纸上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发表)，已经有了3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过了两年，1953.12.16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1.4W+，两年增加46倍。这个决议指出，要在1953冬到1954秋收，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4W+发展到3.58W+，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而实际却发展到了10W+个合作社。

1954.10党中央决定，由10W发展到60W，实际完成了67W个合作社。到1955.6缩减了两万个社，较计划数字超过了5W个社。入社农户共有1690万户，平均每社26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较多些，其它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很多。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也有少数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甚至几百户。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到1957，国营农场将达到3038个，耕地面积将达到1687万亩。其中，机械化农场将达到1411个(包括1952原有的和一五年计划内增加的)，耕地面积将达到758万亩；非机耕的地方国营农场2897个，耕地面积将达到929万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大规模发展。

1955春，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

这些合作社，过一两年就有经验、成老社了，别人就会向它们学习了。由现在到1956.10秋收以前，还有14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

希望各省区的负责同志研究一下，按实际情况定出适当计划，于两个月内报告中央。那时再来讨论一次，最后定案。

问题是能不能巩固。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1.1亿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进而完成农业技术改革，确有很多困难；但应当相信，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的。

就农业合作化来说，我们应当相信：①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经济地位虽有所改善但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特别是其中觉悟较高的，积极性更大。②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党已经胜利领导了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一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农业方面，也同其它方面一样，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有力量的证据。请看第一批300个合作社，第二批1.5W个合作社，第三批8.6W个合作社，共有10W个合作社，都是1954秋季前建立起来的，都巩固了，为什么其他的就不能巩固呢？

应当相信群众和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为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

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数目的偏向。因此，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是一年整两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经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还没有下大力去整)，建议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

现有65W个合作社中，有55W个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较巩固的所谓“一类社”。加上以前的10W个已经巩固了的老社，则已经巩固的社是不少的。可以由这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带领其余尚待巩固的合作社逐步获得巩固。

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去挫折它。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

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W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W个包括40W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1955.4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听。

在胜利面前，有两种不好：①胜利冲昏头脑，膨胀，犯出“左”的错误。②胜利吓昏头脑，“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必须认真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一开始就注重质量，反对单纯追求数量。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个口号也可以用于建设社会主义。

要在省、专区和县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

1. 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
2. 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在向农民作宣传时，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困难，使农民有精神准备。
3. 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全专区、全县、全区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
4. 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
5. 普遍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还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顿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和整党整团工作密切地相结合。

不论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应以乡村当地的干部为主要力量；以上面派去的干部为辅助力量，在那里起指导和帮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办代替一切。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更不能减低产量。

已建立起来的65W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80%+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是极好的，证明合作社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单干户。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必须注意解决以下问题：1耕畜和大农具是否以迟一两年再入社为适宜，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2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3合作社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4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得恰当，才不至于违反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5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6社员成分问题，等等。

这里谈一个社员成分问题。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

这几部分人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吸收进合作社。

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生活或还是困难的(贫农，分得了土地，但人力畜力和农具不足)，或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

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

因此，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入合作社的人，即使是贫农和下中农，要有一段时间教育、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

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的觉悟，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合作社提高到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他们感到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时，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

这样，先将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们(约占农村人口60~70%)，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

在发展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

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已耕的土地不足，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广大农民生活，虽在土改后有所改善，但仍然有困难，富农只占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60~70%。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迅速发展。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20~30%，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

而我们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种情况，认为现在刚刚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已“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这些同志还对于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他们认为党对于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悲观地描写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现时状况，认为“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

不错，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革命。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验。但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的经验水平又从何处提高呢？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这是第二种错误思想。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而是强调非本质方面。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方向。

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愿意在党领导下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2党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如果缺乏这种信心，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建成社会主义。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使我国人民对于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

有些同志不赞成党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进行的。

首先，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逐年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移民垦荒在内，就不能解决逐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求，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困难。

这个问题，苏联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

其次，一些同志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农业机器、化学肥料、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大量使用的可能。

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互相孤立。

苏联的经验，也指出了方向，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老是孤立地去看这些问题。

其次，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除了直接的农业税，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而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了，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批评目前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

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不应当容许一些同志利用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准备以18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

从1949.10中国成立起，到1952三年多，是为完成恢复经济的任务度过了的。在这时间内，在农业方面，除了土改和恢复农业生产，还在一切老解放区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接着是1953起的一五计划，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三年，农业合作化已向全国推广，经验也增加了。

从中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18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

苏联的经验说明这是完全可能的。苏联是在1920结束国内战争，从1921-1937共17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1929-1934这6年时间内完成的。在这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很快就被纠正。

苏联用很大努力胜利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逐步前进的。

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或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第二步，在互助组基础上，仍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联合，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感到突然改变生活方式。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

现已有的65W个农业生产合作社，80%+的社是增产的，10%+的社是不增不减的，10%-的社是减产的。后两类必须整顿。因为80%+的合作社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10%到30%)；又因为那10%+的合作社虽然第一年不增不减，但是经过整顿，第二年可能增产；最后，减产的合作社，经过整顿，第二年也有可能增产，或进到不增不减的地位。

所以，就整个说来，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可以基本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可以逐步训练出来。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成绩，决定省县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或暂停一下而从事整顿；或边发展边整顿。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或大量建立新社，或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

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抓紧，每年应当进行多次。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批评要及时，不要老是事后批评。

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可以少犯错误或迅速纠正。

从上述种种情况，可以说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因而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把这种方针估价为“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很危险，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向我们提出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

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建立在反帝反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

但这个革命已经过去，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

在近几年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逐渐地在发展，新富农已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

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显然是不能继续巩固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

这就是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劝我们“下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末尾和二五计划第一年的开头，即在1958春，全国将有2.5亿人口——5.5千万的农户(以平均4.5口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

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

将在二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1960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

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1960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

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会比社会改革的时间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4~5个五年计划，即20~25年时间。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

要有全国、全省、全专区、全县、全区、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不断地修正规划。

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

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1954.8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涨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各类互助合作组织和各阶层群众，已经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动起来了。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大社员，作为建社对象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充自己的户数，不够条件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也要求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它们自己。群众有的张罗入新社，有的张罗入老社。今年不准备入社的人们，也在积极地酝酿插入互助组。动的面很广，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这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特点。但由于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龙江省的村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乡。黑龙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村。)在群众自找对象中，已经开始产生‘强找强，排挤贫困农民’ ， ‘争骨干，争社员，相互闹不团结’，‘骨干盲目集中’，‘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组织低级组或富农社’等等不健康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情况下，光是从建立新社这个范围和角度出发，考虑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领导这个运动，已经不够了，必须从全村范围(按：即全乡范围)和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既考虑到老社的扩大，也考虑到新社的建立，既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也考虑到互助组的提高，既考虑到今年，也考虑到明年，以至后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实现党的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里所说的“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只是黑龙江一个省是这样的吗？只是某些县、区吗？我看，这种领导落在运动后面的严重情况，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来。

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又说：“双城县的希勤村，以村为单位，采取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规划。这是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一种创举。其重要作用，首先在于通过规划，全面地实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有力地开展了对于富农倾向的斗争。从农业全面合作化的利益着眼，适当地配备了骨干力量，调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组的关系，从而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其次，通过这样的规划，就把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工作，具体地布置到基层领导和广大群众中去，使党的村支部懂得了如何进行领导，使老社懂得了如何向前发展，使新社懂得了如何建社，使互助组懂得了提高的具体方向，更加发挥了党的村支部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地体现了依靠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的正确原则。最后，正由于通过这种规划，可以进一步地摸清农村的底，具体地全面地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进，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从而正确地实现了中央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黑龙江省委报告中所说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究竟怎样解决的呢？省委的报告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省委报告的后面附载了双城县委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党支部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进行全面规划的结果，排挤贫困户入社的偏向纠正了，骨干过分集中的问题解决了，互相争骨干、争社员的现象没有了，社组关系更加密切，富农和富裕中农组织富农社或低级组的企图失败了，基本上实现了党支部的计划。两个老社扩大了社员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个新社的架子，整顿起两个互助组。估计搞得好，明年(1955)全村就可以合作化。目前，全村群众，正在积极地实现今年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和搞好增产保收。村干部普遍认为：‘得亏这样一搞，要不就乱了，不但今年搞不好，还要影响明年。’”

我看就照这样办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 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1955.9.7）

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

* 新中农里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其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其余的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
* 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本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在土改时不正当地受了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感到兴趣。

因以上两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报告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

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目前许多地方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决不可违反。

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还不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或企图组织低级社，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

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即，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

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

* 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
* 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5%，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
* 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10.11）

这次会议是一场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

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

这个辩论，要在农村展开，也要在城市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现在就下面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一、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彻底孤立资产阶级，才便于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

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

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会觉得跟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

结果两下都不相信，工农联盟就不巩固了。为此，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逐年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时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将发现自己完全孤立。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

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

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

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

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孤立资产阶级。

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

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1950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

等到实行土改，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

这就最后地孤立资产阶级，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就是要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小生产绝种。有些同志太仁慈，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这个十五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

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1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2镇压反革命，3解决粮食问题，4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已经并继续给资产阶级严重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镇压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大概共1200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

讲起反革命来，好象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查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

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是很危险的。

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二、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这次讨论，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1. 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2. 是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都能发展。
3.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凡是条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办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凉山那些地方，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4. 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也是可以办的。
5. “办社容易巩固难”，这一条迷信也破除了。办社也不是那么容易，巩固也不是那么困难。一定要讲办社就容易巩固就难，这实际上是主张不要办社，或者少办为好。
6. 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一定要有机器才可以办社的空气现在不大了，可是也还有这个观点。这一条迷信也是能够完全破除的。
7. 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当然有某些少数确实不能办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组，但一般的所谓坏社，是不应当解散的，经过整顿是可以变好的。
8. 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如不赶快上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确是要破坏的。
9. “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灾，牛皮价格过高，饲料不够，还有是老了应当杀了。
10. “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是错误的。今年春季农村的紧张情况，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广大农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教育，同时我们的粮食工作也有缺点。去年究竟购多少适当，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摸底，多购了七十亿斤。现在我们就来一个调整，准备减购七十亿斤，加上今年又丰收，这样，农村情况也就可以缓和下来。
11. “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这是悲观主义。我看合作社的优越性决不止三年，社会主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到了将来社会主义不能代表优越性的时候，又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来代替它。
12. 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这个问题在过去是不清楚的，这次大家提出来了。应当办一批高级社。至于办多少，你们去研究。
13. “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这也不对。今天看起来，从事木帆船、兽力车这类运输业的几百万劳动者，也应当组织合作社。

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

三、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1合作社的规划；2农业生产的规划；3全部的经济规划。

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

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

1. 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
2. 全乡的规划。全国有二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
3. 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
4. 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分三种地区：

1. 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三个浪潮是：今冬明春，明冬后春，再加一个冬春。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两波之间有一伏。这种地区到1958春就可以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2. 少数地区，有两个冬春、两个浪潮就够了。这一部分地区中有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有一个浪潮就到了。
3. 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这里还要除开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大小凉山、西藏以及其它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的不能搞。

“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就是70~80%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里面有一个回旋的余地，70%也可以，75%也可以，80%+也可以，这就是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剩下一点那是以后的事了。

太慢太急都不好，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

过去许多工作是这样搞的，中间有问题不去解决，让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时候来一个总结，来一个批评。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犯过这个错误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

如果遇到情况不对，立即煞车。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

增加生产、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原则，有全面规划、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

务必避免苏联曾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错误。关键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时间是不是太短？我看有五个月切实钻一下也可以。

省级同志认真地钻一下，当然很要紧，特别是县区乡的同志，如果他们不钻，搞起许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险。如果老钻不进去，就应当改换工作。五个月以后，即明年三月以后，中央也许再召集一次现在这样的会。到那个时候要比质量，大家发言的重点，就要有新东西，要讲全面规划、经营管理、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有几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建议，看是不是可行。这就是大家都在做的，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提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

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

再一点建议，是不是请你们试试看。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化运动有好处。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区党委，省委、区党委对中央，都要有简报，报告合作社进度如何，发生了什么问题。各级领导接到这样的简报，掌握了情况，有问题就有办法处置了。这是关于几个领导方法的建议，请各位同志考虑。

四、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思想斗争必须中肯。

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好比打仗，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

这一次会议，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

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有严肃的批评；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

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它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帮助改正错误。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但不要以成绩当包袱。这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是有点摆老资格。人要虚心一点。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

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

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

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和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似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运动这件事，多少年以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在那一个根据地都搞过，却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1951冬中央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也是没有看见。直到1953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就是讲，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他们也不去查一查，同类性质的问题到底过去有人讲过没有，怎么讲的。

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它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

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

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也需要讲一讲。有许多同志老是钻到公事堆里头，不研究问题。不办公事不行，但是，单是办公事，不研究问题，那是危险的。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或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交换意见，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

陈毅同志说了，事物冒了一些头就要能够抓到。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这种情况需要注意。这种专门办公事，而不注意研究问题，不注意接触群众和干部，对他们不采取商量的态度，是很不好的。

五、若干其它问题

下面讲的一些问题，大多数是同志们提出来的。

第一，改换富裕中农在合作社中间的领导地位这样一件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不要一阵风把他们同时拉下来。

虽然富裕中农做领导者不适宜，可他们是劳动者。应当分别情况，看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有些人是必须要撤下来的，因为他在那里继续搞，实在是很不行了。但也要使得群众（比如合作社的社员）和富裕中农本人都了解，他确实不适于继续当领导者。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准备了较好的接替的人，去代替他，才去改换他的工作。有的可以经过他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继续任原职，有些可以改为副职或者委员。

至于本来干得好的，虽然是富裕中农，那当然不在撤换之列。不要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看待，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不要一下于统统撤换。对待这个问题要小心，必须好好地解决。上面说的几种办法，是不是可以，各省各地去研究一下。

第二，要在支部和群众中间说明，这一回我们讲下中农和上中农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不是重新划一次阶级，而是因为事实上各阶层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有积极消极的区别，在一个阶层的内部的个人也有这种区别。

比如贫农中间就有暂时不入合作社的。这一点是可以去说服这些富裕中农的：你看，贫农、下中农也有比较消极的，他不愿意来，也就不要他入，那末你富裕中农现在不愿意来，也就可以不来。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所以，不是什么重划阶级。

第三，关于地主、富农入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县和乡为单位（县为单位还不够，因为一个县基本上合作化了，但是也可能有些乡还没有合作社），一个县，一个乡都基本上合作化了，就是70~80%农户入社了，那个地方已经巩固了的合作社就可以开始分批分期地按照地主富农的表现怎么样来处理。

有一些表现历来都好，归附国法，可以给以社员的称号。有一些可以在社里头一起劳动，也分取报酬，但是不叫作社员，实际上是候补社员；如果他们搞得好，也可以变成社员，让他们有个奔头。第三部分人，暂时不许入社，等到将来再分别解决。所有这些地主富农入社后不要担任合作社的职务。

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

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或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第四，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第五，合作社建社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一定集中在每年的冬季和春季，夏季、秋季也可以建一些社，现在有些地方实际上是这么搞的。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两个浪潮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发展一批之后必须要整顿，然后再发展，同打仗一样，两仗之间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间歇，不要喘一口气，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军队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意见，说是不要休整，不要喘气，就是要一往无前，要尽打，那事实上不可能，人是要睡觉的。今天这个会，如果不散会，尽这么开下去，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人每天要大休整一次，要睡七、八个钟头，至少要睡五、六个钟头，中间小休整那还不算。搞合作社这样的大事不要休整，那种说法是很幼稚的。

第六，“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现在城市大反浪费，乡村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

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必须做的工作。至于经济核算，那就要逐步来。合作社办大了，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

第七，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

第八，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必须严格反对。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也要反对。但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

只要汉族同志态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确实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关系的立场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大汉族主义，则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

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

在今年三月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第九，扫盲运动。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

第十，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

比如讲合作化运动，本来有群众的积极性、互助组的普遍存在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成熟的条件，可是有些同志说还没有；合作化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他们说还不能，这都叫右倾。

如果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就说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来个百分之八十合作化，这叫“左”倾。

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第十一，有人问：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答：完全可能。只要某个地方的领导方面，不管是乡支部、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不去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去注意互助组的发展情况，又没有规划，又没有控制，不是分期分批，而是专喜欢数量，不爱好质量，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

在群众热潮起来，大家要求入合作社的时候，必须设想各种困难和一切可能的不利情况，向群众公开说明，让群众去充分考虑，不怕就可以干，如果怕就不要干。

当然，也不要把人们吓倒了。今天我是估计不会把你们吓倒的，因为我们已经开了这么多天会。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我们反对无穷的忧虑，反对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但当然不是一点忧虑或一条清规戒律都不要了。必要的忧虑，应当有的忧虑，谁人不忧虑呀？也要有必要的清规戒律。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

有这样一个办法：当人们刚刚想要骄傲，那个尾巴刚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提出新的任务（比如现在我们提出比质量，明年来就要比质量，那时数量问题是第二位的了），使他来不及骄傲，他没有时间。

这个办法，过去我们是试过的。在军队打了一个胜仗之后，有的同志刚刚同那些左右前后的人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尾巴翘得那么高的时候，你就给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务。把新的任务一提出去，他马上就要想问题，就要做准备工作，那个翘起来的尾巴就下去了，他来不及骄傲。

第十二，有的同志提出，可以不可以允许县一级有10%机动权？比如讲办合作社，可以少10%，也可以多10%。我看这个建议是可以采纳的，这一条好，不要搞得那么死。请你们再去考虑。

第十三，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第十四，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过还可以加一点，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50~70年内，就是10~15个五年计划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50~70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

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

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我看是一定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第十五，你们对决议、章程这两个文件有许多修改的意见，很好，搜集起来考虑一下。今天通过以后，决议在几天内就可以由政治局加以修改公布。

章程还要慢一点，要跟民主人士商量，要采取立法的手续，也许和兵役法一样，先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一下，交给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见，各地方就可以照那样试办一个时期，到了明年，再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最后，顺便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

你们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也许略有缺点。你们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

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

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

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9/12）

序言一（1955.9.25）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党的总路线是：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约需18年 = 恢复时期的三年 + 三个五年计划。

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表面上大家都是同意的，但实际有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如，1952冬有一个发展，1953春就来了一个反冒进；1954/1955同。所谓反冒进，不但停止发展，且成批地强迫“砍掉”已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十分生气：“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

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

之所以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一些中农，尤其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

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

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制度和整个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

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惶失措大反“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实际完全不是这样。虽有缺点，但整个运动是健康的。广大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就应当允许。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

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省县区乡的完整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积极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就使得，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出乱子。但对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或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当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

（编了一本书《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书的解释略。）

从书中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表明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指导，待根据中央方针做了适当指导，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材料很有说服力，可以使消极态度的人积极起来，可以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

在几亿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

特别是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使很多同志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意志不统一。

现在六中全会即将作出这个问题的新决议。应据此做一次广泛宣传，使意志统一。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序言二（1955.12.27）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这本书编辑了两次：9/12月各一次。第一次编辑时，收集了121篇材料，大多数是1955年上的，少数是1954年下的。当时，曾印成样本，发给七中全会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只留下了91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并增加85篇，共176篇，约90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

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此外，为了批判和建议，还在部分材料写了一点按语。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1955年下，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1.1亿农户中，到1955.12——已有60%即七千多万户，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在1955.7.31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1690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5000+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这表明，只需要1956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4年即到1959就可以基本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表明，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提早一些，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都应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但也完全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热情而有秩序，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

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即到1967，粮食和许多其它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200%。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如7~8年）加以扫除。

许多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伟大前途。

现在提到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1956年上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其它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它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方面。

在这些方面，都存在对于情况估计不足，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行动。

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里人也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

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使更多的人了解农村情况，我们准备从176篇材料中抽出44篇，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1955.9/12）

毛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这里选辑了四十三篇。1958.3，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印了一部分按语，为此，毛在1958.3.19写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全文如下：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1955.9/12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1（《书记动手，全党办社》按语）

这篇文章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如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还是不少的。

所谓“坚决收缩”，大批解散合作社，就是其中一种表现。不过不是消极避开，而是“十分积极”地索性直接解散若干个合作社。他们直接拿刀一砍，就绕开了麻烦问题。他们说办合作社有不堪设想的困难。但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

（数据和举例略。）

为什么别的地方可以克服困难？就是怕麻烦，爽直一点叫右倾机会主义。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列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2（《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按语）

1955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上半年许多人还坚持，下半年就只好相信新事物。许多人不相信合作社运动能成功，但七中全会批判后，迷信统统都打破了。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

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感觉的那样少？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

以此为教训，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3（《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按语）

有人不相信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但某地方是个晚解放区，却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不是三年，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

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总是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更新事物出现，又循环一遍。

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有一个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

4（《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按语）

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合作化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其他民族也已经办了不少成绩好的合作社。

5（《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按语）

这篇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上从来不动摇，实现了全村合作化。

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中国的富农经济很弱（土地改革征收了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比较富裕的中农力量却很大，占农村人口20~30%。

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增产竞赛。

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观望，双方争夺群众。富裕中农的靠山是地主和富农；合作社的靠山是党。

这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

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且数量还少，党还没有宣传到位。

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鸡毛确实要上天。苏联已经实现。许多党组织没有坚决支持贫苦农民，上面还没有打击机会主义思想，没有给合作化做出全面规划和领导。至1955做了这些，形势就完全不同了。观望的群众逐渐到合作化来。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这同政府惩治破坏治安和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

总之，1955下，阶级力量，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1956再有一年，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基本奠定。

6（《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按语）

这篇文章对于，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阻碍广大贫农和下中农走合作化、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描写的很好。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称共产主义者，却对社会主义事业很少兴趣，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

1955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首先经过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下半年却完全变样，几千万户农民行动起来，实行合作化。

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一样，社会主义胜利有了很大把握。

7（《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按语）

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到处都有，但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时。

8（《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

特别要请不相信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人和动不动就想“砍掉”合作社的人好好地看一遍。

现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都在增长，广大农民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领袖人物。最大的缺点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

目前的任务，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列主义的主动立场，全力领导整个农业合作化，不要“叶公好龙”。

9（《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一文按语）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略。）

1954.12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把领导重心放到互助合作，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

在农业合作化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现在全国还是不少的。可能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一点。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否和国家工业化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否健康发展，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能否够迅速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

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必须讲清楚，是为了帮助改善而不是代替。这种转变，首先要靠各级党委的书记，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而面临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不能完成任务，且会要闹出很多乱子。

10（《季节包工》按语）

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会议，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见县的领导是很重要的。

希望全国县级领导机关，密切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发现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及时召开全县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不要等问题成堆才去解决。领导作用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11（《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一文按语）

这个材料有很大说服力。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只要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时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简单从事，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则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

某村是老解放区，1952前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所以只费了一个多月，就建成了合作社。

在条件没有完备的条件的地方，那就是准备条件的问题，几个月至一年多，也就可以了。

条件可以边做这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说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

其中的“倒宣传”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材料描绘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结果逐年增产。

事实证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12（《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一文按语）

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即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各个阶层的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混乱的合作社，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政策和办法，办起来后地方组织就什么都不管了。

材料又提出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社。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全国约有5%的落后乡村，都应当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斗争中消灭落后状态。

13（《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按语）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各级党委都应充分注意。

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

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认为建立贫农优势，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50~70%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

现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认为，现在不应当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会不利于合作化。

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制度去彻底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比较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其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

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

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1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首先分批分期引导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其中觉悟程度高、组织能力强的若干人，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

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份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支部应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应公开告诉农民群众。

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表示愿意入社并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时，再吸收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强迫他们入社。

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

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的优势。

在组织成份方面，他们应占2/3，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1/3。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

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经验表明：建立贫农优势和由此巩固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险又会怎么样。

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线。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贫农的优势领导。结果，贫农扬眉吐气，中农也心悦诚服。

本文作者还表明，不应解散那些混乱的合作社，而是做整顿工作，是完全可以成功的。

14（《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按语）

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但工人阶级和党，在农村中，只能依靠贫农去团结中农。

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改时，现在向富农和其它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这样。

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刚开始都是动摇的。等到革命大势已定时，中农才会加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团结中农。

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1/3为适宜。

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2/3。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

对于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现象，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15（《新情况和新问题》按语）

材料描绘了农村中各个阶层的动态。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观望，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入社是否使他们不吃亏。

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须注意和分析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

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是正确的。“互助合作网”的办法是好的，就是要社、组兼顾，合作社要真正帮助互助组和单干户解决当前生产的困难问题。

贫农基金必须迅速发下去。现在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贫农，要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入社，什么时候就可以取得这笔基金。

16（《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按语）

各省应在关于合作化的指示中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吸收他们入社）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

目前，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错误的。

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17（《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按语）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斗争才能实现的。

社会上一部分人，一个时期内，是顽固地要走老路。另一个时期内，他们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

大多数富裕中农，1955年上还反对合作化，下半年就有人改变了态度，虽然一些人是为了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

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18（《严重的教训》按语）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都是如此，否则就不能创立。

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合作社建立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巩固。巩固后，一松劲又可能垮台。（例子略。）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错误，重新向社员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政治工作，才克服危机。

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

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具体、细致地去做，不能用粗暴、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这种工作，全国范围已有丰富经验。

19（《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按语）

合作社必须强调政治工作，其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20（《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按语）

富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一个很长时期，稍微放松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21（《一个整社的好经验》按语）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即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它要求党向旧制度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材料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仅简单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2（《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按语）

反革命破坏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在合作化过程中，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充分注意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斗争，在合作社内，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保卫组织。

在县委的领导和监督下，党的区委，在研究了情况，向党内外作好了宣传和解释，提高群众对于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警惕，对于混入合作社领导机关里的坏分子，加以审查、清洗和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不过必须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真正的坏分子，不能将好人或只有某些缺点的人说成坏人。处理尤其要恰当，必须经过县的批准。

23（《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按语）

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24（《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按语）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尤其是社会主义时代。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

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

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25（《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按语）

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工作，值得注意。

一切可以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去。农村是广阔天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6（《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按语）

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27（《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按语）

许多同志写文章时，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半文言半白话，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象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

本书中所收的170+篇文章，不少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

这就要求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28（《勤俭办社》按语）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即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是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内的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现在还很穷，要富起来需要几十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勤俭节约，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

有许多合作社不注意节约，应迅速改正。应奖励那些勤俭、产量最高、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相反的合作社。

29（《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按语）

这是一个全乡一千多户建成一个大合作社（他们叫做集体农庄，即是合作社）的七年远景计划。

人类几十万年，中国直到现在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我国的面目将逐渐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30（《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按语）

材料说：“制订生产规划的整个过程，就是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保守思想现在到处作怪。

为了克服这种保守思想，使生产发展，一切合作社，都要做长期计划。

31（《沂涛乡的全面规划》按语）

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

1956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包括的项目，比这个计划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业、商业、金融、绿化、卫生等。那怕粗糙，总比没有好。

一个省只要有一两个县区乡做出了相当象样的计划，就可以迅速传播，其它县区乡仿照。

32（《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按语）

每县都应在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区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力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

合作化的基础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可能在几年内获得解决。

33（《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按语）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放在计划内，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不一定要精料。

除了合作社公养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有宗教习惯的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

34（《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按语）

合作化以前，各处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合作化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

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这种顾虑，劳动力却是不足的。

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经营种类不多，劳动的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不够，耕作也没有精致化。

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逐年发展。农业机械化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

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

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

35（《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按语）

根据这两个合作社的情况，按照现在的生产条件，就已经多余了1/3的劳动力，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1/3的劳动力，其出路主要还是在农村。

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36（《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按语）

材料表明，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一百多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二百多个工作日，女的一百多个工作日，或更多。

这个数目，有些合作社已经做到了。副业必须要有确实的销路，不能盲目发展。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去掉盲目性。

37（《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按语）

“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

问题是要迅速加以训练，并在工作中提高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

38（《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按语）

列宁说：“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开始，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

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且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就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

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

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

第二种课本也应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省市区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

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指导。

39（《勤俭办社，建设山区》按语）

材料中的合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283户的大社。其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三年工夫已开始改变了面貌。（数据略。）其经验表明，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40（《以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按语）

孔子在故乡曲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如何从事农业，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

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

这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41（《大社的优越性》按语）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

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的，也可以办成一个大规模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42（《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按语）

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

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做，仍然要看自身条件是否成熟。但一般地三年也就差不多了。

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更有利时，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43（《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按语）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的合作社，就应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时候，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

生产力一经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大约三年左右的初级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

各省市和各自治区的党组织对此应有研究和布置，在1956、1957两年内，应在群众同意下办一些试点性质的高级社。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时，应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

如果能够在这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在群众中显出比初级社更大的优越性，就可以使以后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

当人们看见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小型社和初级社更有利时，当人们看见长期规划将给他们带来更高的物质和文化时，他们就会同意并社和升级。

城市郊区的升级会要快一些。

##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5.12.21）

今年毛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开始实行。

为此，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

* 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
* 除十七条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
* 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1956年计划内开始实行。

十七条内容如下：

1.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1956年下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75%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80~85%。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1960基本完成，是否可以缩短一年。为此，需要于1956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每区办一至几个大型高级社，再于1957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25%，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三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10万个社，我国是否以30/40+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
2. 地主、富农入社，1956是否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好处很多，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推迟一年。哪一种有利些。
3. 合作社领导成分，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2/3，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1/3。
4. 增产的条件：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5. 1956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三年，最好七年，可以到十二年。此事必须抓紧，是否已有布置。因为无经验，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6. 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准备意见。
7. 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兴修小型水利，保证七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灾旱灾。
8. 七年内，基本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9. 十二年内，基本消灭荒地荒山，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按规格种树，实行绿化。
10. 十二年内，大部分地区90%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11. 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不同区域不同，略）。各项作物，略，指标，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12. 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请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划分为，七年内可以基本消灭、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目前无法消灭。
13. 除四害，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14. 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2K个字。
15. 七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
16. 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17. 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3）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

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要在工作中掌握。

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百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几十人。

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

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2~3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5K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2K千元，小型合作社是1.5K元，个体手工业是8~9百元。

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穿用都有。还有工艺品。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民族好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提高工艺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要赶快。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

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

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机械化。机械化速度越快，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赶快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4，手工业这样大，不应该不纳入国家计划。

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

你们要在六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 论十大关系\*\*（1956.4.25）

这是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讲话。他在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共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尤其是最近苏联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仍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讲十个问题：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错误，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是没有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一直抓了、发展了农业，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还是投资的重点。但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一、更好供给人民生活需要，二、更快增加资金积累，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如果是假想或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如果是真想或想得厉害，那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二、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者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70%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必须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影响了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没有，就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就算五年，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去成本还有得赚。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必须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整训，军队加强了，比二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改进。国防工业正在建立，飞机、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现在还没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1950七届三中全会已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认为这是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一五计划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30%，这个比重太大。二五计划要降到20%，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工厂多造机器。经过一段时间，就不但会有很多飞机和大炮，还可能有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对原子弹是真正想、十分想，还是只有几分想。你是真正想、十分想，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不是真正想、十分想，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不好把兵统统裁掉。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者都要处理好。为此，就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即“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先讲工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在粮食问题上曾犯过一个错误。1954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1955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即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必须记住这个教训。

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以此积累资金，极大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某种错误。鉴于苏联，我们必须更注意处理好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合作社、农民分别拿多少以及怎么拿，都要适当规定。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90%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10%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减少也要及早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事情。地广人多，情况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必须纠正。

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但由此走到取消地方必要的独立性，也不好。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也有意见，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上，经验还不多，希望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一般不是重点。

少数民族人少，占地广。论人口，汉族占94%，是压倒优势。而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50~60%。说中国地广人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在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要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

七、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将来也可以如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发表意见，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团结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就是那些骂我们的，也要养起来，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党的领导，但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了，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早消灭它们。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需要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2/3。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同他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了。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1951、1952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不多说。关，即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即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即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把捉起来后表现好的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人，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已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后，还要继续清查。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只要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90+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另一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那就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不杀方针，不妨碍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有自新的机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工作，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队伍甚至领导机关，那会造成严重危险。

九、是非关系

党内外都要分清是非。对待犯了错误的人，正确的态度应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还要帮助他们改。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屡教不改的，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病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把尾巴翘得高。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帮助态度还是敌视态度，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提出向外国学习，是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无论何时，每个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各方面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已经不要了，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分析，完全以“风”为准，墙头草一样，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很高的人，一下子又把他贬到地下。我们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的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列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经济界，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学过来。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翻译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很多地方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1949，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30+年。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富强了，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但是，像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

##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7.14）

这是毛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的一部分。

美国为着侵略，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

美国到处欠账。全世界，包括英国，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

东方各国，全都受到美国的侵略，有些还是美国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在座的有清朝出生，有民国出生。

清朝早被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翻了。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他多次起义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清朝。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

推翻清朝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没有满足人民要求，比如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就败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

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大。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尔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党合作，把袁世凯留下来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蒋统治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22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原先有五万多党员，经过反革命的镇压，只剩下一万多党员。敌人到处捣乱。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时，日本很强大，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到了偏僻地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只能在敌后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但法西斯，也是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被赶到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和党。向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八国联军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的军队发展到了九十万。然后是解放战争。我们的枪炮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四百万，打了三年，累计起来，被我们消灭了八百万。在美帝帮助下的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外表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

由此，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一个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美洲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为了反对美帝，中南美国家的欧洲移民要同本地印第安人团结。从欧洲移入的白种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是统治者，另外一部分人是被统治者。这样，这一部分被压迫的白种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因为所处的地位相同。

我们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亚洲非洲的朋友，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上，我们同你们性质相同，只是地区、民族、语言不同。我们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我们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全世界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8.30）

今天开八大的预备会议，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

现在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这次大会，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会给全党一个推动力，工作更好。

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过去有些外国同志不了解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太了解我们的整风运动。

现在，可以说一般是了解了。当然，还会有些人不了解。在国内，甚至在党内，也还会有些人不了解，认为七大以来的路线不见得那么正确。

但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七大以来的十一年，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甚至连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在世界上是个新鲜事情。对这个革命，国际资产阶级骂的多，总是说不好。

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

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他就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让美国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

过去说中国总之是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改革，我们把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是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要对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说服、团结，使他们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

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90%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

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还有许多毛病。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好好改进这方面。

在国际上，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苏联，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

这次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参加大会，这是好事。过去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两个革命的胜利，没有建设的成绩，现在外国同志对我们是比较尊重的。

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

六亿人口的国家，只有我们一个。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在日本人手里。蒋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

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

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将完全改变过去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美国只有1.7亿人口，我国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没有理由赶不上。这对于全人类也是一种责任。（数据略。）

第二点，关于继承党的传统。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所谓犯错误，就是主观犯错误，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犯错误，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

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实际。

同时，要根据过去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

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90%+，一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主观主义到处都有，且将来还会有，就要犯错误。

还有另一个叫宗派主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

现在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什么人，只要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用处，就应该团结。

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何况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

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的主流是正确的。

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可以学。但要学的是先进经验。有一些人，连苏联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所以，要加以分析。他们主要的是好的，部分的是错误的。

我们也有部分的东西是不好的，就要丢掉，更不要别国来学这些坏事。但是，坏事也算一种经验。陈独秀、李立三等，都是我们的教员。

此外，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一教，就说服了。蒋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教育、借鉴作用。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即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他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

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我这里是讲打得不对的，斗争得不对的。如果那些人后头改变了态度，承认打你打错了，封你为机会主义王国的国王是不妥的，只要有这一条就行了。

如果个别的人还不承认，也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

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缺点大的。比如，现在党有许多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人，他虽然没有跟你交过手，但因为他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势必不很妥当。对这一部分人，要团结、教育、帮助他们。

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且要帮助他改。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第三点，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七届中委是七十七人，这次加一倍多一点，这样比较妥当。等几年，比如等五年，那个时候再来扩大，比较有利。

现在，很多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时期培养的，是现在工作的重要基础。但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中央提的人数究竟妥当不妥当，请同志们考虑。

应该肯定，上届中委是做了工作的，没有辜负七大的委托。在十一年间，正确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正确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大毛病，并同各种机会主义作斗争，同错误东西作斗争，克服了各种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建设的因素。

他们是有成绩的，其中也包括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这是讲中央委员会的整体。至于个别同志，就不能那么估计。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我们说，你讲一讲你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

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大选举他们一样。七大时，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就是走他们的路线。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或跟他们作过斗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比如富裕中农，无论哪个革命，总是动摇的。他们看到的是他们那一点小财产，患得患失，生怕失掉。这种人跟贫农不同。中国的贫农在北方占50%，在南方占70%。

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千万党员，大中小知识分子约占一百万，把他们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主要代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拿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当然，陈独秀也有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张国焘搞阴谋，搞分裂，跑到国民党那里。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

所谓机会主义，哪里有利就干哪里事，没有一定的原则、章程、方向，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很“左”，后又很右。

七大时，选举了王明、李立三。七大后这十一年来，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有什么损失。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也不会得到奖励。七十几个中央委员，他们并不故意犯几个错误以便再当中央委员。

没有当中央委员的，也没学他们，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更谨慎一些。

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则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是正确的或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从另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

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

问题是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就舒服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他们改或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

正如我们在土改对待富农一样，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一样，那党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可以说没有。

##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1956.9.25）

这是毛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美帝是你们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距离很远是一种因素。但美帝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中国过去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我们的情况很接近。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同盟军。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严重封建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因为有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胜利。我国更如此。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人口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

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知识分子下乡找农民，如果态度不好就不能取得农民信任。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农村、农民不大了解，解决农民问题总是不恰当。

根据我们的经验，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使之相信我们是为他们的好处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切记不要以为帮助一下农民，农民就会信任。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同盟军。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亚洲有些国家的党，农村工作也没有搞好。

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知识分子气，轻视农村，不愿去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党当时也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有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要感谢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十年的内战，就非得研究农村。这个时期，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带来很大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第三个时期，就是抗日时期。同国民党停战，同日寇打仗。这时我们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先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方针，又执行了最右方针。他也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党。

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李立三，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经验。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找到了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在第四个时期，把蒋打倒，建立中国。

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参考，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经验。任何外国经验，只能参考，不能当教条。一定要把马列主义和本国实际相结合。

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几个农村，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麻雀虽然很多，但解剖一两个就够了，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心中有数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

很多国家的党，总书记不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对农村懂一点但不深刻，发出的指示不很符合农村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

调查有两种方法，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花太多。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就走，这是很不够的，必须用第二种方法，走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你们的国家大概都有的。

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走狗，革命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英法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最主要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和亲日的。抗日时，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寇及其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势力。

地主阶级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小地主。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

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冤家。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鉴于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此人民才能解放，因此，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和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他们又是压迫和剥削工人，因此我们要同他们作斗争。但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要有理有利有节。

为此，要调查双方面的情况，工人、资本家。只了解工人，不了解资本家，就没法同资本家谈判。在也要作典型调查，解剖一两个“麻雀”，也要用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个方法。

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时期内，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你们现在还没有取得而准备夺取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又团结、又斗争”。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斗争。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

这两种错误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又团结、又斗争”政策，斗争必须斗争的，团结可以团结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帝胜利。

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党多么爱国、爱团结。这样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损害的同时也在教育。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 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11.12）

（如题。孙对于当下的历史意义。）

##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11.15）

### 经济问题

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退、动静，都要按照辩证法。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有条件的，随后就变为不平衡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有条件的。这样，我们的经济问题，应当告诉干部和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是波浪式地前进。

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根本上还是促进的。前进、发展是个总趋势。

前四年的情况表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是难免的，因为缺少经验。将来有了经验，还会犯错误。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也行，但也要承认我们还有点不行，因为有一部分自己还不能设计。

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有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设施没有相应搞起来。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正确，现在可以作点结论，明年也可以作点结论，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结论。这里不犯一点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同时也是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有人曾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时有个“促退委员会”。后来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来一个促进会，一促进就很快。

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虽然毛病不少，但比促退会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救灾也方便。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和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要向群众解释清楚。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即，中央委员会和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这样就都能了解预算内容。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就是举手，但是不甚了了。三榜定案，也不见得十分懂，还是跟经手的同志有距离。但我们看久了，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有些戏，人们看不高兴，就必须改变。所以，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我曾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的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

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大家都说是可靠的。现在看来有1/10-不可靠。所以，以后要注意项目安排得好不好，要靠专家，也要靠我们，特别是省一级的同志注意。当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这个问题相当大。

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时。

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都过来了。部队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这样，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片面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很少宣传勤俭建国等，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的。至于大的，比如宣统皇帝、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不杀掉那些小的，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

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 国际形势问题

国际形势总的是好的。

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东欧、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是坏事也都是好事。马克思主义看来，坏事有两重性。凡是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纸是包不住火的，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

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时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

生产关系不对头，就要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人和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劳动者手里有工具当武器，没有工具的用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纠纷。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阶级消灭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会有斗争。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不好的人上台。

### 中苏关系问题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也有不同。民族就不同。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举例略。）有些同志不讲辩证法，不分析，硬搬苏联一切东西。

我们中有没有里通外国的人？我看是有的。

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破坏两党两国关系。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列宁、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

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不那样丑化、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即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

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中国。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自食其果。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我们是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 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发动群众斗蒋；土改斗地主阶级。那都是大民主。

“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人，“五反”是斗资产阶级。都是群众运动和大民主。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示威，在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付资本主义的。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性质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

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

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

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群众反对他，打锄头，是该当，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党要得到教训。学生上街，工人上街，有那样的事情，要看成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同群众的矛盾。

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压群众，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害怕的：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

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出现这种坏情况，我也高兴。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攻，我就守。

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打垮。就算跑掉十个达赖，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不爱你了，他想跑，就让他跑，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

党是被人家骂了35年的。加一个达赖或什么人，有什么要紧。一个人怕挨骂，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

东欧一些国家不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这样一套干部。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改。

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

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以后分期退还，或实在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给他楼梯，让他慢慢下楼。

对于其它错误，也是这样。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

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而不是武力解决。主张和风细雨，当然个别人也难免激烈一点，但总倾向是要把病治好，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内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成为模范的。1949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有位将军主张军队增加薪水，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

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但根本是要提倡艰苦奋斗，这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自觉性上。这是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它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1）

一、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应当抓住。这里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种问题是党内的。比如，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他们不是比艰苦，而是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注意。

农业合作化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丰收的地方和重灾区都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想的太好，实际没有，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说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到处挨骂。有些党委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和下面的负责干部都泄了气，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气好办，报纸宣传转一下，专讲合作社优越，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干部中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值得注意。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单干思想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政军民各界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经验少，一有点风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比较好的，只要拿出其中一个，就可以把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能别的就不能？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

学校里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党是法西斯。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

高等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不到20%。这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部分大学生中，哥穆尔卡、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时没有闹乱子，对此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难说不起变化，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某些教授，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党呀，不要社会主义等。他们有这么些思想，过去没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之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欧洲美洲有些党影响和损失相当大。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的人也积极反对。这些人不讲马列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列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个大弯。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正常的反映。但少数党内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就跟着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后头帝国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不吭声了。但本心还是想吭声的。

风一刮，动摇分子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像稻子，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国内国际的思想、政治的风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其中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精神方面，还是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有这样典型的人。这类事情没有结束。十年后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是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地广，但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生产价值更大，生活必需支出也更多。农民生活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发放农贷等等。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8%，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1955年上，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像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江苏作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30%人替农民叫苦。后一查，这些人，大多是家里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有点，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七年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而在我们手里。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所以，也不能说城市政策右了。

农村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没有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无非是少数人闹，要搞所谓大民主，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我并不怕。说来一个大民主，一不怕，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做什么。那些坏人搞所谓大民主，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党和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宪法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就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还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就把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我们从来不怕帝国主义和蒋。现在大民主也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不敢改造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呢？

百花齐放，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不去锄杂草，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党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不管多少年还是会有。

总之，去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激烈。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

二、

现在讲几点意见。

### 1、要足够地估计成绩

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估低了就要犯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可见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

### 2、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这是历来的方针。延安时就采取这个方针。1944.8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时我们向蒋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员都包下来，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进学校，或到农村，或到工厂，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方针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比起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什么叫千方百计呢，现在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 3、国际问题

中东出了个苏伊士运河事件。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手里去了，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这一回冲昏头脑犯是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不是对埃及。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那里冲突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即美英、美法间的矛盾；二、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间的矛盾。三种力量：一、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二、二等帝国主义英法；三、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有武，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但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时间。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中美关系。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的信，主要是给蒋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就是有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希望我们出乱子。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后17年。1929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1933。这年希特勒上台，罗斯福上台，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三五计划完成后，即经过18年或更长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国际舆论上，就越孤立。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打扫干净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二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是。但我们好一点。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我认为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他们要考虑。

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就有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和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最好是臭骂一顿。利无非是多少的钢、煤、石油。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点东西，就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无非是挖了点东西，变成钢材之类，这没什么了不起。可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的时候，就去臭骂一顿。这回恩来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何时，都要谦虚谨慎。对苏联还是要有选择地学。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也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只到一个地方，就单调了。

### 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个方针，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提出来的，是对的，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的东西见面，这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都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在座同志，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的书，这些反面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东西作过斗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有些党员、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全盘否定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事物的联系，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1/10，留下来的9/10，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1/10，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非黑即白，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使党内外都能看到。这是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面前来锻炼。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不同，我们是在“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

对于有害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反驳。比如《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是用“难免”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准备及时反驳。我们搞革命和建设，难免要犯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小。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民主人士中，青年学生中，凡是歪风，即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充分准备，有把握时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次。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只能处被统治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 5、闹事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有各种对立的方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则相反。

学生中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

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哪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

总之，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对立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党历来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也不怕学生、农民闹事。对群众闹事，只有蒋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今年也许会太平。但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大乱子，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当然，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或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再一个，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但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搞得不好，历史走点回头路，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国家只会更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一是不提倡，二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硬去阻止，那不好。谁想闹谁就闹，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这就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改正；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有道理是应当闹的；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不要轻易使用武力。段祺瑞“三一八”惨案，就是开枪，结果把自己打倒了。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也不要捉、关、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邓小平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怕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干净了。但不得人心。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在别的地方就业。这种人代表反动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是爽快，但没有尽量利用反面教员的作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不这样做，就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对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那一类人，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他们就越孤立，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使有些同志骄傲起来了，突然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他还是没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问题提出来，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就跟宗教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了。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值得研究。就我国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错误和缺点。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就很危险。现在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二战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都不讲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一、必须减人；二、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希望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要找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请下面的人上来。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出大乱子还不晓得原因。现在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根本不知道，然后就措手不及。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基层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情况，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才能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 6、法制问题

*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民主人士守法。
* 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 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总是要挨骂。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 7、农业问题

要争取今年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巩固。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1. 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以及其他日用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3600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约800亿斤，不到1/4，3/4+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2. 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农产品发展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3. 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轻工业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
4. 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5. 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6. 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一定意义上，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请大家议出一个适当比例。目的是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竭泽而渔，对工业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2.27）

1957.2.27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经修改和补充后，发表于1957.6.19《人民日报》。1994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讲话分为十二个小题目：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肃反问题。三、农业合作化问题。四、工商业者问题。五、知识分子问题。六、少数民族问题。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九、少数人闹事问题。十、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十一、关于节约。十二、中国工业化道路。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讲话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指出，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今后主要是正确划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法、方针和政策，主张在处理敌我矛盾时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叙述方便，分为12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 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国家现在空前统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迅速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一去不返。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这并不是说社会里没有任何矛盾了。还有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正确地认识这两类矛盾，应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和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及其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容。以我国说，抗日时期，一切抗日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寇及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时期，美帝及走狗国民党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现时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中，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中，除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各个革命时期有不同内容。现时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中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又有妥协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又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或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政策，则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说，前者是分清敌我，后者是分清是非。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这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专政的作用：

* 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反革命分子并判罪，在一个时期内剥夺选举权、言论自由权，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
* 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此时，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矛盾的任务。

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专政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来行使。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有些人希望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反对人民政府。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对付人民政府，使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另有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要求抽象的自由民主的人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说，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即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应片面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且是有害的。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否则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1942我们曾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解决矛盾，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党内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时，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1942整风时采用的。经过几年，到1945中共七大，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就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得到了成功。这个问题，在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1927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解放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方法。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内部矛盾。

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如果处理得不适当，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暂时的现象。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范围相当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起作用。这是一种特殊、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决不能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共忠实地遵守马列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人民民主专政下，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方法。这个意思，在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1950.6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基本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个新问题，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更尖锐，人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注意人民内部矛盾。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肃清反革命分子时，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现在也还有。错误没有扩大，因为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中，都普遍存在。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性质不同，矛盾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具体事物，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暂时、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对于许多人，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懂得采取正确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否则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解放前后的产值差距是巨大的。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我国生产力突飞猛进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敌人也必须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只是刚刚建立。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完全解决。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它又还很不完善，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各种矛盾。当然，解决这些矛盾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需要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时常经过国家计划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局部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欢迎新制度，但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对一些具体政策，应继续考察。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这时，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经济，发展文化，使全体人民顺利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新制度，建设新国家，就十分必要了。

### 2、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把广大群众认为的敌人，当成是朋友。“左”倾思想的人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把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

为正确地估计肃反工作，不妨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后，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没引起什么风浪。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而是由于我们有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党、解放军和劳动人民。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帝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这是完全必要的，是广大群众的要求，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否则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1956年后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错误的，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会少些、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的错误，都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对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时，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但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对于健全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是：还有，但不多了。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不合事实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必定要乘机捣乱。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丧失警惕性，就会吃大亏。但就全国来说，确实不多了。

### 3、农业合作化问题

五亿农民的情况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关系极大。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解决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毛病有些，基本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去年的灾害比过去几年都大，但是全国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些人却在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一股小风。会上发的文件里有一个材料，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救济。经过四年奋斗，绝大多数社员成了余粮户。这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也应该能做到。由此，说合作化不好了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占农村人口70%+。其余人大多数也寄予希望。只极少数真正不满意。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全体，这就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风。

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约需五年或更长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现在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历史。依我看，一五计划建成合作社，二五计划得到巩固，就很好了。

合作社正在经历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矛盾需要解决。

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此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三者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调节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

* 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压迫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生活水平都低。要有几十年艰苦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这样说“苦”就恰当了。
* 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改善了工人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都已有了些改善。农民免除地主剥削，生产逐年发展，农业税并不重，国家也从农民手中以正常价购粮。

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800+亿斤，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生活费又低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 4、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1956完成。所以这样迅速和顺利，是和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还要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但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不用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缺点，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些进步，即每年都在改造。我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书本上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主要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的。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这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由剥削者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即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那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并有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改造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 5、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过去七年已有显著进步。他们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正在增多。知识分子中有些人仍怀疑社会主义，但只占少数。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凡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关系，使之积极发挥才能。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必须改。

广大知识分子虽已有进步，但不应因此自满。为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消灭，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有了改变的必要和可能。但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很长时间，不能急躁。必定会有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对此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最近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好像政治、祖国前途、人类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除学习专业外，在思想、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积极效果。但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党、青年团、政府主管部门、校长教师都应该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使全体青年们懂得，国家现在还是很穷的，短时间内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实现还要靠辛勤劳动。

### 6、少数民族问题

少数民族有3000+万人，虽只占全国总人口6%，但居住地区广大，占全国面积50~60%。所以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则应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从前大有改进，但仍存在尚待解决的问题。在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存在。经过各族人民几年努力，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已经基本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时机，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时，才能作出决定。现在已决定在二五计划不进行改革。在三五计划是否进行改革，看情况。

### 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有些人办起事来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要扩大眼界，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这是客观存在，是我们的本钱。人多是好事，也有困难。各方面事业都在发展，成绩很大，但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这就是矛盾。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哪方面的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出发，就实际条件，同各方面协商，作出适当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推出门外了事。这样说，不是要把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由群众直接想办法。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 8、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几个口号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只允许一种风格，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和错误的东西，需要有考验的时间。新的正确的东西，开始时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好多了。但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有意压抑，只是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保持慎重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作结论。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开始时受过种种打击，现在还在继续受打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曲折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或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将来也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当某种新的真理被普遍接受时，更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胜负斗争，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就要犯大错。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势。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党有力量和威信。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把祖国建设好，已得到巨大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懂得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

马克思主义虽然已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但仍可以对它加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是不怕批评的，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唯心主义者、抱着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批评和斗争中，锻炼、发展。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能增强免疫力。温室里的花不会有强大生命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会加强而非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于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剥夺言论自由就行了。但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方法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出来的，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批评、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不应压制，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批评。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能让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但批评不应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反对一切毒草，但必须谨慎辨别真的毒草和真的香花。

在批判教条主义时，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比教条主义的危险性更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也在攻击教条主义。但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后，社会上还有部分人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其他的人都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看法。我们以为，辨别是不是“香花”，根据宪法的原则，根据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政治主张，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1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2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3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4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5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6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而不是妨碍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不赞成的人仍可以提出意见来辩论。但大多数人有了明确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轨道，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言论行动是否正确。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还需要各自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并不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

以上所说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不应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之所以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1950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和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能否够长期存在，还要看其是否取得人民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让民主党派监督党，是因为党同人一样，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主要监督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有益。当然，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只有在合乎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下，才能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党一道长期共存。

### 9、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1956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闹事的直接原因，是一些物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有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1956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人民曾怎样经历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去解决，闹事总会造成损失。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决不无故闹事。但并不是说已经没有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应当注意：1为根本上消灭闹事的原因，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就不会发生闹事。2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就应当把闹事群众引向正确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处理闹事过程中，不要用简单方法“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不应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克服官僚主义。

在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破坏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不应放纵他们，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不然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 10、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但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但它也有二重性。匈牙利的同志们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1956下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教育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党的人数减少，当然是坏事。但那些动摇分子退走了，大多数坚定党员更好团结奋斗。

总之，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谈论三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的。但如果帝国主义开展，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反对、不怕。一战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二战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三战，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转到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剩下就不多了。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全无所有，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 11、关于节约

要进行大规模建设，但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一个方法。

在1952“三反”运动中，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反对贪污。1955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过高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以及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必须逐步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为骨干，否则不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在去年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持久地进行。总之，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不但经济上，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许多工作人员中，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大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很大的矛盾。要富强，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 1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这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80%+，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能为重工业积累资金。轻工业和农业有密切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还没有使人们很清楚。但随着农业技术改革，农业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二五和三五计划期间，如果农业能有更大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发展，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能使重工业有市场和资金。这样，看起来工业化速度似乎慢，但实际上不会慢。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产量仍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1943的90+万吨，发展到2000万吨。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还缺乏经验，才进行七年。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取得了经验才有全国的胜利。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的经验，比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代价。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人同不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变为工业国，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40+年了，经验宝贵。苏联肯给我们设计和装备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同盟国。除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一些帮助。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好经验都要学。但主要还是苏联。而学的时候也要批判地学，不能教条主义。

巩固同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帝国主义国家，也要正确和平共处、团结那里的人民，但决不可怀抱不切实际的想法。

##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12）

第一点：

现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时期都是大变动。但就性质说，现在比过去深刻得多。

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各阶级相互关系都在变化。农业和手工业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存在决定意识。不同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对于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不同反映。

广大人民拥护，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唯一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伟大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大变动。

应该说，情况基本是健康的。但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建立，需要巩固。为此，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但社会主义新制度一定会巩固。

第二点：关于知识分子。估计，各类知识分子，约有五百万，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愿意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还是爱国的。只有极少数是敌对态度，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就会兴风作浪，顽固地走资本主义路线，但在事实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各界都有，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约战1~3%。

在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说：约10%+的人，包括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这些人是少数，但他们是核心。多数人学了点马克思主义，但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摇摆。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是占极少数。这种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会有的，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部分唯心主义者，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能有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是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工作就不能做好，所以要团结他们。

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社会成员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

在为旧中国服务时，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

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科学技术人员、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

在社会制度大变动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些马克思主义教育，大有进步。但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

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并没有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工人和大多数农民还动摇和暧昧。

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

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要使思想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较多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人，也还要学习。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头脑里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

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工人、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向学生、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

在知识分子中，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方式而非强制方法来帮助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不好。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去接近工人农民，去看看，甚至去住一段时间。

有些知识分子本来就生活在工人农民中，例如农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要把接近工农群众，造成一种风气，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

当然，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去。也不能一下子都去，可以逐步分批地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延安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我们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效果很好。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时，知识是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但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有的人就没有收获。

这中间有一个立场或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立场不同，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话向他们讲。

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就可以把从书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的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在解放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

现在党中央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强迫。这一次主要批判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发扬优点和正确。

整风中，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

我们还有缺点。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

我们的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和错误也不少。因此要整风。自己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不会使党丧失威信。相反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

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工作就会更加主动、做得更好。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旧中国禁止讲改革。但那时，一些立志改革的人无所畏惧，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政权的建立不过几年，但各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要使几亿中国人生活好，建设成为富强国家，是艰巨任务。建设新中国，仅依靠我们还不够。需要党外的志士仁人，能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所以要不断整风，不断把错误东西整掉。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勇敢负起责任，不怕挫折，不怕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党提批评建议。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工作的看法，肯定或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

对于片面看问题的人，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帮助。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经验来观察、处理问题，发表意见，难免片面。但可以要求逐步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停滞了，就是肯定片面性，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

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当自己写文章时，不要老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上面讲了，片面性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人必须全面，会阻碍批评的发展。

但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短文也好，包括杂文，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就是因为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也很尖锐，但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也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当然要分清敌我。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

有人说，不敢写文章，怕得罪人，怕受批评。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正确意见。如果写错了，有批评就可以帮助改正，这没什么不好。

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长期的方针。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批评、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的相互争论和批评；对于错误的意见，以理服人。

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

采取放的方针，有利于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上面说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

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压制的办法，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过程。

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就要学习。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可以少犯错误。

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斗争中，就会明了。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形式不同罢了。

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且只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

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党、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错误的东西总会有，并不可怕。

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有些同志心里很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禁止人接触不好的东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并不奇怪，也不用害怕，这可以使人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已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在政治和思想战线方面，还没有完全胜利。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胜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是错误的。

凡是错误思想、毒草、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任其自由泛滥。但这种批判应是充分说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不应是粗暴、官僚主义，或形而上学、教条主义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但往往忽略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二者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

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违背。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

现时情况，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批判修正主义。

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但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已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

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和研究，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不但要有党内同志参加，且要有党外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

##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3）

一、

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

这次整风，就是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发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

因为革命胜利了，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穿，争名夺利。打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这也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党就是要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二、

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热情。

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少应当工作。

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官兵、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

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它一些制度，但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

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

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它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

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多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

因此，靠正确，不靠资格。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要向新干部学习。

## 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5.15）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党内如此，在整个人民内部也是如此。

党内，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也有缺点但不严重。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又有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比较危险，其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现在应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是马克思主义，或是修正主义。就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

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过多责备下级。

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更多），其中部分确实有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必要的但不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

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号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70%，左派占20%，右派占1~10%。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最坚决最猖狂，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些人是动摇的，可左可右，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社会主义，对于各界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只是反对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党、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确是右派才扣上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

所谓1~10%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实事求是，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总是留恋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格格不入。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比解放初期进步多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

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就不合作了。他们违背接受党领导的诺言，企图摆脱。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改造就是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包括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是恶意的，怀敌对情绪。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这是料到的，也是希望的。毕竟多数是好的。

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企图，不顾一切。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右派有两条出路。夹紧尾巴，改邪归正。继续胡闹，自取灭亡。

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党领导。

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中国没有他们的位置。

大量的反动言论允许登在报上，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以便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我们早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凡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后还是这样。没有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妄图灭掉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它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多少时间才可以完成整风？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

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957.5.25）

（如题。）

##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957.6.8）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约15天足矣。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叛变或动摇。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

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几%，最疯狂的不过1%，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

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和党进攻，切记不要上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巧妙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很有效。

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让群众反驳。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登在报上。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员及学生大吐毒素。他们是最好的教员。

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错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

同时组织党外人士讲演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一半是假主动。

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开始有了主动，因为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党内外的大战，打胜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否则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

现在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只溃乱一小部分，正好挤出脓包。

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957.7.1）

自本报编辑部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批判了错误方向，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

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编排技巧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当然是好的。但还觉不足。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改，是勉强的。

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

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民盟在百家争鸣和整风过程中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这次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犯了些错误，我们表示欢迎，但是不够的，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

“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不是这样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进攻，和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党，以便取而代之，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央指示，正是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牛鬼蛇神“大鸣大放”，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就是说，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分区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不可避免的。只能因势利导。反动的阶级敌人自投罗网，因为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党马上完蛋，这就是章伯钧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按上述反动方针行事，欺骗人民，好像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

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

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和言论。新民报不同，它则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一发现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其负责人和记者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

欠债是要还的，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文汇报处完全被动地位。

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党、青年团里也有，这次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累戒不戒，继续破坏，那就要办罪。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就更要宽大些了。

错误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但应允许保留意见。上述各种人，仍允许有言论自由。

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后，不会有什么害处。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

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7.9）

要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

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不是狡猾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

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坚决的骨干分子，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50+人。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让那些毒草长嘛，怕什么，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

党里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这些同志是为党为国的，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

右派只有极少数，学生的情况上面说了。教授、副教授，就不同一些，右派和左派都有10%，旗鼓相当。中间派80%。有什么可怕呢？

总之，无论何地，90%+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

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烧起来，90%+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烧好。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有点错，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要定期“放火”。

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真正要锻炼了，就吓倒了。这一回就是一次锻炼。

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攻击我们。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

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也是一种锻炼，给的教育最大。每处都有一些右派要打倒我们，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右派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这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末起，直到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还是可以打。

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对我们的、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七年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就还差些。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制度的改造、人的改造。

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属于意识形态。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话不对。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反映阶级关系。

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的人，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

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党。这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时，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只听不说，不通知团员、党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

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里就有敌人。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这叫做“起义分子”。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敌人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

这一回崩溃了多少？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5%，团员更多。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不管多少，总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

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那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

但现在的情况变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或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份也有，但政治斗争占主要成份。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

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时间。右派言论尽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

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我们提倡和风细雨，他们说，和风细雨天天下，秧烂掉，不如急风暴雨。

有人说，党不公道，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整自己就和风细雨。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好像是我们报复他们。

这时，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现在是暴雨天，之后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中国历来如此，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寇是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没有他们，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

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的话，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

总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毒草还是要出来。右派不怕锄，因为讲话那时只说不动手；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是香花，我们是毒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牛吃草一样，先吞下去，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

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好东西，要传下去。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

相信多数人是站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

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

这一头是无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

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像，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糊涂了。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还有一些别的报纸。

有一个时期，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注销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它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

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深刻教育。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把学校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非常怕改造，说改造就出“自卑感”，越改就越卑。这是错误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

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

我看，多数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只要过两三年，，官僚主义又来了。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没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

现在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条路线的问题。是走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什么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党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

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火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

领导下基层，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相信中国人多数是好人。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

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怎么尖锐，没有罪。现在是我们给右派穿小鞋。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就像游泳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

群众也可能犯错误。犯错误的时候，要好好讲道理，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不要脱离他。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但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1帝国主义所有制；2封建主义所有制；3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4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5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

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附在后两张皮上。现在“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

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工人、农民给饭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教的东西不好，就要辞退。

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要回去，但几张皮没有了，回不去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

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

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克草，风吹两边倒。

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

蹲在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

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

对右派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打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打得他回头。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

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

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不愿意改，也就算了。

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就让他带到棺材里去。

##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7）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是为了争取中间派和分化右派。最后不能转变的顽固分子，只要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点事做，也不剥夺公民权。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应当看远些，几十年后，将会看到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

总题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外一起开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错误登报批评。

各党派，各界，各阶级，都应当分期分批逐步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和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有这样的不同，还通用整风这个口号，是因为这易为多数人所接受。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

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这里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开除，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信任多数群众，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之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和接受改造的。

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犯过这错误，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自己力量，不要夸大敌人力量。

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应分别对待。

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

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需很长时间才能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

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勤俭持家，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做工作。最近几年，350亿斤征粮和500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

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能逐年增加。

如果850亿斤粮食收不到，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无法应付紧急情况。今年秋收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严重罪犯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

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否则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和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

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反而怕老百姓？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

党员一定要有朝气，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要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累戒不改，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地县区的党委书记，在半年到一年内，要求亲身研究合作社、工厂、商店、学校，取得知识和发言权，以利指导。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

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党不心服，其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较量一下。他们失败了，才懂得大势已去。只有这时，他们中的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老实，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

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警惕，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可能还要延长10~15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此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胜利。但还需要几个月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革命和建设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

苏联在二十年代曾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10~15年的比较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应当在今后10~15年内基本上解决。10~15年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8~10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都要懂得这个任务，努力学习。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

这是历史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使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完全掌握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各界的政治改造和思想改造工作。

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学家和技术人才、文学家、艺术家，要有自己的报纸和刊物。书记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只要有了倾向，就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的。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和广大人群，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就一个单位来讲，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 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10.9）

这次会议很好，有省委和地委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是大国，工作复杂。去年没开，就吃亏，右倾了。前年高涨，去年就松劲。

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彻底地放和改。要有这样的决心。可以不加反右派。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现在重点是基层即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有些部门还要放，但重心是改。

今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和群众斗争的形式，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不能产生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现在许可了，适合现在群众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抓住这个形式，事情好办多了。各类问题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

党有民主的传统，否则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形式。延安整风时，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改时，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军队里，连长给战士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还要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才能产生，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现在这种形式传下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这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集中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数量少，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现在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作修改。在农村中组织一次讨论。省地县区乡社，六级。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因为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各级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

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

中国就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高产国家。

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

请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合作社、家庭都有积累，就富裕起来了。不然都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5%公积金、5%公益金、管理费外，生产费占20%总产值，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20%生产费。

别的省的同志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各地要结合自身情况。合作社管理费，有些地方比例太大，应当缩小。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应当教育每个人，要有远大目标，有志气。吃光喝光，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

红白喜事大办酒席，实在不必。要改革这旧习惯。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没法禁止，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除四害，讲卫生。只有十年了，今年准备、动员一下。

这是文化，要大为提高文化。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试点，逐步推广，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一起做，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小块田，试验高产。

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

无论搞哪方面，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是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

真正大红，是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

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

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造出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

过去经常讲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要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究竟哪种好。

这种问题多，就是放不开。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

过去革命，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以抗日时期和解放时期，比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即包括错误在内的。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后，“七大”后，强调学习苏联，是有利的。

在革命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刚开始，只有八年。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应当争取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速度更快、质量更好。

第五点，去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质量好、少用钱；多，就是多办事；快，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自己，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是不切实际的多、快。

我们要尽可能争取多、快，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多、快。去年下半年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曾谈过，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应当是“促进”，而不是国民党的“促退”。去年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

要促退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可以有暂时、局部的促退。但总方针，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当前的主要矛盾。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已经完结。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不对的。七中全会提出，全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事实是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意识地缓和了一下。但是，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他要吹风，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有两个任务：一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二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后，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中间落后。那时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5.1，，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又要缓和一下。缓和不叫右倾。好比开会，一连开半年，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

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农村里明年下半年需不需要再搞一次，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否则，那些老右派，新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只要松松劲，右倾情绪就要起来。军队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否则就松散了。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只要不整风，思想也要起变化。

顺便说点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斯大林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就是各国的事了。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也未必见得准确。总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一、和平，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战争，你要动手，我也动手。第一条，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提过谈判和平。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便于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策略性质的口号。但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则第二条，你要打，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现在有些国家的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

此外，对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是1/3的人民，2/3的反革命。除个别的要法办、劳改，一般不剥夺选举权。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

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一点，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娱乐方面，不好。

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学马列主义，学技术科学、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

总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我们这些人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这不行。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结果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10.13）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区别于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点大字报，但那时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那时，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那时在打仗，阶级斗争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就不好了。现在战争结束了，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

新的革命内容，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找到了这种新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领导的，怕没法下台。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

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

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它的人就不要怕。

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人。

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90~98%。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过去只搞过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

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

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并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但是以后也还会有。

现在，在全国有10%的人是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即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

一、有90%人赞成社会主义。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二、在不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中，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这样的人约有2%，即1.2K万，如果集合起来，那是很大的军队。但不会大乱，因为他们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

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围和阶级，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少，但有广大同盟军，最主要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占农村人口70%+。富裕中农约占农村人口20%。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40%赞成合作化；40%动摇；20%反对。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为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

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全国总人口有90%赞成社会主义。

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再争取8%。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2%，要注意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

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哪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500万人，资本家有70万人，加在一起，约600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3000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

罗隆基讲过，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

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有人讲党不能领导，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党非离开不可。无论哪方面，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

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以说服多数人。

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基础上，在现时，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右派也可以搞，“大”字就是他们发明的。

我在今年2.27的讲话中， 并没有讲什么大鸣， 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谁都可以用。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因为90%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10%不赞成者中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对的只有2%。所以其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想通了，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90%赞成社会主义，可能争取到98%；另一方面，10%不赞成社会主义，其中只有2%是坚决反对的。只有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和波兰那样的事件。

不需要像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那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

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说过，乱不了，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解放以前只有400万产业工人，现在是1200万工人。工人阶级虽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它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

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要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进了工会并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有的人进了党，他还反共呢。因此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整改、学马列主义，和风细雨，开小组会，批评和自我批评。

今年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

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受不了。

那时候右派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90%+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

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

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

我们不是讲过吗？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它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逼得老知识分子非前进不可。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它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党领导等问题。

我在4.30讲的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

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

现在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都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即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

五张旧皮没有了，毛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新皮。不愿接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蒋天天反，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接受马列主义，把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

把大字报一贴，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很有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列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有的右派估计到了这单，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很正确，不能老反右派。

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总不能天天同他开会。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不理，看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右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敌对力量。但现在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提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

刚才讲分两种人。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的，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

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高兴，他就买来吓唬农民，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

美帝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讲过，不怕乱。美国占领半个中国也不怕。日本就是这样。我跟日本人谈过，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全民族，提高了人民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

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不赞成。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也不能当了。

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也不好。比如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的，教授也不能当，学生不听。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

这些问题都要考虑。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请诸位议一下。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很少。

这次整风，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都看得见底了。

现在，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

有些问题如合作化就基本解决了，相应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

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范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

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把它改掉了。后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除四害是一个大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就有很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国家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增加，（数据略。）

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完全错误。他们没有信心，因为反对社会主义，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是完全有信心的。

## 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1957.11.18）

这是毛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就要团结。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即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就算这十二国宣言，几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

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陈独秀、张国焘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希特勒、蒋、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就同美国人妥协了。

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

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两个或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60+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列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

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列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否则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

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

我建议，要在各国党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时，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优点和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57.11.18）

这是毛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节录。

1946蒋开始向我们进攻时，许多同志一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

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现在看都倒了。美帝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

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一定要藐视它，否则就要犯机会主义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一定要重视它，否则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打仗只能一仗仗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消灭。

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 第六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1965）

[https：//www.wmjy.cn/search.aspx？searchtype=0&Keyword=%e3%80%8a%e6%af%9b%e6%b3%bd%e4%b8%9c%e9%80%89%e9%9b%86%e3%80%8b%e7%ac%ac%e5%85%ad%e5%8d%b7](https://www.wmjy.cn/search.aspx?searchtype=0&Keyword=%e3%80%8a%e6%af%9b%e6%b3%bd%e4%b8%9c%e9%80%89%e9%9b%86%e3%80%8b%e7%ac%ac%e5%85%ad%e5%8d%b7)

##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11）

（略。）

##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1）

1. 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可以掌握全局和细节；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
2. 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3. 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4. 如何评比？同类型和同类型比，例如县和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5.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文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6. 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
7. 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8. 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9. 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10.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永远如此。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评比不仅比经济、生产、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
11.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过去的部分规则可能成为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应总目标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上级单位应当派遣专员到基层中总结是哪些规则正在阻碍进一步的发展，并与群众进行讨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对旧规则进行增删改，并对新的规则进行总结、汇集、上报，再由上级单位进行讨论、试验、推广。
12. 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缺点和错误。
13. 上级单位的领导，除实际情况不适宜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14.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15.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
16. 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策。
17. 不必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18.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19. 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20. 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21. 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22. 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23.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王明路线，就是如此。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24. 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要经过反复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干部中还有不少人不明白：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25. 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1概念不明确；2判断不恰当；3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4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26. 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27. 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学点外语。
28. 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 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4.15）

（略。）

##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5.18）

（略。）

##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958.6.17）

（略。）

##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7.22）

（略。主要讲了中国和苏联的冲突，在外交上的谈话。）

## 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1958.9.19）

（略。）

##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958.10.2）

（略。）

## 告台湾同胞书（1958.10.6）

（略。）

##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1958.12.1）

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只社会现象。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逐渐激烈的斗争，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者，化为纸老虎，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时，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曲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才取得1949胜利。这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但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1956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人，首先是无产阶级，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认识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解决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 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1958.11）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

归纳为下列五点：

1. 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此阶段，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有了一个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是国营工业，以及其他各项国营事业。这还只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而非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2. 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一部分包括几亿人口，主要是农民，还有手工业工人。其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1953~1958的6年内发展到了现在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有可能开始向全民性发展，例如现在出现的县办工业，就带有向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因素。但尚非全民所有制，可以称为县民所有制，即所谓小全民所有制。在全县范围内能够由县调配的劳动和产品，都属于这种制度。
3. 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一)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因此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为全民所有。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除国营企业和其他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已成为全民所有外，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应逐步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产品能由国家调拨的部分，根据国家计划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调拨。
4. 要能实现调拨和逐步增加调拨的比例，就必须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根据国家计划和公社需要，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因此，必须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断提高这两个部类的生产水平。
5. 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

### 公社问题

* 关于公社的性质问题

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

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二、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公社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 关于公社的体制问题：

现有三种形式：一县一社、一县数社县有联社、一县数社县无联社。大家认为，县有联社的组织形式较好，一县一个社可以继续试行，一县数社无联社形式是不好的。

公社内部各级都应当有一定的权力和机动，以便发挥各级的积极性。

各地公社要一律冠以地名。

在劳动调配中，一、必须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二、必须使生产各部门的劳动分配要合理，劳动组织要适当。

县级工会组织取消。县妇联的组织目前暂不改变。

* 关于分配问题：

要在二五计划中的1960年或略长点的时间内，农村人民公社实现每年每人能够分配到150到200元。并逐步提高国家对产品的调拨比例。争取在1967年内达到公社的纯收入的1/3归个人，1/3归公社积累，1/3归国家调拨。

* 关于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应当实行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

* 关于作息时间问题：

在三五计划内，实现六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八小时睡觉，六小时吃饭和娱乐。

在苦战三年期间，在农村中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和学习(一般的时候十小时工作，两小时学习。农忙的时候，十二小时工作)：四小时吃饭和休息，八小时睡觉。

在城市中，一般地应当根据实际条件，尽可能维持八小时工作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加班加点。

* 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营养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为此，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作出适当规定，不可疏忽大意。
* 立即作好过冬的准备。凡冬季在野外工作的必须有相当的宿舍。北方必须迅速解决冬季取暖问题。

### 城市公社问题

1. 采取积极态度，在城市中试行人民公社。
2. 要分步骤地搞，各地进度可以有快有慢。大城市应当放慢。
3. 城市公社必须要有生产基础。没有生产基础，是困难搞好的，即使组织起来，也办不了大事。
4. 城市中在一个时期内，应实行工资为主供给为辅的制度，个人机动多一些。目前不宜过多地牵动城市人民现有的生活习惯和方法。
5. 国营企业和大学校的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所有制，人员的调配)和管理权限不能改变，人员可以加入当地的公社，可以从厂长基金、超额提成、工会费用中拨出一定数目的经费，交纳公社。
6. 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原来这些企业的上缴利润由公社包缴。城市公社问题比较复杂，委托柯庆施[2]同志写一文件，提交武汉会议讨论。

### 要抓农业

抓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抓农业。1959农业的关键是夏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1958.12~1959.3四个月内，必须负起责任，用一个必要的时间抓农业，保证1959夏季和全年的农业继续获得伟大的胜利。争取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

### 工作方法

1. 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了，干部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的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去处理有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严格禁止和纠正假借组织军事化的口号而打骂捆绑群众和任意处罚群众，严格禁止和纠正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用所谓“大辩论”、“辩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来压服群众。
2. 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一定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谎报成绩，隐瞒缺点。无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哪一方面的数字，也无论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应该是多少就说多少。以少报多，怕说缺点的倾向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彻底克服这种不良风气。

### 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1. 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生活水平，不宜改动。定息不宣布取消，要不要听其自便。愿意参加劳动的欢迎，不愿意劳动的不要勉强。
2. 干部待遇问题，涉及面很大，要慎重处理。在改为供给制时，原则是上面高薪的要降低些，其余的基本维持，有升有降。在农村工作的干部的薪给，既要照顾到农民的生活水平而略有减少，又不宜减得过多。必要时他们的薪给可由国家发给，不由公社开支。
3. 工人的工资总额不能降低。由于取消计件工资等措施而减少了的部分，应当予以补足并略有提高。

## 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1958.10.11）

（略。）

##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1958.10.11）

（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1958.10.13）

（关于美国干涉台湾。）

##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11.23）

文章、报告，提出的指标、论点等，论据要充分。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定性的东西能不能进一步变成定量的。

文章、报告，提出的问题太多也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写几个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地方，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些要挂几笔，有些要突出起来讲。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搞七八千亿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这两条，就不好办事。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要反作用，这是一条科学。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

成绩与虚假，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的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来：有全部是真的，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报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且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铁无煤，还不是听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到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全都自由，都去搞娱乐了，就没粮食了，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搞错了，要道歉，还得扶起来。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11.9）

###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斯：一种是科学法则，它反映自然中或社会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但这两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毛：基本观点正确。但是，“另一种是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它是依据人们的意志创制出来的，并且只有法律上的效力”，这种说法有两个缺点：一、对党和群众在认识规律上的主观能动作用阐明得不够；二、没有说出依据工人阶级的意志创造出来的、由政府颁布的法律，要能够正确，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

斯：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影响它们。在其他许多场合，人们决不是无能为力的。

毛：“在天文、地质及其他某些类似的过程中，人们即使已经认识了它们的发展法则，也确实无力去影响它们。”这论点不对，没有从发展看问题。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现在认识、改造不了的，将来能够认识、改造。

斯：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人们将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这就是：人们认识了客观的法则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

毛：

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说的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客观规律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是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立的。但是，人们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够熟练地运用这些规律，驾驭这些规律，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成都会议提出：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一条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凡是主观、客观条件许可能够办到的事，就要多快好省地去办；否则就不要勉强。工农业并举之外，还提出大中小、洋土这样几个同时并举。这些，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看来还灵。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长期实践中得到检验。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路线是被人怀疑的。解放时期，中国革命和夺取全国政权，我们说应该，斯大林坚决反对。但革命在全国胜利，三大敌人被打倒，证明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胜利后搞合作化、公私合营，工农业都增了产，又证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多搞了一点，晓得明年如何？今年十二月~明年三月，这四个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还要抓农业。抓钢铁的同时要抓农业，省地县都要负责。如果农业无人负责，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这不好。山西：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为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搞农业，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学会多面手。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思想动态就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该首先抓。这些也是成都会议提的。这一回山西人提出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是他们的一个创造。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搞试验田是湖北人提的，现在变成了全国的口号。我们这些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厂，无非是把全国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作成如成都会议决议、北戴河会议决议那样一些产品，在全国加以推广。

我们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呢？还要检验，还要研究，能够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斯：苏维埃政权消灭了任何剥削；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

毛：“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产生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起来的。在创造这种新的经济形式方面，任务困难和复杂，我们与苏联是一样的。但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可供借鉴。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用处就不多了。斯大林提出计划经济是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他又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是有区别的，这很好。

斯：有人说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毛：

这一段是第一章的中心。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

斯大林在这里说“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就是说主观计划要力求适合客观原则，但他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斯大林指出：“不能：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说没有“完全反映”，在他的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是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的要求的。他们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为什么他们的工农业关系、轻重工业关系一直没有处理好？他们对发展重工业过分强调，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一向不重视，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使人民不能从建设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这是一条腿走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手扶拐杖，比较偏颇。重工业内部的关系，他们说钢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把这些平列起来，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群众，没有政治，只讲技术，只要专，又是一条腿。

我们的计划工作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运用了客观规律的要求呢？我们搞过计划，也有经验教训。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也不少。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曾经是一个风潮煤多了，一个风潮糖多了，又一个风潮钢铁多了，过不了多久又都说少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看来，还不能说我们过去是完全正确地计划生产，不能说我们过去的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规律的要求，不能说我们的计划工作过去已经认真研究了、充分掌握了、熟练运用了客观规律。

计划机关是中央委员会，是大区和省市自治区，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经委。计划要靠全党、靠大家来搞。计划有可能搞好，有可能搞不好。正像斯大林说的，可能和现实不能混为一谈。要把可能变成现实，就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力求制定出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计划。

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这就是常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我们又提出，工业内部，以钢为纲；农业内部，以粮为纲；其他按比例发展。这个辩证法，我们也只是最近摸到的。有了钢，才能有机器；有了钢，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就都好办了。钢铁赔钱，一是学费，一是支援国家建设。斯大林只提出了问题，没有回答问题。他也没有提出主要矛盾和抓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是有一个形成过程和发展过程的。

有成绩和缺点的比较，有正确和错误的比较，有中国和苏联的比较，促使我们在1956提出了十大关系、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建设社会主义两种方法的问题，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接着出现了一个跃进。不久发生了反“冒进”。经过整风反右，1957年底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大跃进。经过曲折，得到了“马鞍形”的教训，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是大家想出来的。实行过程中也有曲折，归根到底还是灵，正在逐步实现。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不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反映得比较完全，还是反映得不够好呢？看来，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是比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客观过程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人们对客观过程发展的认识也是不断提高的。客观过程中的矛盾，不发展到一定时候，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还不能完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因此人们也就不能很好地认识、理解它。例如，我们工业搞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辩证法也是最近才摸到的，过去是不认识、不理解的。大中小并举以大为纲，中央和地方并举以中央为纲，大和中央，是这两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一元论，不是多元论，多种矛盾中抓住了主要矛盾，主要矛盾中又抓住了主要方面，或者说抓住了主导方面，就能够把一切带动起来。

斯大林指出：有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若干经济法则，连价值法则也在内，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改造过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过的”法则。这也是不对的。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改造”法则的论点，就是“消灭”和“制定”法则这种不正确公式的残余。可以限制这些或那些经济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可以防止它们发生的破坏作用（当然，如果有的话），但是不能“改造”或“消灭”法则。

毛：斯大林说消灭、创造规律的提法是不对的，是把客观规律和法律混为一谈，把客观规律和计划混为一谈。他们不懂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资本主义那里无政府，在社会主义这里有政府。

###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毛：第二、三章讲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

斯：苏联某些同志断定：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应当消除商品生产。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这些同志大错特错。恩格斯的这段话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一切还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毛：

这一段分析的对。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分析是正确的。斯大林：在恩格斯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我们的人民公社，现在是集体所有制，究竟是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或是两者都要扩大？现在，在有些人看来，人民公社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人民公社只有自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如果进行商品生产，就是不名誉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有条件实行以粮为纲，发展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和发展工业同时并举。人民公社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公社只搞自给性生产，不搞商品生产，不进行商品交换，农民不把粮食等农产品和工人生产的工业品交换，那么工人怎么能有饭吃，农民怎么能够有衣穿，怎么能够得到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如果公社不把自己多余的产品卖给国家，卖给其他公社，怎么能够得到货币收入，哪里有钱分给社员？某些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当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

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国成立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

“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商品交换才能过渡到产品交换。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斯：在十九世纪末《反杜林论》出版时，只有英国是这样的国家，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这里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问题。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毛：这里所说的“命运”问题，就是废除不废除商品生产问题。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是否废除商品生产问题，仍有保留，他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没有作出结论。

斯：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夺取政权后，立即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这是一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这样做将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从而摧毁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可能性。

毛：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这样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我们1954犯过错误，征购将近九百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1955定为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粮食。有人反对我们减少购粮数目。怪得很，资本家这样“革命”，原来是阴谋，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

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他们在看书本时是马克思主义，碰到经济实践，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思想很混乱。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去办，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把农民引导到敌人那去。

斯：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合作运动计划”等文章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 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毛：我们已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政权。
* 将工业中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毛：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对前者采取没收政策，对后者采取赎买政策。
* 逐渐将中小个体生产者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毛：我们的集体化，经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了人民公社。同他们的集体农庄相比，规模更大，公有化程度更高。
* 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不要剥夺集体农庄。毛：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做。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
* 为实现城乡、工农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经济联系形式，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把所有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毛：列宁的五条都是正确的，我们都作了，而且有所发展。

毛：

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

斯大林概括列宁的回答的第五条：“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个意见，我们过去曾经大吹大擂地宣传过。斯大林：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1954我们还是购买，只是购得过头了一点，农民也反对。

中国革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谨慎小心。1956反“冒进”的错误，根源就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发生的问题，还是在相当多数的干部中不懂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甚至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明。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我们建立了人民公社，要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我们现在的公社太穷，除了吃饭以外，货币收入很少，吃的水平还是很低，还是一穷二白。我认为这是好事。穷，就要干，要革命，要搞社会主义。有些老根据地，由于过去没有搞不断革命，在一部分农民中产生了停顿不前的情绪，对高级合作化有抵触，对人民公社更有抵触，说什么：“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认为那是黄金时代；又说什么：“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头”。这些话出自山西老根据地，那里自完成土改，到1956建立高级社，1958实现人民公社化，前后共有十年左右。这给我们一个教训：一个任务完成以后，要接着提出新的任务，引导农民进行不断革命。现在，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在区委管理下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因地制宜大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搞起来，全国的工业大发展，公社的商品生产大发展，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全国农民就可以逐步地共同富裕起来，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以逐步普遍提高起来。

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策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毛：斯大林这里说的发展道路是对全世界讲的，是正确的。

斯：

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中，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可以这样认为。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毛：

斯大林：“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现在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商品。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马列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成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我国1957生产了3700亿斤粮食，300亿斤作为公粮，530亿斤卖给国家，商品粮还不到全年粮食总产量1/4。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茶丝麻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产量，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货币收入很少，很难有钱分给社员。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部分只能吃饭，一部分要救济，一部分除吃饭外还能分点钱。能够给社员分钱的又有几种，有的分得很少。因此，每个公社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发展其他能卖钱的东西，要发展商品生产。

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范县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调查一下。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左”，蒙混过关，教抓到了小辫子，四十条草案为证。

斯大林这句话说得正确：“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之所以叫商朝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

斯大林：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些勉强。奴隶时代商品生产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确实的。但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情况不同了，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产生出来，虽然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母胎中，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已经孕育了无产阶级，作为这个阶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产生了。

斯大林：“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这说得对。我们早在1949七届二中全会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我们又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达六年之久，经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三个步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也完全有了。斯大林：“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那么，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不要怕这个“鬼”。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斯：有人：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也是不对的。

毛：把书中的“我国”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

斯：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体农庄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毛：

书里面的“现今”，指1952年，就是十月革命后的35年。从中国成立到现在，才9年。

书里面提到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这个界限必须分清，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也必须分清，不能混淆。苏联宣布了土地国有，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斯大林不卖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给集体农庄，我们卖给人民公社。所以在我们这里，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都是集体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集体所有的。我们国家能够调拨的产品，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集体农民，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来换取他们需要的商品。所有权还在他们那里，你不给他东西，不给他货币，不用买卖的形式同他们进行交换，他们就不愿意把东西让给你。不要以为中国的农民特别进步，有些地方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痛心得很。现在有人：农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很旺盛。他们下一次乡，认为农民了不起，农民比工人强了。我们要看到农民确有共产主义精神，但还要看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他们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还是集体所有。委书记的考虑是正确的，他不敢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他担心宣布全民所有制实行供给制以后，灾荒发生时，国家是否发工资；丰收时，国家把粮食调走，也发不起工资。灾荒、丰收都有苦闷。他是代表农民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应该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不要急忙往前闯。

北戴河会议中，曾设想用三年、六年或更多时间，实现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还是按劳分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设想的时间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了的时候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够像鞍钢一样？什么时候能够把农业劳动变成工厂化劳动？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要调拨的东西，必须无条件的调拨，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就不能丰富，就不可能直接调拨，也就不能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拿鞍钢的生产水平来：平均一个工人一年的劳动产值是1.8W元，除7.2K元的原材料、折旧外，还有1.08W元是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工资八百元，其他的都是国家的收入。很显然，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达到这种程度，需要经过很大努力。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他们那里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由国家来调拨，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还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否则就没有一个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任务了，就没有奋斗目标了。现在有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楚，认识模糊。如果有人说徐水还不是全民所有制，就被批评是“右倾”。

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在两种所有制存在的时间内，必须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去引导农民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第一个过渡。还有第二个过渡，就是从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959.3毛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1961.9根据毛的提议，中央决定基本核算单位和生产单位是生产队，不是大队。）

我们革命战争用了22年才取得全国胜利，我们曾耐心等待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不行。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勒斯、蒋介石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佬就是要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的做法不了解，现在只警告了三十多次，美国人不搞了，事实上承认了我们规定的十二海里国界线，可见得还是灵。

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

斯大林：在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部门呢？是让国营部门干脆吞没集体农庄部门，——而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统计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特别的、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

毛在评论斯大林关于商品生产的理论时，特别指出，商品生产消亡的条件，除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外，还有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这一条。毛：这段里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斯大林自己也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回避了这个问题。

斯：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毛：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

斯：现在，在我国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

毛：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改变。经过整风反右，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精神面貌改变，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

###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毛：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一些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照斯大林的说法，是没有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斯大林在给雅罗申柯的信中：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认为苏联的当时已经是共产主义，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还只搞了九年，则差得更远。

斯：是不是说价值法则在我国也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有广阔的发生作用的场所，价值法则在我国是生产的调节者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法则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在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一般的整个的经济政策，这一切就使得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毛：这里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这说得很对。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1959.3毛批转山西省委一个文件中：平调的“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例如，粮棉油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难道能说不是由计划来调节而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吗？至于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则是完全由国家计划来进行安排的，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要进行建设。这种赔钱，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经验，要花学费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从长远利益看，一个时候赔钱也是值得的。

答А·И·诺特京同志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成为商品的只能是消费品，生产资料不能成为商品。斯大林：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在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时，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经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之后，不但不变成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托，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由此可见，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范畴中。

毛：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

斯：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 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
2. 必须用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
3. 必须使社会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毛：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他们：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条线很难划。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三个先决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

1. 必须确实保证“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这是基本的。我们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以及其他几个同时并举，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增加社会产品。
2. “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不愿意划线的人，认为现在时间已到，已经上了天，集体所有制可以立即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可以立即进入共产主义。谁不赞成，就说谁是右倾。我们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农村大部分还是集体所有制。即使将来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搞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也还不能马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3. “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为此，需要减少劳动时间，实行综合技术教育，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说“自由地选择职业”，我不太懂，搞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挖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学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搞得没有饭吃。

斯大林提的三个决定条件是对的，主要是第一条。这几条的基本点，就是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发展社会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缺点是没有讲一个政治条件，没有讲用一套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政治挂帅，没有定期的整风运动，没有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没有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的群众运动，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斯大林这三个先决条件是不容易达到的。

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他不提倡共产主义的因素，割裂重工业和轻工业，不重视农业，片面地、过分地强调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不足够重视消费资料的增长，没有按照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政策来缩小三大差别，反而是扩大了三大差别。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关于Л·Д·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

毛：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则搞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

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经过去年和今年的整风，我们已经给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去年以来，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为什么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干劲那么大？就是因为群众觉得共产党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湖北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经常挨群众骂，一九五六年这些干部改变了作风，以平等态度待人，同农民一起劳动，深受群众欢迎。

解放后，不说供给制的长处，只说工资制的长处，这个风气很不好。当然，一九五三年供给制改成工资制，让一步是必要的。因为原来在解放区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占少数，工厂职工是工资制，机关、企业新增加的人很多，他们受资产阶级影响深，要把他们原来实行的工资制改为供给制，也不那么容易。但是，那次改变有很大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这样的让步，就不对了。供给制改工资制以后，一些人闹级别、闹待遇。

现在一些人民公社正在试行供给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恢复供给制，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看来，工资制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在今天还是必要的。保留的工资制中，有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答А·В·萨宁那和В·Г·温什尔两同志

斯：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

毛：

斯大林最后这封信中关于不把拖拉机卖给农庄的意见，彻底错误。他把国家和集体农民对立起来，不信任农民群众，死抓拖拉机不放，理由是说不通的，自己骗了自己。你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把你控制得要死。斯大林在书里，反复说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可怕；而这里又强调为了不使商品流通扩大，不能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又：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他们负担不了，只有国家才负担得了，这个理由也很难站得住。国家就损失得起？

两个过渡，他都没有找到方法，找到出路。他没有找到一条道路，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书里：要创造条件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消失。说也说得好，但积三十年的经验，没有找到出路，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很苦闷。但是他说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主要调节是计划而不是价值法则，这很对。

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但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清的。不讲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分析，哪些应当破除，如何破除，哪些应当限制，如何限制。教育组织也是资产阶级式的。他过去：技术决定一切，这是见物不见人；后来又说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只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如何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地富反坏右，一部分干部，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想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多数人想干共产主义。因此，必不可免地要有斗争，要有长期的斗争。

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要有步骤，向两方面扩大。一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做为有用的工具。

## 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1960.5.14）

（如题。）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1959.12-1960.2）

### 一、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若干重要问题

**（一）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新理论**

1. 哲学为政治服务。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同时，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现代条件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依靠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真正人民的议会，将能够顺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其中包括把基本生产资料变成人民的财产的任务。

毛：

冯友兰在《四十年的回顾》中，讲了他过去怎么样适应国民党的需要，采用一些什么哲学来骗人。他讲他开始相信柏格森，以后相信实用主义，然后又转到新实在论。他用自己的事实驳斥了所谓哲学不为政治服务的说法。

党里有人：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它的书可以不必读。这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和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必须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写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1. 我们要用辩证唯物论这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同文化革命密切联系着的。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和地主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教育和文化已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

毛：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造人们的世界观，为工人阶级造就新的知识分子，使教育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农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二）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因此能够被认识**

1. 系统的意识形态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能够被认识。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人民民主政权以马列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学说为指南，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根据的就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并考虑到本国的特点。

毛：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

1. 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人们才能够进一步地认识规律。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实践中，计划并不是经常都能充分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的。当违反了这些要求时，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就会显示它的威力，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比例失调，正常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遭到破坏。

毛：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人们才能够进一步地认识规律。

1.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展规律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服从社会的统一计划领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比例经常遭到破坏相反，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比例。

毛：恩格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三）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否认二者有同一性，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

1. 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学：制定了关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的基本原理。苏联具备建成完全的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一切。它拥有为此所必需的丰富的物质资源和自然富源，拥有强大的工业和规模很大、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农业。群众在全民的社会主义竞赛中所表现的创造积极性，是使苏联经济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加速发展的强大因素。二战后，拥有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使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的变化，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创造了新的环境，但这并不是：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认识到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依据这些规律，就有可能及时发现出现的各种矛盾，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毛评论时加以引伸，：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红旗》转载了，批评那种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观点，文章写得还好，用了力气，是认真的。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有位同志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照这种看法，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得对：“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1. 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_\_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政策上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根据建成社会主义和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的任务，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毛：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

**（四）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变化、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

1. 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建成根本改变了民族的本性。社会主义的胜利巩固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一致，促进了他们的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的繁荣。

毛：一切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

1. 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

教科书说(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富强的根源，是全体劳动者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的源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毛：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

1. 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在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胜利地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基本任务——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完全铲除了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把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根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由于集体化的完成，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根子被拔掉了。农民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过程停止了。

毛：“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彻底巩固”这四个字看了不舒服。任何东西的巩固，都是相对的，怎么能彻底？如果从有人类以来，所有的人都不死，都“彻底巩固”下来，这个世界怎么得了？宇宙间、地球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生、发展和死亡的，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拿蚕来：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是它的一生的整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是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每个阶段也都是不能“彻底巩固”的。飞蛾最后死了，旧的质变成了新的质，新生下来很多蚕子，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这些不同的阶段中，显然也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人也是在从生到死这个过程中，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人从出生到死之前，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难道能够：从小到大、从大到老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人的肌体里面的细胞，不仅有不断的分裂，还有旧细胞的死亡、新细胞的生长。也许到了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人从母体里带来的细胞都已经死亡，全部变成了新的细胞。人死了，人这个整体的最后质变就完成了。这个质变是通过以往的不断的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1. 一定的社会制度的巩固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集体农庄农户的财产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个人财产。根据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每一集体农庄农户的个人财产，有宅旁园地上的副业、住宅、产品牲畜、家禽和小农具。

毛：一定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需要巩固它，但是这种巩固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远地巩固下去。认识不到这一点，反映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就僵化起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适应新的变化。

**（五）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1.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各国间计划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繁荣文化的巨大可能性。战后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以资本主义梦想不到的高速度有计划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可是在同一时期，美国却遭受到1948—1949年和1953—1954年两次经济危机，结果生产下降，失业增多，而从1957年底开始，美国又发生了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生产过剩危机。

毛：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1.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永远有。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毛：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自己的反面。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

1. 教科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国内还有阶级斗争。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的评价：这本书的基本缺点，是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承认他们国内还有阶级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敢像我们这样大讲阶级斗争，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1. 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观点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1. 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毛说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经常受到破坏的观点时：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服从社会的统一计划领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

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在计划工作上，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漏洞也没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

**（六）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质变。不促进大量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1.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一个工厂，厂房有了，规模有了，里面的机器设备部分地、部分地更新，这就是部分质变。工厂的规模、外形没有变，但是工厂的内部变了。一个连队也是这样，一百多人打了一仗，伤亡了几十个人，要补充几十个人，不断地战斗，不断地补充，就是经过这样不断的部分质变，使这个连队不断地发展，坚强起来。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现代化对于技术进步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设备现代化就是经常更新和改进所使用的设备，办法是用新部件替换机床和机器的旧部件，安装更完善的发动机和各种装备。

毛：这就是部分质变

1.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进一步阐述量变和质变的辩证法，毛：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如此。我们每天读书，从四点开始，到七八点结束，这就是“边”。

1. 量变一定会引起质变。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是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水平。

毛：这一段提出的问题要研究。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量变必然带来部分的质变。

**（七）先进和落后，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

1. 先进和落后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竞赛以迅速而普遍地推广先进经验为前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范例的力量成为不断提高和改进生产的手段。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社会主义竞赛并给予人民群众的这个进步运动以全力支持。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

毛：这里说的“得到勋章和奖章”、“劳动英雄的称号”等等，也就是“尚贤”。我们分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兴无产阶级，也是一个“尚贤”的问题。国民党行，还是共产党行，现在人们不谈这个问题了。资产阶级行，还是无产阶级行，这个问题在一部分人中间实际上还没有解决。

1. 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

毛：这一段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

1. 历史上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根本改变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地位决定于社会出身和财产；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例如马克思主义，就不出在当时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英国，而出在资本主义只有中等发展水平的德国，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毛：我们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小厂里头出来的。大厂设备好、技术新，因此往往架子大，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创造常常不如小厂多。最近常州一个纺织厂，创造了一个加快车速的技术。你看，这个经验不在上海、天津创造出来，而在常州这样的小地方创造出来。

1. 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的必不可免性。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经济核算能使现有设备尽量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又能刺激技术革新。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减少单位产品的基本建设投资是一项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这就要求在最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的企业，确定基本建设投资和利用新技术的经济效果。

毛：我们要采用先进技术，但不能因此否定落后技术在一定时期必不可免性。从有历史以来，在革命战争中总是拿武器差的人打胜拿武器好的人。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全国的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怎么行，这不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吗？

1. 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关于农业发展中物质刺激的作用的观点时：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生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生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八）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

1. 人的认识总是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

资本主义社会，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现象是商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从此出发，分析出商品的两重性，由此揭露了在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我们指出，我们虽然小而弱，但是有群众的拥护；敌人虽然大而强，但是脱离人民，有空子可钻。拿内战时期来：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一个据点，而其他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他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优势兵力)吃掉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其余的敌人。这样，我们在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加上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地方，情况不熟，群众不拥护他们，我们就可以完全消灭这一部分敌人。

1.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决不意味着它们是作为一种统治人们的自发力量而起作用，人们对这些规律无能为力。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

毛：

教科书说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九）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要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必须进行反复实践，认真研究**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比例经常遭到破坏相反，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

毛：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真理要人们相信，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例性是偶然的，经济是通过周期性危机循环地发展的；与此相反，社会主义经济没有经济危机，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

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都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1. 真理要使人们相信，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我们自己提出两条腿走路才有两年的时间，尽管经验证明是正确的，但是不少人今天还不相信，这是有理由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能够持续跃进，取得了胜利，相信我们的人就会多起来。战国时，楚国有个卞和，得到一块很好的玉石，献给楚王，楚王说他骗人，把他的左脚砍掉了；第二次又献上去，还说他骗人，又把他的右脚砍断了。卞和坚信真理，坚定地认为自己的玉是好的，第三次献上去，确实证明了这是块好玉，才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所以，任何真理要使人们相信，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十一）相对真理的积累，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关于苏联的币制改革的成就的观点时：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第663页

**（十二）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比例经济遭到破坏的观点时：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有不平衡，有比例失调，才能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规律。出了一点毛病，就以为不得了，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完全不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十三）两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1.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矛盾和阶级矛盾。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对抗性矛盾、不会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观点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1. 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学阀”，压制新生力量。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的特征则是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不断完善。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能够在一切企业里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的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可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主阻碍广泛推广新的技术发现，只有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时才在自己企业中利用它们。

毛：这里说“毫无阻碍地推广”先进经验，可不一定。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者，在苏联不给他任何实验的机会，到了中国，我们把长江给他实验，成功了，才引起他们部长的注意，到中国来总结经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还有“学阀”，他们控制科学研究机关，压制新生力量，因此先进经验也不是毫无阻碍地得到推广的。书中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矛盾。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或者因为不习惯，或者因为不了解，或者因为同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抵触，它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阻碍。例如，我们的密植、深翻这样的东西，它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还不是受到一部分人的反对和抵抗？当然，社会主义社会里阻碍新东西的这种情形，同资本主义社会是有所不同的。

1.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的观点时：

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

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个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苏联的自然科学有辩证法，现在这方面发展得快。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

### 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

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

1. 所有制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生产分配中的关系要不断地改进。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迅速增长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这种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场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增长，反过来也会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沿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向前发展着。

毛：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几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

1.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所有制出发。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先写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个体经济所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可以写得更好些。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二）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要涉及上层建筑。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化会主义工业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确立只有在城乡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保证。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殖民主义强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殖民地和附属国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以加快发展大工业(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办法，最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这些后果。

毛：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1. 上层建筑要对经济基础起作用。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剥削阶级，但还有落后分子，官僚主义分子，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同各种落后和守旧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

毛：这一段讲得有点神气，要上层建筑干什么？就是为了对经济基础起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1.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各国间计划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繁荣文化的巨大可能性。

毛：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三）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这本教科书就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是矛盾，害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

1. 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并不是：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

毛：教科书：“这并不是：社会沿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发展就不要克服内部的矛盾”。这不过是附带的申明罢了。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1. 教科书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比例和平衡问题的观点时：这段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他们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多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

1. 教科书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与愈来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高速度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余地。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在克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进程中所产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毛：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1. 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旧斗争的基本形式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毛：这一段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1.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

毛在读完《结束语》对教科书作总体评价时：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四）研究经济问题，也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这本教科书总是从概念、规律、原则出发，进行演绎**

1. 教科书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做总体评价时：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1.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观点时：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1. 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观点时：

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格·柯兹洛夫的《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教程》(《经济译丛》一九六0年第一期)：对这本书的批评是带根本性的批评，他指出了这本书在方法上的重大缺点。他主张从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规律。他还提出了书的结构方面的建议。他最好能自己写出一本来。但是建议容易，写出来可不容易。

1. 教科书不掌握材料，不叙述历史，只有逻辑推论。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生产资料公有制使人们的共同劳动能达到资本主义所远远不能达到的规模，工业和农业中的生产积聚达到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程度。

毛：教科书不掌握材料，不叙述历史，只有逻辑推论。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本质问题的观点时：这一节没有解释什么东西，不讲理由，缺乏说服力，尽给人一些概念。要看看下面是不是有些解释。

**（五）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

1. 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贫穷落后，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加快发展大工业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任务的理论时：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1. 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关于国际分工的理论时：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成仿吾曾说鲁迅第一是有闲，第二是有闲，第三还是有闲，并且说有闲就是有钱。鲁迅当时是向封建主义、买办文人进行坚决斗争的。创造社的成仿吾等很幼稚，这样批评他是不对的。鲁迅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出了一本书，就叫《三闲集》，并且写了一篇序，说这是为了对付成仿吾的。鲁迅总是抓住成仿吾，一有机会就向他进攻。有时攻一下潘汉年或李初梨，主要是攻成仿吾。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1. 教科书只批评人家。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某些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制定计划过程中产生一些错误，引起一些不良的现象。工业发展规定的速度超过了这些国家的实际能力，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合作和广泛分工，这样高的速度也没有必要。没有完全实现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的计划任务。

毛：教科书只批评人家，对苏联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却一句不讲。

1. 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淡化群众在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的作用时：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六）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架子也不太高明，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1. 教科书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以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高速度有计划地不断扩大，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充分就业，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毛：赞成这个结论。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列主义。它说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说了高速度，说了不少令人高兴的东西，这些总是好的吧。看来，这本书是想总结他们本国的经验，因此，不能不受本国一些经验的限制。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论：

总的说来，这次读的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说它已经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目前还不好做这样的结论。

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至于如何按比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苏联的按比例，有中国的按比例；在苏联有斯大林的按比例，有赫鲁晓夫的按比例。

毛在读完教科书(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后评论：这次读书是跟着书走，可以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但是还不能算是研究。最好将来以问题和论点作中心，研究讨论一下，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看书的时候，大胆怀疑是好的，要有追求了解的意志和愿望，但是最后不要把好的东西否定。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要勇敢，也要谨慎。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1. 这本书的架子，不太高明。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的观点时：看来，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一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七）现在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1.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条件还没有成熟。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中：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在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具体运用问题的观点时：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

1. 研究通史的人，要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的观点时：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么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八）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这本教科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缺少集中，常常前后矛盾。**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的观点时：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和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

**（九）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消除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的城乡.地区和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的观点时：为了搞经济学，要参考一下古代人怎样搞学问。像《史记》这样的文章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裴松之注《三国志》，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 三、民主革命

**（一）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

1. 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证实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不一定具有最高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内开始和取得胜利。列宁指出，要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只要具有像革命前的俄国那样的中等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就可以。

毛：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它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劳动技术进步问题的的观点时：我国资本主义虽然不发达，但是也有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像上海、辽宁、天津、重庆这样的工业基地。这些地方在出技术、出工人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1. 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的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多。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列宁还在1918春就在自己的和平经济建设的计划中制定了后来在新经济政策中获得发展的许多原则。但这些原则的实行为武装干涉所中断。直到3年后，苏维埃政权才有可能彻底实行这些原则。

毛评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能够巩固下来，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多。当时有十四个国家出兵干涉，但是每个国家派的兵都不多。帝国主义者，例如丘吉尔，当时寄希望于苏维埃政权自己垮台。

1.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

教科书《结束语》：斯大林根据列宁的学：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在《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中，发挥了列宁关于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个别原理，抨击了托洛茨基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毛：最近，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文章中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斗争，列宁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说这是革命的间接后备军。中国革命也吃这一碗饭。我国过去存在着地主买办阶级各派的矛盾，这个矛盾同时反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他们内部有这样的矛盾，我们善于利用这种矛盾，所以直接同我们作战的，在一个时期中只是一部分敌人，不是全体敌人，而我们常常因此得到了回旋的余地和休整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

1. 为什么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俄国有广大的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大大促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化和农民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过程。共产党领导的、以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WZ起来的俄国无产阶级同贫农结成联盟，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专政。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表明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怎样的。

毛：这一段中，值得注意的有这些地方，即：“同时”，“任何国家”，“基本内容”。为什么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为什么俄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俄国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在俄国，有广大的农民群众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事实证明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干部，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在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全国9岁和9岁以上人口的76%。在苏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文盲就已经基本上扫除了。

毛：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人口76%。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80~90%。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农村经济的低级合作形式使广大农民阶层养成集体管理经济事务的习惯。

毛：因为怕没有干部就不搞社会主义，这是第二国际的观点。

1.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前的俄国有足以使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毛：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是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从过去的革命历史来看，世界革命的中心是从西方向东方逐步转移。十八世纪末，革命的中心在法国。十九世纪中叶，革命的中心转到了德国，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随后，革命的中心又转到了中国。将来，世界革命的中心还会继续转移。

1. 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的国家成功？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大机器工业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实现这一过渡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

毛：革命为什么不首先在西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高、无产阶级人数很多的国家成功，而首先在东方那些资本主义生产水平比较低、无产阶级人数比较少的国家成功，例如俄国和中国，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

1. 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人愈穷，愈要革命。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就用不着经历苏联不得不经历过的那条充满了巨大困难的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

毛：这几句，现在看来说得不对。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机械化的程度已经很高，革命成功以后，进一步提高机械化，问题不大。重要的问题是人的改造。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超过先进的，例如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二十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等等。

1. 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资产阶级的毒渗透到各个角落里。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社会主义建设将在特殊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比较容易开始，那么，在这样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将要容易得多。

毛：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这就可以说明，英国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而跟着工党走。

1. 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可能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的观点时：法国《快报》的评论中有很多特殊的东西，其中一条是他们承认我们跃进的因素继续存在。并且还：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他们：中国正向世界上将近二十亿人进行挑战。他们：这不是军事上的挑战，而是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向帝国主义挑战。中国的经验，唤醒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这些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使他们想一想，中国也曾经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采取了这种办法，很快地发展了起来，他们今天还是落后，还是贫穷，究竟应当怎样办？总的讲来，西方一方面轻视我们，另一方面不得不研究我们。

1. 印度没有取得革命胜利，主要是因为印度共产党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不一定具有最高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内开始和取得胜利的观点时：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在这些方面说来，印度也是相同的。那么为什么印度不能像列宁、斯大林所说的那样，突破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的胜利呢？主要是因为印度共产党起先站在尼赫鲁的对面，不积极参加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去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印度独立以后，他们却跟在尼赫鲁的后面走，没有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印度和中国还有一个区别，印度是英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印度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由英国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而中国，则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这些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国长期不统一的、分割的局面。

1. 赫鲁晓夫援助尼赫鲁夫，各有打算。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性或经济性的条件。根据1995.2.2苏印协定，苏联帮助印度建设年产100多万吨钢的比莱冶金工厂，便是与不发达国家建立的这种新型经济关系的明显例子。

毛：苏联帮助印度建立的钢铁厂，现在已经从一百万吨扩大到二百万吨。苏联帮助印度建设这类企业，赫鲁晓夫有他们的打算，尼赫鲁也有他们的打算，现在得利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和印度大资产阶级。

**（二）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

1. 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观点时：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斗争，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月革命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是在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没有列宁主义，也就没有俄国革命的胜利。

1. 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

毛在评论教科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时：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五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党在1927时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就是指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三）无产阶级政党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争夺革命的领导权**

1. 中国共党积极参加民主产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证实了列宁的这一原理：社会主义革命能够在不一定具有最高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国家内开始和取得胜利。

毛：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它阶级、其它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1921党成立后，立即积极参加民主革命，站在民主革命的前头。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的地位，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的国民党没有办法，到了一九二四年只好找共产党合作。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通过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到这个时候，国民党才重新有了一点起色。

1.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怕群众。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革命消灭了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产生了。由于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群众的广泛革命运动的结果，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

毛：我们解放后初期的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是同国民党时期的政治协商会议一样的。抗战胜利后，同国民党谈判的时候，我们对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兴趣，蒋介石却很有兴趣。解放后，我们把这个招牌接过来，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了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历来不搞群众运动。孙中山是革命的，也只搞军事暴动。原因是他们怕群众。

**（四）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革命胜利地完成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封建地主和垄断的大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着手实现土地改革。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这一革命即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五）我们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1.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关于物质刺激观点时：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1. 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人民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国内的一切民主人士。

毛：这里说我国“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组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什么只提革命斗争，不提革命战争？事实上，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从一九二七年起一直到全国胜利，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连续不断的革命战争。在这个期间，我国还夹杂着几次军阀混战。在这以前，从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还有十六年战争，这里面有革命战争，也有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军阀战争。帝国主义利用军阀来搞自己的势力范围，指挥军阀进行争夺地盘的战争。如张作霖，原先是勾结日本的，后来同日本人闹别扭，被日本人炸死，美国就乘机插进去。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件，实际上是美国指使的。如果从一九一一年算起，一直算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可以说是连续进行了四十年的战争，其中包括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战争。我们党产生以后所参加和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有三十年。

1. 教科书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之一，在于采用和平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苏联曾经是唯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单独地抗击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世界，国内资产阶级又在国际资本积极支持下拼命反抗，因此不得不采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目前，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获得胜利，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下，就没有必要采用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了。

毛：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22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80%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20%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那样激烈的斗争。

**（六）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建立起来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措施，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这个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

毛：这里：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史量才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

**（七）关于土地改革**

1. 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是经过反复多次才认识清楚的。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具体运用的观点时：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1. 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一种右倾观点。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农民即贫农和中农群众从国家那里得到土地，摆脱了地主的束缚，不受富农的盘剥，得到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全面帮助。

毛：教科书中：“从富农那里没收来交给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说明他们的办法是政府没收，然后由政府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种恩赐的观点，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点。我们的办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是依靠贫农，使贫农和下中农联合起来，向地主阶级夺取土地。具体做法是：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进行诉苦，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的作用，反对包办代替。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对大批俘虏兵的改造，也采取诉苦的办法。这种办法，我们现在一直还在采取，发展为回忆对比。

1. 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盘集体化以前，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实行了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全盘集体化意味着彻底摧毁农村中旧的社会制度，根本铲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变为公有，建立起公共的劳动组合经济，从而摆脱了富农的剥削。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富农的措施，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了最后一个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

毛：“把自己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变为公有”。我们过去没有说把劳动变为公有。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因为需要富农的粮食，所以对富农只采取限制的政策。这有点像我们在解放初期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他们只在等到国营农场有了四亿普特的粮食，才敢对富农下手，提出消灭富农、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口号。而我们呢？却在土地改革中，就把富农经济实际上搞掉了。

1. 我国地少人多，把农民的土地拿来搞国营农场，农民是不会满意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大农业企业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在一部分从前是地主的土地上和在国有的闲置土地上组织起来的。各人民民主国家里都建立了这种国营农业企业。但国营农业企业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各个国家是不同的。

毛：我国地少人多，解放初期如果把农民的土地拿来搞国营农场，农民是不会满意的。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鉴于迫切需要消灭农奴制的残余，消灭早已过时的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残余，无产阶级国家把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连同耕畜和农具在内，强制地收归公有。收归公有的土地绝大部分交给劳动农民，一小部分则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

毛：

这里所说的土地的“一小部分用来组织大型国营农业企业”，在我们的国家里，这部分土地不能很多，只能很少。中国的土地私有，深入人心，农民一寸土地也是得来不易。我国很早以来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农民的小私有观念很厉害，认为侵犯别人的私有土地，是一种很不好的事情，甚至在土地改革中，还有一些农民说拿人家的祖业是没有良心。因此，土地改革后，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我们最后要实行土地国有，但是首先实行耕者有其田，然后经过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由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转变为国有。

现在农村的土地、工具、产品和劳动，都还是基本队有。我们的任务是在条件成熟时，首先实现社有，然后再实现国有。随着这种所有制的改变，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也必然会发生变化。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策是不是正确。只要政策对了，中国的农民是好讲话的，他们并不是那么保守的。当然，如果政策错了，就一定要受到农民的抵抗。例如，一九五三年河南长葛县要修飞机场，由于对被占用土地的农民的生活没有进行安排，结果农民就三线布防，第一线是小孩，第二线是妇女，第三线是男人来反对修飞机场。他们：麻雀被掏掉了窝，还要叫几声，何况人乎？可是后来政府向他们承认了错误，对他们的生活进行了安排，他们也就没有意见了，机场也修成了。

1. 土地国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口号。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关于地租问题的观点时：关于绝对地租的问题，土地国有之所以能够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口号，就是因为实行土地国有，消灭绝对地租，使土地涨价的利益归于资产阶级的国家，同时使资本家免掉一部分支出，来便宜地利用土地，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在这方面所遇到的障碍。

**（八）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

1. 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马克思和列宁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是允许的，而且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遵循着这个指示，执行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中国这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有价值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结论：“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

毛：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1. 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纯洁得多。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随着某一个国家所形成的革命特点而各不相同。在世界发展的新条件下，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但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的代表中，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他们名义上是工人、农民的代表，有托洛茨基派、布哈林派、季诺维也夫派等，他们名义上甚至还是属于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接受了克伦斯基的国家机构中的大量人员，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各个部的成员都是根据地里出来的，而且大多数骨干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国家机构，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起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要纯洁得多。

**（九）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1. “左”倾冒险分子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问题的观点时：第三国际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一个决议中：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决议没有区别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甚至认为中间派比蒋介石更危险。当时的“左”倾冒险分子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结果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这个决议也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立三路线就提出，一省或数省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1.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说法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是可以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推翻封建地主和垄断的大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着手实现革命的土地改革。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这一革命即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毛：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是可以的。

### 四、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

1. 革命转变后附带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说中国革命在解放后的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是不对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1917.10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

毛：这一段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1. 我们现在就是处在马克思讲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毛：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马克思这里讲，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革命转变时期”。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革命转变时期。

**（二）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

1. 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毛：教科书的这个提法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三）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1. 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用革命手段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大机器工业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实现这一过渡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是能够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和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的阶级。

毛：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要“用革命手段”，这个提法好，不能不这样讲。无产阶级要“把一切劳动者团结在自己周围来消灭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对，但是在这里还应当讲夺取政权。在这里讲，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冲突，在帝国主义时代“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可是，他们在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却讲不那么尖锐。这个“客观必然性”很好，很令人喜欢。既然是客观必然性，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不管你决议里是赞成还是不赞成。你不赞成，它也还是“客观必然性”。

**（四）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同时要讲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

1. 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的观点时：我们始终强调要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办事，要讲“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都是一样的，这就和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了。

1.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每一个国家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

毛：“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五）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1. 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现代条件下，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深刻化，殖民体系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的思想对于全体劳动人类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的情况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

毛：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讲“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WZ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总的趋势来：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1917.7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说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布尔什维克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于中国革命，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1. 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用不着经历苏联那条充满了巨大困难的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

毛：大革命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这是一个法则。只看到战争的坏处，不看到战争的好处，这是战争问题上的片面性。拿我们中国来：如果没有八年抗战，如果没有抗战后国民党又进行反人民战争，大肆搜刮，全国人民就不会那么快地转到我们方面来。现在有人大肆宣传战争的毁灭性，对人民革命是不利的。

1. 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革命遇不到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成分，不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同时政权是用来改造旧经济和组织新经济的杠杆。

毛：不能“成长起来”这几个字用得不恰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都根本不能产生，当然也就说不上成长。这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重要分歧。修正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中的公用事业是社会主义因素，说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杠杆”是物理学上的名词，用来说明经济的问题，不确切。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列宁教导：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在一定阶级的财政帮助下产生的。

毛：“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在一定阶级的财政帮助下产生的。”这里，“任何”两字用得不好。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是靠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能够说它是靠哪个阶级的财政帮助产生的吗？

1.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把反动派搞掉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有利得多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们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WZ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

毛：这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能够在没有国内战争和外国WZ干涉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这些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国际战争的形式，来进行国内战争，把反动派搞掉，是用苏联红军和这些国家人民革命WZ的铁犁把那些坏东西犁掉。说这些国家没有经过国内战争，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没有看到实质。东欧各国一九四四年的解放，是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并为一个。资产阶级的军队在这个战争中完全被打垮了。战犯、大资本家以及同占领者合作的资本家，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在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最主要的地位，而中小资本家的财产则占很次要的地位。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问题时：对中国的叙述，没有讲中国人口多这个特点。

1. 新的历史环境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各人民民主国家正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条件，在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和存在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更为有利的新的历史环境中解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毛：这段说得对。这里所说的：“更为有利的新的历史环境”，主要的就是：一、苏联的存在、巩固和发展；二、社会主义在十二个国家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共产党以列宁的下列原理为出发点：工人阶级同农民联盟，在政治上已经粉碎资本主义之后，也完全可以在经济上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可以消灭剥削阶级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经验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些原理的正确性.

毛：这一段好。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有利条件，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

1. 东欧各国在革命后的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性质完全不同。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

毛：教科书：东欧各国在革命后，“议会成了广泛代表人民利益的机构”。这种议会同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实际上性质完全不同，剩下的只是一个名义。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政权转入劳动者手中是采取人民群众WZ起义的方式还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这要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毛：这个说法，一般可以同意。但是这里埋伏了一个所谓“和平过渡”的问题。

1. 教科书说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什么意思。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落后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毛：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吗？我们没有这样讲过。

1. 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列宁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宁愿以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使用或者不使用革命暴力，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如何，这要取决于剥削阶级反抗的程度和形式。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样就把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内战强加在无产阶级的身上。

毛：

这段有问题。首先对暴力这个概念使用得不确切。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讲，国家就是用来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关。那么，怎么能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对剥削者使用暴力，甚至主要不是使用暴力”？

其次，剥削阶级在要命的时候，总是要动武的。而且只要他们看到革命一起来，他们就要用武力把革命扑灭。教科书：“历史经验证明，剥削阶级不愿意把政权让给人民而使用暴力反对人民政权”。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不只是在人民已经组织了革命政权以后，剥削阶级要用暴力，来反对革命政权；而且当人民起来向他们夺取政权的时候，他们就要用暴力镇压革命的人民。

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第一，要推翻敌人；第二，要镇压敌人的反抗。要这样，没有人民革命的暴力，是不行的。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说话、写文章都尽量合乎帝国主义和敌人的口味。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自己的阶级被蒙蔽。这是欺骗群众和欺骗各国共产党的行为。《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1. 把斯大林丑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

教科书说(结束语)：斯大林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但是这一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

毛：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1960.2.3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擦粉、和平过渡这一套有欺骗性，但要长期维持也困难。因为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只有经过革命推翻它，打倒它。

毛在评论教科书(结束语)对斯大林的态度时：新的增订本在这一行后面，加了四段，写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和赫鲁晓夫的报告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接着写赫鲁晓夫，然后再写斯大林。不按历史顺序写，把斯大林写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插曲。

**（六）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主要错误观点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1. 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能回避对敌人的镇压和阶级的改造。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在暴力方面的作用，取决于某一个国家革命的某一阶段所形成的具体情况。革命的更为深刻和经常的特点就是：组织劳动群众，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在于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组织的和教育的活动。

毛：“为了建成新社会而以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教育群众。”这句话对。我们现在农村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教育，就是对农民群众所进行的新的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纪律的教育。在城市，我们也用这种精神教育工人。在上面那句话后面，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说得不完全，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不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要改造，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要改造，知识分子要改造，而且农民也要改造。

1. 机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学说推翻了机会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必须要等到革命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后才能够进行革命的论点。

毛：这里所说的机会主义者在“关于无产阶级必须要等到革命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以后才能够进行革命的论点”，只是机会主义者的一个错误论点。他们的主要错误论点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只要资产阶级的国有化。

1.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

毛：这里：“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对社会实行国家领导”。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1. 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同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没有多大差别。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种形式在第一个胜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在世界发展的新条件下，人民民主制度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取得了胜利。“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这一段值得研究。这里说人民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同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不一样。实际上，形式也没有多大差别。苏联的苏维埃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都是代表会议，只不过是名称不同。我们这里有正式以资产阶级名义参加的资本家代表，有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民革代表，还有其它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一部分人虽然想闹事，但是闹不起来。这种情形好象是和苏维埃不同。

1. 无产阶级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机器。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还是必要的。但是，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

毛：

这段话的前一句：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国家就还是必要的。这个提法对。后一句话：“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这没有写好，令人不懂。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无产阶级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机器。“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即使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压迫性质也还没有变。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我们还是要用这个国家机器去压迫外国的侵略势力，压迫外国的反动阶级。所谓国家的形式，不外军队、监狱、法院、捉人、杀人，等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家的这些形式，“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外国侵略者来打我们，还不是要用军队去打他们，还不是要把他们捉起来，关起来，最坏的还不是要杀掉吗？

1960.1的苏联《文学报》约了很多世界名人，其中包括英国罗素，给这个刊物写文章。只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作家：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敌人就不会自动地放下屠刀，我们就应该积极准备对付敌人。其他的人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代，大家都不要军队，都不要武器，全世界只留下警察就可以了。苏联的刊物，竟然宣传这样的观点。说好一点，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强大压力的幻想。这同美帝国主义的说法恰恰相反。美国人：恰恰是现在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备战，需要加强军事威力，加强他们的国防设备，努力改善他们的军事生产。

1. 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随着社会阶级的消灭，随着广大群众的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国家将逐渐消亡。但在没有创造出这些条件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国家和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削弱，会给共产主义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

毛：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1. 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所鼓吹的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缩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作用这样一条无政府主义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与马列主义和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使社会主义各国在帝国主义面前解除了武装。

毛：这一段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不正确。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要自己的国家机器可厉害呢，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七）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1. 劳动者管理国家这是最根本的权利。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苏联宪法不仅把公民的权利固定下来，而且把重点转到从实际上来保证这些权利。例如，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社会主义苏联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

毛：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列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1. 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它代表着劳动者的切身利益，真正地保证劳动者的民主权利，不断扩大群众行使这些权利的物质可能性。

毛：“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这个“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不确切。民主只能说是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不好说是有真正的民主，有虚假的民主。因为对于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来讲，资产阶级的民主也是他们阶级的真正的民主。

**（八）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1.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国产生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社会主义能在国家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取得胜利，是因为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

毛：

这段话讲得不对。对于东欧这些国家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有苏联这样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的援助”这样两个条件，为什么不能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完成所有制方面(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呢？

其实，在工业化实现以前，就在所有制方面取得胜利，并不是什么“特殊条件下”才有的事情。苏联也是先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然后才实现工业化的。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1. 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化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殖民主义强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充分发达的大工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国家面临加快发展大工业，迅速地消除资本主义统治的后果的严重任务的观点：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 欧洲的国家是小国林立。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就用不着经历苏联不得不经历过的那条充满了巨大困难的工业化的道路。

毛：不能这样讲。欧洲的国家是不是太多了？很多国家都那么小。中国的春秋时候，也是小国林立，相互斗争。当时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他对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都很懂得策略。古代生产力水平很低，养兵过多，打起仗来，对经济的破坏确实很大。有时确实像蝗虫一样，飞到哪里就把哪里吃光。三国时董卓把长安到洛阳一带的人都杀光了，把洛阳完全毁灭了。打仗时没有吃的东西了，就吃俘虏。以后经济发展了，战争的破坏程度也随着发生了变化。

### 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没收官僚资本，消灭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

1. 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中国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和垄断的大买办资产阶级政权的任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这一革命即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毛：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2。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财产，其中属于日本、德国、意大利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接收过来，全国解放后，这部分已被我们没收；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我们用征用的办法，实际上已把它变为全民所有了，只不过在法律的形式上还没有解决。

1. 把国民经济命脉转到劳动者的国家手中。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国有化废除主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国民经济命脉即主导的经济部门转到劳动者手中。

毛：这里说的“转到劳动者手中”，应当是转到劳动者的国家手中。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大、中工业、运输业、邮电业等的国有化，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是分几次进行的。

毛：工业的国有化，分几次进行，这个经验很好。吃饭也要一碗一碗地吃。

**（二）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逼出来的，是经过尖锐斗争的**

1. 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是逼出来的。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论述时：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1. 我们采取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多种斗争方法。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反对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合乎规律的。同时，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工人阶级可以吸收某一部分资产阶级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乃至国家管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形就是这样。

毛：解放以后，我们根据每个时期的情况，采取了对待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多种斗争方法，使资产阶级无路可走，不能不接受改造。1952“三反”、“五反”的时候，把资本家分为五类，分别对待。1957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代表起来同我们对抗，我们用辩论的方法把他们压下去。

1. 十月革命后，俄国资产阶级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马克思和列宁指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是允许的，而且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完全证实了列宁的结论：“国家政权如果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付给国家资本主义大宗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而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毛：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很好。列宁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因为看到无产阶级管理经济没有经验，曾经企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训练无产阶级管理经济的能力。那时候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错误，不接受列宁的条件，拒绝同无产阶级妥协，逼着俄国无产阶级不得不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当时的俄国，困难确实很大，农业被破坏了，商业联系打断了，交通运输不灵了，搞不到原料，不少工厂没收了也不能开工。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包括这样一些资本主义企业，无产阶级政权在一定条件下即在严格加以监督和限制它们的活动的条件下暂时容许它们存在，并利用它们来建设社会主义。

毛：我国政府对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加工定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解放区，例如东北的一些城市，早已经存在。在全国解放以后，就得到普遍发展。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

毛：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一般说来，只剩下一个形式，剩下一个外壳。资方虽然在这种企业里头，有的还当经理，有的还当管理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是有职无权。我们每年还用一亿两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收买资本家的身子和心，使他们逐步变为企业的职员。就定息这一点来：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

1. 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没有经验。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过去苏联曾经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资产阶级在国际资本积极支持下拼命反抗，因此不得不采用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目前，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条件下，就没有必要采用那样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式了。

毛：这一段讲得不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看到那个时候俄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断定无产阶级不能改变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没有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认为只要他们一反抗，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垮台。他们进行怠工破坏，一直到WZ暴动。这就逼着俄国的无产阶级不得不采取激烈的办法来没收他们的财产。那时候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都没有经验。

1. 我们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企业的管理权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苏维埃政权在克服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专家的暗害和怠工时，在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中，开始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国性的计算和监督。

毛：我们在1952“三反”、“五反”中，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的手中，资本家简直没有发言权，厂方办事要看支部书记的脸色。后来，又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由国家工作人员、职工群众、资本家三方面的代表参加，实际上企业的管理权是掌握在国家工作人员和工人的手里。公私合营以后，政府决定给资本家定息，工人开始还不愿意，经过党和政府的说服，工人才同意。这些说明，我们从那次“三反”、“五反”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实行了强有力的工人监督。

1. 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收买整个阶级。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问题的论述时：现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三）中国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1. 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问题的论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 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过程具有很大的特点：中国大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最初被改造为国家和资本家共有的公私合营企业，然后再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毛：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1. 教科书否定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国家资本主义是从属的经济成分，在苏联的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获得多大的发展。

毛：

教科书：“在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比苏联过渡时期国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要大得多，而在许多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中根本没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这里的意思，是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统治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

拿我们有些省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

日本人过去在东北的政策，是消灭当地的大资本家，把他们的企业变成日本人的国营企业，或者变成垄断资本企业；而对当地的中小资本家，则用建立母子公司的办法来控制他们的企业。

教科书承认我们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的，但是，它没有写清楚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它也没有吸收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现在来：已经不是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四）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和政策**

1. 小私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体的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大经济的过渡是不能自流地实现的.列宁指出，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不同，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因为简单商品经济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毛：这点上，小私有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农民所固有的是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不能说是所有的农民，而应该说农民不可避免地要向两极分化。

1. 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

毛在评论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机器拖拉机站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问题的观点时：农民具有两重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共产党宣言》对这个问题写得蹩脚一点，列宁把这个问题写明确了，斯大林更具体化了。一般地说来，教科书是把这种对农民的具体分析坚持下来的，当然也还有很不够的地方。

**（五）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在我国是通过不同阶段逐步完成的**

1. 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我国是通过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农业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的观点时：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而完成的。

1.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合作社的形式具有自己的特点。其中主要的特点在于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不同，苏联实行了全部土地的国有化，而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还保存着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村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的特点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

毛：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

1. 中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相近的，还有各种半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部分地以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劳动为基础。属于这类合作社的有农业生产互助组。

毛：这里：我们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个说法不对。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到了初级社，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

1.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给苏联农民开辟了过富裕的和文化的生活的道路。集体农庄制度消灭了农民的分化，消灭了农村的贫困。由于有了集体农庄，农村中无马匹、无奶牛、无农具的农户没有了。

毛：

“由于有了集体农庄，农村中无马匹、无奶牛、无农具的农户没有了。”这点很值得注意。就他们来：一方面表示他们的农民富，另一方面表现他们那里个人副业经济还相当强。就我们来：比较起来，一方面我们的农民还很穷，另一方面，我国农村的公有化程度却比他们那里高。所以，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回到原始公社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的生活。那个时候，是集体所有，也是集体劳动。如果那个时候不集体劳动，靠个人劳动，老虎就会吃掉你。

1. 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_\_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工业根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要建成社会主义、不断提高生产和人民的福利，必须有物质前提，因此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

毛：所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个生产力的性质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1. 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造，起初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后来，随着集体农庄的巩固和加强，集体农庄生产开始迅速地增长起来。

毛：苏联的集体化，“起初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使东欧许多国家在实现合作化的问题上增加了许多顾虑，不大敢搞，搞起来也很慢。我们的合作化没有减产，反而大大增产。开始很多人不信，现在相信的人慢慢多起来了。

1. 几个农庄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事情好办了。

教科书：劳动组合公有经济的发展达到高度的水平，就有可能完全保证社会的需要和庄员的个人需要，因而将来个人副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乡村的住宅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乡村里，对集体农庄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筑设备完善的、样式美观的庄员房屋，逐渐实现所有集体农庄的无线电化和电话化。集体农庄建设优良的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和图书馆，这对于庄员们特别是青年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

这一段的设想，很好。

苏联有一篇文章，介绍红十月集体农庄的变化情况，说原来几个农庄，未合并前很多事情不好办，合并成一个大农庄后这些事情都好办了。现在这个大集体农庄，共有一万人，计划把分散的居民点集中起来，在中心建设一个住三千人的居民点，在此周围建设各住一千人的七个居民点。

这个材料很好。斯大林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这个材料证明，没有合并以前的小集体农庄，那样的生产关系实际上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1. 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下农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是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水平。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的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的增加，第二、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比重比庄员个人副业的比重增长得快；第三、小集体农庄合并为大集体农庄；第四、组织新的大型国营农场。

毛：

这一段提出的问题要研究。这里把“小集体农庄合并为大集体农庄”，同“组织新的大型国营农场”，并列为“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水平”的第三、第四两个方面，但是没有说集体农庄本身如何进一步提高公有化水平的问题。

苏联的集体农庄过去合并过两次，由二十五万多个合并为九万三千多个，又合并为七万个左右。将来势必还要扩大。现在他们事实上也已经在搞集体农庄联合举办的修理站、工业企业、公共福利等事情，事实上有些方面和我们的办法类似，只是不用我们的说法而已。看来，将来也不会用公社的名称。说法和名称的不同，包括一个实质问题，就是我们这里实行群众路线，他们那里不实行群众路线。

当然，苏联集体农庄的扩大规模，按户数人数来：可能不会像我们这样大，因为他们农村人口稀、土地多。但是，能够因此就说现在的集体农庄再不需要扩大了吗？我们的新疆、青海这些地方虽然人少地多，不是也可以搞大公社吗？而且就我国南方几省来：有些县(如闽北的一些县)也是在人少地多的条件下搞起了大公社的。

搞大公社是个重要问题，量变了，一定会引起质变，会促进质变。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首先是“大”，接着必然提高“公”的水平，也就是：量变必然带来部分的质变。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1950—1951年进行的合并集体农庄的工作，在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在集体农庄制度的最初时期，小型集体农庄占优势。小型集体农庄不可能有效地利用复杂的现代农业技术，而且它们不能全面地发展公共经济。

毛：这一段关于合并集体农庄的道理，讲得好。

1. 苏维埃和人民公社是发挥地方首创性创造出来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列宁：“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

毛：上面引的列宁这几句话讲得真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公社，就是在发挥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下创造出来的。

1. 农民自留地生产属于小商品生产的性质。凡是富裕中农，都是有点剥削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这五种经济成分的同时存在，对每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来：不是不可避免的。宗法式的经济形式在像中国或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中相当普遍。

毛：我们在解放以后，也像俄国那时一样，有五种经济成分。大多数农民的经济，是家长制的、大半自给的经济，他们出售的商品很少。少数农民，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者是小商品生产者。现在全国的农民，都已经成为集体经济的成员。但是，他们还有一点自留地。自留地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归农民自己消费，也还有一小部分是出售的，属于小商品生产的性质。有的富裕农民还采用一些办法进行剥削。凡是富裕中农，都是有点剥削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庄员的基本收入是根据每个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从集体农庄的公共经济中获得的。

毛：我们现在的农民，和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是一样的，他们的基本收入，都是从集体经济中得来，个人副业的收入只占一部分。问题是前一部分和后一部分的比例，我们前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可能比他们大。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互助组内农民对某些工作实行集体劳动，而同时不仅保持着土地的私有制，并且还保持着生产工具以及产品的私有制。

毛：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地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曾国藩恐怕是一个富农。他所提出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个字，是一种富农思想。

1. 苏联现在还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有斗争。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苏联现在还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当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不同。那时农民的生活完全建立在个人所有制上，现在是脚踏两只船，在一般情况下，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收入靠集体，从个人所有制方面得到的收入只占一部分。有三种所有制，就一定有矛盾，有斗争。他们同我们相反，不敢讲矛盾和斗争。

1. 苏联集体农庄个人副业收入占的比重很大，说明他们农村还有一个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根据农业劳动组合章程，每一集体农庄农户有宅旁园地上的副业、住宅、产品牲畜、家禽和小农具。

毛：苏联集体农庄中，个人副业收入占的比重很大，有的材料说占1/2。这说明，他们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教科书对集体农庄庄员个人的副业不提公有化的问题，似乎他们要使农民永远成为农民。

1. 教科书对苏联曾经成立过的农业公社一笔抹杀。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苏联的一些地区曾经成立过农业公社，这些公社在当时没有生命力，因为它们是在技术不发达和产品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

毛：这是一笔抹杀。

1. 讲阶级斗争好。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必然同工人阶级、贫农和中农群众与农村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相联系。苏联小农经济向普遍合作化的过渡，要求坚决粉碎富农的反抗。

毛：这段讲阶级斗争，很好。讲到富农进行各种破坏，应该说是许多富农，不是全体富农。

1. 列宁的合作化的基本原则就是集体化，机械化，按劳分配。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无论各个国家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差别有多大，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基本原则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国家都是共同的。

毛：列宁的合作化的基本原则，主要的就是集体化(合作化)：机械化，按劳分配，分配中照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六）自愿也要引导。不能借口“严格遵守自愿”而不搞合作化。**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对基本农民群众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对农村的物质上、财政上和组织上的援助，是保证顺利实现千百万小农户合作化的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实行农民合作化必须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在这方面，使农民根据先进生产合作社的实践确信社会主义大经济的优越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毛：不能借口“严格遵守自愿”而不搞合作化。自愿也要引导。我们在合作化中间，先引导贫农和下中农入社。农村有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入社，合作化就是势不可挡了。任何运动中，总有一部分人是随大流的。造成了形势，他们就可以跟上来。

**（七）对中农进行不进行分析是个重要问题**

1. 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农总是动摇的。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社会原因时：在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农总是动摇的，他们要看看，革命有没有力量，能不能站住，革命对他们有没有好处，看得比较清楚了，他们才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十月革命是这样，我国的土地革命、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也都是这样。

1. 对中农的二重性问题要做具体分析。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列宁教导：工人阶级在领导农民时，应当时时刻刻分清农民的两个方面——劳动者和私有者。中农按其本性说来是二重性的：作为劳动者，他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小私有者，他倾向于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是有某些矛盾的，例如在价格问题上，在税率问题上。但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和不可克服的。

毛：“中农按其本性说来是二重性”阶级。对这个问题也要做具体分析。贫农、下中农、上中农一方面都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都是私有者。但是，他们的私有观念是各不相同的。贫农和下中农可以说是半私有者，他们的私有观念要少些，比较容易改变。我们从来：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上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比较浓厚，他们历来对合作化有抵触。

1. 对中农进行不进行分析，是个重要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农民的小商品生产不可避免地产生资本主义分子；农民分为贫农和富农的阶级分化还在进行。但是，过渡时期的农民分化过程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性质：中农的比重较革命前日益增长，而贫农和富农的比重则逐渐减少。中农成了农业中的中心人物。

毛：

有问题。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土地不值钱，农民不敢“冒尖”。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情况不好。我们认为，经过阶级斗争，搞臭了地主富农，农民以穷为荣，以富为丑，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说明贫农在政治上已经压倒富农，而树立了自己在农村的优势。从一九五0年起，到一九五五年，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有争论。砍掉合作社的问题，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那些同志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代表了富裕中农想“冒尖”的心理。

他们认为合作社可以搞，但是要慢一些。经过批判，很多同志已经转过来，积极赞成合作化。

教科书中说“中农成了农业中的中心人物”。这个说法不好。把中农吹成中心人物，捧到天上去，不敢得罪他们，会使过去的贫农脸上无光，其结果必然是富裕中农掌握农村的领导权。同时，他们对于中农没有分析。我们把中农分成上中农、下中农，其中又各有新、老的区别，新的又比老的好一些。历次运动的经验证明，贫农、老下中农、新下中农，政治上好，积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拥护人民公社化。上中农中，一部分人拥护人民公社，一部分人反对人民公社。河北省的材料，全省共有四万多个生产队，其中：百分之五十完全拥护人民公社，没有动摇；百分之三十五的队基本拥护，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或者动摇；有百分之十五的队反对人民公社，或者发生严重动摇。这些队之所以反对或者严重动摇，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富裕中农手里，甚至掌握在坏分子手里。在这次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中，这些队要展开辩论，首先要改变领导。这些都说明，对中农进行不进行分析，是个重要问题。

1. 不能笼统说“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反对农业合作化缓慢发展的现象，领导着农民群众走向社会主义的广阔运动。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积极加入合作社。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不到4年的时间内，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共产党经常领导农民同过去的地主和富农反对合作化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

毛：

“广大的中农群众不再动摇”，不能笼统这样说。一部分富裕中农，现在动摇，将来还会动摇。

这本教科书第三版，苏联最近的增订本，在这段以前，加上了一段人民公社。“教科书”上有了公社，“立了案”，再反对人民公社就不太好办了。但是，它没有提我们的人民公社实行工农业并举，只说公社的多种经济中，包括地方性的辅助性的手工业。实际上我们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发展半机械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我们对地主、富农，按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实行分别对待的政策。我们已经把地主富农搞臭了，现在敢于出来发表反对公社化的议论的，只有富裕中农。东欧各国在农村不提出改造地主、富农的任务。

1. 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个国家里，合作社的形式具有自己的特点。在这些国家中，普遍建立了生产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农业劳动组合比起来，是一种低级形式。

毛：1959庐山会议以前，像新乡、洛阳这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

**（八）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1. 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关系极大。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中农问题的观点时：农村的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对农村的发展方向关系极大。

1. 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俄国十月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的观点时：农民中有几个阶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依靠是贫农阶层。

**（九）工农联盟的三个阶段**

1. 在国有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把工农联盟真正地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消失。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俄共(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党的极重要的决定着整个革命进程的政治任务，就是要极注意地和最细心地保护和发展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巩固的联盟是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间的正确的经济关系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的高涨及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条件。

毛：

这里讲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讲工农联盟怎样才能发展和巩固。讲了对小生产的农民要进行改造，但是没有叙述改造的过程，没有讲这个过程中每个阶段有什么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没有叙述整个改造过程中的步骤和策略。

我们的工农联盟已经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二阶段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础上。不搞合作化，农民必然向两极分化，工农联盟就无法巩固，统购统销也无法坚持；只有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统购统销的政策才能继续，才能彻底执行。现在，我们的工农联盟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巩固人民公社和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的阶段。单有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而没有机械化，工农联盟还是不能巩固的。有了合作化，又有了机械化，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工农联盟，才能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就合作化来：只是建立在小合作社的基础上，联盟也是不巩固的，必须从合作社发展到人民公社，还必须从人民公社基本队有发展到基本社有，再从社有发展到国有。这样，在国有化和机械化互相结合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我国工农联盟真正地巩固起来，工农之间的差别就会逐步消失。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关系问题的观点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合作化，完成得很慢，重要原因是，没有在土地改革后趁热打铁，而是间歇了一个时期。我们一些老根据地也出现过一部分农民满足于土地改革而不愿再前进的现象。

1. 俄国国内战争时实行余粮征集制，实在不妥。

毛在论述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苏维埃政权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的论述时：列宁在一个时期，恨透了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俄国国内战争的时候，实行余粮征集制，势必要对农民翻箱倒柜，这个办法实在不妥。我们有二十二年的根据地的经验，历来实行征收公粮和购买粮食的办法，使我们有可能不走俄国那样的弯路。

1.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不可避免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战时共产主义”在苏联过渡时期某一阶段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即在国内战争和经济破坏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WZ干涉和长期战争引起的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是不必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

毛：那个时候的俄国，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是无代价地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在WZ干涉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受到外国的WZ干涉，但是国内战争的时间比他们长得多，而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1. 尽力发展城乡的经济联系。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农民同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是通过买卖的交换。在过渡时期，国营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商业结合是经济的必然性。

毛：这里：“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十）“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是错误的**

1. 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在革命前的俄国农业中，几乎全部工作都是用人力或马力来完成的。在1928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99%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拉犁，而在1957年，则有98%的土地是用拖拉机曳引犁翻耕的。

毛：

这里：“在一九二八年全盘集体化的前夕，春季作物地的翻耕工作，有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使用木犁和马拉犁”。这个事实推翻了教科书在很多地方关于“要有拖拉机，才能合作化”的说法，肯定了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场所”的说法。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相对说来，他们的拖拉机比我们多得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改革是靠行政命令的，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没收的土地是有限额的，有的国家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才没收。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军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把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

1. 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物质基础”的说法不合乎实际情况。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工业化为集体农庄制度在农村中取得胜利，为在全国建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化给农业打下先进技术基础，从而给农民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化创造了物质基础。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以先进技术设备供应农村，建立城市同农村的生产结合；实行农业集体化，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毛：这几段话中有一个意思，说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农业集体化“创造了物质基础”。这不大合乎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苏联基本上实现集体化是1930-1932，那时，他们的拖拉机虽然比我们现在多，但是在1932机耕地的面积只占耕地总面积的20%。

1. 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是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结合的主要手段。生产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大工业以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供给农业，用新的完善的技术装备农业。

毛：“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高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

1. 国营农场很好，它有很高的商品率。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高度的商品率是国营农场最大的优越性。由于国营农场的高度机械化水平，以及拥有熟练的工作干部，所以现在它的劳动生产率高于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供应国家大量农产品。1957年，国营农场在国家收购量中所占的比重如下：肉类约21%，奶类约21%，羊毛约27%。

毛：国营农场这件事很好，它可以有很高的商品率。可惜这里没有写上苏联从国营农场中得到的谷物，占全部收购谷物的比重是多少。

### 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 “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的提法原则上对。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过渡时期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消灭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在同私有制传统势力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中，要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全体人民。

毛：在过渡时期中，要“进行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这个提法原则上对。所谓一切社会关系，应该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关系。

1. 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过渡时期的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展开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

毛：这里只说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展开谁战胜谁的斗争，这是很不完全的。我们的提法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 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所有劳动者都愿意建成共产主义，所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

毛：搞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也是不知道怎样革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使我们搞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现在看来，这方面的革命是非常重要的。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1.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革命。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

毛：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里说依靠群众的“积极活动”来克服矛盾。应该认识到，所谓“积极活动”，包含着复杂的斗争。要对各种错误的倾向展开批评和斗争。

1. 社会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问题值得注意。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由于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于1936年，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从立法上，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础巩固下来。这个宪法不仅在形式上把公民的权利固定下来，而且把重点转到从实际上来保证这些权利。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

毛：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1.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但有机会他们是要猖狂进攻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巧妙地运用了国内现有的通过广泛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措施，并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来实行和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客观可能性。

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有机会他们还是要猖狂进攻的。1957资产阶级右派进攻被我们打退了。

1. 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所有劳动者都愿意建成共产主义，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

毛：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

1.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国家实行限制、排挤、最后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政策。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反对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合乎规律的。

毛：中国的经验，在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有广大农民援助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双方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

1. 我们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整个世界观。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根据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工人阶级可以吸收某一部分资产阶级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乃至国家管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形就是这样。

毛：教科书：我们吸收资产阶级分子来参加企业的管理和国家的管理，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同时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的任务，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整个世界观，或者改变他们在个别问题上的个别观点。教科书却不提对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改造。

1. 我们这里还有敌对势力。教科书对于合作化以后的农村，不讲人民内部矛盾。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实行全盘集体化的头几年，集体农庄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从组织上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加强党和国家对集体农庄的领导，肃清钻入集体农庄、力图从内部摧毁集体农庄的敌对的富农分子。

毛：我们这里还有敌对势力，在农村，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一部分坚决反对公社化的富裕中农。在河北省，有百分之十五的队，被这些富裕中农和坏分子所掌握。不过我们还是把这些富裕中农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教科书对于合作化以后农村情况的叙述，不讲富裕阶层的问题，不讲人民内部矛盾，例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等等。

1. 社会主义社会先进的人忠心耿耿，落后的人为名为利。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矛盾的性质的观点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先进的人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勃勃；落后的人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我国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这些变化进行抵抗。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有斗争，广东在农村同富裕中农展开农业“八字宪法”的辩论，就是证明。

1. 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成员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

毛：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的成员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事实上是有不少人“极其关心”自己的卢布。

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大工业消灭着资本主义因素，而小农经济却经常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

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不断发展的，因而也需要不断解决。某一种生产关系这个时候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一个时候就不适合了。例如，我国全国一完成高级合作化，当时每个专区、每个县就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

1. 八大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毛：这一段里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提法，是对的。我们在1956八大第一次会议的政治决议中：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不对。半年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我们很多同志就觉悟了，并且采取了正确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

1. 政权先进和经济落后的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维埃政权初期，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和落后的技术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毛：同外国来比，政权是先进的，经济是落后的，我国现在也有这种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国内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些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赖以发挥的经济基础。而这些动力又反过来给予经济很大的影响，加速经济的发展。

毛：这一段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四）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影响束缚下解放出来**

1. 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需要半个世纪。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的观点时：我们的经验证明，改造是不容易的，不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都是不能改造好的。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和他们的影响，至少要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甚至需要半个世纪。

1.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完全克服。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彻底克服，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的第一需要。绝大多数工作者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在劳动中表现出积极的创造性，但同时也有一些工作者不老老实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破坏劳动纪律。

毛：

这里说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尚未成为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里的“一切成员”讲得太笼统了。列宁也是社会成员之一，能够说劳动没有成为他生活的第一需要吗？

这一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两部分人：极大多数人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义务；有一些工作者却不老实地对待自己的义务。这个分析是对的。但是要使一部不老实对待自己义务的人转变过来，也不能光靠物质刺激，还必须经过批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

教科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尚未完全克服。这么多年了，老是不“克”，怎么能“服”呢？

**（五）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1. 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过渡时期的基本阶级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工人阶级在尽量扩大工人和农民的新知识分子的队伍时，也努力吸收旧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专家在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毛：这一段讲了培养工农自己的知识分子，吸收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没讲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就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各方面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改造。文艺界的一些人，当了作家以后，大反社会主义，就是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们不重视这个问题，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一些旧东西采取迁就的态度，当然是不对的。

1.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吸收部分资产阶级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乃至国家管理问题的观点时：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有些人在有了知识以后，就待价而沽，没有高价钱就不出卖。他们只专不红，说党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搞电影的说党不能领导电影，搞歌舞的说党不能领导歌舞，搞原子能的说党不能领导原子能科学事业，总之，说党不能领导一切。

1. 美国不少搞文化的人，干的是反共。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苏联非生产部门的工作者有60%以上是在科学、文化和保健部门工作。而美国在文化和保健方面工作的人，不到非生产部门的工作者的1/5。

毛：美国不少搞文化的人，干的是反共。对于苏联在科学、文化和保健部门工作的人，也要看看他们站在什么立场，干些什么事。

**（六）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教育问题的观点时：这一段只是讲了社会主义建设同文化革命的联系，讲了结束有产阶级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但是没有明确讲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

**(七)逐步改造农民的世界观**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的观点时：在农村来：基本社有制实现了，社有进一步变成国有了，全国布满了新的城市和工业，全国的交通运输都现代化了，经济情况真正全面改变了，农民的世界观才能够逐步地以至完全地改变过来。

**（八）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1. 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条件。列宁写道：“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毛：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1. 我们要用辩证唯物论教育全体人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问题的观点时：辩证唯物论不是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们要用这种世界观教育全体人民，首先是劳动农民，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1. 我们的干部子弟要完全靠自己。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各人民民主国家中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问题的观点时：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善于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问题的观点时：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1. 要破除迷信。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时：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 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所以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这些矛盾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有意识、有计划地领导共产主义建议的过程中，逐步获得解决。

毛：这几句话说得很空，不能解决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

1. 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是就每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来：总是有个开始，有个结束，就是：总有个“边”，不能没完没了。例如我们的这次全党整风，干部中的反右倾斗争，争取在一九五九年年底以前基本上完成。这也是“边”。我们在改造思想方面，进展很快。有些人跟不上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可避免的。经过批判，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可能重新转变为左派。而这次斗争的左派中，也可能将来有些人会变成右派。就整个思想改造的战线来：我们有不断的量变，也有不断的部分质变。总有一天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完全肃清了，这种思想改造的质变也就完成了。那个时候，又会开始新的基础上的量变过程和部分质变过程。

### 七、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1. 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物质福利的目的，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取之不尽的泉源。

毛：好，社会主义生产服从于需要。

1. 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书中讲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说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为剥削者谋利润的经济。不能说是错误的。书里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书里讲了高速度、按比例、计划性，等等。这些都是讲马克思主义的。

**（二）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

1. 建设社会主义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生产基础方面的任务，一定会在最近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只有解决了技术改造方面的这些任务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完全建成。

毛：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1. 拥有机床多少是工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机器和设备的数量增加特别迅速。例如，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人使用的机床的装备程度提高5倍。同时必须看到，机床设备的生产能力日益提高，技术也日益改进。

毛：1949我国拥有机床九万多台，1959增加到四十三万台。日本1957有六十万台。拥有机床多少，这是工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机械化水平还很低，从上海就可以看出来。那里机械化劳动、半机械化劳动、手工劳动各占1/3。

1. 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社会免除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由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而造成的大量浪费社会劳动的现象，它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和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节约最有效地利用全部资源，发掘增加生产的一切新泉源和新潜力。

毛：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1. 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就要发生变化。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发展，劳动技术装备的不断提高，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极重要的条件。

毛：技术一发展，劳动组织、劳动力的分配就要跟着发生变化。军队也是这样。

1. 长时期内，我国应叫做工农业国。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成分的观点时：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1958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6%；1959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70%。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的论述时：长时期内，我们这个国家应该叫做工农业国。即使钢有了一亿多吨，也还是这样。如果按人口平均的产量超过英国，那么，我们的钢产量最少需要三亿五千万吨以上。

1. 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同时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盘机械化得到日益广泛的发展。它走向生产自动化的一个过渡阶段。

毛：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1. 用四到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农业机械化。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同农民经济的商业结合；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以先进技术设备供应农村，建立城市同农村的生产结合。

毛：我们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曾经说到，要用四个五年计划到五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

1. “事在人为”，级差地租不完全由客观条件形成。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与使用土地有关的国营企业(国营农场、煤矿、矿山等)：由于土地肥沃程度高、煤层或矿石蕴藏丰富，也有级差地租性质的补充收入。和集体农庄的级差地租不同，国营企业的级差地租完全归国家支配。

毛：

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例如，在河北省内，京汉路沿线的机井很多，津浦路沿线的机井却很少，同样是河北平原，同样是交通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却各不相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或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为”。同在上海，有的区养猪养得好，有的区却养不好。同在上海属的崇明岛县，原来说那里芦苇多，不利于养猪，现在却看到芦苇多的条件下不但不妨碍养猪，反而有利于养猪。这些说明养猪多少、好坏这件事，同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同“事在人为”是密切相关的。北京昌平县过去常闹水旱灾害，修了十三陵水库，情况改善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吗？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以后再用几年，治理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事在人为”。实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

大冶钢铁厂所需要的煤和铁都比较远。马鞍山附近有煤有铁，条件好得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注意建设，现在已经有了很快发展，以后还会更大发展。它的劳动生产率比大冶高，成本比大冶低，积累会比大冶多，这就是得到了级差地租的好处。

关于耕三余一。《项羽本纪》：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二十一岁到二十三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二十四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公积金包括固定生产基金和非生产基金，还包括用来满足公共经济的需要的流动资金。

毛：现在我们都不算土地的价值。从古以来，没有不被破坏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坏的土地。我国现有十五亿八千万亩耕地，绝大部分是古人留下来，是人们千秋万代的劳动所经营出来的。到现在我们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劳动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经济学家们最好能算算土地的价值。

1. 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化学日益广泛的发展和化学加工方法的采用，也表现出现代技术的进步。在苏联，化学工业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发展的强大因素。化学化是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最重要的条件。创造丰富的消费品要求国民经济广泛实行化学化。

毛：对农业，我们现在不提化学化。一是因为若干年内还不可能生产很多的化肥，已有的一点化肥，只能集中使用于经济作物；二是因为提了这个，大家的眼睛都看着它，就不注意养猪和充分利用农家肥料了。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共产主义的物质生产基础将意味着：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农业方面，完全实现生产的全盘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农业的化学化可以保证全部农作物得到稳定的丰收。

毛：光靠化学化来得到稳定的丰收，有危险。无机化肥要有，但是如果只靠它，而不同有机肥结合起来，会使土壤硬化。无机肥不如有机肥好。

1. 地球是有限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苏联在农业生产的配置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苏联东部地区建立了强大的谷物基地，主要是在东部地区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农业生产的配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毛：地球是有限的。到了全地球的荒地都开完了，那时只能够向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利用海藻这些方面发展。

**（三）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 中国“是一个大国，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源，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

毛：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来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

1. 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1956.9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

毛：我们八大第一次会议曾：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又说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两个说法有点矛盾。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1958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有260+亿元，1959有300亿元，两年合起来，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550亿元。

**（四）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巩固的过程**

1.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中国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论述时：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1.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两次曲折中巩固。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的矛盾的性质问题的论述时：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0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1956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1957.6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1959.6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情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1. 写解放后各个方面的历史是个好办法。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最初，革命消灭了地主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产生了。

毛：现在各部委都在写解放后十年来各个方面的历史，例如，写解放后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这是个好办法。

**（五）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

1. 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具体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前提。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保证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的极重要的条件。

毛：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他们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

1.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根据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要建成社会主义、不断提高生产和人民的福利，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为制造消费品部门的发展、为提高人民的福利创造前提。

毛：这段话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

1. 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同时必须使农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毛：

这一段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年估计可生产钢材一千三四百万吨，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怎么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呢？

1. 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论述时：蒙古革命是一九二一年成功的，到现在这么多年，人口和牧畜都增长得很慢，同农业没有得到发展有很大关系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的观点时：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东欧各国过去几年都是这样的。从一九六0年起，我们要增加农业所需要的钢材。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的论述时：波兰有三千万人口，只有猪四十万头，闹得现在肉类供应非常紧张。看来，波兰现在还没有把发展农业放在议事日程上来。

1. 要对农业、轻工业大量投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人民民主国家一面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一面对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大量投资，大力发展农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每个国家根据本国各种具体条件来发展某些工业部门，就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为迅速提高人民生活福利创造条件。

毛：这里说要对农业、轻工业大量投资。问题是什么叫大量？我们过去也讲是对农业大量投资，但实在说还不像样子。拿一九五九年：给农业的钢材也只有五十多万吨。原因是我们过去重工业底子太小，钢的产量太少。一九六零年开始，给农业的钢材增加了，以后，还将逐年增加。这才可以说是开始大量投资。想多搞一点，“犯罪”不那么严重吧。

1. 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积累大批资金。土地改革后，农民不再向地主缴纳大量的地租，这就使他们除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以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劳动成果来支援工业化。

毛：按照马克思的学：工业是由农业有剩余产品开始的。

毛在批注中强调，农民拿出来支援工业化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剩余的。

1. 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小农经济愈来愈不能满足城市居民对粮食的日益增长的需要，以及发展着的工业对原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这就妨碍了国家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不仅为工业而且也为农业制造各种生产工具，而在小农经济存在的情况下，它就没有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来销售各种现代化的复杂农业机械，因为这些机械只有大经济才能大规模使用。

毛：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1. 不实行工农业并举，怎么能行？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生产资料生产(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保证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的极重要的条件。

毛：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63%。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1956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1960年。

1. 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从1925年到1957年，苏联全部生产资料生产增加93倍以上，而消费品的生产增加17.5倍。人民消费品生产已经达到的水平和增长的速度还不能适应居民对这些消费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毛：这里说到1925-1957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93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17.5倍，问题是，93同17.5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

1. 我们还要逐步地从农村解放出一部分劳动力，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要保证工业有能够掌握和充分运用这些技术的熟练工人和专家干部。城市居民的自然增加，因农业获得新技术装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农村后备劳动力，是保证工业得到干部的主要泉源

毛：这几句话说得对。现在我们有些城市办了人民公社，吸收了大批的人员参加生产，这就增加了劳动力。现在我们还要逐步地从农村解放出一部分劳动力，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有了人民公社以后，这个问题就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现在帝国主义不说我们不行了，也开始承认人民公社不会垮台了，但是他们还说我们的公社不好，说公社就是奴隶劳动。

1.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积累。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认为价格应当丝毫不差地符合于商品的价值。问题不在于使价值规律具有广阔的活动场所，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者，而在于把这个规律用作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的经济杠杆。

毛：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1. 我们要大量发展养猪事业。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到1962年谷物的产量要达到25000万吨(1957年计划为18160万吨)：皮棉为240万吨(1957年计划为160万吨)：猪的总头数要达到25000万头，比1957年增加12200万头。

毛：我们要大量发展养猪事业，第一步争取全国平均每人一头猪，第二步争取全国平均每亩耕地一头猪。城市要在所属的郊区、县大量发展养猪，争取猪肉基本自给，不能只是指靠乡村农民供应，这样做，会反过来促进全国农村大大发展养猪。

1. 教科书对我国并举方针的歪曲。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反对以狭隘的消费观点对待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表现为：忽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否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必要性，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必须以同样的速度发展，甚至主张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比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发展得更快。

毛批注：是对我们的并举方针的歪曲和攻击。

1. 他们的农业、轻工业是长期落后的。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的经济规律并不排斥在个别时期，为了提高落后的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消除它们的落后现象和克服因此而造成的局部比例失调现象，加速这些部门的发展。

毛：他们作的这个补充，看来不加不行。不只是局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农业、轻工业是长期落后的。

1. 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必须合理地分配投资，使重工业和轻工业不论何时都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毛：这里只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没有讲工业和农业也要保持正确的比例关系。

1. 炼钢有两个问题：矿石，铁路。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物资后备、财政后备和劳动后备对于国民经济不断地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如果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就能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生产不断增长。

毛：1958秋我们的计划部门提出了1959生产三千万吨钢的要求，但是没有计算矿石能否供应，轧钢设备是否平衡，运输能力是否适应，结果弄得很紧张。过去我们在革命战争中，曾经说过，人是要吃饭的，人是要用腿走路的。看起来，炼钢也有这两个问题，它吃饭就是吃矿石，它走路要靠铁路。

1. 党组织不挂帅，要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是不可能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有计划的经济管理，就是集中的有计划的领导经济同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创造积极性相结合，同地方经济机关、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工会以及各个企业在制定计划和争取完成、超额完成计划方面的必要独立性和广泛主动性相结合。

毛：教科书把党组织放在地方经济机关之后，地方经济机关成了头，它又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这就使地方党组织不能在当地挂帅。党组织不挂帅，要在当地充分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发挥广泛主动性，是不可能的。

1. 如果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在基本建设中，巩固经济核算制，缩短建设期限，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具有巨大的意义。

毛：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1. “十大关系”提出了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的方针。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观点时：在工业建设方面，搞小型企业，土法生产，这两条首先是钢铁工业部门提出来的，也是他们首先实行的。目的是为了多搞钢铁。“十大关系”中还没有这两条，但是中央和地方同时并举这个方针，已经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实行这个方针，就必然引出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土法生产同时并举这两条来。因为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开始时主要靠中小型企业和土法生产。

1. 广泛地发展半机械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阶级斗争问题的观点时：教科书没有提我们的人民公社实行工农业并举，只说公社的多种经济中，包括地方性的辅助性的手工业。实际上我们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按照计划安排，广泛地发展半机械化的到机械化的社办工业。

1. 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战后时期，苏联的许多工业部门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苏联钢铁企业、在机器制造业、化学、造纸、炼油及其他工业部门中，自动化设备日益增多。

毛：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被克服。

1. 在沿海省份建设新的工业。

毛在评论(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苏联工业化的成就的观点时：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

1. 我们实行几个同时并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的大跃进。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工业在保证积累的增长方面无可争辩地优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资料公有制，工业发展的计划性，工业资源的合理利用，工人阶级的劳动积极性，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一切为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

毛：我们实行几个同时并举，争取实现经济发展的大跃进，就全国来：能够大大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同时，由于要增加很多新的生产单位，也就要吸收很多新的劳动力。

1. 我们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给工农业各部门以技术装备的基础)的必要性为出发点的。同时，根据原料、财力和市场的需要，采取了发展轻工业的各种措施。除了建设大型企业外，还规定广泛地发展中小型企业，这是由于国内技术经济十分落后，人口众多以及与此关连的就业问题。

毛：这里没有正确反映我们的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思想。因为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我们在大型企业的主导下，大量地发展中小型企业，在洋法生产的主导下，普遍地采用土法生产，主要是为了高速度。

**（六）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1. 我们现在就是要“开足马力奋勇前进”。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毛：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

1. 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工业化的速度对于苏联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

毛：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

1. 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维埃国家仍旧是小农国家，其中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为了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必须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在以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集体劳动的基础上改造分散的私有制的农民经济，使资本主义丧失在小商品生产中的基地。因此，必须迅速发展重工业。

毛：这里只讲了政治环境要求高速度，没有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许可高速度，这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有需要，而没有可能，那怎么能高速度呢？

1.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社会产品的销售问题。社会主义生产不会遇到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销售困难，因为居民福利的增长造成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断扩大。然而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中就不会发生国民经济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

毛：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产阶级的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现有二万四千多个人民公社，如果其中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公社，在统一领导、计划安排下，利用当地的各种工业资源，办起各种形式的“小洋群”、“小土群”工业，包括钢铁的“小土群”，那就可以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1. 大跃进上了教科书就好办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主义生产关系)：改进对工业和建筑业的领导，是一项重要的革命措施，它使工业在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大跃进。

毛：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他们也有大跃进，大跃进上了教科书就好办了。但是，新的增订本又改成了“巨大的发展”。

**（七）实行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

1. 教科书不讲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

教科书说(结束语)：共产主义是以马列主义理论WZ起来的共产党领导千百万劳动群众自觉地进行创造活动的结果。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社会向共产主义前进。

毛：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走向个人主义。书中有时也讲发动群众，也引了一些列宁关于发动群众的好话，但是没有展开，不敢像我们这样大搞群众运动，不讲两条腿走路。这事情也确实很难。

1. 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

毛：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的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1. 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全会在谈到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时曾经强调指出：“鉴于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中央全会指出，只有加速发展工业和实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才能解决这些任务。”。

毛：联共中央1928.11全会决议里面的这些话，很好。我们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决议。斯大林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指靠，只有靠群众，所以他们要求党和工农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后来有了一点东西了，就不再那么靠群众了。

1. 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会造成损失。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不断改进生产组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巨大的意义。要改进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就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采用流水作业法，以及实行其他各种措施。

毛：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

1.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群众积极参加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斗争，这是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速度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毛：这里把群众的斗争只看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

1. 人口的多少是经济的发展的一个因素。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建成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条件。

毛：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多少是个因素。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发展最快，有六千多万人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八）自力更生、厉行节约**

1. 我们主张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彼此取长补短，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毛：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

1. 搞大的洋的方面也不能指靠人家。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给工农业各部门以技术装备的基础)的必要性为出发点的。除了建设大型企业外，还规定广泛地发展中小型企业，这是由于国内技术经济十分落后，人口众多以及与此关连的就业问题。

毛：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

1. 厉行节约，积累物力财力。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过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很落后)的工业化，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在苏联建立重工业，要付出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为了积累必要的资金来建设新工厂，必须在经济中厉行节约。

毛：这里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需要厉行节约了吗？资本家一方面在生产上注意节约，另一方面在消费上却极为浪费。

1. 合理和节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没有浪费社会劳动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来保证社会劳动及其成果得到合理而节约的使用，社会主义也是不可想象的。

毛：合理和节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认识。今天看来是合理的、节约的事情，过一个时期，由于新的条件，又成为不合理、不节约的事情了。

**（九）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争取把大跃进继续下去**

1. 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观点时：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

(1964.12.13。二十九日，毛对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先后做过两次修改，正式公布的一节全文如下：

“第三，实行技术革命。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用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

其中“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这段话，全是毛在十二月十三日加上的。)

1. 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可能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的观点时：“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1. 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逼着我们努力。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地位问题的观点时：人这种动物有一种毛病，就是看不起别人。只看见自己的长处，看不见别人的长处；有了点成就的人，看不起还没有成就的人。大国富国看不起小国穷国。西方国家历来看不起俄国。中国现在还处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这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钢，人民生活水平这么低，有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们，对我们有好处，逼着我们努力，逼着我们进步。

1. 我们的任务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美国。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和可能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的观点时：对我们一九五九年的新闻公报，《纽约时报》的：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四条：一、中国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苏联那时没有这种帮助，它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国的合作化搞得快，没有造成损失；三、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集中营”的方法组织起来了，拿我们自己的话来：就是人多，而且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下高度地组织起来了；四、中国是后进的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到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即使达到了这一点，按人口平均，还相距很远。

毛：美国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常用自己驳掉的论点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个报告对中国政策的结论是采取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不承认中国，但是要同中国接触，通过接触，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报告：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1.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很有意义。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战后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以资本主义梦想不到的高速度有计划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可是在同一时期，美国却遭受到1948—1949年和1953—1954年两次经济危机，结果生产下降，失业增多，而从1957年底开始，美国又发生了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生产过剩危机。

毛：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质刺激。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我们还比他们落后得很远，我们一定要争取赶过他们。日本这样小的国家，都有四百万吨商船，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船队怎么能行。

1. 我国也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地物质基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观点时：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

**（十）提高劳动生产率**

1. 劳动生产率是螺旋式上升不断提高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生产不断地和有计划地发展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开始发生作用。

毛：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中，劳动生产率都是螺旋式上升，不断提高的。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高，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高，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又比资本主义高得更多。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不同的是，在阶级社会里，有时下降，有时中断，有时上升。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在危机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下降。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不遇到特殊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下降的现象。

1. 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为了保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不断增加国民经济投资和固定基金，加快劳动机械化的速度，不断地、与生产密切相结合地发展技术和科学思想，研究和利用国外的技术成就。机器和生产过程的经常的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穷的泉源。

毛：上面的前两段讲得还好。看了第三段，知道政治经济学不能不接触生产力方面的问题，这里讲了一点道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技术进步。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

1. 关于无形损耗的问题。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有人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机器似乎只有有形损耗，而没有技术进步所引起的无形损耗，这种论断在实际中就造成了折旧定额偏低，因而阻碍了固定基金的更新。

毛：关于无形损耗的问题，不是它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同，而是社会制度的不同，使无形损耗产生不同的后果。

1.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精神作用。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源，经常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可以保证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

毛：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列宁指出，要建成社会主义，并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

毛：他们老是引列宁的这句话作为他们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的根据，我们要找出一些列宁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即书中所谓精神鼓励的话来。

1. 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有问题。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工人把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庄员提高到农艺师的水平时，就会使劳动生产率达到能保证一切物质资料十分丰富的新高涨。

毛：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

**（十一）合理安排劳动力，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

1. 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已经完全失去效力。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随着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随社会主义积累的增长而增加，就业人数不断增加，失业现象消灭，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到合理的使用。

毛：就是使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

1. 合理安排妇女就业。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在苏联，妇女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实际上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

毛：医生、教师，服务行业和邮政这类工作，尽可能都让妇女去做。

1. 关于退休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在苏联消灭了失业，工人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就业。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因此工人得到的每一工时的工资就较高。

毛：关于退休问题。男人六十岁、女人五十五岁就要退休，这个制度不一定好。五六十岁的人，正是好做工作的时候，退休了，一点工作也不做，对自己身体和思想都不好。老年人如果身体支持不下来，可以少做些工作，也比完全退休好。

1. 人口增加要有计划。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已经完全失去效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劳动能力的人的充分就业和人民福利的不断增长，使患病率和死亡率降低，使人口总数迅速增加。

毛：人口增加总要有个限度，要有计划。

**（十二）计划是意识形态，它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发展的快慢，有着很大的作用**

1. 计划对经济发展具有多么大的作用。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政策上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毛：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1. 计划要以经济规律为依据。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一切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服从社会的统一计划领导，遵守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种成分之间的比例。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比例经常遭到破坏相反，社会主义的特点就是计划性，根据列宁的定义，这种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

毛：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教科书：“计划性意味着经常地自觉地保持着比例”。这里的“经常”、“自觉”，如果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但要实现这个任务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说过，苏联的计划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反映了规律的要求。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1. 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正确地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首先是掌握并善于利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

毛：这段话讲得好。“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这个当做任务来提，是对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1. 政治挂帅，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在论述改造俄国经济制度的正确途径时指出：“一般说来，这种办法就是向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经济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

毛：列宁的这段话，讲得很好，可以用来辩护我们的做法。他讲到“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我们的政治挂帅，就是为了提高居民的觉悟程度。我们的大跃进，就是实现这种计划或那种计划的尝试。

1. 应加上发展的高速度。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的实现，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外环境。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之间进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并确定国民经济的比例。

毛：应加上发展的高速度。

1. 合同就是计划。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农产品采购计划办法时：计划第一，合同就是计划。

**（十三）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

1. 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工业生产都高速度地发展，它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都正在胜利地完成。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各国间计划经济合作的成功经验，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和繁荣文化的巨大可能性。

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计划工作中的各种平衡表，也是暂时的、过渡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能设想，有一种平衡表是没有条件的，是永远适用的。

1. 教科书没有研究矛盾。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

毛：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教科书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规律这一章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提出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其他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研究矛盾。例如，数量和质量，产值和品种，都没有当做对立的统一来研究，这表明他们没有运用辩证法来研究这个问题。

1. 不能完全否定突击。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采用流水作业法等措施改进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就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作业法，以及实行其他各种措施。

毛：“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根本否认突击、赶任务，讲得太绝对了。预定进度表不一定完全反映实际，一切都机械地按照预定进度表执行，就会妨碍生产。不能完全否定突击。我们这次读书就是突击。书出了好几年，我们没有读，这次花点时间读完，还不是突击？突击和不突击是对立的统一。在自然界中，和风细雨和疾风暴雨，波浪的起和伏，是对立的统一。在生产方面的技术革命，也常常发生突击的问题。比如，一个工厂里的某一个车间，技术革新之后生产大发展，其他车间跟不上，就需要突击。农业生产要抢季节，唱戏要有高潮，否定了突击，实际上是不承认高潮。苏联要赶上美国，我们想不用苏联那么多的时间达到苏联那样高的水平，这些也都是突击。

### 八、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断地改进和变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大有文章可做。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中：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1. 在劳动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生产力的不断迅速增长，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这种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场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的增长，反过来也会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在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沿着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向前发展着。

毛：这里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二）企业管理制度**

1. 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国有化的企业中，人剥削人的现象归于消灭。在工人中间发起了社会主义竞赛。把一长制和劳动群众的创造积极性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管理原则逐渐确立起来。

毛：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无产阶级专政保证创立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的类型。

“社会劳动组织”是个什么意思？我们创造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能不能说是一种社会劳动组织？

1. 这十年中国营企业人与人的关系变化很大。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中：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1. 干部要放下架子，同工人打成一片。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

毛：

这段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既然“体力劳动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为什么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一长制，而不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呢？他们不能设想工厂的管理可以有一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黑龙江省、河北省、北京市关于城市街道公社的材料，说明经过街道公社，把居民的生产、生活、教育组织起来，好处很大。这使我们在城市里找到了一条实现公社化的道路。这个问题，现在要积极抓起来。

1. 规章制度也要不断改进。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计划化要求深入研究并尽量利用国内外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以保证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技术的迅速进步、工艺规程的不断改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毛：这里讲工艺规程的不断改进，当然是对的，但是没有讲其他规章制度也要不断改进。而且，不断改进的话好讲，真正做起来就难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彻底实行主要的和最繁重的生产过程的机械化。

毛：这一大段讲生产力的问题，没有讲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有什么不同的特点。规章制度的问题，有许多是同生产关系有关系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条件下，能够充分利用共同劳动的长处，采用最有效的生产组织、劳动组织和经营方法，吸引群众参加不断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创造性的工作。

毛：这段话的意思似乎可以包括不断地改进技术规程和规章制度。这本书里面不大讲生产管理、规章制度需要改进，这里写了是好的。不过，写是写了，做起来仍然不大容易。他们的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多少年来没有什么改进。

1. 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政治教育。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工会的使命是要促使劳动者的物质生活与文化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它们有权对于劳动立法的遵守实行国家监督，对劳动保护状况实行社会监督。

毛：教科书不讲工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不讲如何加强政治教育，只偏重讲福利。

**（三）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社会主义竞赛要讲政治**

1. 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不断改进生产组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巨大的意义。要改进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就要同突击现象作斗争，要按预定进度表均衡地工作，采用流水作业法，以及实行其他各种措施。

毛：社会主义竞赛就是落后者要赶上先进者，这是要经过突击才能达到的。人与人，组与组，企业与企业，要竞赛，要赶上先进，难道国与国就不要竞赛，不要赶先进吗？

1. “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写得不错，缺点是没有讲政治。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竞争。“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

毛：“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这一节的缺点是没有讲政治。

1. 开展竞赛，还是要靠精神起作用。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竞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动力。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愈来愈广泛地参加了社会主义竞赛。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这些刺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毛：开展竞赛，还是要靠精神起作用。先进和落后是劳动人民内部矛盾。生产多和生产少，是矛盾。这里生产这个，那里生产那个，也是矛盾。如果没有矛盾，还要什么竞赛？

**（四）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

1.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大大提高劳动者的文化，能够全面发挥人民的智慧和才能，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他们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

毛：这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劳动者的智慧和才能“是不可能发挥的”，这种说法缺乏历史观点。工人比起奴隶和农民来，他们的才能总要发挥得好些。资产阶级普及了教育，创造了现在这样的学校，这对于劳动者的智慧的增长和才能的发挥是有帮助的。当然，他们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文明的奴隶，来为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才能和智慧的发挥是受到很大限制的。

1.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不是一致的东西。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形成逐步缩短工作日的经济条件。这就使社会成员有可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掌握知识和文化，来发展自己的全部体力和智力。

毛：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1. 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地位决定于社会出身和财产；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

毛：说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只决定于劳动和个人的能力，这个提法不妥。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

### 九、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一）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

教科书说(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财政体系依靠工农业产品的增长和商品流转的扩大。同时，财政对于生产和商品流转的发展，也给以积极的影响。

毛：商品流转，就是产品进入流通过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

**（二）商业和市场管理**

1. 合作社商业并入国营商业，比较节省。

教科书(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在苏联，经营人民消费品的商业有下列形式：(1)国营商业，(2)合作社商业，(3)集体农庄商业。

毛：他们是国营、合作社营两套系统。我们实际上是一套，即合作社商业并入国营商业。这不仅好办事，而且比较节省。

1. 我们对商业的监督。

教科书说(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公共监督对于改善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和公共饮食业企业的工作，具有很大意义。

毛：我们对商业的监督，主要靠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群众监督这一套。

1. 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

教科书说(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社会主义商业企业的纯收入是由劳动创造的：第一，是商业工作人员的劳动，第二，是社会主义生产人员的劳动。

毛：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没有他们的劳动，生产就不能转化为消费，包括生产和生活的消费。

1. 我们对市场的管理。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通过有系统的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

毛：我们对市场的管理，对三类不同的物资采取三种不同的办法。第三类物资，允许人民公社和农民在集市上出卖，价格由国家管理，规定一定的幅度。这种办法，对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有好处。

1. 苏联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集体农庄市场上的价格是在供求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对集体农庄市场有调节。

毛：他们那里的集体农庄市场的自由太大了。说对这种市场的价格只用国家的经济力量来进行调整，这还不够，还要有领导，有控制。如果不控制，投机者就要大赚其钱。我们初级市场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一定的幅度，不让小自由变成大自由。

**（三）关于商品的价值和使使用价用价值的关系**

1.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间不存在对抗性矛盾，但会产生非对抗性的矛盾。

毛：使用价值和价值，首先要有使用价值，要产品质量高，否则卖不出去，价值不能实现。当然，价值过高了也卖不出去。有些地方的粮食，从使用价值来看，同别的地方的粮食是一样的，但是收购价格定得太低，农民很不高兴。

1. 计算劳动的两种形式。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随着共产主义的确立，社会将逐渐用工作时间直接计算劳动，而不再采用价值和价值的各种形式了。

毛：现在计算劳动，采取实物计算和价值计算两种形式。实物计算形式，例如多少万吨钢，多少千匹布，多少立方土，等等，比价值计算形式，更易为人们所了解。

1. 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做总体评价时：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

**（四）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调整的实质**

1. 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正确计划工业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的必要条件。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认为价格应当丝毫不差地符合于商品的价值。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价格时应适应消费品市场价格的行情波动。实质上这样的立场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优点之一——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消灭生产中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

毛：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约束社会集团购买力，国庆期间嘱咐大家不要抢购商品，这就是计划。当然，价格问题是我们要注意的。前几年我们曾经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对于发展养猪有很大作用，但是，像现在这样的大量的普遍的养猪，主要还是靠计划。

1. 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实行的降低人民消费品价格的政策和提高货币购买力，是实际工资不断增长的巨大因素。苏联1947年到1957年间，降低日用品零售价格的结果，使这些价格的总水平差不多降低了56.5%，因而使居民得到了很大收益。同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物价上涨，据官方统计，生活费指数在美国增加了26%，在英国增加了62%。

毛：

这两小段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个是消费品价格的问题。教科书说他们的办法是降低物价，我们的办法是稳定物价，一般的不涨也不降。我国工资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普遍就业，物价低，房租低，不收所得税；前几年发了公债，现在停发了，职工的生活并不坏。究竟是不断地普遍地降低物价好，还是一般的不涨不降好，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一个是轻重工业品的比价问题。他们是重工业品价格低，轻工业品价格高。相对说来，我们是轻工业品价格低，重工业品价格高。为什么这样，究竟怎样才好，也值得研究。

1. 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毛：这里：“生产单位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量”。长春汽车厂现在能够生产二三万辆，将来能够生产十几万辆。从使用价值来看，每辆汽车都是一样的。但是从价值来看，将来生产多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每辆汽车所包含的价值量就比现在大大降低了。

1. 轻、重工业品的价格比率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重工业和农业所创造的很大一部分集中的纯收入，也通过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燃料、原料)的价格的调整，先转入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再以“周转税”的形式缴给国家。

毛：苏联重工业品的批发价格定得低，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产品成本低。也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他们的轻工业品的价格高，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那么，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这些问题，都要好好研究。要做调查，找些人谈谈，也可以考虑派个代表团去苏联研究研究。

1. 工人和农民在价格、税率问题上的矛盾。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是有某些矛盾的，例如在价格问题上，在税率问题上。

毛：工人和农民在价格问题上、税率问题上的矛盾，在我们这里也存在。比较起来，我们在税率问题上的矛盾比价格问题上的矛盾要小一些。同苏联比较，我们在价格问题上的矛盾也没有他们那么大。最近准备把有些地区粮食的收购价格每斤提高一分钱，销售价格不变，因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增加的支出准备采取对经济作物增加一些税收的办法来弥补。价格偏低，对粮农不利，对粮食增产不利，这是多年的问题。采取上述办法，就可以得到一个在现在看来比较合理的解决。

1. 调整价格就是调整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苏维埃国家的一切主要的经济、政治问题都是同价格联系的。

毛：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过去我们提高生猪、油料、蚕丝的收购价格，最近又准备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都是属于调整这些关系的范围。

**（五）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工具，但不是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

1. 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工具。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是正确计划工业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的必要条件。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也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这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优点之一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消灭生产中的自发性和无政府状态。

毛：这段正确，有批评，有议论。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1. 教科书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就不会带来资本主义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

毛：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六）教科书对斯大林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理论的批判不足以服人**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斯大林依据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并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的新原理。斯大林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等等。但是这一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例如，商品流通似乎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逐渐过渡到工农业直接进行产品交换的必要性已经成熟，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以及其他某些原理。

毛：

这里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一著作，“正如斯大林的其他一些著作一样，有一些错误的原理”，这个说法太笼统了。

这里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两条罪状，不足以服人。

斯大林在他的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有商品生产。他：“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他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斯大林批评了苏联当时主张消除商品生产的观点，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教科书说斯大林似乎主张立即消灭商品，这个罪状很难成立。至于产品交换，在斯大林只是一种设想，他并且：“推行这种制度无需特别急忙，要随着城市制成品积累的程度而定。”

另一条罪状是，“低估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只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能够反映这种规律的国家计划。教科书写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又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买卖”的生产资料是不转变所有权的特殊商品，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差不多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一个真正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

**（七）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计盈利**

1. 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计盈利。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经济核算是进行有计划的经营的形式。把个别企业的利益与全国的利益对立起来，就歪曲了社会主义经营方法的经济核算的基本实质。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核算的方法与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营方法根本不同。

毛：两种制度的经营方法虽然不同，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不算账、不计盈利。

**（八）没有运输，生产过程就没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

1. 运输、包装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

教科书说(第三十二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业)：社会主义制度下，商业中的流通费用有两种：第一、同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商品的运输、保管、包装等)有关的费用；第二、同产品的商品形式有直接关系的纯费用(如实现买卖行为所需要的开支)。这两种流通费用有不同的补偿来源。

毛：运输、包装，不增加使用价值，但增加价值。运输、包装所用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没有运输、包装，生产过程就没有完成，不能转到消费过程，使用价值虽然生产出来了，也不能实现。例如，煤炭在矿山开采出来了，如果堆在矿山，不由铁路、轮船、汽车运到用户手中，煤炭的使用价值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1. 运输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有重要影响。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地配置生产，缩短运输线，可以大量节约社会劳动。

毛：运输的合理或不合理，对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要争取用一段时间，在山东、徐州、长江以南有煤炭资源的地方，建设新煤井，逐步做到不再从北方向南方运煤。

### 十、积累和消费，消费品的分配

**（一）积累、扩大再生产**

1. 积累的比重大一些是否有危险。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社会主义社会所拥有的一切物质资料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财富。构成国民财富的物质资料，按来源可以分为积累的劳动产品和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财富。按它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用途可以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以往劳动的成果的那部分国民财富的作用和意义日益增强。劳动产品的积累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极重要的指标。

毛：我国1957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7%，1958占36%，1959占42%。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逐年增加的。可能1959增加得多了一点，比重大了一些。我们过去有过一种怀疑，苏联也有这样说法，就是：积累比重太高了有危险。这个问题要看生产增长的情况。如果生产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基础上，即使积累的比重大一些，人民生活还能够逐步改善，也可以是没有危险的。

1.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这并不是：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中不会发生国民经济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

毛：这最后一句话讲得不对。拿我国来说粮食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应该改成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这是一个任务，不能说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解决了。

1. 所谓后备还有剩余的物资。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物资后备、财政后备和劳动后备对于国民经济不断地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毛：所谓后备，就是除了正常的供应以外，还有剩余的物资。

1. 结余过多了也不好。

教科书说(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苏联的国家预算收入总额，1957年为6073亿卢布。1957年的预算收入比支出多196亿卢布。

毛：我们过去多年中，曾经发生结余过多了也不好的问题。

1. 储备过少不好。

教科书说(第三十章经济核算和赢利。成本和价格)：要加速流动资金的周转，就必须缩短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并要经常反对过多地(超定额地)储备原料、材料、半成品和成品。

毛：过少不好。我们过去曾因“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引起两次所谓反“冒进”。

1. 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剩余劳动是为社会的劳动，它创造剩余产品，即为社会的产品，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劳动者自己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为社会的劳动同为自己的劳动一样，对劳动者是客观必要的。

毛：为社会的产品也要分析，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另一部分是用于社会文化教育和福利保健事业的，其目的是增强人的健康，提高人的文化，养育后代，以便扩大劳动力的后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间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还有一部分，是用于国防这类公共消费的，是非生产性的，但它是为了保证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教科书没有作这样的分析。

**（二）企业纯收入的分配。企业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权限不能太大。**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由于经济核算制不断巩固，国营企业的纯收入在该企业扩大生产(增加流动资金，保证基本建设资金)：改进生产，奖励企业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大。这就使企业及其全体工作者从物质上更加关心经济而有效地利用资金，提高生产的赢利。

毛：这种办法会造成苦乐不均，企业在这方面的权限不能太大。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集体农庄的公积金实际上是由全体人民的劳动建立的，按其性质来：接近于全民所有制。

毛：集体农庄的公积金，主要是靠庄员的劳动。为什么说“接近于全民所有制”？

**（三）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

1. 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主义生产关系)：利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是有计划领导经济的必要条件。这种规律的作用，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执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计划，它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决定性动力。

毛：

前面说基本经济规律是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发展方向的规律，这里又说个人物质利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一种决定性动力”，这不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吗？而且后一种说法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

就以分配问题来：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很大错误。

1. 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生产必须服从全面满足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一目的。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在高度技术基础上的增长和完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工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这里。

毛：这里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根本优越的地方就在工资不断提高，很不对。工资属于消费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的分配，有什么样的消费品的分配。前者是决定后者的。

**（四）批判个人物质刺激**

1. 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竞赛一节时：一不死人，二不使身体弱下去，并且逐步略有增强，这两条是基本的。有了这两条，其他的东西，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1. 片面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经济杠杆运用得越多，特别是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改进生产组织、掌握现有技术和采用新技术的物质鼓励因素运用得愈多，这种斗争所收的效果就愈大。

毛：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一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

1. 赫鲁晓夫说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简直不像样子。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前提是：用适当的方法把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使从事生产的工人和企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从强制的重负变为光荣的事情。但是，劳动还没有像将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那样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第一生活需要，因此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阶段，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劳动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还存在着本质差别，因此，必须实行物质奖励来提高工作者的熟练程度。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

毛：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苏联比资本主义更注意个人物质刺激。这种说法简直不像样子。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观点时：赫鲁晓夫所接受的遗产中，有两件事情很不好，一件是命令主义太深，一件是干劲不足。赫鲁晓夫除了物质刺激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想其他的办法。

1. 教科书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各个成员的个人利益能够同全民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违反这一原则，必然产生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毛：教科书：个人利益和全民利益的“这种结合是用按照社会成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贯彻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来实现的”。这里没有讲必要的扣留，而且把个人利益放在这种结合的第一位，就把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片面化了。

1. “精神鼓励”过头了也会变成个人主义。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劳动者如果工作得好，在改进生产方面发挥主动性，他就会受到尊敬。这一切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前所未有的对劳动的新的社会刺激.社会主义使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深切地关心自己的劳动。

毛：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拿老子的话来：就是要“尚贤”，但“尚”得过头了，也像“物质鼓励”过头了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

1. 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一定要出毛病。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利用工人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是国营工业高涨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日益使工人和职员的工资与每一个工作者所消耗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相适应。这就刺激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毛：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他们的工资政策是以计件为主、计时为辅，我们则以计时为主、计件为辅。计件工资的毛病，是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动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的收入。北京有一个工厂的仓库，从计时工资改变为计件工资后所引起的变化，有个材料，值得看看。这个材料还说明计件工资制也妨碍技术的革新和机械化的发展。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关于计件工资问题的观点时：这里：在生产自动化的情况下，不宜于实行计件工资，可是前面却说“广泛采用”计件工资，这是自相矛盾。我们是实行计时工资制加奖励。这两年的年终跃进奖就是这种奖励。除了少数人如国家工作人员、教育工作人员不发以外，其他的职工都普遍发。按照劳动的多少、好坏，谁发多，谁发少，由每个单位的职工评定。

1. 哥穆尔卡上台时强调物质刺激的教训。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作为以往劳动的成果的那部分国民财富的作用和意义日益增强。劳动产品的积累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极重要的指标。

毛：这句话讲得好。在波兰这个问题现在成为很大的问题。哥穆尔卡上台时，强调物质刺激，增加工人工资，结果工资增长的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他们不注意提高工人的觉悟。工人只想多要钱，不好好干，生产情绪不高，造成了吃老本、不能增加积累的严重状况，逼着他们现在不得不出来反对物质刺激，提倡精神鼓励。哥穆尔卡也：钱收买不到人心。赫鲁晓夫一直到现在强调物质刺激，可以预计，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他开了很多支票，高薪阶层当然满意，广大工人农民要求兑现而不能兑现的时候，就会被迫走到强调物质刺激的反面。

1. 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毛：他们在集体农庄这一章里，特别强调物质刺激，可能是有原因的：过去国家从农民那里拿得太多了。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过分强调公的，不注意私的。现在走到反面，又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大注意集体利益。这样强调下去，又一定会走到己的反面。

1. 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资本主义利用各种形式的劳动报酬和物质刺激来扩大对劳动者的剥削，以便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物质刺激则使生产增加，有利于改进工作者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毛：教科书上：物质刺激“使生产增加”。但是物质刺激不一定每年都增加。人不一定天天、月月、年年都要靠物质刺激。在困难的时候，只要把道理讲通了，减少一些物质刺激，人们一样要干，而且还干得很好。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拿八级工资制来：他们不能解释同一级工资中间，为什么人们的劳动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比如：都是五级工，可是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好，有一部分人就干得很不好，有一部分人干得大体上还好。物质刺激都一样，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呢？照他们的道理，这是解释不通的。

1. 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更不能当作决定性动力。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

毛：“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

1. 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社会主义竞赛并给予人民群众的这个进步运动以全力支持。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

毛：他们还有这样的意思，竞赛所以能成为最大的动力，还靠物质刺激这一条。他们老是提物质刺激，原因是政治太弱。

1. 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高薪阶层和富裕农民阶层有利。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苏联宪法不仅仅是宣布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

毛：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抵抗。

**（五）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1. 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教科书说(第二十八章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货币)：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前提是：用适当的方法把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使从事生产的工人和企业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必须实行物质奖励来提高工作者的熟练程度。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

毛：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农村的房屋还很不像样子，要有步骤地改变农村的居住条件。我们居民房屋的建设，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房屋，主要应当用集体的社会的力量来搞，不应当靠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在争取国家工业化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这本书在不少地方只讲个人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不讲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

1. 社会主义社会消费资料包括个人财产和公共财产。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所有权普及于他们的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

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归劳动者享受的消费资料，一部分是个人财产，一部分是公共财产，如文化教育、公共医疗、体育等设备，以及如像西湖这样的游览地区。而且，这一部分公共财产，会愈来愈多。当然，这一部分也归劳动者享受，但它不是个人财产。如果把这两部分统统说成是劳动者的个人财产，是不对的。这里把劳动收入、储蓄、住宅、家庭日用品、个人消费品及其他日常设备等并列起来，不好。因为储蓄等类东西，都是从劳动收入转化过来的。

**（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1. 工作者是否勤勉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一个工作者如果具有高度技术或更为勤勉和积极主动，他就能在单位时间内在同样的条件下创造出较多的产品。这就是：生产工作者的报酬也不可能一样，而应当符合于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不然，对于劳动者就不会有提高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刺激作用。

毛：这个原则对。工作者是否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决定于政治觉悟的高低。有的人文化技术水平高，可是不勤勉，不积极主动；另外一些人文化技术水平虽然低些，可是更为勤勉，积极主动。原因就是前一部分人觉悟低些，后一部分人觉悟高些。

**（七）“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带来个人主义危险；我们的工资制度，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1. “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带来个人主义危险。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关于经济核算的论述时，针对教科书“彻底采用经济核算，彻底运用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把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同社会生产的利益结合起来”的论断，毛：“彻底”两字，带来个人主义危险。

1. 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利用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反对平均主义，这些刺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毛：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八）教育人民，要把个人的、局部的、眼前的利益，服从集体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而努力奋斗。**

1. 公私兼顾，先公后私。

教科书说(第三十一章集体农庄制度的经济基础)：从1953年起，社会主义农业加快了发展速度，这是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的结果，是党和政府为加强集体农庄和庄员对发展集体农庄生产的物质刺激而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措施的结果。

毛：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1. 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在付给职工劳动报酬、分配集体农庄收入、组织经济核算、规定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等等的时候，物质利益的原则得到极广泛的应用。

毛：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1. 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后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1. 缩短工作日和免费分配。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苏联工人的实际收入比革命以前增加这么多，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因此工人得到的每一工时的工资就较高。

毛：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教科书最近的增订本，加了免费分配的意思，并且说这部分会愈来愈扩大。这个意思好。这种免费分配，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

1. 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联在极短的历史时期内建立重工业，就要求苏联人民在初期忍受一定的牺牲。苏维埃国家把大量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因而不可能在同一时期内以高速度发展人民消费品的生产，从而在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需要上造成了困难。

毛：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1. 学文化，学技术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这是劳动者的熟练技能所应得的。这就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毛：这里：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促使非熟练工作者不断上进，以便进入熟练工人的行列。这个意思就是：为了多挣钱，就来学文化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进学校，学文化，学技术，首先应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工业化，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了集体利益，而不应该是为了得高工资。

### 十一、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以后，社会主义可能分两个阶段，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在苏联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彻底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完全铲除了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和把社会分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根源。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中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完成农业的集体化，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联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毛：建成社会主义，也有一个“边”，要有笔账。例如工业占多大比重，生产多少钢，人民生活水平多么高，等等。但是，说建成社会主义有个“边”，当然不是说不要进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第259，260页

**（二）批判“彻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提法**

1.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巩固，但不能强调过分。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最高阶段的特征是对生产资料的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过渡，就要求大力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国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

毛：

教科书：要“大力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国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既然要进一步发展，怎么能“大力巩固”呢？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要巩固，但是不能强调过分。我们的公社化运动使他们有点不好办事，使得他们农村相当动乱。所以他们那里有人：西风吹来好应付，东风吹去不好受。这本书的新增订本讲到了一些模糊的前途，例如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结合、接近、融合之类，但是对于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他们仍然表示恐慌。他们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曾经造成很大损失，多少年还没恢复过来，因此，现在一提起就害怕。

有的同志说有三类社会主义国家：一类是退回到资本主义；一类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有一类是达到一定阶段就停顿下来。就目前已知的情况来说：苏联的工业和农业，还是在发展，是不停顿的；但是在社会制度、生产关系这些方面，多年来基本上是停顿的，而且这几年来还出现了值得引人严重注意的倒退现象。所以，对他们的情况和问题应当进行分析。

1. 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国营企业和合作(集体)经济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两种经济的差别。两种形式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关系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富强的根源，是全体劳动者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的源泉，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毛：同资本主义比较起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之间的差别，不是根本性的差别。就社会主义经济内部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是根本性的差别。教科书把这两种公有制的形式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对敌对势力来讲，可以说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就它们本身的发展过程来讲，那就错了。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两种所有制的并存，不能是永恒的，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自己的变化过程。

**（三）全民所有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

1. 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1. 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积极性。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在政策上依据了经济发展规律，并善于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根据建成社会主义和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的任务，展开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

毛在评论中谈到我国沿海地区工业建设方针的演变，然后谈到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体制问题。毛：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那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1. 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必须在经济上把专业化、生产协作化和生产配置最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社会劳动的最大节约。苏联过去按照部门原则组织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结果使各部门所属企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妨碍了生产的正确配置和经济地区内部各企业建立必要的经济联系。按照地区原则改组了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以后，就可以更充分地利用社会分工以节约劳动和加速生产发展。

毛：一切企业专门由条条来管，会产生很大的片面性。我们现在中央直属的企业只占20%，其他的都归各级地方管，就避免了这种片面性。我们的教育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现在的问题是，地方管的高等学校太少，科系不完全。以后要举办一些完全由地方自行分配学生的高等学校，开始可以成立这样的班或系。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一个国家统一的程度，还不如达赖时的西藏，因为西藏的武装还是统一的。

**（四）从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

1. 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关于社会主义企业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企业领导人员和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改变时说：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现在证明是正确的。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当然公社里各个生产队向社有过渡，不是一个早晨全部过渡，而是一个队、一个队有先有后的过渡。全部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只要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只要还不向共产主义过渡，一般说来，还不会发生同苏联“对表”的问题。

1. 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础的观点时说：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像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

1. 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毛：

华东协作区最近一次会上，提出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他们提出了实现这个转变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使社有制经济的收入占到全社经济总收入的50~70%。如果不从基本队有制转变为基本社有制，人民公社还不能巩固，还可能垮台。因为生产队的公共财产不多，每年的收入大部分是分给社员消费掉了。一般说来，按每年的总收入计算，分给社员的约占50~60%，用于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约占30%，缴纳给国家的占7%，能够积累的只有10%。

人民公社实现了到基本社有制的转变，还是集体所有制。在实现这个转变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的意见分歧，或者说意见冲突，还不会很大；将来人民公社从公社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意见分歧可能就会大起来，就会发生所谓“对表”问题。

我们有极少数公社，在一九五九年春夏整社以后，还坚持了基本社有制，这些社可能在若干年内就要遇到如何处理从社有制转变到国有制的问题。

1. 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多成分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另一方面存在着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社会主义大工业消灭着资本主义因素，而小农经济却经常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在这种基础上，归根到底是会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的。

毛：

这里说：“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能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散漫而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这个提法当然是正确的。从此逻辑地推论下去，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一直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个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长期不克服，也有问题。最近辽宁省委的调查，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意见，都提出了人民公社如何先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问题。个别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队所有过渡到国有的问题。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实际上是工农的矛盾。苏联两种所有制长期同时并存，但是他们一直不承认这个矛盾。德国有个老共产党员，看了我们的八届六中全会决议以后，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很高兴，认为我们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远景规划。

1. 教科书不承认先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评价说：苏联现在还有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这种个人所有制当然和集体化以前的个人所有制不同。在所有制的变革上，教科书不承认先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使整个社会实现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他们用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接近”、“融合”的模糊观点，来代替一种所有制过渡到另一种所有制、一种生产关系过渡到另一种生产关。

1. 两种所有制的长期并存也会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在不断增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分配和交换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某些方面，以及有计划领导经济的形式，就会过时，就会落后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不再适合进一步发展生产的需要。这就必须改变生产关系和经济领导形式，使其适应已达到的生产力水平。

毛：这一段还讲得好。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只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和领导经济的形式方面，存在着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而且所有制方面，例如两种所有制的长期并存，也会有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见，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它反映出工人阶级和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继而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特点。

毛：这里只讲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性，没有讲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是客观的必然性。我们讲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过程，现在我国有的地方已经开始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河北省成安县的一个材料，说有些经济作物区的公社现在很富，积累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不使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工业和农业就会发生新的矛盾。

1. 生产合作社还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教科书说(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农经济逐步联合成以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生产合作社，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客观必然性。

毛：下一步还有一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必然性。

1.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在长期内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的观点时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1. 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乡村的住宅建设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乡村里，对集体农庄住区进行合理的规划，建筑设备完善的、样式美观的庄员房屋，逐渐实现所有集体农庄的无线电化和电话化。集体农庄建设优良的学校、俱乐部、电影院和图书馆，这对于庄员们特别是青年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他们只讲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不讲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经过什么步骤、什么过程变成为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他们不同意我们提出首先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前一种过渡，就是要把农业生产资料统统变为国有，把农民统统变为国家的农业工人，由国家发工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高速度发展生产，工作要有步骤。没有适当的步骤，又可能刮起“共产风”来。主要的步骤，将是在社有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社有经济占到了全社经济的一半以上，实现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的转变。这样，再变为国有就好办多了。

1. 将来我们的农村是一切国有化。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的观点时说：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农民把公社化错看为国有化，不少地方发生农民把土地推给人家，自己情愿少种的现象。经过整顿，经过三级所有制的确定，农民已经看清楚人民公社还不是国有，而是队基本所有，现在农民转过来多要土地，多种土地了。估计展开机械化以后，到处更会感到土地不足，会普遍进行改良坏土地。

1. 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的观点时说：人民公社将来从基本队所有，经过基本社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后，全国将出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再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进而转变为单一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过程。说两种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现在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到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实现以后，那就更加强大得多了。教科书就是看不到事情的发展。

**（五）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总有一天要完结自己的命运**

1.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二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在过渡时期的多成分经济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他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1. 社会主义经济有它发生发展的过程。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说：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组成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难道就没有它进一步变化的过程吗？难道我们能让这两种所有制“彻底巩固”下去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难道不是像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六）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

1. 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教科书说(第二十一章社会主义大工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发展大工业，首先是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基础的重工业，是消灭这些国家失业和农业人口过剩的必要前提，以前这些国家年年有大批人找不到工作，流亡国外。工业化促使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巩固并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了必要的基础。

毛：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斯大林对农民总是不放心，把农民卡得死死的，用拖拉机站来控制农民，结果吃了亏。

1. 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城市和乡村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决不是意味着降低大城市的作用。伴随着工业在全国有计划的分布而来的是新城市的建设。城市是物质和精神文化最发达的中心，是大工业的中心，它将促使乡村获得现代城市的文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就是要用绿化城市和利用现代市政建设的一切成就的办法，来消灭人口密集现象和改善城市生活条件。

毛：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申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1.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的消失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教科书说(第二十九章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熟练劳动的报酬较高，刺激劳动者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毛批注：根本上靠生产的发展

1. 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随着从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向单一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的过渡，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城乡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的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间的界限也将最终消灭。共产主义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也是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同的根本特点之一，因为那时候生产资料和全部国民财富的所有者是没有阶级差别的人民。

毛：这里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阶级界限也是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同的根本特点之一。”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了，那时，工人不叫工人，农民不叫农民，知识分子不叫知识分子，所有的人都叫共产主义劳动者。

**（七）每一个时期总有人反对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反对建立共产主义**

1. 每一个时期总有一部分人安于已有的制度而不愿改变。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础论述时说：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1. 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却不愿意建立共产主义。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所有劳动者都愿意建成共产主义，所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

毛：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敌对的阶级，所有劳动者都愿意建成共产主义”。但是，过去的剥削者、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却不愿意建立共产主义。

教科书说：“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

毛：只能说：不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但是还要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革命。

**（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要经过革命**

1.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有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能说不是社会革命。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完成，同时就是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同共产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和社会团体，所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不通过社会革命完成的。

毛：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就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我国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再从集体经济变为全民经济，都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

1. 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对抗性矛盾的观点时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九）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

1.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五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使居民日益增长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能够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日益增长的生产合理地协调起来，不会有生产过剩危机，因而有可能不断地扩大生产。

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有一种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怎么办？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1.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毛在读完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后：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1. 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对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观点时说：当然，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

**（十）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但在没有创造出这些条件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仍然是迫切需要的，国家的一切职能要保存，而组织经济的职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家和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削弱，会给共产主义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

毛：国家消亡，需要有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很危险。

**（十一）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由于对社会关系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族被改造成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族。资本主义把民族分成利益对立的阶级和集团，而社会主义则在公有制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把民族团结起来。

毛：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他们实行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办法。我们这里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有些人想援引苏联的办法，在中国成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这是不对的。现在，区别民族界限，重视民族感情，对反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现在提出消灭民族界限，是反动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世界主义的。但是，将来民族界限总有一天要消灭，各民族语言总有一天会融合成为统一语言。经济大发展了，文化大发展了，交通非常方便了，彼此往来非常密切了，就会感觉到各有各的语言很不便利，统一语言的需要就会愈来愈增长。第281页

**（十二）共产主义要求更严格的劳动纪律**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随着共产主义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就成多余的了。货币也就不需要了。产品将按社会成员的需要直接分配。社会将逐渐用工作时间直接计算劳动，而不再采用价值和价值的形式。广泛利用电子计算机。

毛：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因为高度自动化，要求人们的劳动和行动更准确，那时的劳动纪律会比现在更加严格。第706页

**（十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尚贤”恐怕还要继续下去**

教科书说(第二十七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社会主义竞赛并给予人民群众的这个进步运动以全力支持。劳动者由于工作中的成就，不仅得到物质奖励，而且得到勋章和奖章，由于杰出的革新活动，更得到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和列宁奖金。

毛：到了共产主义以后，“尚贤”恐怕也还要继续下去。产品按需分配了，物质刺激也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先进和落后这两部分人，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分别这两部分人，就是一个“尚贤”的问题。第461页

**（十四）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发展的**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商品货币关系消亡的设想时说：现在我们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所做的科学预见。进到高级阶段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又会提出来。第706页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关于彻底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观点时说：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第258页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观点时说：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 十二、国际问题

**（一）国际资产阶级处于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世界非常不安宁**

1. 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处于危机之中。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策略可以改变，而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国际资产阶级现在处于危机之中，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都害怕，警惕性很高，但是章法很乱。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非常不安宁。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必要的后备的问题的论述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非常不安宁。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占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已经有二十多个国家独立，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对稳定。赫鲁晓夫：“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这句话说得真没有意思。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会用武力去试探，而且资本主义已经不稳定，何必我们去试探呢？

1. 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

毛在读教科书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时论述了社会发展史，并对战后的国际局势做了简要的概括。毛：人类历史进到铁器时代，才有两千多年，从发明蒸汽机到现在，不过一百七十多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粗石器时代最长。从粗石器进到精石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现在的国际局势，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紧张多了。当时，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相对稳定时期，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革命都失败了，英国和法国很神气，各国资产阶级对苏联也不那么怕。除了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以外，整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并没有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意、日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垮台了，英、法也削弱了，衰落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十几个国家成功，殖民体系瓦解了。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再也不能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的相对稳定了。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体情况变了，但危机规律依然存在**

1. 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时候的危机有所不同。

教科书说(第二十六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战后时期，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以资本主义梦想不到的高速度有计划地不断地向前发展，可是在同一时期，美国却遭受到1948—1949年和1953—1954年两次经济危机，结果生产下降，失业增多，而从1957年底开始，美国又发生了波及到其他资本主义各国的新的生产过剩危机。

毛：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马克思时候的危机不同，有了变化。过去大体上是七八年或十年来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中美国来了三次。具体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规律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在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发展不平衡。

1. 资本主义走向没落和完结。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与愈来愈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高速度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余地。

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是，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1. 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

教科书说(第二十四章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绝对统治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依据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自觉地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领导，而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

毛：教科书关于“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

**（三）战争与和平。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

1. 资本主义危机就是酝酿着战争。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生产的增长受到群众有限的购买力的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资产阶级利用政权来维持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毛：这里说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这就是酝酿着战争。难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忽然不灵了么？难道在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就能够彻底消灭战争么？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1. 二战以后局部战争没有断过。

毛在读完教科书《结束语》对全书所做的总体：只要阶级斗争存在，战争总有一天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局部战争没有断过。美国帝国主义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帮助南朝鲜打北朝鲜，帮助南越打北越，都没有引起什么连锁反应。

1. 国际范围内的斗争比过去都更加尖锐了。

教科书说(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即使到共产主义建成后，只要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只要它们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进犯的威胁还未消除，国家还是必要的。但是，国家的性质和形式将取决于共产主义制度的特点。

毛：目前的国际形势，仅仅是没有打世界大战，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过，国际范围内的斗争，各方面的斗争，比过去都更加尖锐了。

1. 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是，国家政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他们在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领导下，为了全民的利益，利用这一政权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是，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一政权来维持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毛：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不是麦克米伦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曾经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经过极大的努力，签订打仗时不打原子弹、核武器的协定，打起仗来大家都还用常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

1. 社会主义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

教科书说(第二十三章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社会主义的进攻引起剥削阶级的拼命反抗，他们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支持下，进行怠工、破坏和恐怖活动。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同这些困难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作了必要的牺牲，终于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毛：教科书的增订本，在此之后，加了一段，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苏联的西方，有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的东方，有了我们和朝鲜、蒙古、越南这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导弹可以打几千公里、万把公里。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现在苏联已经不在导弹的包围之中吗？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

1. 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

毛在评论教科书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的条件地观点时：最近，1959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

1. 军区可以把管MB的这个重要任务担当起来。

教科书说(第二十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和巩固，国家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对剥削阶级的镇压这个职能消失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略者的的职能保存下来，国家组织经济文化教育活动的职能日益加强。

毛：我们现在有些军区，觉得没有事做，可是他们又不想把管MB的这个重要任务担当起来。

**（四）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

教科书说(第三十四章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自发的，生产的增长受到群众有限的购买力的限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一政权来维持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毛：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教科书第三十三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预算、信用和货币流通)：不是说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中不会发生国民经济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

毛：现在，美国和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即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很注意中国的问题。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月革命成功了，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些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很注意对苏联的研究。原因之一是苏联作为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革命胜利了，又进行了多年的建设，而中国是亚洲的一个主要国家，也一定会引起人家的注意。欧洲和亚洲是世界上的两个大洲，这两大洲有两个主要国家革命成功了，这件事情引起了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

**（五）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1. 两个经济体系之间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并不排除两个体系的国家之间发生经济联系，反而要求建立和发展这种联系。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根据平等、互利和严守自己承担的义务的原则，尽力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发展事务联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合作的发展，不但不妨碍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而且会为加强这种往来创造有利的前提和条件。

毛：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了两个世界市场的论点。教科书在这里强调两个世界体系的和平经济竞赛，强调在两个世界体系间“建立和发展”经济联系。这是把实际上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的观点的后退。在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教科书避开了这种斗争。

1. 在国与国的关系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

教科书说(第三十六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分工以每个国家的可能性为依据，并导向共同的繁荣。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取长补短，集中人力财力发展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毛：

这一段里面的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对各省的提法一向是：凡是自己能够生产的，就自己尽可能地发展，只要不妨碍全局。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

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

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例如，庐山会议的决议，就是如此。它既合乎全国的需要，也合乎各省的需要。能说只有中央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地方就不需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吗？从经济上来：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以前曾经担心，各省都发展了各种工业，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的工业品会没有人要。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各种工业品并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上海最近提出了向高大精尖发展的方针，他们还是大有事情可做的。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1. 小的国家和省份也很难什么都搞。

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必须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是中小国家，每一个国家发展所有的工业部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也是力不胜任的。

毛：就某些产品来：有些国家有这里所说的“力不胜任”的问题。蒙古人口不到一百万，各种东西都搞也有困难。我们国内有些人口少的省，例如青海、宁夏，现在也很难什么都搞。

1. 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阵营各国弱肉强食，发达国家以保持不发达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为目的；而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国际分工，各人民民主国家便易于消灭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经济落后状态和经济发展的片面性，为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更迅速地发展经济和增进人民的福利。

毛：在这行后面，新的增订本加了三段话，其中有句话：“使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总的水平逐渐拉平”。据：目的是想使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大体上相同的时间之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这个理论、这种提法，都不对。各国人口不等，资源不同，历史条件不一样，革命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怎样拉得平呢？一对夫妻生了十个儿子，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聪明些，有的愚蠢些，怎么能够拉平？“拉平”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均衡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一国之内的各省，一省之内的各县，都不平衡。拿广东的卫生工作来：佛山市和岐乐社搞得好，因此佛山和广州不平衡，岐乐社和韶关不平衡。他们反对不平衡，幻想平衡，是错误的。

1.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完全平等没有做到。

教科书(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

毛：事实上有。教科书又：“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

毛：事实上也是没有做到。

1. 事实上有政治性的贸易。

教科书(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一个参与国强迫对方接受他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的歧视和不等价交换”。

毛：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有卖肉带骨头的贸易，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贸易。

1. 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

教科书(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贷款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信贷关系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垄断组织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在社会主义阵营，债权国不因给予贷款而有任何特权。贷款的条件十分优惠。

毛：贷款这件事，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刚上台时，他们做的和这里写的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好，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社会制度变了，这个国家走的方向就要随着改变。

1. 印度的革命总是要成功的。

教科书(第三十五章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给予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性或经济性的条件。根据1955.2.2苏印协定，苏联帮助印度建设年产100多万吨钢的比莱冶金工厂，便是与不发达国家建立的这种新型经济关系的明显例子。

毛：在相当长期内，印度大资产阶级可以剥削工人，但是这个工厂建成以后可以增加好几万工人，这样一个几万人的重工业企业，可以成为印度无产阶级积累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从长远看，印度的革命总是要成功的，这个钢厂、这类企业，将来总是人民的财产。现在尼赫鲁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资本主义的实际，这对印度工人有欺骗作用。甘地主义的影响，也对印度工人有麻痹作用。印度还没有像蒋介石那样的屠杀人民的反面教员。这些都是印度无产阶级的不利条件。

## 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1960.5.17）

前几天，我看到古巴朋友，他们两年多就胜利了。开始时只有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一条船到古巴，不会打仗，打冒险的仗，结果八十二人就给搞掉七十人，剩下十二人，菲德尔·卡斯特罗[1]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就转入山区，改变了策略，这样就发展起来了。后来也还有些挫折，挫折教育了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古巴人口比阿尔及利亚少，只有六百万人。美帝国主义离他们也很近，飞机去只要半小时。他们打了两年多，1959.1.1取得了独立，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我对他们：现在你们比我们强，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你们只打了二年多。他们是在一个孤岛上，要在各国找援助，拉丁美洲广大人民都在帮助他们，现在我们对他们也有帮助。他们那里美国干涉不干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两种可能：美国武装干涉或者不干涉。他们正在分配土地，三分之二已分配，再过些时就能分完。

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住主力，并每天消耗敌人一点力量。你们的十万兵力能保持并发展，胜利就是你们的。法国人怕熬时间，你们不怕，已经熬了六年，要熬下去，不就胜利了吗？

你们自己讲，战争是长期的，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民。持久作战也是我们讲的，我们很赞成。以你们自己为主，这也是你们的方针，但别国有责任帮助你们。你们组织了各阶层的广泛统一战线，只要反对法国殖民者的都组织在统一战线内，你们叫民族解放阵线，这个名字就很好，可以团结许多党派。战争持久下去，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发生，能保持团结就好，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使法国孤立，不使自己孤立。

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人数很少，最多只占世界人口的1/10。法国有4.5千万人，但不是统一的，大部分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你们要在法国人中做工作。你们在法国有四十万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他们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工作，来帮助你们。

美帝表面强大，但有弱点，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南朝鲜的人民就起来反对美帝及其走狗，土耳其、日本的人民也广泛地起来了。谁也没有料到1958.7.14伊拉克的革命，伊拉克的形势对你们有帮助。谁也没有料到1959.1.1古巴的革命取得胜利。许多事情料不到，我们未料到，帝国主义也未料到，但是它就要发生，古巴革命对你们也有利。非洲，两年前和两年后有很大不同。我们见过许多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他们情绪都很高，在拉丁美洲是反对美国，在非洲是反对法国、英国、比利时。

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是世界反帝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总是光明的。作为你们的朋友，提这些意见供参考。相信你们不会说我干涉你们内政。我们是共产党，帝国主义说革命都是共产党搞的，这是造谣。你们要搞革命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已经搞起来，我们才知道。你们要成立临时政府，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成立起来了，我们就承认你们。你们来过几个代表团，我们热烈欢迎。

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法国不承认中国，还有蒋代表在巴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支持你们，为什么不能同你们往来？美国占领台湾，承认蒋，不承认我们，说蒋是“好人”，我们是“坏人”。戴高乐也说我们是“坏人”，并说你们是“坏人”，那我们就是“坏人”同“坏人”来往。

帝国主义不喜欢我们，说我们“侵略”，先“侵略”了蒋，又在朝鲜和美国打仗，“侵略者”这个诨号就出来了。帝国主义愈说我们坏，我们愈高兴，愿一辈子挨骂，如果它们讲我们很好，那岂不是同蒋一样了吗？帝国主义骂我们，也骂你们。你们挨骂已五年半了，要准备挨帝国主义的骂，准备人民欢迎。帝国主义骂你们，但世界人民都欢迎你们。我们都是一党，革命人民都是一党和一条阵线。这里面还有各种不同，有的信仰共产主义，有的信仰宗教，有的不信这些，有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大家团结共同反帝。你们知道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现在同我们一道工作，有选举权，并参加政府，只是不要蒋那一派买办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地主。是不是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地主都杀掉？不是，而是给他们出路，比如分给地主一块土地，让他们自食其力。

美国侵略台湾，反而说我们侵略。美国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爱好和平”，它欺负社会主义国家，派飞机到苏联领空，被打下来了。美国“爱好和平”，它给戴高乐提供军火侵略阿尔及利亚，它爱的是另外一种东西，爱的是要把你们灭掉，把我们灭掉，甚至把戴高乐也灭掉，只剩下它。戴高乐同美国合作，但又有矛盾，在斗争中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我们承认你们，苏联没有承认你们，是有原因的。苏联不愿同法国闹翻，闹翻了，美、法更会一起对付你们。所以，苏联是考虑到美英法的矛盾，为了争取英法，才没有承认你们。我们就不能起这样的作用，我们不能拉戴高乐一把，因为我们同法国没有外交关系，戴高乐又瞧不起我们。我们只有那么点钢，法国又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那些人只看得见钱、钢和原子弹。我们很感谢你们看得起我们。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几枝破枪给你们。再过十年，我们钢多了，也有原子弹时，你们的情况也就变了。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就是要有志气。现在不是戴高乐、麦克米伦、艾森豪威尔万岁，而是各国人民万岁。

## 同蒙哥马利元帅谈国际局势（1960.5.27）

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陆军元帅。二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同西方世界的外交关系可以说是降到了冰点，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代表着保守派意志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却急切的想要来到中国访问毛。

但是在当时，和许多西方世界的人民一样，蒙哥马利对中国一直以来都秉持着抵制，仇视，甚至有些不屑的态度，尤其是经过1953年的朝鲜战争，这更加使得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蒙哥马利作为一名代表着英国保守派意志的将军，厌恶中国是意料中事，而这样的看法也使得他在追求世界和平上走了更多的弯路。

但当他访问了苏联以后，他的心里萌生了一个之前从没有有过的想法，同样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复杂，也是为了试探一下中国对于目前国际形势的态度，以及中国未来的外交走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1960年，蒙哥马利来到了中国。

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中美之间的敌对，在美国的指示下，西方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采取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因此，即便是蒙哥马利元帅，也对中国国内的情况知之甚少。

在蒙哥马利的眼里，中国虽然正在崛起，但是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更多是因为其背靠苏联。所以这次访问的一开始，对于蒙哥马利来：更多的是“顺道”而已。

这个时候的蒙哥马利还不知道，这次访问中国，竟然会彻底改变他的观念，后来的他甚至在离开的时候说出“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中国”这样的话。

蒙：请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

蒙：这是很坏的。

毛：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

蒙：但这是很坏的。

毛：不坏，是好的。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

蒙：因此我认为局势是坏的。

毛：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

蒙：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

毛：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毛：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着紧张。

毛：这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

蒙：有可能。

毛：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蒙：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

毛：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蒙：我不能肯定美国在西方国家集团中制造了它的反对者，在西方集团中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我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毛：我不是指欧洲，欧洲是比较平静的。我是指南朝鲜、南越、日本、土耳其、古巴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非洲不能光责备美国，首先是要责备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但是，美国要在那里取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因此，我说好的一面就在于使这些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

蒙：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等到战争打到一半才参加进来。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却怕美国把它们带入战争。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

毛：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由英国、法国来加强，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蒙：我相信必然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

毛：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毛：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应首先采取哪一个步骤？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这是需要时间的。

毛：主要是美国的势力，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英国在德国只有四个师。

蒙：只有三个。

毛：而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包括在西德、英国、土耳其，还有在摩洛哥。在东方，美国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有军事基地；美国还在南越有军事人员，在泰国和巴基斯坦有空军基地。

蒙：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缓紧张局势：第一，停止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来。

毛：但是人民在做。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还有土耳其人民，都在进行示威游行。土耳其刚刚发生了政变，这总不能说是共产党搞的吧。

蒙：要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你有三十五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二十五年。

蒙：我有五十二年了。

毛：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我们应当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毛：好，我赞成。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这里也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这样做；另一条就是美国人非常自高自大，他们是寸土不让的。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有可能。

蒙：我跟美国人很熟，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

毛：我们的政策也是使美国为难。

蒙：在美国，我有很多朋友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很多强大的报界人士也会同意我的。我过去从来也没有设法使美国为难，我想现在就要使它为难了。

毛：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

蒙：我想应该对美国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老实话。

毛：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它有三百万军队，其中一百五十万在海外，包括在你们的英国和中国的台湾。我们在国外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没有一个兵。

蒙：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毛：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蒙：这点我是同意的。

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蒙：你认不认识蒋介石？

毛：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能不认识？蒋介石就是经过我们的帮助才掌权的。在他没有掌权以前，我们同孙中山打交道。

蒙：毛同蒋介石是否在抗日的时候合作过？

毛：抗日合作了八年。后来他又同美国合作来打我们。过去你们英国同日本有一个同盟，对付沙皇俄国。那时远东是你们的天下，中国主要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是一战时开始变了。二战后，日本你们就管不了啦，由美国管了。英国还同美国订了一项君子协定，把中国让给美国。这是克里浦斯夫人到延安时告诉我的。她：在中国问题上，英国没有发言权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就消除了，仇恨转向美国。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有九万人。

蒙：可是过去的仇恨是针对英国的。

毛：过去是对着英国，同时也是对着日本。

蒙：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毛：过去也有日本，后来就成为日本和美国。

蒙：你们反对美国，是不是因为美国派了马歇尔军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毛：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

蒙：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

毛：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

蒙：日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毛：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日，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

蒙：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坏的意图？

毛：我看是有。

蒙：什么样的意图？

毛：当然主要是美国。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我读过艾登的回忆录。他讲到苏伊士问题、埃及问题和伊朗问题，也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他：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时，英国希望印度参加，美国坚决反对。美国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和日本参加。

蒙：印度是不会参加的。

毛：那个时候，艾登想让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艾登在回忆录中：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相提并论。

蒙：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毛：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毛：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美国就知道了。

毛：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一战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毛：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到底是华盛顿的北美强大，还是英帝国强大？但是，华盛顿用几枝烂枪，打了八年，把英帝国赶回去了。

蒙：美国革命是件好事。革命往往是件好事。如果不是美国革命，加拿大就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中国的革命也是好的。所以革命可以是好的。

毛：你很开明！

蒙：我是个军人。

毛：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

蒙：我同意。

毛：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蒙：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毛：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我希望如此。

毛：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

蒙：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毛：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蒙：这我不知道。西藏是在中国之内的。

毛：你们外交部做的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正式代表权给英国，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

蒙：这是需要时间和等待的。

毛：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

蒙：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俄、中这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和戴高乐是很熟的。戴高乐曾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人人都有缺点。

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蒙：海军也是这样。

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蒙：戴高乐会：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而在法律上戴高乐这样说是对的。

毛：阿尔及利亚人可不同意，他们要求独立。

蒙：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必须解决。但是法律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阿尔及利亚问题应该解决。阿尔及利亚人告诉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九十万军队，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大概有五六十万。每天、每月、每年，法国都在阿尔及利亚消耗大量军费，这对法国很不利。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是必须解决。法国军队不能打仗，在越南他们也打不过胡志明部队。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六年。开头阿尔及利亚只有三千名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万人的军队了。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戴高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他可能被迫下台。

毛：也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同英国和美国一道在欧洲有平等的权利。

蒙：他已经得到了。他曾经坚持这一点。

毛：不完全如此，美国人不干。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毛：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可是他被暗杀了。

毛：印度的甘地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 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点建议给苏

## 共中央的信（1960.6.10）

（略。）

## 十年总结（1960.6.18）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1957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

1958.5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1958大跃进，并在8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

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

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1958.8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1959一年完成的问题，1958.12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

1959.1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

1959.4上海会议规定1650万吨的指标，仍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

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1300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丁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

管农业的、管工业的、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1959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找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1960.6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人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1956周恩来主持制定的二五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

现在就全党同志来：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1959.3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

如列宁所：不犯错候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真理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找出固有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 同斯诺的谈话（1960.10.22）

毛：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1939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十二年，二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1950才真正住在美国。这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和尼克松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毛：看了一些。

斯：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但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两年前的声明。

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宪法，新总统在十一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一月。他们：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十一月六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直到明年一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甚至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很可能。

毛：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或其他人的问题。蒋的人如果成了三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十一年，甚或二十二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我看不是这样。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但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的经济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我记得在1939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八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毛：就是这个道理。

斯：你在你的一篇文章里：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贺龙率领的部队，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我在北京一年顶多四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对马海德〔9〕)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九十七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1946.7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

斯：我记得在保安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毛：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五年？十年？当时主席说至少十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十二年多。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十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十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两千美元，也就是说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毛：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

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我的确能够：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1960.11.15）

（略。）

##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址（1960.12.24）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反封建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需要批判地利用。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应善于分析，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反封建主义的文化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很多，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没有人欣赏。

##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1.13）

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

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调查研究摸清情况。

决心大。这次会议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时期，解放时期，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有麻城的经验，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还早。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波浪式地向前发展。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 关于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给邓小平的信（1961.4.25）

（略。）

##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961.6.12）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1959.4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1960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

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水利、县社工业、养猪场、交通、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80%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

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在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1942~1945上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1921建党，到1945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

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1917起，经过35年，直到1952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1961.6.13）

这是毛同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谈话的一部分。

毛：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苏：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观点。不过陈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只能一步走。

苏：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样呢？

毛：不一样。

苏：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1961.7.30）

（略。）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1.30）

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也讲一些其他问题。

1. 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到会有七千多人。会议开始时，刘少奇和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提意见。在座有各方面、各地方的人，多数是比较接近下层的，应当比中央更了解情况和问题。在各种不同岗位，也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果然议论纷纷，也还提出了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组织了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第二稿中，第一和第二部分有很大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认为第二稿是比较好的。如果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方法，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修改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和解释。这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尤其是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和意见会很多，宜采取这种方法。

也不是所有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人大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如果有条件的话，你们工作忙，一般不能用很长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试。

这个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1. 民主集中制问题。

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党员，但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列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不应当怕。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非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拳头，只能用讨论、说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只能用民主的、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我们不去理它。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都应当按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不是提倡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我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还是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党章、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不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一次大家不满意，就多来几次，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1959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1961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另外一些省，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怎样，只要正视错误，肯改正，肯让群众批评，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且是唯一的方法。但能实行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充分的民主生活，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

我们现在还有许多困难。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1957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不可能发动群众积极性。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工厂没有原料就不能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材料决定问题，就难免主观主义，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听取不同意见，认真分析复杂情况和不同意见。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周到。否则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意见，批评不得。这是不对的。这次会议，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一到，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应当隐瞒。不能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各级的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凡采取这种态度的人，都要失败。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

🡪

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

🡪

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

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1949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1957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对于这个残余，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基本上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和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1. 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员、艺术家、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附属于资产阶级或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不是只有革命的才去团结呢，只要他们爱国，就要团结他们，并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人口的95%+。这些人，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约占全人口5%，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占全人口95%+的人民群众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列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国内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90%+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列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90%+的人民一边。

1. 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党建立直到1945七大，共24年，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春到1945夏，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不管什么人犯错误，只要认识、改正，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改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那时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到1927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取得很大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替中央起草过一些政策、策略，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因为以前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时，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我讲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1960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1960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1961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1960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那是中国明末清初。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在那时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那更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逐渐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主张农、林、牧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认识，弄清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研究。要下去蹲点，到生产队、工厂、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后，不认真做了。1961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中，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中国成立至今已12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1950-1957是前八年；1958至今是后四年。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的报告里。我们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

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那时，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一五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那时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只得照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从1958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于此，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有了这些东西了，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

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都在辛苦工作。但也要看到，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有1700+万党员，80%是建国后入党的。建国前入党的只占20%，其中1930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800+人，现在恐怕只有700+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党员的招牌，但却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

上面是第四点。就是讲，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经过反复实践，有了成功和失败，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发展为比较完全的认识。那时，我们就比较主动、自由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1.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之，90%+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列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还不觉悟。但他们总会逐步觉悟，总会拥护马列主义。马列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都要向苏联学习。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在必要时，给以适当回答。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在国外，帝国主义者、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都骂我们；在国内，蒋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国家有六亿多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95%+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5%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

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列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这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党内外都是这样。省委、地委、县委，一定要让人讲话，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二、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不服则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例子略。）

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现时，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时，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骑在人民的头上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对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否则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有些同志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但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愿意改正，只要有了自我批评，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但是没有指名道姓。你们自己心里有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的，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就好了。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就难免要垮台。

今天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外发扬民主。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95%+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

## 祝贺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的电报（1962.3.28）

（略。）

##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1962.8.12）

（略。）

##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962.9）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1962.8.12）

（略。）

##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63.1.6）

▲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本来是观念论者，接受唯心论。以后接受青年黑格尔和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学说。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经过哲学的革命、经济学的革命、社会学的革命，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社会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以这样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历史唯物论。在旧社会，接受旧社会的遗产，加以改造，使唯心辩证法变成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变成辨证唯物论，唯心论的历史观变成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经济学也是如此，由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好的内容，如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变成阶级斗争的学说，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政党。这是常识，全体共产党员都知道。但是现在几十个党的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的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哪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都说自己是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孙中山和蒋介石也都是这样说的。美国反动派也说自己是全民的。日本也是如此，垄断资本说他自己代表全民。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他代表无产阶级，引导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变成农民的党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党在很长期间，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认为代表农民，托派也这样说。其实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

▲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是共产党，不是社会党，更不是自由民主党。

## 为学习雷锋题词（1963.3.5）

（略。）

##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963.9.3）

（如题，别人的经验只能作参考，必须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 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3.11）

*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 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革命运动的经验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自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想要篡改和抛弃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企图，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
*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 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
* 有什么奇怪呢？庞大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因为它反革命、反科学、反共产主义、反人民，势必从它的宝座上跌下来。列宁领导的“无名小卒”们要起来代替他们了。
* 在中国，毛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不顾曾经强加于他的“狭隘经验论”的嘲笑，政治上的打击和孤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 在中国，因为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家手里，广大群众拥护这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庞然大物被打倒了，被人看不起的人们(他们领导了占人口90%+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广大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物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化。
* 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共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列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
* 苏共领导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正确原则，首先把内部争论公开在敌人面前，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擅自宣布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所谓“反马列主义”者，其后又用种种恶劣行为反对中共和一切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曾经猖狂了好几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足以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使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好过的办法。如果他们再不改正错误，他们的日子是肯定会更加不好过的。
* 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帝国主义，二、真正的马列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 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维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日益同社会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使他们自己从形式到本质都变成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且用开除党籍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这时，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认识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终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训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手，重新回到马列主义。
* 总之，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列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列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列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 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领导着占世界人口90%+的革命人民，将战胜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
* 老修正主义者曾热衷于“回到康德去”的时髦口号，伯恩施坦公然说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在1905革命失败后，产生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认为只有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才是一条好出路，曾经公开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使革命家变成“造神派”。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这种反动倾向，受到了列宁彻底的批判。他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大著作，就是为了批判造神派的。
*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列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 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应当而且可以调和、融合起来。
* 我们对欧洲十四~十六世纪从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当代也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愿意同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联合的关系。
* 毛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列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原则。

## 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963.12）

1963.1.12，毛在南昌接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谈话在座的委方参加人：委共政治局委员埃：马查多和罗德里格斯，左派革命运动领导人萨埃斯，民主共和联盟代表纳胡尔；中方参加人：杨尚奎、李启新。

▲凡是马列主义政党都不会接受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但是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党的第一任书记陈独秀就是机会主义，1927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了托派，大概在1938抗日战争时期病死的。今天，有少数党员和干部还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还有资产阶级残余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存在。旧的官僚资本被我们没收了，民族资本被我们赎买了，但资产阶级的人还存在。十三年来，资产阶级中间的很多人接受了改造，愿意跟我们走，但另一部分人就不接受改造，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右派，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此外，我们社会里还有一个比较活跃的阶层，就是农村的富裕中农。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不过不占优势，是少数，要改造他们也很困难。美国人说我们好洗脑筋，但这些人的脑筋是洗不清的。你们(对卡瓦略夫妇)在中国住了三年，正是我们困难的几年，你们是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的。

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会更好一些。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又不会作教育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十三年的经验中，和过去革命时期一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要和平道路，不要革命。老的修正主义者说，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冒险分子”。

▲在十九世纪时，还没有无线电，打电报也要通过海底的电线。资产阶级学得会的东西，我不相信无产阶级就学不会。

▲[外宾：我们还不清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人贵族，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到哪里去找？]我已经说过，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农村中的富裕中农，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现代修正主义是战后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思潮。

## 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1964.1）

（略。）

##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1964.1.17）

这是毛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等谈话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二、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三战？有人说是。

（爱德乐：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件好事，对我们有利。

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除了有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三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一战、二战都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

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南越就是例子，美国就是没有办法把那里的人民压下去。而且这样的事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

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共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说明那里不稳定。东欧也是这样，例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不断换领导人。有些人是在激烈反华之后下台的，而下台之后就不反华了，例如于哥夫、西罗基。他们反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被赶下台以后就不反了。这说明了两点：一、有些人并不是真心反对中国；二、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对。我们有了资格，有人要靠反华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从那时到1958上，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

后来，1958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因为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去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1959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那些清规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

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是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三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这一段话。

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964.1.30）

这是毛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

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还是可以合作。我们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反对大国欺侮，不许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国家的本钱比我们的大，你们的原子弹都已经制造出来了，我不反对你们生产原子弹。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

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迷信它们那一套。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办？从前我们也照办过，那是在斯大林的时候。1957我还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苏联还不是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去了，因为它撕毁了大批合同，公开反对我们，同美国配合起来搞。这很好，我很赞同。美国、苏联这些大国来反对我们，总有个什么道理，我们也一定有一点东西值得它们反。现在，西哈努克不吃美国这一套了。柬埔寨这个国家只有五百多万人，但敢于跟美国斗争。

你们可以在亚洲和我们合作，同美国顶一顶。美国到处不得人心。本月，日本一百多万人示威游行反美。我曾经同你们前总理富尔先生谈过，希望你们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你们靠拢一些。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一、英国承认中国，不承认台湾，这是好的；二、英国现在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这也是好的；三、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来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同国内有什么密码通讯吗？在外国跑，没有个密码通讯可不方便。

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快地把话讲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曲，不要搞外交手腕。

法国已经不是希特勒的法国，中国也不是日本的中国了。过去，从北京到南京，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强占。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蒋都赶走了。那时，我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

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你们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延安去过吗？那里很落后，只有农业，一点点手工业。那时，我们说美蒋是纸老虎。我们也说，希特勒是纸老虎，他最后倒了嘛。

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当年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多大的势力，这你们都经历过。

什么全面、彻底裁军，你们相信不相信？没有那回事，现在是全面彻底扩军。减少一些步兵是可能的，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制造原子弹。你们法国已经能爆炸原子弹了。我们比你们落后了一步，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

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它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有些亚洲国家的人，反对你们到亚洲来支持西哈努克；对南越，只许美国占领它，不让你们来帮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东京说，戴高乐将军想拿着橄榄枝打进亚洲，但是没有打进来。美国一手拿橄揽枝，一手拿剑，在越南南方打了几年，越打人民的斗争就越发展。它的剑在那里杀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吴庭艳，一个叫吴庭儒，做法很恶劣。我看你们也不高兴吧？做这样的事干什么！现在扶植起来的所谓新政府照样不行，美国的政策太错了。中国四川省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

我们双方还可以对日本做工作。日本总有一天要把美国赶跑的。我说的不光是指日本共产党，还指日本的大资本家，现在日本有些大资本家对美国很不舒服。英国问题麻烦一点，哪一天它不当美国的代理人就好了。

我们不反对你们同美国好，对你们说来，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利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里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1961他第二次访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1964.2.13）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

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

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2〕，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个要考，知追什么是诺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安走问日C的风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

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1964.3.22）

（略。）

## 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1964.4.16）

（略。）

##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论（1963-1965）

本篇一是毛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千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二是毛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给刘少奇的一封信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在1964.9.25将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九月八日给他的信和他九月二十三日的复信稿报送毛，毛当天给他写了这封信。本篇四是1964.10.18毛再阅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五是毛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六是毛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七是毛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第─编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旁写的一个批注。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963.5）
2.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1964.8.29）
3. 干部中，不少自以为是的。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1964.9.25）
4.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1964.10.18）
5.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1964.12.13）
6.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指1931-1934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等人)，实在懂得很少，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1965）
7.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 反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1964.6.14）

现在非洲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政、经、文各方面独立。我们都要反对外来干涉。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也要几十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几百年的建设历史。我们几十年赶上，时间并不那么长，我们要有信心。有人说有色人种就不如白种人。我看，他们说得不对。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比西方更好一些。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亚非拉。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人民中也有很多人是不反对我们的。在美国人民中就有很多人是赞成我们的，如美国专家有些在我们这儿当编辑、翻译，也有的在我们的外国语学校帮我们教学。要把他们的政府、垄断资本家同广大人民分开来看。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一、你们有人民；二、你们在非洲是个大国，有很好的土地，可以搞农业和畜牧业；三、可能有很多地下矿藏。这几条中，首先一条是你们有很好的人民。

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不要讲很久以前的历史，就讲十年前和十年后就大不相同。十年前，埃及在1952推翻法鲁克王朝，苏伊士运河还没有收回。十年前还没有开万隆会议。世界变化相当快。

历史和未来属于各国人民，不是那些大资本家。

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否则，对你们、我们都不利。到外国去剥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自己还是被压迫者，台湾还没解放。自己还是个不发达的国家，去打外国人的主意，像话吗？如果哪个中国人在你们那儿做坏事，你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把他撤回来。你们也可以把他赶回来。

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我们也有跑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去的人，他们看不惯社会主义，想跑也可以，我们人本来就太多了。

##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964.6.16）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防止出修正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1. 教育干部懂得马列主义。即，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2. 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
3. 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要记仇。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完全的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党的历史上没有哪年纯过，但却没有垮。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95%。
4. 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听各种意见，包括反对意见。要讲民主，不要就自己讲，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5. 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

##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964.6.23）

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会把建设打烂。国民党内战，打了好多年。后来又跟日本打了八年。讲长远一点，之后的帝国主义，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最后是二战，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

（中国近代革命历程，略。）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至少要几十年。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帝战争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越南的反帝战争，我们是支持的。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还有抗美援朝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美帝。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不会放弃它的，即我们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蒋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高兴。我是指美国资本家，而不是美国人民。

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殖民地，这是指在经济上，许多时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听美国话的吴庭艳，美国竟把他杀掉了。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政府杀掉的，没过一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布满军事基地，而且侵占台湾，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不高兴。

美国人说我们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来过，可是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 教育制度要改革（1964.7.5）

这是毛同他的侄子、中国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话纪要的节录。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 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1964.6.27）

（略。）

##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7.9）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是大家关心的问题。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非拉在二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同它打了八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支持蒋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寇和美帝，还有走狗汪精卫、“满洲国”、蒋。解放后，一位日本资本家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共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一、它削弱了蒋；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是美帝。第三个是蒋。当时蒋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五百多万。蒋95%+的军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5%-跑到台湾。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美帝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非拉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1958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1958-1964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1956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法联军那样强大，却一打就跑了。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八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八十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八十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十二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胜利了，本·贝拉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否则也像法国一样失败。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它不走是不行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非拉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那就学卡斯特罗、学本·贝拉、学胡志明、也可以学中国。所以，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没有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如果有中国人不尊重你们，那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我认为或用文的办法，或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那里学来的，蒋打我，我就打他。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我打了二十五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不会打仗的，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说我们是侵略者。确实是“侵略”了蒋，但那是蒋先侵略了我们。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共就犯过很多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 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1964.8.22）

这是毛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的一部分。

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也可能不同，但我们根本共同点是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我们这些国家，是没有原子弹、氢弹的。法国是有原子弹的，但是在座的法国朋友是反对发动核战争的。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现在的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美国有这么多原子弹，也只使用过两次，就是二战快结束时，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反对三战，也反对在越南南方的外国军队干涉别人内政，打“特种战争”。法国政府说，法国过去在越南是打败了的，现在美国又在打，照他们看来，美国也要打败的。因此，法国反对用战争办法解决越南问题、老挝问题，主张和平谈判。法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资格来讲话。日本也取得了一定的资格来讲话。二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核战争。在座大多数朋友的国家同我们一样，是没有原子弹的。我们跟法国有外交关系，在反对美国侵略这一点上有共同点，不但跟在座的法国朋友有共同点，跟戴高乐也有。这就是说，世界已经起了变化，不再允许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在座各位朋友代表了人类大多数，你们的理想是要实现的，但还要斗争。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就不相信人民不能胜利，我看你们也不相信你们不能胜利。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1964.9.10）

戴高乐总统7.23批评了西德。我看这个批评相当好，也让西德考虑一下，就是听美国话太多啦。还有英国，我看也值得批评一下，它跟美国太靠拢了。

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把英国算在美国那边也可以但英国保守党里也有人不赞成英国政府的政策。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你们说我们也参加了对东南亚的干涉，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空话”来干涉，就是鼓励和支持那里反美的游击战争。这是公开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支持。

##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963.9、1964.12）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105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除了最后一次的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社会制度腐败，二、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就要犯错误。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做得到的。只要看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我们从一个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我们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抛掉了。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孙中山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 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1965.3.23）

亚洲所有的革命者和政党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同帝国主义对抗，我们希望你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美国的手比我们长，到处侵略。1958美军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军队在约旦登陆，造成局势紧张。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英军队才被迫撤走。后来，黎巴嫩还发生了内战。在你们地中海有美国的第六舰队，在我们周围有美国的第七舰队。美国总共有四个舰队：第七舰队最大；其次是第六舰队；第二舰队分布在美国西海岸，是第七舰队的后备；第一舰队在美国东海岸，是第六舰队的后备。另外，美国在摩洛哥和利比亚等地有军事基地，英国在亚丁和波斯湾也有军事基地。

打日寇时，我们是同美英法合作的。日本降后，美帮助蒋发动内战，当时英法已经没有力量来管我们了。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它在中国沿海港口驻扎了一些军队，当我们消灭了蒋数百万军队，快要解放那些港口时，它的军队撤走了。后来，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遇见了美国军队，打了三年。现在，越南人民也遇见了美国军队。看来，美国是喜欢打仗的。朝鲜和越南离美国那么远，它还要派兵来。

我们两国都受过殖民主义的压迫。你们过去是法国管的，我们过去是受好几个帝国主义管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来都被我们赶走了。日本同我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十四年，在其他地方打了八年。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团结起来反对它，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美国军队占领台湾，还占领南朝鲜和日本的许多地方，并在越南打仗，美国实际上是在教育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比如越南人民，从前不知道怎么打仗，现在学会了。

帝国主义有时通过它的走狗教育人民，如中国的蒋。我们就是受过蒋教育的，他用内战教会我们打仗。像我，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现在，非洲正在发生战争。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仗，才取得独立。在苏伊士运河也打过仗。你们是在二战，因为法国人被迫退却而取得了独立的吗？

我们在外表上样子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样。我应当说明我是不信教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合作。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不损害对方。我们不颠覆你们，你们也不颠覆我们。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

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非常恨我们，说我们好战。其实，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它只占第二位。比如南越，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可是人民打得很好。

阿拉伯民族是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应当说，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团结斗争，就能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国家革命胜利经历了二十二年战争，先同国内敌人作战，并进行了长征，后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最后同美国支持的蒋作战。这期间，我们自己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纠正了错误，我们就胜利。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个政党同一个人一样，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许多例子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革命是可以胜利的。

## 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65.6.26）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有结束呀！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 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1965.8.8）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1965.10.20）

这是毛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是个不太平的世界。

不久前，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登载了日本记者从南越发回来的几篇报道，美国报纸说报道不公正，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的不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这就可见舆论的方向是不利于美国的。最近，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示威发展起来了。目前主要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在闹。

不过，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我们和美蒋都谈过。腊斯克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美国曾想和我们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

原来你们曾按照日内瓦协议，把在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结果，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又重新搞起武装斗争来。一开始，你们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我们赞成。到了第二阶段，你们是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时进行，我们也赞成。第三阶段，你们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我们又赞成了。依我看，敌人在逐步升级，你们也逐步升级。在今后两三年内你们可能会困难一些，也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应该把这点估计进去。做好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大概是当他们打到第四五个年头时，有些领导人就有点忧愁了。那时他们的总理阿巴斯来和我们谈，说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很少，只有一千万，已经死了一百万；敌人的军队有八十万，而他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四万，连游击队算在一起不到十万。我当时对他们说，敌人一定要垮台，坚持到胜利之后，人口会增加起来的。后来经过谈判，法国撤了军，现在已撤完，只留下一点海军基地。阿尔及利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对于发动群众和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你们和我们同阿尔及利亚有所不同。

我在文章中讲的人民战争，有些属于具体问题，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情况，你们的很多方法和我们过去的不同了，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打仗也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打了些败仗，不像你们这样顺利。

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且是可以打败的。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除（1965.11.25）

这是毛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谈话的主要部分。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个事情是从今年二月美国的空军轰炸北越开始的，几个月后，最近美国进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十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反对侵略越南。

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一种征兆，预示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家里总是不那么很穷的，甚至他们也都反对本国的反动派。他们的斗争会影响广大群众，会影响其他阶层，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组织示威游行，火烧了那时的政府部长的房子。革命开始时并不要多少人。党在1921只有几十个人，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就在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党一大，十二个代表参加。在这以前，我也不是共产党人，可能比你们现在的知识还要差。原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比较先进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就翻译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所谓“三矢计划”是日本的一些教授揭露的。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搞细菌武器，也是日本教授揭露的。可能那些教授也并不是什么共党员，他们是出于良心，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黑暗面。

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中国长期搞不清楚，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在这以前，总认为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党成立后，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才闹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所以，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欢迎。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说我们只对个别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同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同日本相互派了新闻记者，相互派了贸易办事处。说你们的政府那么坏，我看比美国政府稍微好一点，也比蒋好一点。我们跟蒋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人员往来，当然他不是什么外国人。

##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1941）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对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无论它有利、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不能动员群众，我们都不得不调查、考虑、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必须明白，在日本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90%以上的一切地方，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二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却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争取胜利，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结果是任何稍广大、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共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大小，总分，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7]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937.6.5）

1937.5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我以为必须承认以下论断：

* 1. 党在十五年中领导中国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
  2.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
  3. 一方面，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
  4.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列主义，有了马列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
  5.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列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列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小的、“左”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1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2有，三个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党的正统，包括政治、组织、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团结、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党内确实存在许多不良习惯。否认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

1. 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
2. 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
3. 党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
4. 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

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党内还存在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些少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不会长期如此。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也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

1. 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
2. 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
3. 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
4. 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
5. 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
6. 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

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 第七卷（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https：//www.wmjy.cn/search.aspx？searchtype=0&Keyword=%e3%80%8a%e6%af%9b%e6%b3%bd%e4%b8%9c%e9%80%89%e9%9b%86%e3%80%8b%e7%ac%ac%e4%b8%83%e5%8d%b7](https://www.wmjy.cn/search.aspx?searchtype=0&Keyword=%e3%80%8a%e6%af%9b%e6%b3%bd%e4%b8%9c%e9%80%89%e9%9b%86%e3%80%8b%e7%ac%ac%e4%b8%83%e5%8d%b7)

## 出版说明\*\*

毛的著作，是马列主义的不朽贡献。根据中共中央出版毛选和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老朽编辑了这部《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获知毛生前不愿出全集，老朽也无此能力，故全集之事只能报憾了，就此封笔。

过去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五卷和第六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第七卷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

在中国成立后的新历史时期，毛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贯原则，领导党和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在反对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时期，毛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系统总结了我国的和国际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观点，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新思想、新结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它不仅为我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而且具有伟大的深远的世界意义。

《毛泽东选集》第七卷是1966~1976的重要著作。毛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理论，关于人民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大”权利的理论，关于对修正主义反动派造反有理的理论，关于权力机构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理论，关于抓革命生产的理论，关于发展经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要吐故纳新的理论，关于学校要半工半读的理论，关于知识青年要支援农村的理论，关于合作医疗的理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关于中国不称霸的理论，都在本卷中得到阐述。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但由于毛逝世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非毛”活动，让“毛泽东思想”这个术语由原来代表的鲜艳红旗变成了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特色旗”，所以老朽也用“毛主义”〔2〕来代表毛的学说。

毛主义是当今世界的马列主义，马列毛主义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毛的思想和学说是永存的。

收入选集的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著作，有一部分发表在中央出版的文件上，有一部分没有正式发表过，包括毛起草的文件、手稿和讲话的正式记录，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静火

2010.6.4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主席普拉昌达：《论毛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发展之中结晶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众所周知，卡尔马克思通过不间断的斗争实践和自己的伟大天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由三个部分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发展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根据阶级斗争的新实践和新问题，列宁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提升到第二阶段，即列宁主义。今天这一科学正在通过斗争向着它的新的更高的第三阶段发展。这个新的更高的第三阶段就是毛发展的毛主义的阶段。因而，在今天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手中，就有了马列毛主义这一为全世界接受的总体完整的理论实体。如果不把毛主义理解为当代的马列主义，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正因为他是马列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全世界的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就一直在恶毒地攻击毛主义和毛主义者。正如马列主义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在与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毛主义也将在与各种错误的剧烈斗争中建立起来。

在我们的运动中，尽管有了把毛的贡献理解为马列主义的思想，这些贡献已被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术语进行了表述。虽然我们把毛的贡献作为无产阶级普遍接受的理论，并宣布“毛泽东思想是当今世界的马列主义。”但是，随着毛去世后，右倾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主义运动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A、哲学领域

1. 毛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认识的所有领域确立了矛盾法则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和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对矛盾普遍性和决定事物主要矛盾的过程和重要性的分析把对辩证法的理解提高了一个新的高度。确立矛盾基本法则对于明确地阐述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2. 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作为认识的来源，对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和对理论与实践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毛的思想无可争辩地在认识论的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3. 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的主要方面这一问题的深刻分析和应用，为革命者与修正主义作战提供了便利的锋利武器。
4. 在同修正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思想“生产力理论”和“经济主义”〔这是基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形而上学与一点论的理解而产生的。〕的斗争中，毛对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下可以起决定作用的分析暴露了资产阶级的伪说。
5. 毛的使哲学走出图书馆和书斋变为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必要性以及实现这一过程的实践为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奠定了基础。

B、政治经济学领域

1. 在这一领域，对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析是毛的一个重大发现。对被压迫民族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垄断资本主义联合封建主义掠夺人民的代理人--的分析，一方面揭露了以新殖民主义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的非人性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指明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对象。只有通过摧毁官僚资本主义，没收他们的财产，才能把帝国主义从受压迫国家驱逐出去，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这一结论的历史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2. 毛为社会主义时期经济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是通过资产阶级的命令，而是通过发挥群众的主动性〔通过在群众中宣传正确的经济政策〕才能坚实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伴随着这一观点而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和“又红又专”的口号，这些口号的革命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3.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下，通过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摧毁封建主义的基础，没收具有垄断性质的外国和国内的公司并以此限制、控制和引导对公共生活不具有控制力的私营资本主义，这些经济政策已被实践证明是合理的。

通过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毛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发展是十分清楚的。

C、科学社会主义领域

1. 毛提出了被压迫民族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概念，他的这一历史性贡献世人共知。
2. 在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人民战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空前的顶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武器。这一理论阐明了战胜强大敌人的科学方法。毛简要明快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3. 牢记苏联反革命的教训，毛发展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仍在继续的理论，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4.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未来50到100年内，世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毛的这些格言具有独特的重要性。这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制定自己的革命战略做出了重要贡献。毛自己在也同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用了这些思想。

因此，毛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方面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使之在质上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以马列毛主义这一专有武器的形式的获得了自己解放的理论。

在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使用毛主义的这一术语的争论甚至是向破坏毛的贡献的方向“前进”的。不驳倒这种谬论，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这些谬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历史时期论”：有人说，要形成“主义”，它应当代表整个历史时期。据此，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产物，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而毛不代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毛主义，等等。持这种观点的人要么是没有理解科学的基本规则和发展过程，要么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企图把科学的发展限定在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之中，这是完全不科学和可笑的。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科学可以发展许多阶段。如果有人谈起历史时期，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说，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的、垂死的阶段。因此，列宁主义的提法也是不合适了。因之，历史时期论者论点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2. 有人说，由于毛没有创始性的贡献，因此使用“毛主义”这一术语是不合适的。根据他们的观点，毛所讲的话都是列宁说过的。当支持“思想”这一术语的人们也持此观点时，事情就变得更严重了。毫无疑问，持这种观点的人们选择的是连毛泽东思想都要放弃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已经简单地阐述了毛的贡献，然而，如果人们要按照上面的思路来讨论事情，问题还是会产生。为什么不说列宁也只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复了马克思主义呢？为什么这些人还是要接受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呢？答案很简单，就是要误导人民。如果不是那样，他们要么拒绝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要么就停止对毛的贡献的破坏。
3. 有人会说，我们不应匆忙地提出毛主义，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没有人会听我们的话，那样的术语就不应该被提出：这只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许多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的动机也许是诚实的，但是这种观点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不是匆忙或不匆忙，而是正确还是错误。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它最终将导致不必要的妥协，只能会导致人们在永远的错觉之下工作。

结论：“毛主义”这一科学术语是十分重要的。

静火有言

〔一〕

胡锦涛〔1〕曾代表中央表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毛！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2〕

但实际上，三十年来，掌握了话语权的修正主义右派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肆意地猖狂地无耻地抹黑诋毁文革，而一些意图推翻共产党和公有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加入了反毛的大合唱，于是各种报刊影视小说等思想领域，大量充斥着文革和毛泽东的谎言：

1.红卫兵比日本鬼子还坏的谎言

2.刘少奇有病不给治，被迫害致死的谎言

3.大批老干部被迫害致死的谎言

4.文革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谎言

5.文革闭关锁国的谎言

6.文革是十年动乱灾难浩劫内战闹剧的谎言

7.周恩来也反对文革，文革是毛一人的文革的谎言

许多朋友已经驳斥了这七个谎言，但他们还会造出七十个、七百个谎言，比如，“毛的稿费在文革中达到亿元”的谎言，比如“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谎言，甚至“毛的《沁园春·雪》是窃取胡乔木”的谎言，够了！我明白了，他们和毛之间是阶级仇，他们知道毛是社会主义的魂，只有彻底否定人民领袖毛，让人民失去指导自己斗争的理论—毛主义，他们才好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他们才好为所欲为地压迫人民。因此，只有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谎言才没有市场，才会有更多的人和他们斗争，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所以唤醒人民才能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也是老朽编写本卷的一个目的。

铺天盖地的反毛非毛宣传是无法蒙蔽广大人民的眼睛的，但确实给一些小孩洗了脑，比如袁腾飞〔七二年出生，在其九岁到十八岁的年龄段被反毛宣传洗脑〕，而其本人又不学无术，终于变成了一个垃圾文人。

尽管如此，连最死硬的反毛狗分子茅于轼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拿人数来讲，恐怕怀念毛是当前的主流。”〔3〕也就是说，如果全国人民投票选举领导人，拥护毛的政治家会当选，这难道不是民意吗？

〔二〕

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非毛”、“唯生产力论”加“不争论”，即是后来大肆鼓吹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唯生产力论的根本思想不是以人民的幸福为治国标准，而是以经济数字为标准，一切为了提高GDP，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为了提高GDP，可以将宝贵的有限的资源贱卖给外国资本家，可以将国企卖给个人，可以不顾环境污染，可以再现黄赌毒，可以贪污，可以受贿，可以把人民的命用二十万来标价，挖煤矿的时候人不过是二十万的设备，死一个就赔二十万，然后继续挖。

而最能体现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就是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本来生育权是基本人权，之前国际三个人权会议〔4〕都通过宣言，确认“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任何政府和组织不能剥夺人民的生育权。

但修正主义右派为了反毛非毛，散布“中国贫穷的根源在于人口多、分母大，而毛与马寅初的人口之争以及‘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激增，所以毛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制造者”等歪理邪说，1979.8.5《光明日报》上发表反动文人朱相远的文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意思是说，由于在五十年代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的“人口论”，致使中国人口多增了三亿，拉开了非毛的序幕，这个谎言直到2009.12才由中央文献室曹前发写的《“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说之历史误读》正面斥之为“谬误”，可惜已经流毒三十年矣。

1980.9.25《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标志着修正主义势力已经全面夺取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制定政策的权力，改革开放由此开始，此后强计生在“不争论”的口号下野蛮推行，致使我中华民族四亿子孙无法来到这个世界，八亿父母受到最耻辱的迫害，公职被开除，房屋被扒倒，家里值钱的东西被抄走，人被抓走强行阉割结扎，而后来的结果表明，无论男女结扎十年后必将失去性能力，多少大月份的婴儿被打上毒针然后引出体外，哇哇哭声不断，对母亲对婴儿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啊，老朽亲眼见过计生委的打手进农村抓人，把全村符合条件的男子全部抓走结扎，这是多么令人发指毛骨悚然的罪行啊，希特勒推行灭绝犹太人计划毕竟是针对外国外族，南非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毕竟不伤及人命，而强计生却是针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子孙，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天啊，我怎么生在这样一个罪恶的年代！而计生委的刽子手们，却把杀戮婴儿消灭子孙当成了自己的功绩，2009.12.9计生委的副主任赵白鸽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竟然说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少出生了四亿人口，按照目前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四点五七吨计算，中国如今每年减少十八点三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人怎能如此无耻！！！

强制计划生育在理论上是无知、愚蠢和荒谬的：1979.8.5田雪原发表长篇论文《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1980新华社公布了导弹控制论专家宋健等人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2050中国人口将达到四十亿。这是一个草率的、机械的、愚蠢的结论，用两个月时间怎么就能论证了中国百年的人口呢？宋健和田雪原等人正是中国1980开始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总设计师”。他们所谓的“现代科学”就是设计数学模型，算中国有多少耕地资源、多少别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养活多少人，由此决定中国的“最适人口”是几个亿〔七亿、五亿、三亿的说法都有〕，他们荒谬地认为，“公民的生育权利是政府恩赐的”，为此中国必须实行生育率管制减少多少人口以达到这个“最适人口”。他们从不去调查真实世界约束人的行为的种种局限条件，而太急于搞社会工程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但实际上这四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全部出现了，而且形成了大灾难。易富贤的研究〔《大国空窠——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香港大风出版社二○○七年版〕充分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宋键和田雪原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强制计划生育政策是野蛮的：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198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严格控制第二胎，坚决杜绝多胎生育”，“严格控制”加上“坚决杜绝”是多么野蛮啊，由于强计生违反人性和人权，必然受到人民的抵制，计生部门主要、经常依靠暴力或其他强制措施推行，手段包括强迫体检、上环、结扎、堕胎、处死活体娩出〔通常是大月份甚至是足月引产〕的婴儿、巨额罚款〔社会抚养费〕、抢夺财产、殴打、抄家、坐黑牢〔办学习班〕、不给上户口、开除公职、学籍、军籍等等。超越人性底线的种种暴力计生事件层出不穷，如孕妇在街上被抓走做流产顶替他人流产名额，计生对象逃走抓捕其亲属、邻居，姐姐逃走就结扎妹妹，哥哥违规扒弟弟的房子等等，法院不愿、不能、不敢受理计生案件。王鑫海博士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十宗罪》充分揭露了他们的罪行。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计生委。

强制计划生育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首先，私生活权是个人最根本的权利，是人格尊严的最后屏障。一个没有多少权利意识的人，可以对没有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利无动于衷。但是当政府或他人损坏他的健康、毁损他的名誉、暴露他的隐私、闯入家中拿走他的财产、抱走他的孩子、抢走他的妻子的时候，当政府或他人用绳子五花大绑把她抓去绝育或堕胎的时候；他〔她〕只要不是个白痴，就无不感到铭心刻骨的痛苦。这种痛苦达到一定程度，对许多人来说可以彻底摧毁他的人格尊严和道德观念，使他〔她〕相信“人对人是狼”的性恶论，从而在没有现实危险的时候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益。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连生育自由的权利也被剥夺，很难想象这个国家会实现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一个民族的素质低可以慢慢的提高，但如果一个民族多数人没有了人性，没有对自由的向往才是最最可怕的。

其二，强计生导致了严重的人口结构问题，据统计，二○○七年中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一点四三亿，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二○三○年到来，届时需要抚养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同时，新生人口严重不足，农村中小学的生源严重短缺，很多学校已经被迫合并或关闭。强计生造成劳动力短缺，养老金陷入困境，整个民族面临崩溃的危险，想一想，两个独生子女夫妻怎么能扶养一个孩子和赡养各自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共九个人呢，家庭势必崩溃，家庭的崩溃势必引起社会的崩溃，因为全中国的所有老人必须靠全中国的所有年轻人来共同养老，由于独生子女比例高和适龄青年逐渐减少，同时会出现征兵难的情况，独生子从小受溺爱，娇生惯养，怎么能打仗？于是，民族也就崩溃了。

其三，强计生造成性别失调，据2007.2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我国1996~2005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100。再过十多年，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几千万光棍。这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四，强计生造成中国的主题民族汉族在各地人口比例下降，严重弱化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少数民族占优后的地区必然发生分裂主义运动，现在的西藏和新疆就出现了这种恶果。

其五，强计生对家庭伦理的摧残是致命的，人的社会情感，主要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而亲情又包括父母儿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还有与叔、伯、姑、舅、姨之间的亲情，以及由这些关系衍生出的堂兄妹、表兄妹之间的亲情乃至更大范围的亲情。而现在因独生子女家庭居多，堂亲、表亲这些层次都逐渐弱化或者断绝，这种人伦的缺陷必将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总之，强制计划生育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最无知最荒谬最残忍最野蛮最专制最卑鄙最下流最无耻最黑暗的一页。

改革开放中的许多政策都和强计生类似，像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国企改革、就业改革等等，都是决于仓促，行于专制，收于罪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强计生开始，必将以强计生被废除而结束。

〔三〕

文化大革命和后来的改革开放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是严重对立的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文革革的是官，改革改的是民，请看：

1.

文革实行大民主，七五年宪法规定“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改革搞“垂帘听政”，搞“不争论”，八二年宪法删去了“四大”权利和“罢工”自由，并且在八九年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这部只有三十六条条文的法律，竟有三分之二的条文是约束公民权利的行使，使用了十三个“不得”，根本就是反游行示威法，此后，中国再无真正的游行示威、言论自由。

2.

文革中“各级干部都要参加劳动”，勤政清廉，极少贪污；改革中各级干部都是官老爷，腐败糜烂，极少清廉。

3.

文革中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改革中废除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完全倒退到了封建社会，断送了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

4.

文革中城市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当家作主，没有失业、养老、教育、医疗的忧虑；改革中进行了私有化改造，能卖的卖，能送的送，到最后九千万工人下岗，公有制奄奄一息。

5.

文革中处处为工农兵着想，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公费医疗，药品大降价，福利分房；改革中搞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住房市场化，终于引来了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

6.

“毛泽东时代的中美关系，中国在人权等方面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后来倒了过来，中国变成了守势，美国变成了攻势。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领先于美国。不仅领先于美国，甚至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政治文明的中心。”〔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毛泽东时代时的谈话〕

对这一点，毛在文革中就看透了，准确地把邓小平定位在“走资派”，邓小平虽然多次表示“永不翻案”，但他一直怀着报复的心态想否定文革的，等他把华国锋逼下台后，就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否定，清理了所谓的“三种人”，所有的政策都与文革对着干，1984.4.23《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5〕，提出：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不想再比较文革和改革，因为红和白很好区分，我只想问，改革开放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我们先看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怎么说的：

“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选第三卷《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3.7〕》〕

下面我提供一个资料，据新华社举办的国内经济权威报纸《经济参考报》2010.5.21发表的《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财富两极分化》，国内各大网站均予转载，作者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二○○七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

按照邓小平的标准和新华社公布的事实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失败了，改革开放是一条邪路，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四〕

文革十年是思想空前解放的十年，文革使社会主义观念深入人心，这就是追求公正，追求平等，追求社会正义和自由，反对压迫，反对剥削，从此后，谁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就不得人心，谁想剥削别人压迫别人就会被打倒。

文革十年是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的十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毛主义成为人民手中的利器，反对官僚主义、官僚特权、等级差别，打击贪污腐败、腐化没落，追求社会平等、社会公正。

文革十年是民生辉煌的十年，实现了教育革命，改革了从学制、教材到升学、考试等一系列旧的教育制度。打破了教育战线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落实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各类各级学校不收学费或只收极少的课本费、杂费，工农劳动人民的子女不仅有了上学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上得起学。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学到大学，成立了以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和教育行政的管理机构；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教育真正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手中。随着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在广大农村涌现出一大批“赤脚医生”，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长期以来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

文革十年是社会风气高尚的十年，以八个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工农兵真正走进了艺术的殿堂，成为了舞台和各类文学艺术作品的主人，他们和他们的英雄业绩与劳动风采，成为了被讴歌的主题。千百年来，文学艺术领域这块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世袭的领地，史无前例地为工农兵所占领。批判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社会风气良好，新人新事辈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切沉疴痼疾，在我们的社会里基本绝迹。

文革十年是政治清明干部清廉的十年，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深入人心，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识别能力。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政权。由于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代表参加，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因而密切了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了国家政权的坚实基础，社会秩序稳定，犯罪率极低，人民安居乐业，无产阶级专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文革十年是经济辉煌的十年：

1、农业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农田水利工程配套成龙，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一九七六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六点七倍和六十六倍，全国三分之一的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增长了四点九倍，机电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多；农用化肥产量增加了二点一倍，每亩化肥施用量增加了二点一倍；每亩用电量增加了四点七倍；农用载重汽车拥有量增加了三点三倍；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千八百三十六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人均产量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一。

2、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继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一九七六年我国原油产量为一九六五年的六点七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崛起。一九七三年从国外引进十三套大型先进化肥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三百五十七万吨，尿素五百八十万吨。同时引进的大型化工、化纤生产设备，也先后在北京、上海、辽阳、长寿等地安装建设。在此期间，冶金工业方面，新建了攀枝花钢铁厂、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武汉钢铁公司还从国外引进了先进的一米七轧机工程设备。机械工业方面，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四川大足汽车制造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方面，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方面，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及国外引进设备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兴建。

3、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

1970.7建成了全长八百九十公里的焦枝线。1971全程一千○八十五公里的成昆线全线通车。接着全程二百○九公里的大焦线也全面动工。此外，还修建了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上的阳平连接。华北地区继续修建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线，还建了通〔县〕坨〔子头〕线。全长六千七百米，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南京长江大桥，由一九五九年动工，1968胜利建成。此外，1974还先后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秦皇岛、由秦皇岛到北京、由山东临邑到南京等长距离输油管道。邮电通讯方面，一九七六年建成全长一千七百多公里的中间轴一千八百路载波通讯干线和连通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讯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条卫星地面站。

4、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继1964.10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6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9.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10我国第一次实验发射核导弹成功。1970.4.24我国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11.26按预定计划回收所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我国成为美、苏之后第三个可以回收卫星的国家。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科技人员，于1972成功地培植了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提高亩产百分之20%。

文革十年是外交辉煌的十年，1971.10在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上，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2尼克松访华，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从而宣告了美帝国主义孤立我国政策的彻底破产。到1976底，和我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四十九个增加到了一百一十一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文革十年是中共建国六十年里发展又好又快的十年，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五〕

老朽采集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一部分以中央名义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文集》〔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毛泽东论教育革命》〔8〕、《毛泽东外交文选》〔9〕、《毛泽东传〔1949-1976〕》〔10〕、《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11〕、文革中传达下发的文件、全部的《人民日报》〔1966-1976〕；一部分没有公开正式发表过，如《毛泽东思想万岁》〔12〕；本卷所选文件，公开发表的都按原貌收入，没有正式发表的讲话记录在编辑时作了必要的技术性的整理。

最后，声明一下，由于老朽年老眼花，时间也不充分，对编辑这样一部重大题材的选集难免有所偏差，希望广大网友理解。我会根据今后获得的资料和朋友们的意见不断地来充实这部毛选。

静火

2010.6.4

〔6〕《毛泽东文集》是继《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之后的又一部体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的多卷本毛泽东著作集。这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从1992开始，至1999全部完成，历时八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三次陆续出齐。1993毛诞辰一百周年时出版第一、二卷，1996毛逝世二十周年时出版第三、四、五卷，1999.7.1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为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为社会主义时期的著作。全部选稿八百○三篇，其中民主革命时期五百○四篇，社会主义时期二百九十九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

##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备战备荒为人民（1966.3.12）

（略。）

##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3.20）

1. 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

苏联二十三大不参加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1. 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不要剥夺吃饭权，有什么关系。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解放军的首长，对历史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好的坏的都不要压。

〔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

〔朱德：打倒那些权威。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现在的权威是谁？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 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现在要做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要搞机械化。〕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虚君共和”，毛认为中央高度集权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并提出了“虚君共和”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彻底贯彻，建构了中国计划体制中的中央高度集权，形成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体制，从而使中国的i划经济体制有别于苏联模式）*。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办托拉斯，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二十三条：1964底到1965.1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这样不行。

〔周恩来：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品带新产品。〕

〔林彪：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这好像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小钢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明年搞个办法。〕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那就叫第八机械部的陈正人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么？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中央也无权呀！〕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

〔林彪：还是要学毛著作。〕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列宁也是超。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 对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批评（1966.3/4）

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都、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名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4.10）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在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1942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毛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总结，是马列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的这五篇著作，够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好的作品也有，但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步地开展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革命，并带动文艺界发生革命性变化。它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影响，有力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和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从生活中去提炼、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只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艰苦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不可能例外。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有人却在毛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缺乏具体分析。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解决。

四、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正确指示；明确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反动的所谓“创新独白”，我们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反动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并没有系统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和模仿。盲目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只有人民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面对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要在党中央和毛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伟大的国家、党、人民、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对创作中的困难，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功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否则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也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样两点：一、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交给群众评论。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也可以提高群众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文艺批评家”的械。要开辟文艺评论专栏，对基本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人是认识问题，他们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捉大人物，要敢于碰他。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论据充分、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会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时，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要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些。我们的文化水平较低，经验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或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在根据地，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缺点是，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和党的文艺。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组织路线、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著作，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利。

## 学校一律要实行半工半读（1966.4.14）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学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有准备地一律到工厂、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五五开，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90%+；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

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

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分批分期，但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1966.5.5）

这是毛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代表团时的谈话节选。

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到1966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 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五·七指示（1966.5.7）

这是毛通知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如题所示。）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1966.5.16）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2.12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在1965.9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1. 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2. 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3.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1957.3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4. 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5.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列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6. 毛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7. 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列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8. 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9.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10. 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政府、军队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 同胡志明的谈话-不搞清官贪官，搞文化大革命（1966.6.10）

胡志明：越南共产主义革命家，时任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本人的汉语说得极为流利，仅略带广东口音。

毛：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接班人究竟是谁，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帮助些什么？

胡：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年产钢多少？

胡：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那里去的？从中国去吗？

胡：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什么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象癞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去世后，爱德华·伯恩斯坦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发表大量理论文章，形成一套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代表作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正。由于伯恩斯坦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的，所以，修正主义一词即由此而来。此后，凡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实际上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机会主义思潮，都被称作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世界修正主义的鼻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考茨基在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会主义理论，成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各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戏剧界又分好几种戏。

毛：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上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1957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了。

胡：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听了毛、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

## 给江青的信（1966.7.8）

这是毛在武汉致江青的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原件为毛销毁。

江青*（毛夫人，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6.29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帮，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的很凶，简直吹的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将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倒霉了。

中国自从1911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利用了孙中山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66.7.19）

5.25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 工作组要撤，文化革命要依靠革命师生（1966.7.24）

开两个会，一个是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另一个是起草文化大革命文件的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行，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六月一日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们谁看过，小平看过吗？

〔邓小平：没有〕

哦，没有，知道你也没有。那么你能斗得了他吗？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

〔陈伯达：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几个理论和方针，他们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乱弹琴！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闹事就是革命。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

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哪个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

〔康生：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大搞排除干扰，实际上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据说《新华日报》被学生包围了，就不得了了，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革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你们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和吴德来了吧？

〔李雪峰站起来：我在。〕

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讲话有什么了不起？学生们围上来，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刘少奇：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你搞了一二个月了，却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嘛，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怕什么，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但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教科书你工作组能弄出来吗？不行，还得靠本单位的人才能改。这一点大多数人都通了，你还不通？

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可能来不及了，要加就加中央社论和通知。

〔周恩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毛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另外，我提议教科书加上毛的著作。〕

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像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当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李雪峰：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除你外，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邓小平：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究竟是谁掌握呀？我看还不如有些学校呢！你们没想想，学校的学生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就要闹事嘛，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使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正在制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吗？我看文件上要写明只有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就斗他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

##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8.1）

（略。）

##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8.4）

（如题。说是群众路线，命令学生革命，真来了却要镇压，这与国民党之流没有区别，总之，不要镇压。）

##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8.5）

（略。）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8.8）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在党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复辟。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有魄力、有智慧，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但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存在四种情况：

1. 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的好学生。他们提倡大字报、大辩论，鼓励群众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时也鼓励群众批评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领导就是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由于毛泽东思想领先。
2. 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的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他们是“怕”字当头，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不求进取。对于群众的革命新秩序，感到突然，以致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
3. 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实际上，他们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接受群众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
4. 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时，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要信任、依靠、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要怕出乱子。毛常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

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几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不可避免、必要、有益的。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辩论中，每个革命者都要善于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革命的同志，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以便加强团结。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单位、工作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八、干部问题

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

1. 好的。
2. 比较好的。
3. 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4. 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是大多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同过去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斗争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十、教学改革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进行文化革命群众运动时，必须把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传播，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同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结合起来。

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

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积极工作的，不反党反

社会主义，不里通外国，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的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

文革使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丰富、更加提高了。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各地区、各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部署。

在农村和城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如果原来的部署是合适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乱它，继续按照原来的部署进行。但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的问题，应当在适当的时机，交给群众讨论，以便进一步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带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样做，如果那里党委认为合适，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十五、部队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

各级党委，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毛著作。特别是要反复学习毛有关文化革命和党的领导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各级党委，要遵守毛历来的指示，贯彻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先做学生，后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

##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8.12）

（略。）

## 对四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的批语（1966.9.8）

（外国专家发大字报表示取消自己在中国的特殊的高待遇，让自己和普通的中国群众一样接触群众，更好地劳动、改造和革命。毛表示同意。）

## 驻外机关也要革命化（1966.9.9）

（如题。）

##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10.24/25）

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搞串连，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

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

〔刘澜涛：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大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去看看再说。〕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问李井泉〕：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开始不大通，全会后一段时间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但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在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只是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可是刘少奇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后，就更分散了。1953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

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其涵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如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

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说：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邓小平〔虽然〕耳朵聋，〔但〕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占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真正四类干部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讲几句话，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就是搞一、二线。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训，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许多事让别人去搞，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

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大家同意了。再嘛是过于信任别人了。这件事引起警惕，还是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几件事，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

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决定通过了不一定能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现在经过两个月了，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大家发言都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经中央同志讲话，交流经验，就比较顺了，思想就通了一些。运动只搞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开始搞民主革命，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斗争怎么斗争法，以后才摸出一些经验。路也是一步一步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就不能要求同志们都就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五一六〕“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之后又开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以后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

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召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是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作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有七、八个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还以为几十分钟讲一讲，表示欢迎就可以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护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拉另一派红卫兵保驾，就搞不好。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上面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讲历史，讲十七年历史，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点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这次会议发的简报不少，我几乎全部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们，因为时间太短。有的同志说不是有心犯错误，是糊里糊涂犯了错误，可以原谅，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时间太短，新的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看十七天会议以后会好一些。

## 斗争要文明些，坚持文斗，不用武斗（1966.12.27）

（如题。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 对刘少奇到学校做公开检查的批示（1967.1.6）

（略。）

## 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1967.1.8）

这是毛对中央文革小组就这两个报社夺权问题的谈话。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搞一场革命，定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种》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住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我管不了，红卫兵—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1920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净，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青年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

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 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1967.1.21）

（略。）

## 论夺权（1967.1）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

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

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

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接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谢富治：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

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在现在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人，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之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前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 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1967.2.3）

毛：什么时候谢胡(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多少年来，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1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时已经看出问题了。1962~1966五年时间。为什么说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1953冬到1954春。然后是1959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工厂、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全面、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指示写的？

毛：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时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时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刘少奇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后他们进了学校，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顶多有5%。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在各处。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处。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他们到处这么搞。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取得了相当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可以改！我也犯了一些错误。至于什么具体的，现在没有时间讲。有人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

## 批评“二月逆流”（1967.2.18）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注释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铸被打倒，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任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1966.10.9~28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邓的错误。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陶铸却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陶铸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其实，陶铸死保刘邓的立场是他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就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以极右的面目出现，反对毛《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群众起来了，他又跳到极左，在群众面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更为恶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传大权，在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还大登刘邓的照片，并授意伪造毛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割去，换上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针对陶铸这种保皇立场，1967.1.8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八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在被打倒以后，曾和他的老婆曾志谈起他和刘少奇的关系：“1942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指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我对刘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的观点的。”他还讲：庐山会议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从这些自白里可以看出，陶铸的保皇立场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里揭露批判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陶铸确实是刘邓的“贞洁之妇”，在刘邓垮台之后，他仍然“从一而终”，作为刘邓的代言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兴风作浪。但是，他没有逃过毛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陈伯达，却采取了不讲策略的方式，受到毛的严厉批评。1967.1.7他俩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社会。二月六日的会议上，毛严厉批评：“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的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二月十日，毛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这次也不例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帅们和老领导，就利用这次批评左派，向着毛，向着文革大闹起来。

1967.2.14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党的领导表示出极大的愤懑。并说什么“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叫嚷：“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在二月十六日碰头会议上，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指一九六六年经过毛亲自批阅的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达到了。”

这就形成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余秋里是二月逆流中的两帮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3〕1967.3.16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1936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静火注：刘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文革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良云〔静火注：张良云后来出狱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反共启事》内容是：

“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1967.2.18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曾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访时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静火有言：通过这样一种特殊手续把大批干部尽快救出去似乎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多少同志宁肯死在监狱也绝不背叛自己的信仰发表什么《反共启事》，如江姐等，即使是在同一个监狱，刘格平张良云等同志也拒绝发表《反共启事》，又坐了八年牢，从这点上说，指示一部分同志发表《反共启事》对不起牺牲的同志，也对不起自己的信仰。

##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2）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很好的。

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的时候，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较成功。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码头上啊？

〔张、姚答：“还在”。〕

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古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3〕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6〕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子，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酉，诏书里就写上“祁酉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入在那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那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7〕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8〕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 是义和团侵略了帝国主义吗？（1967.3.23）

（略。）

##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1967.3）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产阶级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 论革命的“三结合”（1967.3/4/10）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好。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这是一个很好的报告。

一、依靠群众。这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机关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作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哪一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从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与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一条，组织性纪律性强，动作快。如沈阳军区的支左、支工、支农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动作很慢。

三、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一、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因为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式的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二、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三、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作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全国应该有更多的第一把手站出来。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干”，用群众性方法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968.4.16）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1963《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68.7.28）

毛：〔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站起来同他们握手〕都是一些年轻人！

江青：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2〕，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冈山”？〔3〕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元梓：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元梓：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富治：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新北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公社”，老佛爷〔聂元梓的外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富治：他的二把手聂树人〔4〕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王大宾：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来嘛！

谢富治：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公社”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彪：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反对派“井冈山”〕、“四？一四”〔蒯大富清华“井冈山X”的反对派“四？一四”组织〕、“X”〔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井冈山公社”的反对派“造反X”〕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5〕，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会说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北大〕“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青：她有人保镖。

聂元梓：没有。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富治：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青：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富治：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大宾：没有。1966.9.23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爱晶：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元文：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康生：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爱晶：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X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北师大“造反X”是个湖南‘省无联’〔6〕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7〕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韩爱晶：我也参加了。

江青：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青人就是要作些好事，也会作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青：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那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北大〕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彪：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候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人都是聂的反对派北大“井冈山”负责人〕。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青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指《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哪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七二一指示”〕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我不是哲学家。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彪：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8〕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还有高玉宝〔9〕，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彪：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彪：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彪：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彪：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是不要打内战。

林彪：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10〕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11〕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彪：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大富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

蒯大富〔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12〕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韩爱晶〔流泪〕：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派去的。

蒯大富：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对着谢富治、温玉成问道〕：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对谢富治说〕：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嗯嗯地哭。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是极重感情的人。毛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重复着说：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毛〔对黄作珍〕：你叫黄作珍，那里人？

黄作珍：江西宁都人。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姚文元：伸出红手，宣传毛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文元：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恩来：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青：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青：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恩来：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恩来：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不要分派了。

江青：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13〕，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文元：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它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文元：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大学不要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青：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青：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北大〕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青：聂元梓应该去作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14〕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厚兰〕的麻烦没有？

谭厚兰：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陈伯达：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青：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伯达：你韩爱晶对毛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伯达：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彪：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伯达：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彪：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它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失了街亭，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邰只剩了个马。

林彪：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工农占全国人口90%+。你们学校90%+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富治：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彪：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富治：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语录，二是毛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生：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爱晶：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富治：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伯达：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爱晶：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伯达：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青：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青：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青：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青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青：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清华〕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大富：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清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北大〕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元梓：王、关、戚〔15〕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作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清华〕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北大〕井冈山”。

姚文元、谢富治：革命的井冈山！

江青：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恩来：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大富：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周恩来：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德：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清华〕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青：“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青：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负责人〕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清华〕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大富：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清华〕井冈山”两个。“四？一四”是右倾的。

江青：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爱晶：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青：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搂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气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青：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学生〕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四？一四”留在学校里，“〔清华〕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清华〕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韩爱晶：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剧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有毛泽东思想。

毛：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16〕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17〕，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的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恩来：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彪：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伯达：韩爱晶过去就是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文元：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恩来：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江青：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么！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18〕

大家：没听说。

姚文元：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爱晶：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韩爱晶：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大富：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毛〔走了又返回来对中央领导〕：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 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赤脚医生就是好（1968.9.14）

（如题。赤脚医生，即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

##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1968.9.30）

（如题。）

## 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要和工农兵结合（1968.7/8/9）

大学还是要办的，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后好了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8.29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的路线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68.10）

1968.10.13开幕式上的讲话

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国内和国际。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子辉你是很熟悉的。〔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副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山东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山东的同志要作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王任重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崇义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

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工作也很难作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搞不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从1927到1949，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肖克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成立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哪个是李德生？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的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哪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幺幺幺”。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1968.10.31闭幕式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很好。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地球就不转了？！照样转，还能不转吗？！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人，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1927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二十四元，最多的给四十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

引自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1968.11.17）

这是这是毛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谈话的主要部分。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二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它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是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是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日本1945投降到现在已有23年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且还得到了发展。

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

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灭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分赃不匀，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有个美国记者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如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到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1966我在杭州同胡志明主席谈话，那时美国对北越已经又打起来了，但还没有恢复轰炸。我说美国大概打到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不管哪个总统上台都有这个问题：它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现在退出？我看继续打下去它的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的国家都没有参加打，这同朝鲜战争时的情况不同。日本大概不会参加打，它经济上帮一点儿忙是可能的，制造军火它是赚钱的。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也这样说。它不但在美洲、欧洲把兵力分得这么散，就是在亚洲也是把兵力分散的。我原来不相信它会打北越，后来它轰炸北越，这话不灵了。现在它不轰炸了，这话又灵了。也许我的话就又不灵了。但总有一天要灵的，它又要停止轰炸。所以你们做几种打算我看是好的。

总之，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是没有进攻北越的，它也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它是留了一手的。它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它也不“穷追”。所以它那是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它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它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至于我们在你们那里的现在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可以撤回来，你们讨论过没有？如果它再来，我们再出去嘛！你们考虑一下，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这和你们的飞机利用中国的飞机场一样，需要利用时就利用，现在不需要了就不利用。大体就是这样。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约翰逊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一百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

还有一点，是南越傀儡政府非常害怕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有人说，真正有效的，在南越人中有影响的，不是西贡政府，而是解放阵线。这话不是在美国的国会里讲的，而是记者报道的，但谁说的又不讲名字，只说是所谓美国官方人士。这话就提出这么个问题，在南越谁是真正有威信的政府？是阮文绍还是阮友寿？所以，名义上美国吹阮文绍怎么了不起，并说他不去巴黎参加谈判，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美国知道没有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就不能解决问题。

##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1968.12.11）

（如题。）

##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1969.10.14）

这是毛针对苏联对我核战争威胁〔1〕下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

注释

〔1〕“文革”初期，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加剧，1969.3.15凌晨，苏军边防军六十余人在六辆装甲车的掩护下，从珍宝岛北端侵入，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击毙了苏军边防部队总指挥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苏联方面亡五十八人，伤九十四人。中国边防部队亡二十九人，伤六十二人，失踪一人。8.13，苏联军方经密谋在新疆铁克列提袭击我军三十余人的巡逻队，三十八名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仅一人生还。大规模流血冲突使中苏双方走到了战争边缘。

8.20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试探美国：如果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如何反应？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此准备把此消息透露出去，8.28，《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同时，苏联秘密通知东欧各国：苏将先发制人打击中国核设施。下旬，东欧国家泄露了苏联的意图。8.27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

8.28，毛签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八·二八命令”〕，指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在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国人民防止苏联“突然袭击”。

八月下旬，美国还侦察到苏联空军在远东的一次停飞待命〔在整个九月份都继续保持着〕，这意味着所有飞机同时进入高度准备状态，往往是一次进攻的信号，至少也是对敌人的严酷警告。

9.10，苏联塔斯社指责中国从1969.6-8，蓄意侵犯苏联边境488次并挑起武装冲突。

9.16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文章还声称“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提到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维克托·路易斯的真实身份令人怀疑。据熊向晖回忆，中方注意到此人经常向外界透露苏联重大决策。基辛格则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称他是间谍。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示警。受毛委托研究国际形势的陈毅等四位老帅经过紧急讨论，次日即向中央提交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苏联方面蠢蠢欲动，而打击手段和打击对象都与核武器有关，核战争的阴影顿时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美国尼克松总统决定，故意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苏联本土一百三十四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以牵制苏联。

为展示抵抗决心，9.23和9.29，在毛指示下，我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两万多吨当量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三百多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9.11在北京机场，苏联会议部长主席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双方会谈似乎异常顺利，但柯西金并没有否认“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传闻，9.26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称，他建议自10.10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9.29中国建议将边界谈判改到10.20开始，10.14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20前抵京，针对苏联突然的这种缓和姿态，中央认为，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是，柯西金来华会谈，与日本特使来栖“珍珠港事变”前赴美一样，只是战争爆发前放的烟雾。且柯并未承诺不对中国发动核打击，苏联战略火箭部队也已做好随时打击中国的部署。由于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确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绝大部分核武器和导弹基地、海空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

为保证中国领导人不被一次消灭掉，毛做了这段指示。10.14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20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

其他人员疏散为：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何长工去江西峡江，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

##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1969.4）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党从1921成立，已经有四十八年了。一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二、三、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五大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六大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恩来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

七大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共和国建立，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

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针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

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

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还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跟王效禹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

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

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小报就是起来。自从王、关、戚，杨、余、傅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1969.12.19）

（如题。）

##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1970.3/4/7）

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1〕。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2〕。

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3〕。

注释

〔1〕这是19703.3.7毛为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宪法提出的建议。

历史事实证明，毛的考虑极富远见：

党、政、军的权力主要来自宪法和党章。

建国后，毛就开始构思国家的领导体制，194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这被看作是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主要规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公民的权利义务等，也规定了组织国家政权的基本原则，但并没有规定国家机关的设置与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第十三条第二款〕而对国家机构具体职权的规定是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可以说，《共同纲领》和这部组织法共同构成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其中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第四条〕这个委员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名、副主席六名、委员会五十六名组成。而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并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工作。”这意味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虽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居于领导地位。在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第二十条〕，同时，他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党政军权集中于毛一身，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主席制的雏形。

1954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毛倾注了很大心血，完全可以称之为“毛泽东宪法”。在国家领导体制上，毛对当时的苏联宪法和1949临时宪法所确立的领导体制作了根本性改革，即创设了1936苏联宪法和建国初期临时宪法中不存在的一个全新领导职位：“国家主席”。

1954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下列职权：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由此，五四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不是一个虚权元首，而是实权元首，在法律上不仅是最高军事统帅，国家元首，而且是政府首脑，人大委员长和总理都直接受其领导。1954.9.27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以其在党内外、国内外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无人可比的崇高威望当选国家主席。

1954.9.28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国解放军和其他武装力量。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来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根据七大党章第三十四条，“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政治局主席毛自然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位集于一身，使党政军“三位一体”体制正式建立。从此，毛大量重要的政治活动就通过国家主席和最高国务会议进行的，1954~1958毛召开过大约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相反，中共中央的会议远远少于国务会议。

八大党章也确保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政治局主席，自然也是政治局下设的中共军事委员会主席。1956.9.26八大通过的党章第三十七条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

然而，这个“三位一体”的体制由于1959毛辞去国家主席，而选举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第一次发生了分裂，即按照八大党章，毛是党主席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拥有最高的政治主权，而按照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拥有最高的法律主权。如果二者在党内合作顺利，那么，两个主权合一就能维持三位一体体制，否则，中国的宪政体制就面临着分裂。不幸的是，由于毛和刘少奇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导致中国宪法体制的危机。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名不正则言不顺，毛在退居二线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不在一线，对大量事情很难直接插手，出现了大量违背毛意愿的做法，如大跃进期间的浮夸等“五风”错误，毛虽再三批评一线领导，甚至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要求“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但效果甚微；一线领导在庐山会议上想彻底打倒彭德怀；三年困难时期，一线领导又想下马原子弹这样的战略项目；六二年刘邓等一线领导又想搞包产到户，走小农经济道路；教育、文艺、医疗等长期不为人民服务而为官老爷服务；在“四清”运动中不是针对干部而是把整肃的矛头指向群众；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等等。一线二线不统一，毛深受其苦，文革开始后就果断结束了一线二线。

文革中，毛逐渐形成这样的理念，“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必须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

九大后，毛考虑改变国家宪政体制，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的二元化，国家主席和国家总理的二元化。存在带来国家不稳定的内在隐患。虽然党主席可以兼任国家主席，但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二元化问题依然存在，如果党主席不是最高国家元首，就会面临宪政分裂，如毛决定退居二线后，刘少奇任国家主席，但毛仍然是党的军委主席，由于没有修改宪法，这样就在理论上产生了二元化的问题，与“党指挥枪”的原则产生矛盾，尽管实际上这段时间还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仍然是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但终究是一个宪政弊端。如果党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那么，任何人担任国家主席都有可能让宪法体制陷入分裂，因此毛提出在“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个思想最后体现到1975宪法：

“第十五条中国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第十六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第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十八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条国务院的职权是：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和全国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依据七五宪法，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彻底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彻底解决了宪政分裂的隐患。

应当指出，文革结束后，翻案后的走资派在否定了文革以后，邓小平为了非毛和垂帘听政的需要，废除了党章中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制”，实行“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制(与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分离)，恢复了宪法中的“国家主席”职位，同时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位，终于造出了和原来同名但不同权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

根据1982.9.6十二大通过的党章：

“第二十一条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

这样，就废除了党主席制，恢复了党总书记〔邓小平在五六十年代曾担任过十年书记处总书记，但当时的总书记只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制，同时实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与党的总书记分离制。由此形成党权与军权的分离。1982.9.13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另外，邓小平又搞了一部1982宪法，又重新设立了国家主席，但此“国家主席”已非彼“国家主席”，由1954实权元首，变成了虚权元首，宪法中又设立了独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1982.12.4宪法规定：

“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这样，此时的国家主席毫无实权，既无军权又无行政权，完全是一个虚位元首。国家军委则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完全使国家元首与行政权、军权分离。

更令人气愤地是，邓小平为了继续掌控军权，在十三大时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中规定：

第二十一条第五段“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就是说，普通党员也可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经过党章和宪法的修正后，党权、行政权、军权全面分离，新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严重冲突，不得不采用“两个牌子，一套人马”的办法，但即使这样，因为两个委员会的任期不一样，也会出现两套人马的情况。这一阶段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独立于国家主席，直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每届五年，需要注意的是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都有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则没有限定。就宪法文本来看，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有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而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没有连任的限制，就产生了国家主席与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非一元化的可能。由于军事领导机关强调权力和责任的高度集中，同时又实行首长负责制，当出现非一元化的情形时，从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看，可能会出现危及国家安定的风险。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到南北朝时期的诸国林立，再到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华民族承受了太多战乱，所以军权的统一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实上在当代，各国武装力量的统帅权大多由国家元首享有，比如，在法国，总统是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在美国，总统除享有国家武装力量的统率外作为三军总司令，还享有较大的战争权。

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邓小平采用的这种分权模式，属于典型的因人设事，除了加强了他个人的权力外，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两届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都被逼下台，且酿成了“六四”镇压学生事件。

“六四”后，迫于党内外强大的压力，1990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党的总书记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993江泽民又顺利地出任国家主席，实现了党权、军权和国家元首的统一。2002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2003胡锦涛又担任国家主席，2004胡锦涛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4.9.20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时，江泽东同志指出“锦涛同志是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接任军委主席的职务顺理成章。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至此“三位一体”的体制又建立起来了。

但这却依靠领导人的自觉，没有制度的保证。像这种多个职务集于一身“多位一体”才能保证实权元首的体制，尤其是两个军委主席〔国家军委和中共军委〕的职位还是有些问题，如2004.9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胡锦涛授予张定发及靖志远上将军衔。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江泽民，胡锦涛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授衔是违宪的，直到2005.3全国人大上，胡锦涛才接替江泽民担任国家军委主席。

所以，总体来看，既然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这个问题，七五年宪法是解决得最彻底的。

〔2〕1970.4.12毛在林彪的建议上写的批示，林彪建议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3〕1970.7.18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如果毛当国家主席就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批示。

##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970.5.20）

（略。）

## 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1970.6.24）

（如题。）

##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1970.7.11）

（略。）

##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1970.7.13）

（略。）

## 我的一点意见（1970.8.31）

（略。）

## 与斯诺的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1970.12.18）

斯诺：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怎么是打扰呢？1965我就叫你找我。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到处打，到处分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就是那个时期。1967.7/8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斯诺：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诺：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诺：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德〔4〕，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5〕，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6〕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7〕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8〕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诺：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诺：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诺：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诺：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诺：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诺：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9〕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汇合。汇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0〕路线被批判了。

斯诺：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诺：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美国大选〕是哪一年？

斯诺：一九七二年。

毛：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1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1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1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

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诺：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末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15〕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16〕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17〕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诺：你想到了。

毛：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诺：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诺：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8〕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诺：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诺：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19〕不好，勃兰特〔20〕也不算怎么好。

斯诺：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诺：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21〕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23〕一个，毛一个。

斯诺：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Belden〔贝尔登〕〔24〕。

斯诺：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那个拉提摩尔〔25〕怎么样了？

斯诺：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26〕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诺：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27〕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8〕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29〕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诺：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30〕。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LongIslang长岛。

斯诺：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了。1965.1二十三条〔31〕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2〕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诺：是新版吗？

毛：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党内的反动分子。

斯诺：那末，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1965.10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5.16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8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33〕搞出来了。

斯诺：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诺：就是《炮打司令部》〔34〕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诺：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诺：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诺：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诺：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35〕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and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诺：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诺：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36〕，不行；树立瞿秋白〔37〕，不行；树立李立三〔38〕，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诺：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诺：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红军、人民解收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WZ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WZ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诺：够了。

毛：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诺：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诺：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诺：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诺：那是。

毛：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诺：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诺：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诺：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末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列主义的嘛，反马列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39〕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40〕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列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诺：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41〕

毛：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苏联开二十三大，刘少奇、彭真就提建议要派代表参加，修正主义是有国际性的。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不联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不行。当然后头那个建议被我们打掉了。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诺：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诺：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诺：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就是这个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诺：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 对外宣传工作不可强加于人（1968.3~1971.3）

这是毛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

1. 1968.3.7毛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2. 1968.3.10毛对关于开好1968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3. 1968.3.12毛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x修建xxxx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4. 1968.3.17毛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5. 1968.3.27毛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毛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列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6. 1968.3.29毛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7. 1968.4.6毛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和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8. 1968.5.16毛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9. 1968.5.29毛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10. 1968.6.12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像章”。毛批示：“不要”。
11. 1968.7/8毛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12. 1968.8毛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的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
13. 1968.9毛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14. 1968.9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来访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15.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批注：“去掉三条”〔即：17、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万岁！万岁！万万岁！〕
16. 1969.1毛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上指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
17. 毛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的“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18. 毛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19. 1969.9毛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0. 1970.6.3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21. 1970.6.7毛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22. 1970.6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23. 1970.9毛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24. 1970.11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25. 1970.12.6毛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26. 1971.3.15周总理给毛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1971.8/9）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党已经有五十年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28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1930.6~9，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1931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1931~1934，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1935.1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1959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1970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1959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继续搞。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静火有言：以林彪之军事上的杰出才能和政治上的成熟老辣，尽管在政治上失利，但也断不会制定如此幼稚可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可惜其教子无方，受其拖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

## 对反革命不要杀，保留活证据（1971.11.14）

（如题。）

##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1971.10/11）

毛：小唐（唐闻生，毛晚年的重要翻译）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恩来：主席本来指示……（美国决定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驱逐蒋的台湾代表，因此毛不同意。）

毛：那是老皇历喽，不作数喽。

周恩来：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周恩来助理）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外交部副部长）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恩来：就让黄华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恩来：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好，那就这么办。

毛：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摔在外蒙古。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19个，非洲国家26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7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131个会员国，76赞成，17弃权，只有35反对。表决结果一宣布，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

1950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1776美国独立战争，1789法国大革命，1917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

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

〔叶剑英：“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四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济南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在座的同志知道吗？

周恩来：还没有告诉他们，主席谈完后，我们就到大会堂把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读给他们听，并介绍有关情况。“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毛：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个党支部。

周恩来：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毛：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毛：安全问题很重要，去了上上下下要住在一起。

毛：马上打电报给黄镇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 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1972.2.21）

尼克松：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这里的“哲学”相当于“战略”）方面。

尼克松：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基辛格是个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基辛格今天主讲要请他，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望着摄影师们〕现在他们想干扰我们的会谈，我们这儿的秩序。

尼克松：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你见到啦？

周恩来：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恩来：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恩来：从1924开始。

尼克松：是的，我知道。

毛：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你〔指基辛格〕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

基辛格：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

毛：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克松：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

基辛格：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做掩护的。

尼克松：利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你们的姑娘常被人利用啊？

尼克松：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恩来：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基辛格：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克松：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毛：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

尼克松：我们理解。我们希望我们不使你们面对那样的问题。

毛：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克松：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我喜欢右派*（“右派”，是作为“哲学问题”讲的。从“哲学”即“战略”上讲，当时西方一些国家中，在“苏攻美守"的形势下，右派主张对苏强硬，或可称之为抗苏派，左派主张对苏妥协，或可称之为亲苏派。为了抗苏，也就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由于对苏妥协，往往不愿或不敢接近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把尼克松、基辛格说成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尼克松：是的。

毛：那位首相希思也是右派。

尼克松：戴高乐将军也是。

毛：戴高乐是另一回事。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尼克松：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

基辛格：总统先生，我觉得那些左派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靠拢，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对你。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1971.9.13林彪一家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

周恩来：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

毛：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

周恩来：在外蒙古。

尼克松：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中，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国的左派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不站印度。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亲印度，二是他们亲苏联。我认为，着眼于更大情势是重要的。不能让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去吞并邻国。这让我付出了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历史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

毛：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如果你把我们谈的这些，我们讨论的哲学，向其他人通报，你认为好吗？

尼克松：主席可以放心，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或我与总理所讨论的一切，统统不会泄露。这是进行最高层会谈的唯一办法。

毛：那就好。

尼克松：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而外，……

毛：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周总理跟你谈的事。我看你的题目更好，哲学问题。

尼克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

毛：对，赞成。

尼克松：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中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和苏联都在伸手，问题是，中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

毛：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因此，我们两国间的状态很奇怪，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乒乓外交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也不到两年。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解决不了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总理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交往。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或尼克松哪个更好。但叶海亚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约翰逊总统像土匪。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的印象。我们也不太喜欢他。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时，你们也没有想通。

周恩来：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政策。

毛：之前周恩来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克松：但是他们握了手。

毛：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很多。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松：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一个新的世界形势，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而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毛：就是嘛。

尼克松：我还想说的是，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周恩来：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尼克松：我们也不威胁别人，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于中国也没有领土要求，中国不想统治美国。同时，我相信，当然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它们都不想统治世界。正因为我们这两个国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态度相同，所以我们相互并不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虽然有分歧，但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

毛：你们下午还有事情？现在几点了？

周恩来：四点半开全体会，现在是三点三刻。

毛：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毛：“只争朝夕”的是基辛格。

尼克松：从个人的意义上说，你和总理对我都是不了解的，因此你们不应该信任我。但是你们会发现，我不能做的就决不说，但我做的比说的要多。我就是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主席和总理坦率地交换意见。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克松：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就没有靶子了。

尼克松：主席的一生我们都是熟悉的。你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被人所知，我也是出身于贫穷家庭，现在达到了一个大国的顶峰。我感到，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于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毛：你的《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对着基辛格〕他〔指毛〕读的书太多。

毛：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克松：好哇，太好了。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克松：他的死很令人悲伤。

毛：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

尼克松：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我就不送你了。

## 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中国方面的声明（1972.2.28）

（略。）

## 启用邓小平（1972.8、1973.12）

这是毛在启用邓小平时的批示和部分谈话

一、1972.8.14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

请总理（周恩来）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1.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邓，指邓小平，1932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1933.3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1931.6任永、吉、太中心县委书记，1933.3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1933.3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帅师长。古，指古柏，1933.3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法。1933.3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2. 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3. 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是有战功的。此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二、1973.12.12/14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部分谈话

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

三、1973.12.14毛同政治局有关同志的相关谈话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四、1973.12.15毛在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的相关谈话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对邓小平〕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吧。

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初期犯有路线错误，被停止工作。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江西。1973.3.10经毛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2.8.3他给毛写信，表示“保证永不翻案”，同时揭发批判林彪，提出想做一点工作。全文如下：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1965.12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6/7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1972.8.3

## 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谈话（1972.9.27）

这是毛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谈话的一部分。

毛：你们吵完了吗？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田中：吵是吵了一些，但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不，不，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

毛：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是。

毛：〔对着大平外相〕你把他〔指姬鹏飞（时任外交部长）〕打败了吧？

大平正芳〔日本外相〕：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田中：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毛：那就好了，你们那个“麻烦/迷惑”问题（一个因为翻译而造成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田中：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修改。

毛：一些女同志不满意啊，特别是这个“美国人”（毛晚年的重要翻译），她是代表尼克松说话的。年轻人坚持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因为在中国，只有像出现不留意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词。

田中：“迷惑”这个词汇虽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日语“迷惑”是在百感交集地道歉时，也可以使用的。

毛：明白了。“迷惑/麻烦”这个词你们用得好。中日有二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田中：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二千年。

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中：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

毛：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

田中：是的，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

毛：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尼克松首次访华），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中：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打败呀？

田中：谢谢。

……

毛：廖承志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要是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

毛：你在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田中：二十五年内搞了十一次选举，每次选举都要搞街头演说。不和选民握手，是很难取胜的。

毛：到街头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啊！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我半个世纪前也曾在长沙经常这样做，可要当心啊！你们的议会制度怎么样？

田中：很费劲，一出差错，就得解散，进行重新大选。

毛：日本不容易呀。

田中：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你抽不抽我的烟？

田中：这个就行了，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总理谈判时间长了，又抽上了。

毛：谢谢。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恩来：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你们速度很快啊。

田中：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田中：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三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毛：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972.12）

（略。）

## 祝贺越南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1973.1.29）

（略。）

##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973.2/11）

（客套话，略）

毛：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3〕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辛格：是的。

毛：他也反对杜勒斯〔4〕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辛格：以前的敌人。

毛：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Friendship。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也正是我说的。

基辛格：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信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对的。

基辛格：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辛格：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辛格：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他们不团结。

基辛格：不团结，而且不像你们那样有远见。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恩来〔对毛〕：帮助蓬皮杜，基辛格同意。

基辛格：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辛格：两家联合。

毛：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像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但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基辛格：不管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立场。

基辛格：我们并未计划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

周恩来：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10~15%。

基辛格：完全正确。

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导弹部队吧。

周恩来：大概30~35W，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辛格：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27.5W人，但这不含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南朝鲜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30W。

基辛格：大约4W。

毛：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恩来：在台湾吧。

毛：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辛格：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辛格：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辛格：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辛格：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辛格：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一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辛格：是的。

毛：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

基辛格：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

基辛格：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辛格：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辛格：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恩来：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和白宫的联系。

毛：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黄华命苦，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辛格：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好啊。黄华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

毛：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周恩来：非常少。

基辛格：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辛格：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毛：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辛格：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

毛：对。

基辛格：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是吗？

基辛格：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辛格：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恩来：你是指苏联？

基辛格：我是指苏联。

周恩来：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看着翻译沈若云〕这个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恩来：她是沈若云。

毛：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辛格：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恩来：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我们应该送些小孩出国，年龄不要太大。

基辛格：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划，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着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辛格：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辞汇-纸老虎。

基辛格：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毛：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

基辛格：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辛格：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辛格：苏联？

唐闻生：苏联。

毛：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几年，戳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作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辛格：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辛格：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毛：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辛格：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

毛：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辛格：哪种方式？

毛：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辛格：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

毛：现在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辛格：原则上……

毛：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他们都是一伙儿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有什么好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小岛罢了。

周恩来：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毛：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辛格：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希望在1976前，或在1976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当作贵我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联络处用处非常大。

毛：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都一样。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我们甚至不会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碰澳门，顶多也只碰一点点。因为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地掌控着澳门。赫鲁晓夫也骂过我，说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不只赞同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自中国割去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基辛格：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而且联络处也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想个办法来做，不过这不是必须的。

毛：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基辛格：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说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我们联络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辛格：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以前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那套说法可以不用再提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带。我们黄镇大使提过我们支持阿拉伯世界，不过他不了解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重要性。

基辛格：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也重述了联合国的官式立场。而我了解你们必须公开地采取某些立场。这些并不违反我们的共同立场。不过，事实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不是因为苏联施压才使然。所以，每当苏俄施压，我们必须抗拒，除了争执本身有其优点之外，我们可说是为了抗拒而抗拒。然后当我们击败他们时，我们甚至有可能朝同样的方向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想法，我们只是反对借着苏联施压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毛：没错。

基辛格：而且我们现在的策略正是如此。

毛：下次你再到中国来，除了政治，还可以同我谈一点哲学。

基李格：我很乐意，主席先生。哲学研究是我的初恋。

毛：或许当了国务卿后就比较难研究哲学了。

基辛格：是的。

毛：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辛格：他1959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我们在1958决裂。他们想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军港，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讨论时，我差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在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那就是他说的，口气还很大，因为他见过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沾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在北京同我夸口，说他认识美国总统，讲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问布鲁斯大使；你知道这回事吗？〕

布鲁斯：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晓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巍的。

周恩来：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现在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一个到过像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西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

周恩来：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我本来还想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不过好像谈得太久了。我们占用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我想讨论的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会采用孤立主义。

基辛格：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认为目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不过，现实状况会让他们了解，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唯一的选择。目前我还不知道，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战术。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偏离现在的轨道。

毛：那你和我似乎是同一类的。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神疑鬼的。

基辛格：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是我想形势所需，使我们只有回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政策。不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趁着大家都还在位，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加强关系，不要让其他政策有机可趁。

毛：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主张从欧洲撤军。

基辛格：是的。

毛：这是帮苏联的大忙了。

基辛格：我们将不会在我们尼克松总统任内执行。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形：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粗暴、极为迅速的解决。

毛：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

毛：我不喜欢你同我耍外交辞令。

基辛格：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就会松手。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我也不喜欢战争。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觉得不要。如果你们真的打，最好只用传统武器，核武器只是备用，尽量不要碰。

基辛格：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那就好。我听说你们以前这个方法是为了争取时间。

毛：我们是想争取时间，可是，我们还有另一个立场，如果苏联攻击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我们必须防患未然。

毛：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

##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1973.12.9）

（略。）

##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1973.12）

（略。）

## 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谈话（1974.2/3）

这是毛会见卡翁达、布迈丁、尼雷尔时的谈话内容纪要

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否则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希望你们帮助人民，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当卡翁达谈到赞比亚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作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

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之，将来总有一天会打。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一战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二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二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

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也把美军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

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

中国成就有但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说中国好或不好，是不妥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有黑暗。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

总之，所谓裁军，一战后就说要裁军，结果二战。二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一战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二战。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

〔尼雷尔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也怕呢。

〔尼雷尔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整个非洲的事情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

〔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帮助很小。

〔当尼雷尔称赞中国医疗队时〕，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

〔尼雷尔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

〔尼雷尔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 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1974.5.25）

（客套话，略。）

希：我想苏联有很多困难，有经济困难、农业困难，领导内部也有分歧。但他们领导内部的分歧是在策略和时机问题上，而不是在长期战略的问题上。

毛：我看它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希思：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却在不断增长。虽然苏联在世界许多地方遇到了问题，但它的实力正在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主要威胁。主席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

毛：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就垮台了！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苏联这一股祸水引向中国。张伯伦，包括法国的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我当时是反对张伯伦先生的。

毛：我讲的主要是美国舆论。你们英国舆论讲到苏联怎样要进攻中国，我看到的不多。

希思：如果欧洲是软弱的，苏联就有可能实现对中国的企图。因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很重要的，它可以使苏联发愁。

毛：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

希思：中苏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主席如何判断苏联对中国的目的和动机？

毛：中苏的分歧要从1954开始算起。因为1955阿登纳到莫斯科，赫鲁晓夫就对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阿登纳的回忆录上是这么写的。你见过阿登纳吗？

希思：见过，我见过他很多次。有一次他去意大利休假时，我和他谈了一整天。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

毛：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

希思：它在非洲很不成功。

毛：丢了埃及。

希思：在阿拉伯世界中，它的影响很小。

毛：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

希思：我想在你们这里，毫无影响。

毛：有些影响，林彪就是它的人呢。

希思：中美关系今年将如何发展？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

毛：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希思：如果他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在十八个月以前就会劝他把这件事彻底压下去，但是他那时没有问我。

毛：他也有缺点呢！

希思：我们都有缺点。

毛：我的缺点更大呢！八亿人口要吃饭，工业又不发达。不能吹中国怎么样。你们英国还可以吹一下。你们算发达国家，我们是不发达的国家。要看他们年轻的这一辈怎么样。我已经接了上帝的请帖，要我去访问上帝。

希思：我希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要接受这个邀请。

毛：还没答复呢！

希思：我对刚才主席所讲的很感兴趣。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了，你们的粮食几乎自给自足，工业正在开始发展，可能我们英国能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向你们提供你们所需的帮助，但主席是如何鼓舞了七亿多人民团结一致这样工作的？

毛：说来话长。但是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希思：好。我们始终乐于帮助你们。

毛：好。你们的艾登现在还在吗？

希思：在，现在七十六、七岁了。他至今仍对外交事务、国际问题极有兴趣。

毛：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亏。

希思：是的，吃了大亏。

毛：美国人拆台。美国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伸到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

希思：是的，这是美国当时遏制世界其他地区的意图的一部分。现在它已经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毛：那么怕共产主义干什么？我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希思：我完全同意。

毛：美国人骂了我们二十多年。

希思：美国人和你们的关系是又爱又恨。现在他们害怕你们的心理减少了，也就更爱你们了。

毛：怕得要死！基辛格第一次到北京，好像中国人要吃他。他自己说，第一次很紧张，第二次也还有点紧张，第三次不紧张了。但是我们对美国人比较放心。

希思：我们欧洲对此很高兴。主席对日本比较放心吗？

毛：对。

希思：你们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说的和平意图？

毛：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希思：没有理由要怕欧洲。

毛：过去怕呢！

希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毛：没有冤仇。过去不仅英国，还有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八国联军。

周恩来：还有俄国、日本、美国，八个国家代表十二国，那是1900年。

毛：都成了历史了。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现在我想谈谈香港及其前途。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

希思：希望香港平稳交接。

毛：这也是我想要的，而且一定要办到！我们现在也不谈交接细节。到时候再商量。〔转向总理〕九七年时你我都不在了，那是他们的事了。

##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12）

这是毛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1〕后的谈话要点

关于理论问题，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2〕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3〕。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4〕。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5〕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注释

〔1〕1974.12.23~27毛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12.26毛与周恩来单独长谈，其中讲到理论问题。1975.1.7周恩来将这次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整理稿送毛审阅，毛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1.8周恩来将这个谈话要点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2.18中央发出通知，将毛的这个谈话要点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要求“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根据毛的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三十三条，在1975.2.22《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

〔2〕春桥，即张春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元，即姚文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3〕《红旗》杂志1975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文如下：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张春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1920，列宁根据领导十月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1957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1969.4.28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是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达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的旗号打击毛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4〕毛在1974.10.20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5〕《红旗》杂志1975第三期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全文如下：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姚文元〕

毛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WZ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及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得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支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的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WZ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林彪反党集团，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在1971.8~9巡视各地的谈话说：“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的旗号打击毛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而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积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腐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地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 对国民党战犯、党政军特人员一律释放（1975.2.27）

（略。）

## 要安定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阴谋诡计（1975.5.3）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王海容、唐闻生〕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邓小平〕，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既要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面向王海容、唐闻生〕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

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 关于《水浒》的评论（1975.8.14）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

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 中美关系会一点点好起来（1975.12.2）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今天早上有一次很不错的讨论。

毛：你们讨论什么？

福特：我们讨论了我们同苏联之间的问题，还有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对策，以及我的国家和你的国家有必要合作，去实现那些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目标。

毛：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只能放放空炮。

福特：我不相信，主席先生。

毛：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点。

福特：我们也能。

毛：你们也能？那么我们应该达成一项协议。

福特：我们还可以使用武力，对付那些制造麻烦的国家。

毛：这个不坏。那么我们可以达成另外一项协议。

福特：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时候，有很明确的讨论目标。

毛：除了苏联帝国主义者，不可能是别人了。

福特：主席先生，今天早上，我们使用了一些很强硬的语言。

毛〔指着邓小平〔1〕〕：你们批评他了？

福特：我们强烈批评的是另外一个国家。

毛：那个在北面的国家。

福特：对。

毛〔对驻美大使黄镇〕：黄镇〔2〕同志，事情怎么样了？你还回美国吗？

黄镇：我听从主席的指示。

毛：总统先生，你们要他吗？

福特：我们当然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好极了。大使先生回美国是很重要的，就像〔驻华大使〕布什〔3〕先生要是留在北京一样。

毛〔对布什〕：你留在北京吗？

布什：只有几天了。

毛：你升职了。

福特：对，他升职了。我们将在一个月里，提名继任者。

毛：我们不想让他走。

福特：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我要他回美国。但我们会找一个同样好的人来接替他。

毛：那样挺好。我觉得，黄镇同志返回美国更有利。

黄镇：我将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我确实想回国，因为我驻外太久了。但是我将按照主席说的做。

毛：你应该再在那里待一到二年。

黄镇：好的，我肯定会回去，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

毛：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指黄镇〕。这两个年轻人〔指在场的两个翻译唐闻生、王海容〕对乔老爷〔4〕也有一些批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现在外面有很多大字报出来。你不妨去清华和北大看看。

福特：我不太明白这些东西。主席先生，我希望，你让大使回美国再待两年，意味着我们还能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毛：对，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还要继续发展。我觉得，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今年、明年、后年，可能都不会有大问题发生在我们两国之间。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吧。

福特：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应对来自诸如苏联那样国家的挑战。

毛：对，我们对苏联一点信心也没有。邓小平同志也不喜欢苏联。

福特：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在全世界扩张，掠夺领土和经济资源。我们必须面对他们的挑战。

毛：好。我们也要面对挑战。

福特：我们希望从明年开始，我们的双边关系可以得到改善。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

毛：你是说我们两国之间？

福特：对。

毛：那样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如果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一起合作，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那么美国和中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就会在我的国家得到支持。

毛：很好。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说说而已，苏联到底怎么行动，还需要观察。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必须让苏联对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留下深刻印象，言辞是不起作用的，必须有实际行动。我们将不断对他们施加压力。我希望，来自您的压力，和我们的压力一样强大。

毛：我们就是放放空炮，骂骂人而已。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将要做的就不止与此了，过去也是如此。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坚强有力。我们将来就会这样行动。而不是只说不做、放空炮。

毛：你们有实心炮？

福特：对，我们将一直准备火药，如果他们来挑战我们，那么我们的火药就不会闲着。

毛：很好，那样也不坏。不过，现在你们是和平共处。

福特：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会对任何扩张主义行为坐视不管。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应对这些挑战了，并将继续如此。

毛：那样很好。我们需要签署协议吗？

福特：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达到同样的效果。你从东边施加压力，我从西边施加压力。

毛：可以。这是君子协定。

福特：这是最好的取得成功的方法，对付那些不是君子的小人。

毛：他们是小人。

福特：我们今天早上用的词，比这个还要强烈。

毛：我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来看我。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国能够更加友好。

福特：主席先生，这正是美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愿望。我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过去三年来，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行动是得到美国人民全力支持的。美国人民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必须采取强力行动，阻止苏联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军事力量，并且准备使用它。在我们看来，这是让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最好方法。

毛：好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福特：很正确。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就会坐下来谈判，试图互相理解和消除矛盾。

毛：很好。我们两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总是存在的。

福特：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对我们两国和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毛：举例来说，我们和苏联之间就没有我们和你们之间这样的谈话。我去过苏联两次，赫鲁晓夫〔5〕到过北京三次。没有一次谈话是真的令人满意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与勃列日涅夫〔6〕先生见过两次。有时谈得很顺利，有时谈得不好。我想这正是我们坚定态度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没法同意他们的有些提议，将来也不会同意。我们将保持坚定，维持军事力量。他们理解这一点，我想对我们两国最有利的方法就是，我们一起采取坚定立场。这正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

毛：好的。

毛：你们现在同日本的关系怎么样？比以前好吗？

福特：对，比以前好。主席先生，正如你所知，我大约一年前访问了日本。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访问日本。大约一个月，日本天皇和皇后访问了美国，这也是他们的元首第一次来我们的国家。我们感到，美日关系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好时期。

毛：日本也受到苏联的威胁。

福特：我同意这一点，因此，主席先生，我认为中日关系的不断改善很重要，就像美日关系在不断改善一样。事实上，美日关系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

毛：对日本来说，同你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同我们的关系是第二位的。

福特：你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吗？

毛：不算很糟，但也不是很好。

福特：你们希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对吗？

毛：对。他们国内有亲苏派，反对谈论霸权。

基辛格〔6〕：也可能是害怕谈论。

毛：正是这样。

福特：你们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怎么样，主席先生？

毛：比起我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太多、太多了。

福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西欧、以及你们同西欧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才能应对任何苏联在西欧的扩张。

毛：对，对，这是我们同你们的一个共同点。我们同欧洲国家没有利益冲突。

福特：主席先生，事实上，我们中有些人相信，中国比有些欧洲国家更能使得欧洲保持团结，使得北约加强力量。

毛：他们心不齐。

福特：有些欧洲国家不像表面上那样强大和坦率。

毛：我觉得瑞典不坏，西德也不坏。南斯拉夫也很好。荷兰和比利时就稍微差一点。

福特：很正确。苏联正在设法利用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弱点。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打算这样做。

毛：对，现在葡萄牙看上去更稳定一些了。形势好像在朝好的方面发展。〔8〕

福特：过去四十八小时里，形势发展很令人鼓舞。我们支持的一方正在得势，采取行动稳定局势。我们同意你的看法，南斯拉夫是重要的，在抵抗苏联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很关注，铁托〔9〕逝世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毛：对。也许铁托之后会是卡德尔〔10〕。

基辛格：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反应。我们正在着手做这件事。不同的因素都会对外部集团产生影响。

毛：对，南斯拉夫有许多省，它是由很多以前的小国家组成的。

福特：主席先生，今年夏天，我到罗马尼亚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旅行。我对齐奥赛斯库〔11〕总统的力量和独立性，留下深刻印象。

毛：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对西班牙的局势也很关注。我们支持西班牙国王。我们希望，他能够处理好那些破坏西班牙王国的因素。我们将和他一起工作，在这个转变时期，争取对局势最基本的控制。

毛：如果欧洲共同体〔12〕吸纳西班牙，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好事。欧洲共同体想要西班牙和葡萄牙吗？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正在敦促北约对西班牙更友好一些，哪怕法国反对这样。我们希望，在新国王的领导下，西班牙能够更容易被北约接受。此外，我们感到欧洲共同市场应该对西班牙政府有更多的回应，朝着西欧一体的目标努力。我们将在这两个方向上，尽我们所能。

基辛格：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不够激进。

毛：是这样吗？对了，以前他们总是打来打去的。还有，以前你们不骂法国。

福特：对，我们支持西班牙新国王。因为西欧的南部必须保持强大，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如果我们要抵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这些国家都必须得到增强。

毛：好的。我们认为希腊应该变得比现在好。

福特：对，他们经过了一段困难的日子，我们感到新政府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我们会帮助他们的。我们希望最终他们会回到北约，成为一个成员国。

毛：那样不错。

福特：当然，希腊有一些激进的想法，从我们的观点看，不是很好，会削弱北约，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毛：是吗？！

福特：让我们看看中东地区，主席先生。我们认为西奈协议〔13〕有助于减少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必须尽快实现该地区的广泛和平。等到下一次美国大选一结束，我们就将努力争取实现该地区广泛的和持久的和平。

毛：持久和平很难做到。

福特：对，几百年来他们都无法实现和平。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实现它，一旦成功，就将消除苏联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影响。如果局势保持停滞，那么苏联就有机会制造麻烦。因此，我们相信必须不断前进。西奈协议有助于我们同埃及实现良好关系。在下一次大选后，如果我们继续前进，争取更大范围的和平，这对将苏联的影响赶出该地区就会有重大影响。

毛：我不反对那样做。

福特：关于南亚次大陆，我们希望通过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基地保持我们的影响。当然，我们将不断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已经取消了对他们的武器禁运，所以他们自己可以想办法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印度相信，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值得尝试。

毛：那样很好。

福特：主席先生，你对孟加拉国的局势有何看法？

毛：那里的情况正在变好，但还不稳定。我们准备派个大使过去。也许他需要不少时间才能到那里。

福特：你是否感到担忧，印度可能会插手，对孟加拉国采取军事行动，取得主导权？

毛：有这种危险。我们必须警惕。

福特：主席先生，印度总是会做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反对其他国家。我希望他们不会在孟加拉国上面犯错误。

毛：确实如此。如果他们在那里采取行动，我们将会反对他们。

福特：我们正在同巴基斯坦和伊朗合作，阻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谴责任何印度的此类行动。

毛：好，我们又达成了另一项协议。

福特：我肯定你同我们一样，很关心苏联在印度洋的存在，以及他们在东非的活动。这一类举动，我们都强烈反对。我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安哥拉〔14〕，我们正在那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防止苏联在那里得到一个在非洲大陆上的据点。

毛：你们看上去没什么办法，我们也没有。

福特：主席先生，我想我们双方都可以做得更好。

毛：我赞同把苏联赶出去。

福特：如果我们一起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毛：可以通过刚果和扎伊尔的金沙萨。

邓小平〔对毛说〕：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南非，它会卷进来。这会触怒整个黑非洲。这使得整个事情都变复杂了。

毛：南非名声〔15〕不好。

福特：但是他们正在阻止苏联扩张。我们觉得这是令人钦佩的。我们给了赞比亚和扎伊尔许多钱。我们想象，如果我们自己采取行动，并且中国和其他国家也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防止苏联获得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防止他们控制安哥拉的主要资源。我们强烈反对古巴的介入。现在，他们在安哥拉有五六千人。我们觉得这不是好事。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苏联。

邓小平：你的意思是，你们钦佩南非？

福特：不。他们强烈反对苏联。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件事美国没有插手。

邓小平：在安哥拉。

福特：南非反对安哥拉解放军。

毛：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福特：刻不容缓。

毛：我觉得安哥拉解放军不会成功。

福特：我们也希望他们不会成功。

基辛格：如果其他两个派别足够训练有素，我们就可以提供他们武器。这样我们就能防止安哥拉解放军获胜。那两个派别需要得到训练，需要理解游击战。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武器，但是需要其他人训练他们。

毛：过去，我们通过坦桑尼亚支持他们。但是坦桑尼亚会扣留某些东西。也许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扎伊尔。

邓小平：可能还是通过扎伊尔比较好。

基辛格：那就通过扎伊尔。中国方面也许可以使用它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对于非洲来说，如果莫桑比克反对苏联集团和安哥拉解放军，那么就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福特：但是，你知道，莫桑比克支持安哥拉解放军。这可能很难吧。

邓小平：不可能的事。

基辛格：我知道。不过他们可能不理解他们正在干什么，因为他们非常尊敬中国。

毛：我们可以试一下。

基辛格：我不觉得莫桑比克理解安哥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提建议，他们更愿意听中国的话，而不是我们的话。

毛：我们可以试一下。

邓小平：我们可以试，但是不太可能成功。

基辛格：确实如此。

毛：扎伊尔可能更可靠一些。

基辛格：扎伊尔应该成为一个提供支援的基地。我们从莫桑比克得不到帮助，但是也许他们会置身事外。我们不指望从莫桑比克得到帮助，但是可能他们至少会保持中立。

毛：我们试一下。

福特：我要再说一次，刻不容缓。因为其他两个派别需要得到支援。直到不久前，他们都做得很好。目前，局势陷入僵局。如果在我们、你们和其他国家做出努力之后，安哥拉解放军依然占据优势，那将是一场悲剧。

毛：这很难说。你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了？

福特：我可能会说，对于安哥拉就是这样。在动身离开华盛顿前，我刚刚批准对那两个派别提供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将面对苏联的挑战，击败安哥拉解放军。

毛：好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讨论世界局势，表达了我们发展双边关系、在许多问题上一起合作、解决许许多多世界冲突的愿望。

毛：对，现在有一些记者说，我们两方的关系非常坏。也许你应该向他们透露一些消息，给他们一些内幕。

基辛格：这需要双方努力。他们在北京也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毛：但是这与我们无关，是一些外国人透露出去的。

福特：主席先生，我们不相信报纸上的话。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国家要一起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关系很好。当我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希望你的人也这样做。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两方关系好，而是还要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关系好。

毛：我们会一点点来的。

福特：我们也会努力的。

毛：那就这样吧。

## 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1975.10~1976.1）

这是毛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多次重要谈话纪要。

清华大学刘冰〔1〕等人来信告迟群〔2〕和小谢〔3〕。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4〕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5〕，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1949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6〕，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7〕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8〕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因为，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9〕。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10〕、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11〕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12〕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13〕、聂元梓〔14〕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80%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15〕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16〕的《论孔丘》，冯天瑜〔17〕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18〕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注释

〔1〕刘冰，1975.8/10，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拼凑了《关于迟群问题的材料》、《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等材料，经过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转给邓小平上书毛。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的。1975.11.26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即中发[一九七五]二十三号文件，全文附录了这两封信。

1975.11.16政治局会议上，刘冰做了检查：“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处分；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迟群，原任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1968.7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0上教育部所属机构撤销。同年七月成立国务院科教组，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1971下，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

〔3〕谢静宜，原任毛的机要秘书，1968.7和迟群一样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971下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

〔4〕小平，指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5〕“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1975的工作整顿中使用的一个提法。1974下毛在不同场合、针对某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三条指示。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不抓思想斗争，只抓生产，并积极打击左派。

〔6〕指1962.9.24-27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需要几十年或更多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列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7〕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解放后，曾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1968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1968.10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1969.10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8〕林彪，1925加入中共。1958.5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

〔9〕“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大意是说我们住在这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不知道有汉朝，也就更不知道魏晋了。1975.11.20根据毛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暴露了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

〔10〕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部长。毛收到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的信，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11〕英国工党，英国两大执政党之一，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但从五十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社会主义应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反对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在现存制度基础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这些思想在工党内占了上风。

〔12〕1955.12.5美国劳联和产联合并。劳联，全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6年。产联，全称“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按产业原则建立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在劳联-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

〔13〕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X”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68.12分配到宁夏三○四厂工作。1970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

〔14〕聂元梓，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5.25曾贴出由她领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被毛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1973审查结束后，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转到北大仪器厂工作。

〔15〕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6〕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7〕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18〕郭老，指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19〕1976《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全文如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对天安门事件的指示（1976.4.7）

这是毛在听取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

毛远新〔1〕：〔我汇报了四月五日、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

毛：谁人建议的？陈锡联〔2〕？

毛远新：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3〕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毛：好。

毛远新：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手。〕

毛：〔点头〕嗯。

〔当我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4〕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5〕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

毛：公开发表。

毛远新：登报？

毛：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6〕等。

毛远新：市委报告不发了？

毛：不发。并据此开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毛远新：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嗯！

毛远新：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毛远新：好。上次会议，张春桥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9〕。

毛：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11〕

毛远新：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毛：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10〕。

〔我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毛：叶〔12〕不找。

〔我把叶剑英划掉。问：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毛：好。华国锋任总理。

毛远新：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毛：对。

毛远新：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毛：〔挥手〕快，谈完就来。

〔下午〕

毛：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13〕

〔1〕毛远新，1975.9毛病重，他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

〔2〕陈锡联，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76.2.2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3〕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

〔4〕华国锋，时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5〕北京发生的事，指天安门事件，“四五”事件，四月六日凌晨，毛远新给毛写了报告：

主席：

五日夜到六日凌晨，政治局部分同志听取了北京市汇报，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同志首先介绍情况，要点如下：

今天〔五日〕敌人闹得这么凶，我们估计不足，上午很被动，下午才扭转过来。

从现场来看，有组织地活动的约有二百来人；跟着起哄或表示同情支持的有四千多人，其中有十几岁的学生、社会流氓；其他是看热闹和过路的人。

昨天晚上的行动，捉了十几个，清理了花圈，今天他们早上六点就来了，提出1.要花圈；2.要战友。碰见MB、战士、公安人员就打，他们利用战士MB打不还手的纪律，硬往死打。总计：

伤：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民兵六十一人。

战士：五十二人，公安人员五十五人。

重伤：十五人，已送医院抢救。

烧毁汽车四台，砸毁汽车两台，并放火烧了历史博物馆南侧的小红楼〔现场市委指挥部〕。烧自行车一大堆。

查出一个地下"新造反委员会"。

下午决定只要歹徒动手打人，MB、战士、公安人员可以还手，并配备了短木棍，敌人的气焰马上就下来了。我们的士气大振。

市委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大喇叭广播以后，多数看热闹的群众都很快走散，一万MB和五个营的战士及三千公安人员带着木棍把闹事的人全部包围，分批清理，多数教育释放，捉了最坏的三十八个人，前天捉了三十九个，大部分有证据。目前天安门前恢复正常。

刘传新同志说：这次事件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即他们的矛头非常集中，各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攻击毛为首的党中央，这么多讲话、文章，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小平〕不提走资派，不正面提毛〔攻击的提〕，手法多样，朗诵诗词的，发表演说的，教唱歌的什么都有，很多不是这些年青人写得出来的，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

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人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意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里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这是历史上没有的。

够立案侦察的有三百多起，反动的东西共三百四十多件。

此外，从整个行动来看，完全是早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今天这么凶猛的反扑，出我们的意外，原以为昨夜打击了他们，得喘息一下吧，谁知趁我们拂晓调整兵力部署的时机，突然组织反扑，我们过于天真了，看简单了。

今天得了教训，准备明后天新的反扑，已组织了三万MB，九个营的战士，只要允许MB挨打还手，不用战士也可以对付。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卫戍区司令吴忠同志说：

现在已准备了三万多MB，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待命，市区内集结九个营的部队随时机动：

历史博物馆两个营，

小红楼一个营，

中山公园一个营，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个营，

市委机关一个营，

人大会堂一个营，

西单拘待所一个营，

市公安局一个营。

另外，还有三、四个师驻扎近郊待命。

今天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也差，上午没搞好，没有集中力量，在今天上午烧汽车时就应出动，但调动不灵了，指挥部没〔被〕包围，冲进去放了火，在一楼浇上汽油、点火。要把楼上的全烧死。楼上有MB指挥部的马小六、张世忠同志〔中央委员〕，有卫戍区两个副司令，市公安局两个副局长，他们从后门跳窗才跑出来，教训太大了。

另外，打不还手是指人民内部，那样的反革命，烧汽车、打人还不还手，吃亏了，他们连外国人也打，想制造事端，我们估计不足；暴露了我们工作中很多弱点。

今天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

政治局的同志一起研究分析了一下：

不要以为事情完了，天安门前大表演是在造舆论，下一步是不是在广场不一定，防止他们声东击西，准备更大的事件的发生。因此MB明天不要轻易出动，指挥要从全市着眼，不要只注意广场，遇事要沉着，看准了，不动则已，一动就要胜利。

MB要进行思想教育，讲清这根本不是什么悼念总理，是反革命暴乱性质。不要把MB手脚捆得太死，“小人却动手，老子也动手”。请吴德同志代表中央去慰问受伤的同志。

公安局要侧重侦察线索，找到地下司令部，只打击了表面这些年轻人不行，要揪出司令部。

部队也要加强教育。防止敌人也拿起武器，包括枪枝。要准备几个方案，徒手、木棍、不行就动枪。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

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望告。

退毛远新

四月六日三时

〔6〕吴德讲演，指1976.5下午广播的《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1976.4.8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予头直接指向毛，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请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保卫党中央，保卫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晚十一点，广场上的群众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清场时，先由卫戍区的徒手部队把广场包围起来，然后是MB出动清场。当时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凡是身上带有凶器的、带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带有反动传单的人，交给公安局审查，其余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后实际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后，又陆续大部释放。整个清场过程，免不了发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死一个人。”—《吴德自述：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真相》

〔7〕邓，即邓小平。

〔8〕春桥，张春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9〕纳吉，1956.10.23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数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匈牙利进行全面改革、纳吉重新出任政府总理和苏联驻军撤离匈牙利等要求。当晚，这场示威游行演变成群众武装暴动。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纳吉出任总理。纳吉政府坚决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和恢复多党制。苏军出兵镇压。匈牙利十月事件很快被全面镇压下去。纳吉被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8.6.16被绞死。

〔10〕苏振华，时任海军第一政委、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上将，在解放战争中参与了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是邓小平的老部下。1975积极配合邓小平的“整顿”。

〔11〕中共中央1976.4.7通过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2〕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1973邓小平复出的倡议者，1975积极配合邓小平的“整顿”。毛在1976.1指出“剑英七五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

〔13〕中共中央1976.4.7通过决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 祝贺印度支那三国抗美救国战争取得胜利（1975.4/12）

（略。）

## 后事交代（1976.6.15）

这是毛同部分政治局委员〔1〕的谈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2〕！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3〕。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注释

〔1〕当时在场的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

〔2〕静火以当年美国人的一个角度来为毛泽东时代做个注释，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旅行团成员、美国天主教《圣十字》季刊主编威廉·文·埃登·凯悉访华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毛的中国是个奇迹，但还不是天堂》，1976.9.5出版，摘要如下：

我作为纽约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发起的由十二人组成的旅行团成员之一，在中国的广州、南京、杭州、上海、北京五大城市以及部分郊区，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访问虽不能使我取得像一个中国通或关于中国问题职业观察家的那种资格，但这次经历，可以帮助我更正确地观察和理解今天的中国。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我对新中国人民可贵的道德风尚感触最深。中国人热诚友好、勤劳、聪明和勇敢、有献身精神、有良好的纪律，他们可以信赖和靠得住。

在我的访问旅程中，我特别作过一番努力，想了解中国的宗教现状。我得以会见一些当地中国的宗教各教派的领导人：在杭州的一位伊斯兰教的阿訇，在上海的一位基督教牧师，在南京的一位圣公会退休主教以及在北京的天主教主教和神职人员。从我能够搜集到的每一项意见中，按我看，显而易见，全部宗教，特别是带有组织形式的宗教，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外国的还是本国的，已经几乎完全地从中国生活和思想中消失了。找不到地下宗教活动的任何证据，所以谁也不能讲那里是否具有任何重要意义的个人宗教信仰或活动。

过去二十五年来，由于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美国院外活动集团无休止的宣传机器所助长的普遍看法，美国人曾经把中国宗教的衰亡归因于一个无神论者政府的无情的镇压。这种看法毫无事实根据。无人否认共产党领导人是无神论者，他们不把宗教置于重要地位，而且尽最大努力不让它扩大影响，特别在青年中间。但是他们的总的政策与其说是迫害宗教，毋宁说是忽视宗教。对他们来说，宗教不是那么重要。显然，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既然宗教今天在中国是无足轻重的，十分明显，它跟新中国人民发展固有道德风尚是毫无关系的。这一事实给神学家提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样能够说明如此人数众多的一个国家会那样普遍地表现出这种道德风尚，而在西方，这种表现则总是被认为是同宗教信仰和宗教动机联系在一起的。

那些其创始与发展同宗教有密切关系，并直到今天仍在高唱宗教的重要性的西方国家，其公共道德水平有多低，如果中国人能够知道，他们无疑将会大吃一惊。这些有宗教的国家今天的暴行、贪婪、不公平、自私自利、偏见、色情、犯罪、吸毒和行凶泛滥成灾，但是没有宗教的中国却正在培育出一个健康和有道德风尚的人民。

当我在新中国各地旅行时，一个根本问题始终萦绕脑际：他是怎么完成这项工作的呢？毛怎样去说服那么多的人对他的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如此热情地给予合作呢？

也许美国对华院外活动集团最恶毒的谣传就是说，毛和共产党人，在他们内战获得胜利后，在一场残忍的血洗中巩固了他们的政权。我们从一些包括总统和国务卿们的歇斯底里的声音中听到过同样的而现在已证明为荒谬的预言，说什么随着共产党在南越的胜利而来的将是这种血洗。这种断言没有得到客观的证据。毛不是蒋介石。1927蒋在上海背信弃义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而这一事实有文件可以证明。

毛所以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改造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取得他的令人震惊的成就，是因为他很了解他的人民。他了解他们的潜力和他们的固有财富，并动员他们为争取他认为能使他的人民确信是为了他们本身的最高利益而奋斗的目标。他的“为人民服务”的著作是基本的和革命的。他了解他们的道德品质，向他们呼吁，并把他们加以发展而赢得了他们的合作。

1949当毛接管那个国家时，它是一片混乱。25年后，他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和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一个具有自尊心和道德风尚的八亿多人民，生活在迄今所建立的一个最不分阶级，正义的和公正的社会，在那里每个公民够吃够用而没有那一个人享受过多。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它本来很容易会给世界其它部分带来无法忍受的担子，而它现在却是一个保证人人在衣食住行方面都照顾得像个样子的自给自足国家的典范。过去被称为一个不像样的国家，而今天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了。

如果说毛的中国现在是一个奇迹的话，它还没有变成一个人间天堂。他们强调一致、公民、小组和“我们”。而我们则强调能提出异议的权利、强调个人、人和“我”。毛认为个人存在于集体之中，并为集体而存在，而且个人是在集体中才能获得幸福和才华的发挥。而我们则认为集体是为个人而存在的，而且集体的福利和力量的发挥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

对中国问题的任何探讨中，必须记住毛的中国今天仍处于它的初建时期，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们的缺点和他们为了取得二十五年的光辉灿烂的成就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去吹毛求疵。

有一样东西是毛的中国如此生气勃勃地向世界各国，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提供的，那就是对人类的一个希望。中国一度是大国中间最病态的一个国家，而今天它是最健康的。我们环视全世界，到处看到像是走向死亡的重病，我们能从毛的中国的榜样提取希望。在那里，我们曾经学习到，有一个明智的和无私的领导，任何病态的国家也能够自行走上恢复健康之路。毛由于他为他的国家所作的一切将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杰出的、创造性的领袖而载入史册。

〔3〕1976.10.6拥护文革的左派力量发生分裂，华国锋和叶剑英发动“十月政变”，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1977.7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复出后三年中，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影响，走资派势力逐渐控制中央，并在1980.12.5发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点名批评华国锋，“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1981.6.27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华国锋下台，至此，走资派势力全面复辟。

# 《毛泽东文集》选篇

## 更宜注意的问题（1922.5.1）

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说劳工不应该撇开，那末，这个劳工仅有的“五一”纪念日，至少也值得大家一注意吧!

大家注意，就请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除开那些重利盘剥的人，坐拥遗产的人和挟资经营产业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这些劳工从他们身上所产生一面他们自己恃以得食一面资本家又恃以获利的唯一东西的“劳力”，一定靠着一件东西，就是工人本身的“生存”。不能“生存”，自然就不能有“劳力”。这样的结果，工人自然得一个“死”字，但资本家又岂能独得一个“生”字?依这个理’由，所以准备做十八岁以上的大劳工的那些十八岁以下的小劳工，不可不予以相当的食物使保存生命，慢慢有力可卖，这实在是聪明的资本家应该注意的。在世上卖过力的劳工，当他到了六十岁以上力卖尽了再不能卖力的时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也应该使这些劳工尽其天年。依这个理由，那些六十以上不能卖力的人，应该给与他一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

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这无论怎么样聪明的资本家也不会注意的。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若生存权和劳动权，并不违背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值得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失业?

“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926.3.18）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的讲演，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上原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

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五十五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才举行纪念呢?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

关于巴黎公社的经过，近几日的报纸都有记载，即《新社会观》[2]一书内，也有简单的叙述，想各同志都已看过，可以不必多讲。现在只把纪念巴黎公社的几个重要意义说一说。

巴黎公社，是1871.3.18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五十五年了。我们要问，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发生于百年以前，而发生于五十五年前的今日呢?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地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这是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马克思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民国三年的欧洲大战，丧失了许多的生命，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结果得到了什么?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现在一般资本家宣传说：“对外的战争是有益的，对内的战争是无益的。”我们却要进一步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才有意义的；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此应注意的第二点。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此应注意的第三点。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1917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1925国民政府打倒杨、刘，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这是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第四点。

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极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试看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法国资本家所残杀者统共不下十万人，而俄国革命所杀的，最多不过几千人。“赤色的恐怖”实在不及“白色的恐怖”多了!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实证。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1]序

《农民问题丛刊》，是毛泽东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九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的，旨在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原计划出版五十二种，实际上出版了二十六种。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要么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要么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形势，只能是其中一种。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凡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亿元的消耗，90%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向党里要到命令，去乡村中，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预计：全国三亿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10%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第22~26种)。关于此问题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编印。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议决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经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详细地翻过来。本书内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较的详细，我们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较一番。

##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这是毛起草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

二月七日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

……

##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1938.1.11）

这篇文章，是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节录的毛泽东一九三四年所著《游击战争》一书中论游击战术的一部分，后经毛泽东修改校正，发表在《解放》第二十八期。

**一、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

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讲到战术，则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不是别的，乃是袭击。袭击是攻击的一种，游击战争不注重正规的阵地攻击这种形式，而注重突然袭击或名奇袭的这种形式，这是因为游击战争是战略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非如此不能达到目的。

**二、袭击战术的要领**

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要领，一般地可以举出如下十二条：

1. 袭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有秘密而周详的计划，迅速而突然的动作。
2. 游击战争袭击的目的，总的方面，在于消灭小敌，削弱大敌，扰乱敌之侧翼与后方，配合游击部队之政治工作，破坏敌之政权，唤起民众抗敌，保持或恢复抗日政权，由此以创造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配合正规军作战，因缴获武装使游击队逐渐发展成为抗日的正规军。至于袭击的具体目的，则在各个消灭敌之小部队，扰乱敌之大部队，消灭敌之民团，破坏敌之后方机关，破坏敌之交通路等等。
3. 袭击要选择有利于袭击的条件。无此条件或条件不足时则须注意造成之。这在许多时候是可能的，只须根据敌人部队的素质、指挥者的个性以及其战术的运用等，而采用如下的办法：
   * + 1. 骄纵敌人。例如故意以战斗力不强之游击小队与敌周旋，使敌以为不要紧，而在敌人不防备时突然袭击之。
       2. 麻痹与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使敌捉摸不定，因而袭击其一点。又如派遣游击小队或小组用大游击队署名的标语或布告活动于甲地，而大游击队则实行袭击乙地或丙地。
       3. 疲劳与恐吓敌人。例如动员民众坚壁清野，使进攻之敌饥疲不堪。又如将游击队分为数起，或派遣许多游击小组，不时进袭驻止之敌，使之一夕数惊，发生疲劳情绪，然后选择适当之时机袭击之。若敌人虽多，但素质不良，指挥者懦弱，则散播谣言，虚张声势，以增加其动摇，然后举行袭击。
       4. 派遣间谍打进敌人驻地，取得当地人民及敌人内部士兵同情于我者，以作我之内应，便利袭击之成功。
       5. 使用游击小组及人民自卫队四出活动，使他处敌人固守一地，钳制可能应援之敌，使我在另一地之袭击易于成功。

以上这些，都是以自己的动作变化敌人的情况，便于游击队的成功，虽不是一定有效的，然而是往往有效的。

1. 袭击前之侦察，这是首先重要的。侦察的内容，应该注意下列各项：
2. 敌人兵力多少，战斗力强弱，武器如何。如准备袭击驻止之敌，则须知道敌军配置情形，警戒程度，及其换班秩序等。
3. 附近有无其他敌军，兵力多少，可能增援的程度如何，运输速度，距离远近，电话电报联络情形，最低限度的增援时间，增援方向及道路状况，均须一一查明而考虑之。
4. 附近居民的情形。
5. 袭击部队到达准备袭击地点的大小道路及有无隐蔽接近地。

侦察上列各项，须以秘密而巧妙的方法出之。侦察愈详明，则袭击计划愈能正确。可能时顶好预先绘出一简易地形图，并将敌人配备标记出来。

1. 袭击的时间问题。不外下列四种：
2. 在夜间。这一般是对驻止之敌，因在其他时间袭击不利而采取的。一则利用夜暗最能隐蔽接近敌人；二则夜暗冲锋，可以减少自己的损伤，并可扩大自己的声势，增加敌人的恐慌；三则邻近敌人夜间增援不易。因此游击队须经常注意夜间动作的练习。
3. 在拂晓。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实行的，即是利用夜暗行军接近敌人而于拂晓时实行攻击，这在游击队离敌较远或夜间攻击动作尚不熟习时，是袭击的最好时机。但冲锋开始，须在敌人起床以前为宜。
4. 在黄昏。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说，在其他时间敌人均比较注意，同时接近敌人的道路又较隐蔽，白天行军不成问题或通过地区可以伪装时，采用此种时间袭击之。在此种时间，万一袭击不成功亦可利用夜暗安全撤退。
5. 在白天。敌人运动多在白天，故袭击行动之敌大都选在白天。游击部队欲最有效果地袭击敌人，必须不丧失敌人正在行动中的机会，此种时机必须普遍采用。此种袭击多为伏击。如欲白天袭击驻止之敌，则须在下述情况下方可采用：1、敌人素质甚差，不机警，无工事，疏忽已极；2、敌人根本不知道游击队要来袭击；3、孤立无援之敌；4、大雨大雾最易隐蔽袭击动作时。在这些情况下，白天袭击驻止之敌，也是可能成功的。
6. 必须保持袭击计划的秘密。袭击敌人虽有好的计划，若此一计划被敌人知道了，则不但一钱不值，还有遭受损失的危险。所以袭击计划之严守秘密是最要紧的。除了第三项所述尽量利用抗日人民及游击小组四处活动以迷惑敌人外，还应该注意下列事项：
7. 袭击计划不应全部告知部下，只告部下以应知之事或分段告知之，如在出发前、行军中及到达目的地以后。
8. 对驻地人民及所请向导，均不应使其知道游击队袭击的企图。
9. 可能时，在出发时先向假方向走一段路然后折转向袭击目的地前进，这在敌人耳目众多之处可采用之。
10. 袭击部队的开进。下列各点是值得注意的：
11. 如有必须通过的河川及障碍地段，应于出发前研究通过方法及携带必要的器具。
12. 携带标语布告等。
13. 约定各种记号，例如开始冲锋记号等，并规定袭击不成功及遇特种困难时的集合场。
14. 行进中选择极隐蔽的小路甚至走没有路的地方。
15. 行进中保持极端的肃静，禁止说话与笑声。除侦察警戒人员外，其余队员均不准装红子(只装暗子)。
16. 在行军纵队先头，派出少数便衣武装的侦察人员担任直接的侦察与警戒。
17. 行进尽可能地快。
18. 行进中，要有遭遇敌人的战斗准备。
19. 到达袭击目的地以后的动作。这是全部袭击计划中的重要关节，应注意：
20. 迅速在敌人警戒线外隐蔽集结，如果敌人还不知道，切记不要惊动他。此时部队首长应迅即召集各分队首长，指示具体的攻击方法。在白天，要引导各分队首长隐蔽观察敌人的配置，当面指示各分队的具体任务。如有可能，则以便衣侦察员不动声色地捕捉敌人的步哨，进一步察明情况。
21. 兵力大(一营以上)则将全部分成两路(不可隔得太远)实行攻击，兵力小(一连以下)则一起投入冲锋就行了。
22. 派遣少数人枪，在不易攻击的方面举行佯攻，钳制敌之一面，而以主力投入敌人薄弱较易冲击的一二点，但决不可平分兵力。
23. 在兵力优裕时，可派遣一小部埋伏于敌人可能逃走的方向，截断敌人去路。
24. 必须在敌人有增援部队的方向，派出少数人的警戒，并破坏其电话电报线及桥梁道路。
25. 准备攻击的位置，不应过近也不应过远；准备攻击的时间，要尽量缩短；准备攻击的动作，要尽量地快。
26. 夜间袭击，要有很好的识别标记，以免混杂不清。
27. 冲锋动作：
28. 冲锋开始，应按照预定的时间、方向、道路而迅速地突然地实行之。如分几路冲锋，则以主要之一路到达冲锋地点所需要时间之多少来决定全部冲锋的开始时间。其他各路应向主要的一路取齐，以免敌人过早发觉。
29. 冲锋开始时，不要作声，也不要打枪(就是敌人先打枪也不管)，也不要喊杀，而用刺刀、梭标、大刀，一下冲入敌人配置，实行格斗，迅速解决敌人。如果有手榴弹，应首先投掷手榴弹(注意——不要打倒自己人，只准在最先头的几个人打，后面的不准打)，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瞬间，扑拢敌身而解决之。
30. 只有在钳制方面，可以少数火器射击敌人而吸引其注意力，以便突击方向迅速取得胜利。
31. 如敌人固守房屋顽强抵抗，可实行放火烧屋逼其投降(只准烧其固守之屋，不准乱烧)，或趁敌人混乱之际从其他房屋袭入之。
32. 如袭击成功，敌人溃退，则担任埋伏截击之部队首先应努力堵截，此时突入部队应不顾武器、财物之缴获，除管理俘虏、警戒战场之必要部队外，其余均应跟踪追击，期于大量解决敌之有生力量，使敌无反攻之可能。但在有增援敌人之顾虑时，则不应远追。
33. 袭击后的动作：
34. 袭击成功时，立即把部队集合，连同伤员、胜利品等，带到通来路有阵地的附近集结，并以一部占领阵地，防止敌人反攻。
35. 如残敌远逃，已无反攻力量，又无增援敌人之顾虑时，则袭击部队可在当地留相当时间。此时以一部工作人员担任分发缴获敌人之财物于当地贫民，帮助人民反对著名的汉奸。而游击队主力则选择有阵地的地点，集结休息，绝对禁止自由行动。虽然如此，游击队主力一般仍不应在当地宿营，应移于离此若干里之优良地点宿营。
36. 如情况紧张，则应缩短处理战后工作的时间，以便游击队能迅速地胜利地离开此地。
37. 关于处置俘虏，在离自己根据地或抗日正规军不远时，则将俘虏全部押送后方或交给正规军去处理。不然，则问明情况，给以适当宣传后立即释放，严禁杀害俘虏，仅对民众痛恶的汉奸首领可以在民众要求之下处决之。就是有时俘虏不愿跟着游击队走，亦只应解除武装将他释放。须知杀害俘虏只足增强敌人战斗力，于抗日战争是完全不利的。但在释放俘虏时，要注意保守自己行动的秘密，为达此目的，应把俘虏事先放走，而把没有走的关在一个房子内，使其不能看到游击队退去的方向。
38. 如袭击不成功，或袭击刚半而敌人增援已到，则应毫不迟疑地迅速撤退。如在敌人压迫下退出战斗，则应实行分散退却，同时以一部最精干的老游击队员担任掩护。退却后的集合场，多应是先一天的宿营地或是预先指定的。
39. 游击队就是在无严重敌情下撤退时亦应伪装，例如先向假方向走若干里，再折到真正要走的道路，用以迷惑敌人，失去敌人可能跟追的踪迹。
40. 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及城市。以游击队劣势的武器，去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或城市，只凭一般的战斗方法是不行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袭击的，但应注意下列的条件：
41. 最好在要袭击的城寨堡垒中，要预伏间谍或有同情于游击队的人民、兵士为内应，这种政治工作游击队要经常有计划地做。
42. 选择敌人警戒最疏忽之点，利用夜暗，乘其不备，悄然爬入。或在最危险之处，即是敌人最放心的地点，有时也是我们悄然爬入的最好场所，但这决不是经常的。
43. 如袭击被敌发觉，则以小部在他方向佯攻，吸引其主力，而以游击队之主力从其松懈处薄弱点袭入之。
44. 在白天实行远距离的袭击，在可能情况下，可伪装敌军，乘机袭入之。
45. 在城堡附近的野战中击溃敌人，跟踪追击，乘势袭入，这是最有利的情况，不应放过此种机会。
46. 在抗日根据地附近的城堡，有时也在敌人薄弱的远后方，如果民众条件好，而游击队力量优裕时，可以采取围困爆破的办法。但必须在敌人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才能采取此种办法。
47. 扰乱或钳制敌人。扰乱是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附属部分，但也是必要部分，目的在于增加敌人不安，减杀敌人威势，以造成我们消灭敌人或逼退敌人的条件。其方法如次：
48. 在夜间袭击不成功时，则改变其任务为扰乱。高喊口号，大声唱歌，四面打枪，都是方法。退去之前可散发标语传单于空地上。
49. 在配合正规军作战，为了分散敌人兵力使其胶着一地不能增援其他方向时，亦可采用扰乱方法。此时可将游击队分为若干起，轮番于黄昏、夜半、拂晓等时间，潜至敌人驻地附近，突然地射击与呐喊，使其惊疑不定，无法增援或迟滞其增援时间。
50.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虚张声势。其法是在敌人驻地附近多插旗帜，多举烟火，即古人所谓设疑兵的办法。目的或在欺骗敌人，便于我方在他处之行动，或在恐吓敌人，增加其惊惶心理。此时我游击队只虚与周旋，决不要进入严重的战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三、袭击行动之敌**

上述十二条虽然说到了一般袭击战术的原则，然而主要地是说的袭击驻止之敌。游击战争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还以袭击正在行动中的敌人为多，所以游击队不应放弃一切当着正在行动而又条件适合的敌人的袭击机会。这种袭击按其性质都是遭遇战，但分埋伏与急袭两种。埋伏是预期遭遇的性质，但采取埋伏的形式。急袭是不预期遭遇而发生的，采取急袭的形式。前者是游击队重要的战术，故说明较详。后者是偶然情况，故只略为述及之。

1. 埋伏即伏击，是游击队有计划地隐蔽配置于敌人必经道路的一旁或两旁，待敌通过时而突然袭击之。这种动作，就叫做伏击。根据情况及配置的不同，分为两种伏击方法：一、待伏。预先在敌人必经道路上埋伏好，待其通过而袭击之；二、是诱伏。以主力埋伏好，而以一小部故意示弱，诱敌至埋伏圈内，然后袭击之。
2. 根据敌人战术、部队素质及地形等各种不同条件，埋伏可以采取一侧埋伏，两侧埋伏，多面埋伏或重层埋伏等几种方法。
3. 埋伏的目的在于：
4. 消灭或打击敌之步兵、炮兵、骑兵、运输队、征发队、汽车、火车、船舶等。
5. 捕捉敌军单个或多个通讯员、侦察员、电话员、采买员等，以搜集关于敌人的情况。
6. 以埋伏截击败退之敌。
7. 埋伏，首先要求明了情况。若情况不明，则或致落空，或反受损失。故埋伏前的侦察，须周详仔细。侦察应注意事项如下：
8. 侦察的方法：一、利用居民中同情于游击队的，使用各种方法去接近敌人，从敌士兵、夫子口中，得出必要的情况；二、使用便衣侦察员接近敌人，进行侦察；三、窃听敌人电话。第四，捕捉敌之人员，从其白头或文件上，得出消息。
9. 侦察的要求，主要的是敌人出发时间，兵力多少，将走道路，要到地点，行军力，有无特种武器及特别装备，有无辎重，行军中之通讯联络情形，行军时的特殊惯性等。
10. 侦察的技术，以能隐蔽自己企图、得到敌人消息为原则。侦察所得之消息，除对必须告知之人外，均应保守秘密，以防泄露。必须记着，不论在敌人后方或抗日区域内，随时随地都有敌人侦探潜伏的可能。
11. 伏击地区的选择。选择伏击地区以利于发挥自己最大威力、不利于发挥敌人最大威力为原则。因之，选择伏击地区时应注意下列各点：
12. 有良好的隐蔽，使游击队容易看见敌人，而敌人不易看见游击队。
13. 有良好的地形，使游击队便于出击敌人，而敌人不便于攻击游击队。
14. 埋伏地点附近之道路，须利于游击队退却，不利于敌人退却。
15. 埋伏地点，须选在敌人一般行军警戒搜索正面以外。有时道旁虽有良好地形，如果过于接近敌走道路，则游击队埋伏时的隐蔽集结地，应选在更靠后的适当地点。
16. 要有良好的观察地点。伏击最好是具备这些条件，但不是一定要这许多条件一一齐备，才能设伏。
17. 埋伏部队的开进：
18. 时间不要过早，免得游击队久处于埋伏中，减弱其紧张性与慎重性，容易暴露企图，增大敌人发觉的危险；但也不要过迟，免得来不及布置埋伏。
19. 行进路要隐蔽，宁肯走小路，甚至走没有路的山地谷底。
20. 行进时，先头须派出伪装的便衣武装侦探，以任警戒。如必须通过住民地，顶好全体伪装，以保持行动的秘密。
21. 到着埋伏地区时，即应封锁消息。
22. 伏击实施：
23. 配置兵力，应按照游击队兵力大小，敌人兵力大小及地形情况而定。通常以一小部(在全兵力30%以下)，占领险要地点，用火力杀伤和钳制敌人，而以主力埋伏于便于出击地点，实行突击。有时，应派出少数人枪在有敌人增援顾虑的方向或为便于撤退而必须占领的掩护阵地上，担任警戒。
24. 在袭击敌人大部队时，应放过其先头及本队，而袭击其后尾。此时如能以游击小组于敌人先头部队之前方侧方实行扰击而抓住敌人，则更便于伏击部队之袭击。还可以预先设法将道路、桥梁实行某种程度的破坏(泛滥，淤塞，石头拦阻，将一般的桥变成不良的桥等)，加长敌人的行军纵列，使之不易首尾相顾。
25. 如果是袭击敌人小部队，则可以堵塞其去路，截断其来路，而全部消灭之。
26. 关于开始出击的信号，各分队的具体任务，出击道路，何部首先射击等，均须预先详细告知各分队首长。
27. 出击以前，须极端保持隐蔽肃静，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随便探望。
28. 战场观察。顶好能设立两个观察所，第一个设在通敌人来路十里左右的附近，并带通讯员三四人，一律伪装，担任观察。将敌人行军长径，兵力多少，警戒搜索情形，不断报告游击队长，以便指挥者根据情况适时处置。这个观察所，须在敌人全部通过后，始得归回。第二个设在伏击地区附近，指挥者亲自观察，以便适时发出开始出击的信号。
29. 开始出击的时间，要选择得最好，要能抓住敌人行进中一个最适合于自己出击的时机。同时，还须要全体队员绝对服从命令，不准自由行动，免致敌人事先发觉。
30. 出击时的动作，要迅速猛烈，要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很短促地将所有火器一齐快放，跟着立即冲锋，迅速解决战斗。任何迟疑与犹豫，都是不利的。
31. 战斗成功，立即集合部队，处置俘虏，收集战利品及伤员，以便迅速撤去。如只消灭敌人一部，则撤退更要快，以免遭受敌人的反攻。若有不能带走的笨重物品，一律毁坏之。
32. 伏击不可能或不成功时的处置：
33. 如刚出击尚未进入战斗，忽然发现敌人兵力过大或被敌人预先发觉我之埋伏而早已占领阵地，出击毫无胜算，则应马上停止出击，断然撤退，以保存自己力量。这时候，需要指挥者之最高的机断与灵活的处置。
34. 已经进入战斗，但遇敌人顽强抵抗，确无胜利把握时，亦应终止战斗，决心引退。
35. 扰乱。有时目的不在消灭敌人，或伏击不能解决战斗，均可实行扰乱任务。其方法是用小部队，分散数处，以火力杀伤敌人，扰乱其行军纵列；或于高山峭壁处，推巨石、倒古木以杀害其人马。
36. 伏击敌人单个或少数的传令兵、采买、侦探等，则是游击小组或游击队所派出的便衣侦察员的任务。此种机会很多，不应放弃。
37. 伏击骑兵：
38. 敌骑的运动力和冲击力较大，所以埋伏时，应选择在森林或隘路(有时住民地也可以)，敌骑运动不便之处而实行之。
39. 集中火力杀伤乘马，则人员自易捕获。
40. 如伏击少数敌骑确有把握捕捉之时，可设置重层的多面的埋伏。
41. 可以伪装居民，预伏某一村庄中，待敌骑进入村庄人马分离时，突然袭击。
42. 伏击汽车：埋伏地点，应选在山谷、谷底、沟底、转弯处、上下坡处，并预先设置障碍、陷井，或埋置地雷(束集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亦可)，使汽车到此不得不停止或被炸毁翻倒。而游击队则埋伏于附近隐蔽地点，待汽车停止或翻倒之际，以一小部拦住先头，另以一小部截断归路，主力则直扑汽车捕获其人物。如有护卫兵士，则须先解除其武装，再行烧毁汽车。但对被俘之驾驶人员及士兵，须注意争取，不要杀害。
43. 伏击火车：
44. 在转弯处、上下坡处、有高堤处、洼地、隧道口，都是埋伏的好地点。
45. 方法：先卸松铁轨上的狗头钉或径拆散铁轨的一段，使列车到时，跌出轨外。或在铁轨上、隧道口上，用大石头大木头堆塞起来，以制止火车前进。而游击队则分为三部：一部占领阵地，预防列车上卫队抵抗。部对车厢射击。另一部则准备进入车厢，收缴枪械，俘虏人物。最后放火烧毁车辆。
46. 对装甲火车，则更应特别注意，因为它是移动的炮台。游击队一面不但预先卸松狗头钉，而主要是尽量用地雷炸毁之，待其倒坍后，再行出击。
47. 伏击船舶：
48. 游击队可以伏击的船舶，主要是敌人运输用的商船或较小的内河炮舰。
49. 伏击的地点，要在河岸上便于隐蔽之处、湾曲处、靠近我岸处。
50. 伏击时，游击队主要火器及兵力应准备迎击船头，而以一小部截击船尾，准备敌船回头时用火力拦阻之。待敌船一到，即猛力以步枪机关枪，顶好是炮兵(若无洋炮就是大土炮松树炮也可以)，一齐快放。
51. 如是木船，则迫令其停止靠岸，搜查其军械及资财。私船放还，并给船工以财物，官船则烧毁之。
52. 伏击敌人征发队：
53. 在敌人征发队尚未接近村庄时而伏击之。游击队须预先埋伏于敌人必经的道路旁边，待敌一到，突然袭击而消灭之。
54. 或在敌人征发队已进村庄分向各家征发时袭击之。此时敌人分散，不能集合，最易消灭，若预先在村庄内伪装埋伏一小部，而以大部从村外攻击之，则收效更易。但村内埋伏的，一定要等村外大部队先行动作，方免敌人惊逃。
55. 或因时间来不及，未能实行上述两项办法时，即可待其征发完毕满载而归之时，在敌去路旁边伏击之。伏击成功后，所获财物，应交还原来被征发之民众，只有在民众自愿慰劳游击队情况下，才可分取一部分，帮助游击队的给养。
56. 但对敌人征发队，无论何时伏击，均须以突然的动作，首先消灭其掩护部队，方能达到目的。
57. 伏击敌人运输队：
58. 应选择隘路或道路狭窄之处。
59. 若敌掩护部队的兵力较大，则可分游击队为两部，以主力同敌掩护部队战斗吸引其向我，以小部夺取运输品或烧毁之。
60. 若敌掩护部队较小，则首先消灭其掩护队，再夺取其运输品。
61. 伏击敌人运输队一般原则，须先射击其先头，使运输纵列发生错乱，夫子乱跑，道路阻塞；其次猛力消灭或驱逐其掩护部队，再行夺取辎重。
62. 若要防止运输队向后逃跑，须先以小部截断其退路。
63. 急袭：这是处置不预期遭遇的方法。
64. 在行动中的游击队，可能遭遇行动中的敌人讨伐队、征发队或运输队，所以，游击队在行动时应经常准备这一着。
65. 游击队行进时，应经常派遣便衣侦探在部队先头三五里处行进，以便遭遇敌人时能迅得消息，定下处置方法。
66. 如遇小部或兵力相等之敌，应即争取先机，将游击队迅速转入于敌人侧面，而突然向之开火，猛力冲锋，一鼓消灭之。此时若敌溃败，又无其他敌情顾虑时，则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消灭，但追击不应过远。
67. 如遇大部之敌或情况不明，则以毫不迟疑、迅速引退、脱离敌人为原则。如敌首先开枪，则我应以小部占领阵地抵抗，掩护主力先撤，掩护部队随后撤走，避免损失。
68. 总之，突然遭遇敌人，要有最快的决心，或打或走，不可迟疑。迟疑不决，是危险的。

以上十八条都是袭击行动敌人的方法，抗日游击部队应该加以研究。

但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抗日战争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可贵的经验，胜过过去文字条文的东西，希望大家共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3.30）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　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事变[2]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1925~1927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1921~1924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1925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1921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棋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1921~1927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员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棋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12）

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1942的计算及1943的预算看来，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还在内战时，中共中央曾经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建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那时，为了补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经发动过各机关学校种菜养猪的事。那时，只有军队还无生产的经验。那时，因为江西农民比较富庶的条件，还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这是历史的原因。抗战以来，我们是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的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迫得我们不得不从事生产自给，维持抗战的需要。这是现时的原因。

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1938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在那时，我们还只是令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其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的财政供给。后来看见试办的战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们果然能于教育之暇做出许多生产工作来了，他们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们因生活改良，逃亡现象也减少了。由于看见这些成效，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普遍地应用到那时留守边区的部队，由留守处下命令叫各部队都学着这样做。但也还是为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为着解决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时政府方面，开始注意建立了几个小的工厂，但对机关学校，则连种菜养猪我们也还没有叫他们做。1939国民党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曾经指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那时我们又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50~80%租税给他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的军队全部都是劳动力，没有女人，没有老人小人，又没有租税重负，为什么还会发生饿饭的事?我们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关，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住用问题?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这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比1938不同了，不是仅仅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决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动员的范围也不限于军队，而是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发出了开展一个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号召。《开荒歌》是那时唱出来的，《生产大合唱》也是那时产生的。这一号召，不仅动员了几万党、政、军、学人员，也动员了边区的老百姓，这年老百姓开荒达一百万亩之多。这一号召又传播到了华北，在战场上作战的八路军也有许多在战斗间隙中从事生产的。这是我们的生产自给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包括1938~1940三个整年。在这一阶段中，政府的工业建设发展了一步，军队与机关、学校发展了农业生产。

1941至此次高干会(1942.12)为第二阶段，生产自给的基础已经坚固地打下了。在这两年中，人员增多了，许多人因外边顿不住来到边区要吃饭，为了增强河防三五九旅也来了。军队增加了而外援全断，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而在取之于己这一方面，两年努力的结果，从总量上说来，是超过了取之于民那一方面的。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发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已经过去了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于农业，政府则发展了工业；第二阶段则着重了商业，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需要，除一部分部队与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的方针外，其余都讲究做生意，没有像在第一阶段那样地重视农业了，但政府、部队与机关、学校都发展了工业与手工业。此次高干会后将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作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协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

##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1943.12.17）

* 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
* 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
* 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 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
* 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 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 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的、无问题的。人是什么一种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2]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 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末，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
* 拿体质说，现在人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
* 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 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
*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7）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3.7.29）

一、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1918列宁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指资本家对其企业的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25%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指全国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在零售方面商品流转总额的大体比例）*。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25%；而75%+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稳步、积极、自愿地搞互助合作；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四、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五、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六、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营轻工业厂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同时还必须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纱厂、金笔厂等轻工业。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如税收等，也可以训练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虽然如此，还是要搞地方国营工业。现在地方工业上缴九万亿元的利润太高，应降下来，以利地方工业的发展。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七、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因此，不要笼统地批评“三高”政策。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应当降，也有明天应当提高的。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八、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

九、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十、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它是国营贸易的手和足，现在虽然财产还是你的，将来可以改为由国贸企业发薪金。从国贸企业批发商品而又转批发给别人的私商，算不算国家资本主义?我不作定论，由你们去讨论。其他私商，同国营企业没有联系，跑自由市场，自由泛滥的，不能算国家资本主义。

十一、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的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九月间把材料整理出来，发至各地。

##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954.9.14）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

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20%。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有五十万年，但其中四十九万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制这一条，因而没有进到文明社会。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在当时受压迫，就是因为有进步性，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时程潜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失败了，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60%，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还说过，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以上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意见，是否妥当，请诸位考虑。

## 同长征、艾地的谈话（1956.3.14）

长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毛：因为我怠工，所以拖迟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写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周恩来：《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

艾地：《毛泽东选集》出了第三卷之后，毛主席对第一卷、第二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

毛：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

艾：《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文章（指《战争和战略问题》）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

毛：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

艾：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

毛：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同志也曾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4.3.29他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应当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二十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

艾：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

毛：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还说一点，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真实，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说我曾经在一个深夜到离开延安四十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我是去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8.24）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7]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8]。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9]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 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10]，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11]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一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15]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慈禧反对戊戌变法向外国学习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956.9.10）

我们这次大会跟七大有相同的性质。那一次，为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一次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对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那一次的选举，达到了团结全党、使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1921~1949共二十八年，我们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少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过大的损失，吃过很多苦头，死了多少人，牺牲了多少革命的人民，牺牲了多少党员和干部。犯错误，受损失，不单是犯错误的人要负责，不犯错误的人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都觉悟，我们党内的人都觉悟，干部都觉悟，那个错误路线就行不通。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了，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但是作出一个结论来也还会犯错误。所以，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有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有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还有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从1921到1935遵义会议，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全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民主革命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我想，我们应该避免而且可以避免走那么多弯曲道路，主观主义这个东西可以更多地肃清，宗派主义也可以更少一点。我们这个党，在最近若干年以来，就中央来说，就高级干部来说，是个宗派主义比较少的党，也是主观主义比较少的党。你说主观主义有那么多，你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革命搞胜利了，现在搞建设又有了成绩。你说宗派主义有那么多，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陷于孤立?在革命时期没有陷于孤立，在建设时期也没有陷于孤立。可见我们的主观主义不是那么多，宗派主义也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有主观主义，还是有宗派主义，包括中央发布的文件中间也有。例如一长制，中央曾经批转过某些地区的经验，认为可以试行。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经验，就不能下一个断语，说一长制不好。一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断定一长制不好，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好。

现在讲党内的关系。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刚才陈云同志说了，几位同志也说了，这个名单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这个名单里头，工人少，上海工人差不多没有，天津工人也没有，武汉、重庆、广州、沈阳、鞍山、大连、青岛的工人也没有，北京工人也没有。那好，你这个中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是不是无产阶级的中央?我们这个中央历来就是无产阶级成分很少。现在开八大，全国搞工业化建设，无产阶级成分还这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在农村先发展先胜利。许多同志在根据地搞了很久，二十多年，也有一部分同志是在白区奋斗，有的长期坐班房。这些人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学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得成熟了，有一部分便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革命是最后胜利的，到现在才有几年时间。所以现在，也许到九大、十大，都不可能有很多工人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头来。刚才陈云同志讲了，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了，那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要起变化。所以，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不能说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中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你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帝国主义呀?为什么会搞社会主义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我们的党按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关于一百七十个人的中央委员会名单，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错误犯得也比较少，论才、论德、论犯错误的情况，他们都很好，但是没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这一点陈云同志讲了，别的同志也讲了，问题是这个名单如果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一扩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扩大到三百多。我们取得革命胜利还只有七年，如果照苏联那样算下去，到革命胜利四十年那个时候，可能要搞个两三千人的中央委员会!那就只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不要开代表大会了。

我还想起一个理由，应该再加以解释。别人的例子很多，我想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些人去考试，一个名叫孙山的人去看了榜回来，别人问他自己的儿子考上没有，他说“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意思是说最后一名是我孙山，你的儿子在我孙山后面，没有考取。这就是所谓“名落孙山”的典故。我说今天没有列上名单的同志，即名落孙山的同志，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当然这是说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也许是孙山以内的人将来起很大作用。这有两种可能。至于将来几十年以后怎么样，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我们可以不去管他。我们这个名单管不了。我们这个名单大概只管到二十世纪。同志们，我并不是许愿，也不是说你们现在不选上更好一些，是说要斟酌，要各方面平衡。至于哪个起作用大一点，哪个起作用小一点，这里头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刚才讲的名单中上海工人、天津工人、大城市的工人很少，这就是一种偶然性。必然性是经过偶然性来表现的。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是在乡村里头先搞的，乡村里搞革命的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你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我看山上确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大家都上了山，有这么多根据地嘛!

刚才政治局跟各代表团的负责同志商量，觉得可以增加少数人，如果通不过，也可以减少几个人。七大就是这样，有两位同志，几次在候选名单上提了他们，最后就是没有选上。这次也可能有个别同志虽然在名单中提出了，但是选不上。我们可以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们，权利完全在代表们手里头。因此，代表们在预选时，这张一百七十人的名单里头可以调换某些人，可以减少某些人，就是不要超过这个总人数。为了开票的时候好计算，不混在一起，可以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上你认为可以增加的人选，增加几个也可以，增加十几个也可以，你爱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这样搞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提供一些情况让中央考虑正式名单里头是否要增加若干同志。这样，中央可以根据得票数的多少，根据各方面情况，斟酌出一个正式的候选人名单，并且分出正式中央委员候选人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出最后确定的名额。比如不是一百七十人，而是一百七十几，或者还是一百七十，或者如果划掉的多，就再减少几个。这些都请同志们考虑。

## 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1956.9.25）

这是毛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中国过去也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的情况很接近。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广泛的同盟军。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严重的封建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因为有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取得了胜利。我国更其如此。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多的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

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知识分子下乡找农民，如果态度不好，就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农村事物、农民心理不大了解，解决农民问题总是不那么恰当。根据我们的经验，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使他们相信我们是为他们的好处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绝不能认为农民一下子就会相信我们。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我看，亚洲有些国家的党，农村工作也没有搞好。

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以后，是第三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6]。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总书记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我看很多国家的党，总书记不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对农村懂是懂得一点，但是不深刻，因此，发出的指示不很符合农村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走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你们的国家有没有这两种资产阶级?大概都有的。

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地主。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

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冤家。中国有句俗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鉴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敌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和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又是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因此，我们要同他们作斗争。但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要有理　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为此，要调查双方面的情况，要调查工人的情况，也要调查资本家的情况。只了解工人，不了解资本家，我们就没有法子同资本家开谈判。在这方面也要作典型调查，解剖一两个“麻雀”，也要用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个方法。

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你们现在还没有取得政权，你们准备夺取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无日期）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十个问题前面加写的一段文字。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无日期）

这是毛泽东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谈话。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末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问题，科学家们还在争论。

(于光远: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中有灵长类，猴子就是灵长类动物，但也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没有概念。

(于光远: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行不行?)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像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100%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100%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康熙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结果。

##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1959.10.26）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1917.2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1]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1955和英共波立特(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1957.11莫斯科会议宣言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1945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1946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和平。1949春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

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一百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九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6]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像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将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

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12-1960.2）

**一、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划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2]。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3]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4]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展了。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这一段[5]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6]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7]、《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8]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德国的和俄国的。

**二、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9]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五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10]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这里说，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11]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12]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13]后，杨杏佛、史量才[14]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国际[15]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一个决议中说，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16]这个决议没有区别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甚至认为中间派比蒋介石更危险。当时的“左”倾冒险分子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结果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这个决议也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立三路线[17]就提出，一省或数省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讲“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18]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19]说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布尔什维克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于中国革命，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20]那样激烈的斗争。

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21]。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

这一段[22]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23]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现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元定息[24]，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教科书的这个提法[25]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教科书承认我们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的，但是，它没有写清楚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它也没有吸收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现在来说，已经不是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26]。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27]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28]。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9]，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30]的建设。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31]。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32]。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33]，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34]。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35]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36]，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这段[37]讲得好。“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这个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38]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

这段[39]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0年。

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

这里说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九十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十七点五倍，问题是，九十三同十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

这一段[40]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年估计可生产钢材一千三四百万吨，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怎么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呢?

这里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41]，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这段话[42]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上不去，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东欧各国过去几年都是这样的。从一九六○年起，我们要增加农业所需要的钢材。

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

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

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我们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43]中曾经说到，要用四个五年计划到五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末，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例如，在河北省内，京汉路沿线的机井很多，津浦路沿线的机井却很少，同样是河北平原，同样是交通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却各不相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或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为”。同在上海，有的养猪养得好，有的却养不好。崇明县，原来说那里芦苇多，不利于养猪，现在却看到芦苇多的条件下不但不妨碍养猪，反而有利于养猪。这些说明养猪多少、好坏这件事，同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同“事在人为”是密切相关的。北京昌平县过去常闹水旱灾害，修了十三陵水库，情况改善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吗?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以后再用几年，治理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事在人为”。实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

这最后一句话[44]讲得不对。拿我国来说，粮食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应该改成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这是一个任务，不能说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解决了。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这里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需要厉行节约了吗?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45]。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46]，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这段[47]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　，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48]，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49]。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这一段[50]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这一段[51]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52]，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53]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的利益。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54]。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挚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3.23）

《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这篇文章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篇文章有些人可能会不懂得。因为文章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依靠、团结、打倒些什么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

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的路线。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错误的路线。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

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1929.12召开的，这篇文章是1930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不必再讲了。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后完成。

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则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最近，中央的文件提到农村要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强有力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因为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剥削阶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被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了?要做调查研究，可能还在有一些地方没有打倒，还在当权。大体上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过去的五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把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恰当地解决了就好了。至于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农民自己说，人是有眼睛的，不会看着他们饿饭，不照顾他们。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

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清楚。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料想到后来的王明路线，当时立三路线也还没有出现，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是有了。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

底下是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第二点是讲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开调查会人太多了比较困难。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五点是讲要亲身出马。这里讲，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第六点是讲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冶金、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去了解一个工厂。这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工业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现在我不反对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这回我就派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结合当地省委的同志来搞。我是间接的，并没有直接调查。现在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过去这样的调查难于办到，那时我们全部人马只有几千人。

至于第一节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

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又讲不甚了了呢?比较摸底，但还是不甚了了，我是讲“不甚”，不是讲你全不了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有些问题得当面交待一下。比如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至于调查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就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这一点。此外，还有什么横断法、纵断法之类的名词，可以不用。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他们讲我们不反对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文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我在1941.3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1930.5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那个秀才，年纪相当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就跟我讲了许多事情。我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还说过，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究竟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此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